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政治冒险家

切·格瓦拉 (下)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政治冒险家——切·格瓦拉（下）

克里姆林宫烂成一锅粥

10月27日。在古巴。苏联火箭部部队分遣兵团司令兼导弹基地司令员别尔乌金中将，在切·格瓦拉的支持、影响和鼓舞下，坚决执行古巴领袖卡斯特罗作出的严惩来犯者的命令，一摠指挥键钮，就把萨姆导弹送上长空，把美国间谍飞机打了下来。

这里霹雳一声巨响过后，美国立刻陷入了“黑色星期六”的无边黑暗，陷入在了一片的丧魂落魄中，陷入在了一片可怕的恐怖的悲鸣中。

然而，其实，这里还不是发生了最黑暗的地方，这里还不是最使人胆破心裂的地方，也还不是最为造成了惶惶和恐怖的地方。

造成了更大的黑暗，更大的惶惶和恐怖，仿佛已经是灾难临头的地方，是在离古巴还有一万三千公里遥远的苏联，那是在莫斯科，那是在克里姆林宫内赫鲁晓夫办公和已经连续几天须臾不敢离开的地方。通过电讯，那古巴上空的突然一声巨响，立刻似乎比霹雳更可怕地传到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耳道里，他几乎立时便为之魂飞而魄散，他甚至立时抱起脑袋来，在他的办公室内，想马上寻到个洞，就要往里钻了。

赫鲁晓夫马上打电话要所有能够求告和可以求告的朋友、同志和伙计赶快奔到他这里来：

“科兹洛夫同志，你快来吧，天要塌下来了！”

“米高扬·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快来吧，地要裂了！”

“米·安·苏斯洛夫同志，末日已经来临，你快来想想办法吧！勃列日涅夫呢？伊利切夫呢？还有福尔采娃，该死的小挨刀的，他们都哪里去了？”

应着赫鲁晓夫丧魂落魄的紧急电话，苏共中央的凡是正在莫斯科的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外交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首长，陆、海、空军，火箭部队，其他各兵种的司令员、政治委员、元帅们、主帅们，大将们、上将军们，还有一些此处比较少量的中将少将还有更少量的校官们，一时都乱哄哄地被一起召到了尼·谢·赫鲁晓夫的办公室里来。亏了赫鲁晓夫早有远见，在斯大林死后，尤其是在他当权之后，他亲自出主意，亲自指挥人马，不仅在莫斯科最漂亮的风景区列宁山上，建造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宽敞宏大气魄壮观的高级别墅和住宅区。在克里姆林宫内，他也一改列宁、斯大林过去在小屋子里居住和办公的传统，他亲自指挥建造现在所拥有的既能办公，也可以会客，甚至可以变成跳舞场的如此有气魄的宏大办公厅，如果当时没有远见造下这样的大屋子，现在忽然召来这么多的黑压压的人马，怎么能坐得下，站得开呢？

在这个宏大的办公厅里，现在站满了，形形色色的，粗的细的，肥的瘦的，有的脸相似猫，有的脸相如狗，比如米高扬，他的长脸，就完全酷似一只猎狗。他们有的笑容可掬，有的面目冷酷，比如马利诺夫斯基，实在很像一只穿着元帅服的大猩猩，那大下巴，几乎总是在向外地涨大着。这么多人物，这么多各色的人物，一时都聚到了赫鲁晓夫的衙门厅堂里来，高矮参差不齐，你推我揉，到处嗡嗡嚶嚶，大声说话或者窃窃私语，甚至有的老男人还伏在了年轻的女官员耳根上来咬耳朵，他们有的人开始发出嘘声，传递着惊慌、可怖的话语和气息，自然的，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都已经知道了远在万里之外古巴上空发生的事情了，所以，他们每一个人现在拥有的惶惶心情，充满了恐怖和绝望情绪，也是无须说的。不过，尽管如此，不知是谁，

不知为什么，是幸灾乐祸，还是怎么地，忽然发出了一阵“咯咯”的干笑，好像立刻要撕裂人们的神经要引发传染歇斯底里的大发作了，于是人们更嗡嗡嘤嘤地大声嘈杂哄哄起来，更显得哄乱了起来。

满屋子都是惊慌失措，绝望和似乎是世界进入末日的情绪。

而这时候，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更完全似乎是变成了这锅热粥烂粥中心的一把搅粥的勺子，他一会儿搅到这边，一会儿搅到那边，他大声地吵嚷着，大声地呼喊着：

“比留佐夫元帅！事情完全是你惹出来的，你说说，你怎样来拯救俄国吧！”

赫鲁晓夫扯着火箭部队司令比留佐夫的衣襟吵嚷。

比留佐夫悄然无声，不敢搭话。

赫鲁晓夫也不敢更深地质问他，因为比留佐夫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随便把导弹运进到古巴那边去。赫鲁晓夫心中完全清楚，祸是他自己打头招出来的。

但是，他仍然还是要抓替罪羊，他又抓住了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衣襟：

“元帅！这都是你出的好主意，是不是你在苏乎米海岸和我一起散步的时候，你指着海那边的土耳其说：美国人在那里设置了导弹，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古巴也针锋相对，设置起导弹来呢。你是不是这样说过？好一个聪明人！现在大祸惹出来了，你说怎么办吧！”

赫鲁晓夫冲着马利诺夫斯基又是一顿喊，然后，他忽然又跳到了苏斯洛夫的面前，愤怒而疑惑地挥起了拳头：

“苏斯洛夫同志，你为什么笑，你是在幸灾乐祸吗？原子弹飞来，你也会变成一堆肉的，你不要幸灾乐祸吧！米·安，苏斯洛夫同志……”

苏斯洛夫急忙辩白：

“赫鲁晓夫同志，我没有笑。你知道我的肺有病。我是在咳嗽。我为什么会幸灾乐祸呢！”

赫鲁晓夫还是说：

“你一贯阴阳怪气，叫人摸不着头脑！你完全可能心怀不满，不怀好意，因为你总以教皇自居，总想当上二把手，或者还想当上一把手吧！”

苏斯洛夫说：

“尼基塔！谁给了你这样的权力？你是酋长吗？你有什么权力来侮辱你的同事？我是主席团委员！”

赫鲁晓夫说：

“明天你可能就不是了！因为你在困难的时候，你竟敢笑话我，你竟敢笑话我尼·谢·赫鲁晓夫！”

苏斯洛夫只得再说一遍，嚷着说：

“我没有笑话你，我只是在咳嗽，我只因为肺有病，我忍不住要咳嗽！”赫鲁晓夫还要吵下去。但是，这时候，他终还是被阿·伊·米高扬喝住了：

“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忘记了过去那个人，他在的时候……”

米高扬点到为止。他不能把那个人的名字说出来。显然，米高扬现在是向赫鲁晓夫揭示当年斯大林的榜样。

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曾经大肆制造谎话，指责说斯大林在1941年6月25日德国法西斯突然入侵苏联时，斯大林一时惊慌失措，

完全失去了应对的能力，简直完全变成了吓坏了的白痴，几乎马上就要夹着尾巴逃出莫斯科，准备到古比雪夫逃命去了。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活灵活现、绘声绘色地描述过斯大林，说斯大林也有过这样的狼狈处境。米高扬当时听到了赫鲁晓夫的这话，不过，他当时就知道赫鲁晓夫是在扯谎，哪有过那种事情呢，怎么会有那种事情呢？斯大林，那可是斯大林呀！德国法西斯在白俄罗斯，在乌克兰，在1941年6月25日的那个早上，的确是突然袭击，突破了苏联红军的防线，苏联红军的确是立刻蒙受了巨大的溃败、把敌军引进了纵深，许多重要城市和战线，立刻在一日之内崩溃和陷落了，然而，在距离西部边境前线并非千里之遥的斯大林，并没有马上惊慌失措的手忙脚乱起来。赫鲁晓夫那时在乌克兰的基辅，他在那里当他的，被斯大林委任的“乌克兰王”，他并不在莫斯科，他并没有见到过斯大林在战争最初开始的日子的情景，可是，当时，作为苏联共产党最高领导成员政治局委员的阿·伊·米高扬，却是一目了然见识过当时斯大林的情景的，在克里姆林宫的大本营里，他一如往常地镇定自若，他总是安祥地坐在他的安乐椅上，从容地抽着烟斗，专注地静听着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关于战争形势的分析和战况的报告，前线的形势，确实是火上眉毛，十分危急的，但是，斯大林仍然能在他的办公室里从容踱步，条令分明而镇定地作出各种各样的应急的决断和调兵遣将的命令。斯大林从来也没有在任何困难危急的形势面前，表露出过哪怕一丝的失措和惊慌，至于到古比雪夫去的话，斯大林确有过这样的指示，在古比雪夫再建立一个二线的司令部，并把各国的外交使团迁移到古比雪夫去，但是斯大林本人，则从来也没有产生过离开莫斯科一步的念头，尽管后来为了绝对的安全，把列宁的遗体都从列宁墓中移出，秘密地运送到了苏联的远东地区秘密安放了起来，斯大林却仍然绝不离开莫斯科他的大本营，他的最高统帅的指挥员位置。

阿·伊·米高扬见识过斯大林当年的雄风和神采。见过那样的榜样的英姿，他也是真开过眼界，因此，他现在面对着在一锅粥一般慌乱的人群中，像一把搅粥的勺子一样胡乱搅动着的赫鲁晓夫，实在有些看不入眼。而且，阿·伊·米高扬最晓得可以镇定赫鲁晓夫的神经的穴位。他与赫鲁晓夫在眼下这班人群中，可以算是交道打的时间最长的一个。赫鲁晓夫的每一根神经，他都似乎可以清楚的摸到，所以，他也能够很准的针灸赫鲁晓夫的，可以便他镇静和安稳下来的穴位。

现在，阿·伊·米高扬，猛的这一针刺到赫鲁晓夫的穴位上来，赫鲁晓夫猛的一惊。米高扬显然刺得他有些疼痛，因此，赫鲁晓夫差点也冲米高扬瞪起眼来。此时正是最心乱如麻，急急歪歪的时候，所以，即使对米高扬，赫鲁晓夫也说不定会发急歪，发脾气，尽管米高扬曾经是他的头上的太阳，曾经是压在他头上的很大的领导，米高扬在已经当着中央首长的时候，赫鲁晓夫连个区委书记还不是呢。不过，彼一时，此一时也，不管过去米高扬何等高高在上，现在他不也在赫鲁晓夫的手下了吗？如果赫鲁晓夫真向他发脾气的时候，他也只能是乖乖的伺候着了。

不过，米高扬可是又狡猾又有手腕本事的一个玩政治游戏的老手。要说玩政治牌的圆滑娴熟，赫鲁晓夫除了颇富匹夫之勇之外，他那儿能在米高扬的话下？也许米高扬正是由于他的不可比拟的老练和政治上的无比的圆熟，使他不无谨小慎微，却又机巧有度，宁肯在一场又一场风波之后甘居一场又一场斗争中不怕冒风险争勇好斗的赫鲁晓夫之下，却也不肯充当任何挡风的

墙壁，出头的椽子先烂。后来的事实证明，还是米高扬当大官的时间来的早，在大官的位置上维持的时间长，下台比赫鲁晓夫还要晚得多，而且最后也还算善终。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赫鲁晓夫到后来，在政治游戏场上，也还是没有玩过阿·伊·米高扬。米高扬还是舵盘把的稳，最终还是比赫鲁晓夫高了一筹。

只是，在这一天的当时，赫鲁晓夫到底还是没有冲米高扬瞪起眼来。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完全的匹夫，他有的时候，还是能够相当有些机敏的。当米高扬向他当头棒喝一声时，他最初的一惊显然是想发火，在这样的朝廷里，有谁还能有捧喝赫鲁晓夫的权力呢，就是米高扬也当然不行。不过，他的脑海里忽地一转弯儿，他看到了米高扬，他终于好像看到了救命的稻草。

是呀，谁能有米高扬经多识广，见过世面，颇富经验呢？

特别是，米高扬此时此刻，还忽然又提到了那个人。赫鲁晓夫当然知道，能听出来，米高扬提到的那个人，当然就是指斯大林。

是的。赫鲁晓夫并不是完全不熟悉斯大林，恰恰相反，他是熟悉斯大林的。他是很见过斯大林的。他在斯大林的鞍前马后，身旁左右，当过了多少年的近卫军战士，曾经对斯大林几乎真的怀有过儿子一般的忠诚，喊“斯大林是我们最亲爱的父亲”，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赫鲁晓夫是有着独特的专利权的。从1934年在苏联共产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在大会发言中第一个独创发明这句说词以来，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之前，这句说词一直是赫鲁晓夫的口头禅，在没有任何一次的正式发言和演讲中，赫鲁晓夫是不反复重复这一个唯他独创的说词的，仿佛他总是害怕别人抢去他的专利发明权似的。而事实上，斯大林对赫鲁晓夫来说，实在也真可谓是他的政治生活之父。

人们可以推想，如果不是1929年9月里，赫鲁晓夫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进入莫斯科斯大林工学院，从而和斯大林的夫人娜佳成为同系的同学，进而成为娜佳的朋友，娜佳又很快把他引荐到斯大林身边的话，苏联的政治生活中，怎么能显示出来自顿巴斯矿区一个小煤矿的副矿长，一个普通的矿工出身的工农兵大学生，后来那种若大的政治天才呢？

事实上，完全是斯大林，把赫鲁晓夫提拔起来的。所以，说斯大林是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活之父，当然也属正确不谬。

只是后来，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突然在一夜之间，确实是在一夜之间，那是在1956年2月24日，在苏共“二十大”已经胜利闭幕以后，就在这个“二十大”业已闭幕的当天晚上，在苏共“二十大”上当选为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突然从这天夜里23点30分开始，到第二天的凌晨4点钟，召开秘密会议，赫鲁晓夫进行了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从那一夜开始，赫鲁晓夫这个斯大林的忠实儿子，就变成了斯大林的死敌，对斯大林极尽诋毁和泼污，直至后来扒坟掘墓，焚尸扬灰。

不过，尽管如此，儿子毕竟还是儿子，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活之父，毕竟还是他的政治生活之父。斯大林作为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活之父，作为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活的老师，在赫鲁晓夫身上，除了他难移的狡诈性不可更改以外，耳濡目染，斯大林也传给了他一些政治生活的技能和本事。

斯大林在这方面，无疑是无师自通的杰出天才。有谁教导过斯大林应该在政治生活中怎样表演呢？列宁在政治上，思想上，哲学和理论上，对斯大林有过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在政治生活的舞台上，特别是在国际政治生活和

斗争的舞台上，列宁也并没有导演过斯大林。

而斯大林在这样的舞台上，却始终能够自如地表演好他庄严的角色，他在这样的角色表演中，总是镇定自若，举步从容的在希特勒挥师进攻苏联，突然袭击突破苏联，大兵压境的严重局势中，斯大林没有惊慌失措，决没有像尼·谢·赫鲁晓夫今天在这里一样，在严重局势面前，立刻惶惶万状，完全变得像个跳马猴子一样。

还有，另一次，美国人也突然袭击斯大林，那是在 1945 年，罗斯福总统死了，新上任的美国新总统杜鲁门来到了波茨坦，他忽然想吓唬一下斯大林，扯着斯大林的袖子说：“元帅先生，美国现在拥有了一种破坏力极大的杀伤性武器，厉害的很！”杜鲁门总统很想吓上斯大林一跳，但是，斯大林的表情立刻令他失望，斯大林对杜鲁门总统的无异于讹诈的吓人话，所报之的，只是似乎是了不为意的，心不在焉的，淡淡的一句，轻轻的一句：“哦”。斯大林脸上找不到任何惊愕的表情。

杜鲁门总统进行的，事实上那不也是最初的核讹诈吗？可是，斯大林是怎样把他顶回去了呢？尽管斯大林在那时，实在也还没有原子弹，可以和美国较人较量，但是，斯大林还是把杜鲁门给顶回去了。

那是什么年代？

那是什么样的年月里的人物风采呢？

那不正是当年赫鲁晓夫政治上的父亲和老师斯大林吗？

可是，岁月流逝，到了 1962 年 10 月，斯大林逝世还不满十周年，到了赫鲁晓夫当政的年代，赫鲁晓夫这个本来在多数时候凭着匹夫之勇，气壮如牛的汉子，怎么受得如此泥巴牛屎一般的稀松平常，软塌塌了的呢？

当年，斯大林和杜鲁门较量，杜鲁门手中有了原子弹，斯大林两手空空，也许还有手榴弹，可是斯大林并没有被杜鲁门吓倒，并没有被杜鲁门吓的腿软下来。

但是，后来，斯大林下命令加紧制造原子弹。他下死命令，要贝利亚负责，两年之内，苏联一定要拥有原子弹，结果贝利亚不负斯大林之期望，一年零九个月，在 1948 年 9 月以前，搞出了苏联的原子弹，后来，斯大林死了，贝利亚被赫鲁晓夫杀了，但是，他们留下来的，造出来的原子弹、氢弹，已经足够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势力面对面，针锋相对地对峙和抗衡了。到了 1962 年 10 月的时候，美国和苏联，实际上完全是这样一种状况：你有原子弹，我有原子弹。你有氢弹，我有氢弹。你的导弹对着我，我的导弹对着你。实际上，这完全只是一种平衡的状态，是一种对峙的状态，是一种要想活，谁也不能动手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本来，能有什么了不起呢？

简直没有什么了不起！

完全可以说并不存在什么了不起。

可是，就在这样的状态中，赫鲁晓夫突然能在一点儿波澜骤起的时候，便完全地吓慌了魂儿，完全吓麻了手脚。

而正是在他不知该如何所以，不知该如何是好的，完全没了招儿，完全手足无措之时，忽然米高扬向他提起了“那个人”来。

是呀，“那个人”如果今天还活着，情景会是怎么一个样子呢？

是呀，“那个人”，不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样子，活生生的榜样吗？

米高扬向赫鲁晓夫提起了“那个人”，立刻仿佛真有了效应，真壮了一下赫鲁晓夫的胆子。他的已经被吓昏的神智忽然清醒了许多，他发现了米高

扬可以是根救命的稻草，他经多识广，富有经验，怎么现在不来问计于他呢？不早就应该问计于他了吗？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亲爱的米高扬同志，苏维埃国家，我们全苏联的人民，我们大家，我们的妻子儿女，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期，我们已经整个地，完全地，十分危险地处在美国的核打击的阴云之下了，你说该怎么办吧？我们在那边，我们派到古巴去的败家子儿，胆大包天，打下了美国飞机，美国人要报复，一场原子大战，即刻就要爆发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吧，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同志，你说这次该怎么办吧？”赫鲁晓夫差不多是嚷着声儿，他扑到了米高扬的身边，抱住了米高扬的臂膀。赫鲁晓夫情真意切，眼泪汪汪，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米高扬马上开始安慰赫鲁晓夫：

“不要慌忙。尼基塔！不要慌忙。有您和我们同在。我看，我们是能度过危险时期的。”

赫鲁晓夫马上打断他：

“米高扬同志，您不要唱高调了。现在不是唱高调的时候，时间紧迫。热核战争可能就在眼下的某一秒钟就要开始发生了，所以，您不能再唱高调了，您得赶紧拿出个能够行得通的主意来。”

米高扬说：

“主意会有的，赫鲁晓夫同志，主意会有的。”

赫鲁晓夫说：

“什么好主意，您快说吧，米高扬同志，你快说吧！”

米高扬眨巴了一下眼睛。

米高扬开始在心里打鼓，这主意怎么出，这好主意的话又该怎么说出口来才好呢？赫鲁晓夫是个心眼不大，而且多疑的人，他一向嫉恨比他聪明，比他有本事的人，比如贝利亚，比如马林科夫，比如莫洛托夫，当然，也还包括朱可夫，在朱可夫元帅身上，还可以看到赫鲁晓夫过河拆桥的品质。当年，朱可夫动用军队的力量帮助赫鲁晓夫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包括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赶下了台，可是，真是后来马上应验了“狡兔死，走狗烹”的这句话，赫鲁晓夫战胜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之后，几乎是第二天，就把他的帮手朱可夫元帅也登下了深渊。为什么？只因为朱可夫元帅在帮助赫鲁晓夫展开对莫洛托夫一伙人的斗争中，显示出了决定性的力量。赫鲁晓夫是不允许比他聪明，比他有本事，有能力，有力量的人永远呆在他的身边的。他一向最喜欢，最欣赏，最爱使用的人，不是马屁精，就是草包，不是草包，就是马屁精。斯大林过去喜欢聪明练达能干的人，赫鲁晓夫实际上最喜欢唯唯诺诺的草包；他以前内定的第二书记基里钦科，那是他从乌克兰带来的老搭档，可是，那家伙，绝对是全苏联最大的草包，最可鄙的无能之辈。后来，基里钦科作了替罪羊，被赶下台，赶到莫斯科以外的什么地方去了，现在又内定选了一个酒鬼、色鬼、马屁精外加双料的大草包，来充当第二书记，临驾在苏斯洛夫之上，当然也还临驾在他米高扬的头上，真是岂有此理，咄咄怪事！

米高扬对此愤愤不平，但他倒也并不十分引以为意。米高扬多年总结的一个宝贵经验是：官大有险。所以，要越谨慎越好，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恣意，不能放肆，说话必须三思，行事必须九思，决不能冒然，绝不能求一时痛快，一时得意，而忘乎所以，而轻率行事，不能顾前不顾后，不能不计后

果。

比如眼前的赫鲁晓夫，大火烧了猴屁股似的，差不多完全是要狗急跳墙起来，这时候，正是他头脑发热，头脑昏乱的时候，什么样的丑事、臭事，都有可能施行，都有可能干得出来，而事过之后，如果他忽然又要当事后诸葛亮，事后的大佛祖、大明公，追究丑事、臭事、错事，就是明明是他干的，是他亲手干的，他也会寻找替罪羊推委，他也要文过饰非，把自己打扮成一贯英雄正确的先知先觉，而别人都是大败势中的白痴、傻瓜、无能之辈、混仗东西。

想到这些赫鲁晓夫一贯的伎俩，一贯的个性脾气，米高扬在赫鲁晓夫求助他的时候，问计于他的时候，他不能完全不管，不能完全不闻不问。何况，这实际上也又到了他的一个显示才能和高明的机会，怎么能放过这样的机会呢？不过，无论如何，这是到了又一个关键的时期，非常的时候，他还是不能不小心为佳，谨慎从事的。

在过去的几天中，克里姆林宫里乱成了一锅粥，在克里姆林宫外的莫斯科，更是乱成了一锅粥。首先是从列宁山上的党政最高领导人们居住的别墅区开始，一辆一辆汽车，拉着高级官员们的老婆孩子、七姑八姨，以及儿子女婿，金银细软，宝贝物资，纷纷撤到莫斯科郊外，有的人家甚至已经在苏联的远东小城小镇包租下了房子，准备搬迁到那里去。大官们的家眷们这样行动起来，接着就会影响中间的官僚。部长会议的政府部长们，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们，也都纷纷行动起来，向莫斯科城外运送家眷，简直又像是1812年发生在莫斯科的故事差不多：拿破仑要来了，所有的贵族们，都在争相逃离出莫斯科。而1962年，莫斯科的贵族们，似乎也要在美国人的核威胁下，把莫斯科完全变成一座空城了。

然而，就在这样的纷纷嚷嚷的纷乱中，在所有这样的逃出莫斯科的车水马龙中，人们却绝对找不到任何一个阿·伊·米高扬的家属，完全找不到米高扬的妻子儿女。为什么呢？因为米高扬的家属更恋栈列宁山上高级别墅区高级住宅楼的所有现代化的齐全设备，他们的完全不忙于去奔波逃难，因为米高扬早已向他的家人们打过了招呼：

“战争打不起来。你们谁也不要动。你们哪里也不要动。”

他的亲属们提醒他说：

“赫鲁晓夫家把孙子、外甥们都迁到莫斯科城外去了。”

米高扬却说：

“那是他们家的事。你们不要迁。现在正值深秋。正是黑松林别墅那边蚊子咬人最厉害的季节。蚊子还会传染脑膜炎的，别弄的原子弹没有飞来，倒是蚊子飞来了，弄得孩子们得了脑膜炎。”

由于米高扬的坚持，确实，他们家的人，在从10月22日开始，进入最紧张的危机的日子以来，是一个人也没有离开莫斯科的。米高扬的家人们知道米高扬如果没有把握，他是绝不会不加谨慎冒然行事的。他们知道米高扬既然这样行事，想必是因为他手里确有把握的王牌。

当然他的家人也有怀疑的时候，因为他们听说了，赫鲁晓夫家的孙子外甥们撤到莫斯科郊外去，竟然还是赫鲁晓夫从克里姆林宫打回来的电话发出来的指示。可是，尽管如此，米高扬也不为所动，不准他的家人们照猫画虎。米高扬的家人们也能想到米高扬其实比赫鲁晓夫更富有经验，也更聪明和更富远见卓识，而且，他从来几乎都没有作过错误的决定，所以，米高扬的家

人们，到头来无论别的人家怎样人心慌慌，一片纷乱，仍然不受其扰，保持着家庭的安然的正常生活。

事实上，米高扬确实已经进行过对事态的仔细分析，他得出来的结论是，无论如何严重对峙，真正的战争现在不会发生，特别是真正的核战争，现在不会发生。因为他还没有听说，也还没有看到，美国已经选了个疯子或颠狂病人，来充当美国的总统。相反，据米高扬所知和听到的信息，据说美国的现任总统肯尼迪，倒是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比如，米高扬听说，1961年美国人指挥雇佣军入侵古巴，失败后美国人大肆鼓噪要求大加报复，可是，据说肯尼迪则认为：搞雇佣军入侵，本身就是错误的。这认识可真是棋高一招，足见其聪明。因此，如果认为这样的聪明人会糊涂地发动一场难说你死我活，也许只能是同归于尽的核战争的话，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所以，尽管从10月20日以后，从肯尼迪在美国白宫发出强硬讲话以后，苏美两国已经出现了严重战争对峙的严峻形势，米高扬却仍然坚持认定，核战争是打不起来的，因为核战争完全不可能是一两个顽童可以胡闹的把戏。

在克里姆林宫最高决策的主席团会议上，米高扬含糊其词地谈过他的这个观点。但是，这个观点和赫鲁晓夫的观点认识，有着完全不同的。所以，不容他说出来，说清楚，赫鲁晓夫就厉声地打断他的话，指责他没有伟大政治家的头脑，不能正确认识目前美国太强大了的这个客观形势，还是一套形而上学的旧思想，旧观念在作怪。

赫鲁晓夫甚至还点到了斯大林曾经对米高扬的一次批评。那还是在三十年代的时候，米高扬到美国去办外贸交易，在和美国的大资产阶级们打交道时，总有些自惭形秽直不起腰来的味道，因此，有些美国的新闻媒体，就作了一些米高扬在美国人面前不无奴颜媚膝的报道。斯大林看到这些报道后，等米高扬回来，把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叫在一起，大批一顿米高扬，批评他没有能够与资产阶级硬碰硬的硬骨头，甚至连不亢不卑也作不到。因此，赫鲁晓夫现在点到米高扬的这一次挨批，质问米高扬：“你是不是还在斯大林的阴影里走不出来，你要我们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进行危险的冒险活动呀！米高扬同志？不可能！”

所以，既然米高扬的判断、认识，不合赫鲁晓夫的胃口，与赫鲁晓夫的观点认识有异，因此，后来米高扬完全咽回了自己的认识和观点，宁肯充个哑巴，不再吱声。

不过，今天，现在，再不吱声就不行了。再不吱声，赫鲁晓夫就会说你也想幸灾乐祸，是见死不救，是一个野心家了。

很久以来，米高扬知道赫鲁晓夫越来越高不开他，可是也同时发现，赫鲁晓夫对他，也越来越警惕。有的时候米高扬能发现，赫鲁晓夫脸上的两个明显的肉疣会突然鼓着，两只褐色的小眼睛忽然瞪起他来，闪烁一种几乎明显显示权力威慑的，同时又是疑惑警惕的目光。

米高扬太知道伴君如伴虎的意味了。他完全知道，伴赫鲁晓夫，也只能是这样的意味，必须格外的小心，必须慎之又慎。

那么，赫鲁晓夫现在问计于他，米高扬事实上也成竹在胸，完全知道该照计而行什么新的办法。其实，有许多办法，是可以选择和实行的，完全可以镇定下来，从容的选择和实行，不必慌忙万状。

不过，米高扬心中有数，在赫鲁晓夫恣意发泄的时候，不能马上要他打住。在赫鲁晓夫办错事，特别是满腔热情、全力以赴办错事的时候，任谁也

不能向他指出错误，更不能对他实行批评。如果这样，这个到头来也改不掉老脾气的蛮子，改不掉其劣根性的狡黠的顿巴斯矿区游手好闲的小酒馆和妓院的暗门子里泡出来的二流子，总还是要嫉恨你不忘的，即使后来他知道你是对的，他是错的，他也会嫉恨你。因为，事实上，仅仅因为你比他聪明，他也会绝不忘怀地嫉恨你，永远嫉恨你的。

此时此刻，到底该怎样向赫鲁晓夫献计献策，献个什么计，献个什么策才好呢？

米高扬认为，再不能拧着赫鲁晓夫偏执劲儿，向他指出不大会会有核战争威胁和危险的存在。如果这样指出，已经认定处在核战争阴云之下的赫鲁晓夫，就又要跳起来，指责你是在不负责任，你是还要冒险的疯子了。他还会把你的话头打断的。赫鲁晓夫向来不会欣赏不能顺着他的思路和意志的献计献策，这已经是约定俗成的老规矩了，米高扬到了此时此刻，也还是不能不循着这规矩办事的。

毕竟米高扬老奸巨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不乏机巧和圆滑的智慧。他在脑海里经过一番三思九想，他终于向赫鲁晓夫说出一个差不多完全可行的良好计策来。其实，米高扬知道，他的这个计策，也不过仅仅是 $2+2=4$ 的数学题，简单的很，根本不是什么高等数学。但是，他却依然是极为郑重其事的说：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目前如此严重的事态形势之下，决策行事的最好办法，最佳办法，也许只能是——”

米高扬突然又打住话头，撩起眼皮来，抬起头，让眼珠子盯着大房子高屋顶上的水晶玻璃吊灯旋转起来。

赫鲁晓夫差点要急的跺起脚来了，他攥紧两只拳头，忽然朝地下挥着，冲米高扬急切地喊：

“您快说出您的好主意来，米高扬同志！”

米高扬终于又放平了脑袋，转回了脸来，仿佛是非常热切地伸出两只手来，把住了赫夫的两只胳膊说：

“到了这样严重的局势危急的时刻，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最好的应对处置办法，也许只能如此，那就是完全由您本人，来充分地展示您伟大政治家的风度了，你可以完全仅以您的名义，马上给肯尼迪写上一封电函，立即告诉他，您已经作出决定，苏联已经作出决定，准备开始从古巴撤出导弹。这样，马上便会釜底抽薪，使矛盾和对峙立刻不复存在，烟消云散。危险严重的形势和局面，将由于您的政治家的胸怀和风度，举重若轻的伟大作为，马上就会开始缓和进而逐渐的消解了。”

米高扬说出了他的好主意。

赫鲁晓夫瞪大了眼睛，盯着米高扬，半天眼珠子转不过来弯儿来，又老半天，才终于又眨巴了一下，问了米高扬一声：

“这就行了吗？米高扬同志。”

米高扬说：

“十有七八，这是可行的。尤其是由您来出面办这件事，直接和肯尼迪打交道，这件事是能办成的。”

赫鲁晓夫还是不无疑惑，但是，除了米高扬这样的好主意，谁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科兹洛夫甚至出主意要主席成员们都到鲍罗费克斯大教堂去搞一次集体祷告，恳请上帝来保佑苏联，这样的主意怎么能拿得出来，不

是简直荒唐透顶吗？吵了老半天无神论，忽然又去祷告上帝，请求上帝开恩保佑，而且是主席团委员全体去，如果真有上帝的话，愤怒的上帝不把大家的裤子都扯下来痛打每人一顿屁股，那才叫怪呢！赫鲁晓夫能采纳这样的“好”主意，干出这样的蠢事吗？

那还是不能够的。

赫鲁晓夫还是很有头脑的。

他现在比较出来了，还是米高扬更高一筹，更有一手。

而且，米高扬的主意更有体面的说法，好听的名头。严重的形势怎么应对呢？只要赫鲁晓夫同志展示一下伟大政治家的风度就可以了嘛。这是多么体面的办法呀！

真是好办法。

好了。就照这样的办法来办吧。米高扬还说八九不离十能成功，这就是肯定能成功的。米高扬这个老油条，没有十二分的把握，他是绝不会说十分的。

赫鲁晓夫这样想着。他准备要下定决心了。

接着，他立刻就下定了决心。好吧，就这样办了。

他迅速开始赶走多余的人，让那些元帅、将军们都走开，他这里现在只要留下一些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的书记处书记，得让他们大家帮他措措词儿，得让他们大家给他提着点词儿，以便他能给肯尼迪写好一封信。

赫鲁晓夫和斯大林绝不一样，绝不能比。斯大林有很多著作。他的讲话稿，重要的电文，重要的信件，都是他亲自动手动笔写。斯大林从来不用别人捉刀。而且，斯大林在文字游戏中，从来都十分挑剔，谁在俄文中拼错了一个词儿，变格不对，或者用错了标点符号，那都是不行的，那他都是要指出来的。可是，赫鲁晓夫在这方面，实在完全不行，他的文化基础太差，他的俄文拼写，就是直到后来，也完全不能过关，经常把“青天”拼写成“牲口”，甚至把“文化”拼写成“野猪”，实在很不像话。因此，他后来也绝不亲自动手抓摸文墨，哪怕是给他儿子写信，他也只是口授，而让他的秘书们来抄录。

赫鲁晓夫有好几个秘书，是从乌克兰开始，经过战争年代，一直带到他身边的，经常替他口授抄录文件的，是阿·萨秋科夫和鲍·列别杰夫，赫鲁晓夫一直把他们当作小文书来使唤，总是干一些抄抄写写之类的琐事，但是，他们实际上又是大秘书，级别都很高，都有相当中央副部长的级别，但是，他们在赫鲁晓夫这里，经常干的不过是记录赫鲁晓夫的口授文书，包括给儿女们写信，特别是给孙儿孙女们写信，写便条，赫鲁晓夫都不敢亲自动笔，他唯恐拼写错误被孩子们看不起，被别人议论讥笑。赫鲁晓夫有这方面的自知之明。他因为很久以来就位居高官之职，配有秘书，所以，他也就有了完全不摸纸笔的条件。

本来，在平时，在一般的情况下，诸如像起草什么文件啦，电文啦，公文信件啦等等之类的文书，在赫鲁晓夫这里，基本上是连口授也不作的，顶多是说上一个框框，说上一点意思，然后就全由秘书们起草拟稿，然后讨论修改，再反复一番，最后成文再写成定稿。赫鲁晓夫出手的文书材料，一般都经过这样的渠道过程。在通常的时候，他宁肯说完意思让秘书们去一边拟稿，而他自己悠哉悠哉独酌独饮白兰地酒，他才不来磨嘴皮儿搞什么口授呢。

然而，这一次。给肯尼迪写信，要展示一下他的伟大政治家的风度了。

这样的机会，他是不能让人来掠美的，这一次给肯尼迪总统写信，他完全坚持一定要亲自来口授。他只要求萨秋科夫来记录，让列别杰夫来打字，校印成稿。同时，他让主席团委员、书记处的书记们，等在会议室里，等着讨论，通过一下这篇信稿。

这时候，米高扬又提示赫鲁晓夫说：“里尼基塔！不要太匆忙，要充分展开您的才智，以充分的说理，让他明智起来。您是能做到这一点的。”

赫鲁晓夫说：

“当然。米高扬同志，我们务必作到这一点。我必须引导肯尼迪总统聪明起来，要引导他能像我们一样明智，我们决不能让他蛮干和胡来。这样，事实上，现在事关拯救全人类命运的大事，完全掌握在我们的手里，而现在世界的命运危在顷刻间，我们不忙些作好这件事，这怎么成呢？我们不能有任何懒懒散散的二流子思想，那是要误大事，捅大漏子的，我们不能冒那样的险，我们必须抓紧，我们必须对世界人民负责任，对整个世界负责任。”赫鲁晓夫似乎又要有些得意忘形的唠叨起来了，好像真的人类的命运都握在了他的手心里，人类真的就要全靠他来一手拯救了。米高扬知道他已经完成了任务，虽然他还有一整套想法，还有很多想法，他本来还是想有所进言的。他想提醒一下赫鲁晓夫，这封信，还应该仅仅是一种要求对话而放弃对抗的姿态，仍然应该坚持尊严的立场，不能没有完全必要的适当强硬态度和实力的显示，最少不能降低到不亢不卑的界标以下，绝不能流露出任何乞求和平甚至低三下四的姿色。米高扬想提醒赫鲁晓夫注意这些方面，但是他再次想到了在赫鲁晓夫面前不能显示过分的、过多的高明。于是，后来，米高扬把心里已经打好复稿的如此这般的一些谏言，也都打住了。

米高扬不想再说什么。

可是，有另外一个人，现在蹭到前面来，要和赫鲁晓夫搭话。这个人苏联外长安·葛罗米柯。

葛罗米柯不是主席团成员，也不是中央书记，可是，他是外交部长，在这里人们面对的主要工作，当然主要是处理外交事宜，所以，他即使不是委员、书记，他也还是被特别指定留了下来，像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一样，他虽然也不是委员和书记，但因为目前的工作也事关战争问题，所以，作为国防部长，他也被留在这里，同时，当然也还留着比留佐夫元帅，苏联火箭部队的司令。

葛罗米柯现在蹭到了赫鲁晓夫的身边来。

葛罗米柯是苏联老资格的外交官，在苏联全部外交史上，有十分辉煌的经历，从1939年开始，斯大林就亲自派他到美国去当大使，当时，他年龄只有三十岁，还算是一个年轻人。不过，他到华盛顿任职不久，美国人就给他送了个绰号，叫作是“华盛顿最老的年轻人”。意思了无贬意，只是说这位年轻的苏联大使温文尔雅，老成持重。因此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和尊敬。后来，在二战期间，在斯大林生前，葛罗米柯备受器重，成了苏联最著名的外交官之一，为人练达而思想缜密，是完全能够胜任一切外交事宜的，非常称职的外交部长，办外交，在形式上，几乎从来不出纰漏，平时寡言慎行，一言不多出，一步不多行，一般的，总似象工具似的被他的国家领导人来使用，却很难像器具一般发出共鸣，赫鲁晓夫不只一次说过：我让葛罗米柯同志在冰山上坐着，如果我不发话，他一辈子也不会下来。这也可以说明他何等的忠

于职守，也还可以说明他后来为赫鲁晓夫所如何好用。

而且，在平时，他在全部外交工作的过程中，他总结的最主要的一条根本经验是：根据授权办事，绝不讨权越权办事。外交工作，多含峻严，多含微妙，往往必须严字为界，绝不能越雷池一步。

所以，葛罗米柯在他的顶头上司和领导人之下，从来是听吆喝、听指挥，却总是不肯蹭步靠前，总是不肯试图左右更不用说试图临驾在他的所有指挥棒之上的，特别是对赫鲁晓夫，他更是绝对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只是，今天可怪了，不知是怎么样的鬼使神差，他忍不住在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说完一番话后，就向赫鲁晓夫蹭了过来，一改他平时寡言少语的本色，他忽然也向赫鲁晓夫主动进起了言来：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您给美国总统肯尼迪先生直接写信，直接交涉关于撤出苏联设置在古巴领土上的导弹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明智的，也是可行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您是需要考虑和解决的，这就是，这里有一个外交程序问题。首先，苏联在古巴设置导弹，是根据苏联和古巴军事合作协定进行的。既然是苏古两国的军事合作协定决定了在古巴设置苏联导弹，那么，在古巴设置苏联导弹，就不只是仅属于苏联方面一方的事情了，它有一半还对等地属于古巴方面，所以，您在对于苏联设置在古巴的导弹作撤出的决定时，首先还需要和古巴方面取得认同和一致，在和古巴方面经过磋商和研究，取得共同同意撤出苏联设在古巴的导弹的共识和决定以后，才可以由您来不仅仅是代表苏联，而且也代表着苏古共同的一方，和肯尼迪总统再进行交涉，否则，没有古巴方面的同意和授权，我们只能代表苏联一方，而不能代表古巴一方。然而，现在的对抗和对峙，实在也还不仅是苏、美的对抗和对峙，而是苏古为一方，美国为另一方的对抗和对峙。所以，我们现在由您来与肯尼迪总统先生打交道，他如果对您的授权因为古巴方面没有明确的授权而提出异议的话，我们在外交上将会无法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我们的外交地位将有可能会遇到被推到非常被动的位置上去的挑战。”

葛罗米柯是外交官。他习惯了使用缜密的外交词令，如此有条有理，有板有眼地向赫鲁晓夫进言，请求赫鲁晓夫考虑这样的外交程序。

葛罗米柯认定这样的外交程序，是非常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

赫鲁晓夫从头到尾，听了一遍葛罗米柯的进言。

赫鲁晓夫圆睁着一双褐色的不大的，但是仿佛总是包含着异常的狡黠和机敏，同时包含着似乎是不无威胁和权势意味的眼睛，他专注地盯住葛罗米柯的鼻子头，这双眼睛咕辘辘地旋转了起来。

葛罗米柯开始变得像一条木偶似地被他盯着。

赫鲁晓夫专注地盯了一阵葛罗米柯，忽然，他又在葛罗米柯的面前，低下了头来，打起了转转来。

显然，他也展开了紧张的思想。他开始思考葛罗米柯的话。葛罗米柯的话，不能是一点儿也打动不了他的。

赫鲁晓夫开始急躁起来。他的转转更急躁地转动起来。终于，他不想再转下去了。他握紧了两只胖乎乎的，然而还在发着抖颤的拳头，他站到了葛罗米柯而前，他猛得冲看葛罗米柯大声呼喊起来：

“葛罗米柯同志！你是一个机械唯物论者，你是一个外交工作中的傻瓜，干了这么多年外交部长，你还没有学会什么是外交，外交只能是有权力的人

们才能进行的，你懂吗？什么叫外交程序？国家领导人的意志就是外交程序。你现在胡言滥语，婆婆妈妈，你是在耽误我的宝贵时间。现在整个世界都处在了核战争的阴云下，全世界人的命运都危在旦夕，都在急迫地等待着赫鲁晓夫同志去拯救他们，可是，你小小的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忽然从哪里跳出来要给赫鲁晓夫同志上课，讲什么狗屁外交程序。卡斯特罗算什么？古巴算什么？古巴不过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港湾之外，飘浮在加勒比海上的一条小小的短短的香肠！肯尼迪是大国的总统，只有大国的领袖才能和他对等地打交道。卡斯特罗——凭什么也能往其间放呢？凭着他那一脸喜欢吵吵嚷嚷的大胡子？不行！他没有这个资格。再说，这已经是什么时候，火烧眉毛，非常时期，原子弹都要扔到头上来了，整个世界已经处在了崩溃和被摧毁的边缘上，已经是非常危险，危险极了！可是你这个傻冒外交部长，还要慢腾腾地搞什么外交程序。你快站远点吧，葛罗米柯，当心赫鲁晓夫同志真的把你送到苏联的冻土带去，真的让你永远坐到冰山上去，永远再不得下来，你听明白了吗？葛罗米柯！”

赫鲁晓夫喊着、叫着。

他的喊声、叫声，不仅葛罗米柯听到了，全体在场的其他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也都明明白白，听到了这喊声和叫声。

大家立刻开始噤若寒蝉，没有任何一个人，还敢再站出来，多嘴多舌。谁还能有这样的胆呢？谁不怕赫鲁晓夫送他到永难见天日的冻土带地区去呢？送下了台的主席团委员到冻土带去，也并不是无例可找，以前赫鲁晓夫的呢友，后来反目成仇被撤了职的基里钦科被赶出莫斯科，不就被送到了冻土带地区去了吗？

这样，再没有任何嘈杂声在赫鲁晓夫的耳边搅搅了。赫鲁晓夫开始聚精会神地让他的秘书们准备好纸笔，然后便开始亲自口授，给美国总统肯尼迪写信。

一开始，他婆婆妈妈，罗哩罗嗦说了一大堆废话。但是，他坚决要求他的秘书完全照他的口授抄录，因为这封信要充分展示赫鲁晓夫自己的伟大政治家风度，所以，他命令秘书们抄录他口授的信件时，要注意表述好他个人的语气和语态，因为这将是拯救世界的里程碑式的文书，必须保留着他赫鲁晓夫的个人色彩和烙印，以便在千百年后，全世界人民再来读这封维系过世界命运，拯救过全世界亿万人不死于核灾难的伟大历史性文件时，能仿佛历历可见历史上出现过的这样一个伟人，甚至还能让人们千百年后仍然能听到他的声音。

后来，当这封信写到中间的时候，赫鲁晓夫要他的秘书们，一定措好词，一定写清楚，一定要让肯尼迪总统看到这封电函时，马上能明白的，毫不含糊地看到这样的话：赫鲁晓夫为了拯救全人类免于核灾难，已经准备好从即日开始，就要发布命令，完全、彻底、干干净净地从古巴岛上，撤出全部苏联导弹了。而且，关于这一点，请肯尼迪总统一定要相信，赫鲁晓夫说话是算数的。如果肯尼迪总统还是不能相信的话，可以请肯尼迪总统在苏联撤出设置在古巴的导弹时，派人来登上古巴的岛上来监视和检查，肯尼迪总统完全可以派任何人，来检验苏联撤除古巴岛上设置的苏联导弹的诚意。

这封信，真是非常壮观地表现出了泱泱大国苏联的最高领导人的伟大政治家风度。表现出了赫鲁晓夫的伟大政治家风度。

赫鲁晓夫口述着这封信。

赫鲁晓夫自己动手干不了文墨。但是论说嘴，他也还是很有天才的，既经过训练，也经历了长时间的锻炼。因此，他要说起什么事情来的时候，一般肯定还能头头是道，有的时候还会充满着一种激情，充满着一种强烈的自信，往往能够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确实是能说会道，他从来相信他会说理，会论理，相信他能使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能够在任何论理，说理的过程中，被他说服，被他辩倒。

他今天口授给肯尼迪总统的信件，按照阿·伊·米高扬的说法，是要表现伟大政治家的风度，这样的表演，自然会使他格外的兴奋和激动。人要是在兴奋激动的时候，思维激荡，语言流畅，侃起来的时候会越侃越不打绷儿，越侃好像越能娓娓道来，理直气壮，充满了激昂。

赫鲁晓夫简直像高山流水，奔流直泻，滔滔不绝地口述口授着给肯尼迪总统的信，他口述口授的口干舌燥，他口述口授出好长好长的一封长信。虽然确实罗嗦，但是主要的思想、意思，都还是十分明白无误他讲清楚了，讲全面了。

他一边口授，一边记录，另一边已经在打字，校对，以便最后形成书面文字。以便最后把书面文字再传给主席团成员、书记处的书记们讨论修改，然后必要的话，再表决通过一下。

按照正常程序，也还应该是这样的。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定过规矩，在政治局通过任何决议时，光举手还不行，往往还要求每个政治局委员在所通过的决议上签字，同意的签同意，有保留意见的，也还可以签上保留意见。这个规矩在斯大林死后就破坏了。但是，通过表决程序，还仍然是照行的。

因此，现在在这里所要通过的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信，事关苏联的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重大决策，是关于选择战争还是和平的重大决策，所以，这样的事关如此重大问题的书面文字材料，当然应该是在主席团表决通过的。

然而，赫鲁晓夫口述口授来的快，抄录，打字，核校略有些跟不上速度，所以赫鲁晓夫口授完了，打字稿还没有完全出来，核校修改工作还在进行，秘书们似乎觉得还须进行一些文字润色，不然文字也太琐屑了。

书面文字现在还没有形成，理所当然还不能传到主席团会上来念一遍，然后让大家讨论，修改，再付诸表决，并且，一定要得到表决通过，然后才能开始操作使之成为电函。

不过，这样一来，不知又要耗费多少功夫和时间，赫鲁晓夫忽然觉得这可不行了，危险的时刻一刻也不能多有，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信，既然已经口授出来了，还修改什么？还通过什么？难道赫鲁晓夫就不能说了完全算数吗？

不！非常时期，必须打破一切程序，一切完全得全照着赫鲁晓夫的政治家风度行事了。

书面文字可以改着、校着，但是，必须马上形成电码，马上往美国拍发，必须通过电台，马上向美国，向全世界发出苏联争取和平的声音，赫鲁晓夫呼吁拯救全人类的声音。不然原子弹就要扔到头上来了。

于是，1962年10月27日的这一个美国的“黑色星期六”的晚间，深夜之时，肯尼迪总统当正在一筹莫展的白宫办公室里愁绪万千之时，办公桌上忽然跳出来了无异是一纸请降书的赫鲁晓夫求和的特急电函。而在此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信息监听电台，却也已经把业已在莫斯科那边，在开动最大频率的各种语言的无线电广播中广播出来的赫鲁晓夫致美国总统肯尼迪求

和信的录音磁带，送到了肯尼迪总统的办公桌上。

于是，这一天整整一日紧张万端的肯尼迪总统，马上笑了起来，同时，马上在安乐椅上坐了下来，把两只穿着漂亮皮鞋的大脚，高高地翘在了总统的办公桌上，他“嘿嘿嘿”地笑了起来。他全身轻松下来。接着，他马上操起了电话来，给总统夫人拨通了直拨电话：

“杰基吧？告诉你一个最新信息：俄国人投降了！赫鲁晓夫已经送来了降书。我现在就回家去。我们今晚该好好地庆祝一下了！”

赢家只能属于古巴

打掉美国飞机，进入紧急状态，这是自然的。

从1962年10月22日突然拉开所谓古巴“导弹危机”的帷幕。实际上短兵相接的对垒，真枪实弹的交锋，还只有10月27日的这一次，也就是别尔乌金中将毅然绝然按动电钮，启动萨姆导弹，打下美国少校安德松驾驶的间谍飞机的这一次。

直至后来，当所谓的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以后，甚至再后来进入新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当历史学家们面对着已经发黄的厚厚的记载着关于古巴导弹危机资料的故纸，在平心静气，安然从容地研究这场往昔发生的历史故事时，人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在当年发生的那件轰轰烈烈震动世界的大冲突、大对峙中，真正祭给可怕的战神的牺牲的祭品，竟然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安德松少校，也唯有这样一个安德松少校。他就是那场巨大危机中的全部牺牲品。

这样一个牺牲数字，只相当于昔时美国纽约每日的自杀人数的五分之一。虽然这个数字使那场轰轰烈烈震动了世界的巨大危机的战争冲突和对峙的伤亡人数还是突破了零。不过，尽管如此，这个零的突破，还只能是说明，那场沸沸扬扬，惊天动地的所谓“世界危机”，其实也不过是雷声大而雨点小的可怜的一场虚惊，完全没有战争的必然意味，只不过是历史上最平庸的政治家们完全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一场虚张声势的把戏和游戏。

然而，当然，在那场人为的把戏和游戏中，当在进入10月27日，在古巴上空真的动起真枪实弹来，真的把美国飞机打掉，把驾机的美军少校飞行员击毙丧命的时刻，当时的形势，自然是理所当然进入了一个更为紧张严重的时期。

在拳击场上，谁见过只出手挥拳而不出手还拳的拳手？在古巴的上空，萨姆导弹忽地一闪，打下了美国飞机，美国怎么办？你有地对空，我有空对地，苏联有地对空的萨姆导弹，美国有空对地的SS导弹。你能打我天上的飞机，我怎么不能炸你的导弹基地？你来我往，来而不往非礼耶。你来一拳，我还一拳，一场恶战就要真正地打起来了。真有可能真正地打起来了。

所以，局势自然进入了最紧张状态。

因此，当切·格瓦拉少校，从古巴西部最前线他的前线司令部，把电话打到哈瓦那，当他向菲德尔·卡斯特罗总司令汇报报告了在西部前线地区，击落美国的入侵飞机，击毙美国的飞行员的经过以后，他们两位亲密的战友，两位饱富战略思想和战术经验的年轻少校，接着进行了对局势十分必要的分析和讨论，他们的思想是相通的，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所以，他们很容易，很快便达成了共识。

切·格瓦拉少校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少校，在此一时刻，他们共同认识到了，真正的危机局势，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真正的关键的时刻，美国人的报复和反击，完全是可能的。美国佬有能力、有力量作出可以叫作反击的决然反应。为此，古巴必须作好迎战和打的准备，前线军民，必须严阵以待，迅速投入最高级别的临战状态，整个古巴列岛，也要再一次作出最严重的临战状态动员，所有军民都拿起枪来，开始准备投入战斗，古巴要开始作好一切这样的准备，准备打，准备打局部的战争，准备打举国抗击的战争，准备小打，也要准备大打，准备在沿海沼泽地上打，也要准备进入山区打，要作重上马埃斯特腊山的准备，要准备以全古巴的六百万军民，来对抗美国佬的六

千万入侵者。切·格瓦拉少校曾经指挥二百人的第八纵队，对抗并消灭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的八千到一万人的军队，那是以一对十的战斗，那是以一对百的战斗，过去曾经创造过这样的奇迹，现在，古巴人怎么不可能仍然以一对十，以一对百地对抗和消灭美国入侵者呢？让美国佬把六千万入侵者派遣到古巴岛上来入侵吧，古巴是不怕他们的！

切·格瓦拉在向菲德尔·卡斯特罗打报告的时候，特别仔细地讲述了他的战略意志和战术决心，对切·格瓦拉说出来的全部思想，全部想法，卡斯特罗都十分欣赏，非常赞同，卡斯特罗对切·格瓦拉在西部最前线的战斗部署和指挥完全是绝对放心的。与此同时，卡斯特罗与格瓦拉，对于这场危机可能导致的最高危机界限，他们也使用他们已经经常使用的非常有效为别人很难破译的特定的隐语，在长途电话中，进行了十分深切的讨论和交流，切·格瓦拉迅速说出了他的观点。卡斯特罗马上对格瓦拉的观点报之以共鸣。于是，他们接下来对他们讨论的问题，进行了论断。切·格瓦拉在这样的讨论中，认为当前这场危机，尽管实际上已经展开了美苏两个核大国的严重对峙和对抗，但是，真正发生核大战、核冲突的可能性，几近于零。

尽管对于核大战、核冲突的爆发，古巴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准备。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是古巴当然也作了这方面的准备。因为事实上古巴一直在面对着核威胁，它是不能不作出必要的和可能进行的核反击准备的。

而且，对于这样的核反击的准备，古巴也进行了尽可能掌握机会的努力。

8月末9月初，切·格瓦拉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进行谈判，达不到任何可以预期的结果，于是，格瓦拉毅然中断了谈判，迅速地飞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几乎是匆匆忙忙去看望正地布拉格接受培训的古巴战斗轰炸机飞行员。他们将可以驾驶伊尔—28战斗轰炸机。伊尔—28在当时已经是陈旧的速度不是很快的战斗轰炸机了，但是，却仍然可以是一种可以运载核武器，可以用来进行核袭击、核轰炸的飞机。苏联在苏古军事合作协定中，已经同意把四十二架这样的轰炸机布置在古巴的领土上。这样，如果有一天，这样的装载核炸弹的伊尔—28飞机，如果它们的苏军飞行员不能授命驾驶起飞的话，在必要起飞执行战斗任务时，如果古巴有了自己的轰炸机驾驶员，就可以在那样的时刻，完全奋发地来奋起替代苏军的驾驶员，来驾机起飞去执行他们应该执行的战斗任务去了。装载着核炸弹的伊尔—28飞机，古巴驾驶员来驾驶，也是可以执行同样性质的战斗任务的。

在这方面，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是思想非常默契一致地提前作好了准备的。

除此之外，切·格瓦拉在到西部前线，在那里迅速展开工作，迅速深入地进行人的工作，人的影响工作，他深刻地影响了这里的苏联火箭部队分遣兵团和导弹基地的司令，引别尔乌金中将为至为默契同心的同志和朋友，事实上，切·格瓦拉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位苏联中将。而既然已经掌握了这位中将同志，理所当然，自然也可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切·格瓦拉已经掌握了这里的火箭分遣兵团和导弹基地的指挥，最少已经拥有了可以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能力，而有了这样的能力，这里的核火器，如果到了一定必须启动的时刻，当然也就能够被启动起来了。但是，尽管这样，尽管古巴也确定进行了应付核冲突的准备，进行了这方面的努力争取，或者还可以说，在思想、战略思想的准备方面，也许比物质方面的准备充实更多。面对着核威胁的古巴人，总不能只有核恐惧而没有准备对付核战争的必要思想准备。他们明明

知道帝国主义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因此他们完全不可能对核威胁，核战争不持有充分的警惕。所以说，古巴进行了适当的应对核战争的准备，这还是确定的。

然而，即使如此，古巴领导人虽然年轻，却不乏他们所特有的聪明和胆略。他们不仅有聪明的思想，而且有革命的勇气，他们的思想既能清醒，又能镇定，所以也能够做到冷静而不昏乱，完全能够作出接近事物发展规律的比较正确的判断。

他们明确的认识是，核战争有可能爆发，但是这种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最少在眼前是极小的，特别是双方都有能力进行核对峙的情况下，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因为那样的棋步，明显是走上了绝路，走上了死路，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人们何苦要作出那样的选择呢？

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认为，从实质上讲，对这样一种核对峙、核冲突的发展趋势，即通向最后发生核战争的爆发的心理恐惧，更甚的，肯定只能是美国佬。美国佬对核爆发战争的恐惧心理，肯定会比仅有温饱生活水平的国家和人民，要严重十倍，因为即使就是同归于尽的结果，他们失掉的也肯定会更多，这可以比如是一边是宝玉，一边是顽石，如果出现玉石俱碎的结果，是宝玉更甚比顽石的损失之大，还是顽石更甚于宝玉的损失，这样的价值比例，是不言自明的。

有着这样的判断和论断，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相应地作出这样的论断和判断：他们认定了美国佬启动核战争的机器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如果他们一定要启动战争机器的话，他们倒有更多的可能选择暴风骤雨般的常规战争，比如出动飞机轰炸，出动海上的封锁和袭击，出动大兵团的陆上入侵。这样的启动战争的可能性，远甚于选择启动核战争的可能性。而在这样的可能性下，古巴应该十分坚定镇定地作好常规战争的充分准备之中，而绝不能处在盲目的热核战争威胁的慌乱之中。古巴不能手忙脚乱。古巴不能张慌失措，如果美国佬敢于向古巴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常规战争的话，那优势就完全不在美国佬的那一方了，尽管美国佬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但是古巴有更多的能够勇敢投入战斗，不怕流血和牺牲的人，而且，古巴的山山水水和每一寸土地，除了成为入侵来犯的美国佬的坟场和墓地之外，哪里都不会有他们的掩体和隐蔽物。

这样，古巴人既不怕美国佬发动热核战争，古巴人也绝不怕美国佬发动常规战争，古巴人不怕死，强大的美国佬能奈我何？

有了这样的清醒、冷静的分析、认识之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在他们用他们特有的隐语的长途保密电话中，又研究和磋商了他们，接下来的布署和步骤。菲德尔·卡斯特罗仍然要求切·格瓦拉坚守在古巴西部地区的比那尔德里奥省，作为最高领导核心的全权代表，统帅指挥临敌最前线的古巴军民抗击力量，协调那里苏联火箭部队分遣兵团和导弹基地的防卫和打击力量。此时，劳尔·卡斯特罗已经领命又回到了古巴的东部地区，在古巴的第二大城市设置了他的作故司令部，他开始主要密切地监视美国尚在中国一直没有撤出的关塔那摩军事基地，警惕美国佬从那里展开军事行动。

而菲德尔·卡斯特罗总司令呢，他仍然坐镇在哈瓦那，一方面全面指挥全国军民加紧备战协调行动，另一方面，在多尔蒂科斯总统的协助之下，直接负责外交联络工作。特别是直接负责与苏联的协调行动。

由于情况明，决心大，头脑冷静，判断清楚，成竹在胸，菲德尔·卡斯特罗一直能够从容镇定，一切按照既定章法，有条不紊地冷静而果决的行事，一切都完全从容不迫地行事。

在与切·格瓦拉通电话，交流情况和进一步磋商研究战斗部署以后，他开始打电话与苏联驻古巴大使阿列克谢耶夫联系。

不管菲德尔·卡斯特罗如何从容冷静，却也绝不会麻痹和麻木。他同时是机敏的，仍然是格外的机敏的。

萨姆导弹打下了美国的间谍飞机，是真正拉开了实战的序幕。美国佬的报复反击很可能紧接着，便展开进行。

因此，此时此刻，在古巴，当然是完全处在了严重的临战形势之中，也可以说是处在了十分危险的局势之中了。

卡斯特罗除了与切·格瓦拉通话，他当然也与劳尔·卡斯特罗进行了通话，一切经过进一步严密部署以后，他要向苏联大使馆询问，在已经发生萨姆导弹击落美国间谍飞机的战争步骤以后，古苏军事合作的一方，苏联领导人们面对目前的局势和情况，准备作出怎样的反映。

卡斯特罗要通了苏联大使馆的专线电话。

阿列克谢耶夫大使立刻亲自来接卡斯特罗的电话。

“菲德尔！”苏联大使使用西班牙语与卡斯特罗通话。在古巴革命刚刚胜利的日子里，阿列克谢耶夫作为塔斯社记者，来哈瓦那活动，和劳尔·菲德尔与格瓦拉都交上了朋友，所以，即使当大使以后，他也还以古巴领导人的朋友自居，有的时候直呼其名，追求亲切的效果，不拘外交礼仪，所以，他在电话中，一听是卡斯特罗的声音，立刻直呼其名，然后，他在电话机的那一头，他显然又在耸着肩膀，摊着手对卡斯特罗说：“没有办法。莫斯科那边又没有声音了。”

卡斯特罗说：

“阿列克谢耶夫同志，目前形势十分严重，莫斯科怎么又没有了声音呢？”

“我不知道。卡斯特罗总理同志！”

“可你是苏联大使呀！”“大使怎么样，大使只是大使，大使不是赫鲁晓夫同志的总参谋长。”

“那好吧。我到你们大使馆去。我们一起来和莫斯科联系。我们一定要与莫斯科取得联系，要和赫鲁晓夫同志取得联系。在目前严重危险的形势局面下，古苏两国作为这场军事对峙和斗争的共同的一方，我们必须密切地协调行动。”卡斯特罗在电话里，向苏联大使强调着。

阿列克谢耶夫马上响应卡斯特罗的意向，他显然高兴起来，甚至是不无急切之情地邀请卡斯特罗说：

“那，总理同志，就请您马上来到我们的大使馆吧。我马上向莫斯科报告，卡斯特罗同志来到了苏联驻古巴大使馆，要求和赫鲁晓夫同志直接对话。”

卡斯特罗说：

“好。阿列克谢耶夫同志，你马上发出这样的电报，我马上就会来到你们的大使馆了。”

1962年，世界电讯业还处在一个并不十分开通的时期，古巴到苏联的电话，还是不能直通的，所以，哈瓦那和莫斯科的通讯联络，主要依靠的还仅

只是密码电报，这样的联络手段，有的时候难尽人意，根本谈不上是通畅。

卡斯特罗撂下与阿列克谢耶夫的电话以后，把他的行址告诉多尔蒂科斯总统，然后他就驱车急驰来到了苏联大使馆。

阿列克谢耶夫大使已经在大使馆门口迎接着他。

此时，时已入秋，平常时候灯火辉煌的哈瓦那，今天又处在了灯火管制的状态中。苏联大使馆，现在也完全是一片黑魑魑的建筑群了。

大使迎了上来。

菲德尔立刻问：

“莫斯科有了回声吗？”

大使说：

“还是没有，菲德尔同志。”

他们进入了大使馆。

他们来到了大使馆办公大楼底层的会议厅。这里是可防原子弹袭击的地下室。

这里有自备电机发电，所以，这里的灯火依然通明。

“你们加紧联系。请再发一次急电，告诉莫斯科，菲德尔坐在你们的大使馆里，在等待着莫斯科的回答。”

阿列克谢耶夫忙说：

“好的，我马上再发急电，我请求他们迅速回音。”

菲德尔说：

“您不必求！我可以有一些耐心，在这里等莫斯科的声音。”

阿列克谢耶夫请卡斯特罗坐在沙发上。卡斯特罗宁肯选择一个安乐椅坐。他不想身体坐的太低，也不想坐得太舒服，因为那样会令人脑部的血流放慢，会令人发困，会令人很想睡觉。

连日来，睡眠严重不足，几乎一直都在连轴转的卡斯特罗，是很容易被睡眠的强烈欲望战胜的。但是，他的意志又绝不允许被这样的欲望所压倒，因为他的理智告诉他现在是绝不可以安然睡觉的时候。

阿列克谢耶夫大使命人端来了肉冻、鱼罐头和伏特加、白兰地酒，还有面包和水果。

卡斯特罗拒绝吃任何东西，也拒绝饮酒。只是，他要求喝古巴式的浓咖啡，千万不要放糖。

后来，在苏联大使馆的地下大厅里，他便一杯接一杯地大饮咖啡，大抽他自己带来的雪茄烟。苏联大使馆准备的，送上来的香烟，烟丝和烟斗，他连看也不着，闻也不闻。

他在苏联大使馆，耐心地、十分耐心地等待着苏联的声音，等待着莫斯科的回答。

他真有耐心。

他也真地是能够身临大事有静气、不慌不忙。

他完全不知道莫斯科那边不是不想马上发出回答哈瓦那大使馆问题的声音。苏联外交部，党中央的书记处，都得到了从古巴发来的请求回音的加急电报。可是，他们得不到授权，他们完全回答不出什么。

因为，这样的回答，只能是赫鲁晓夫发出来的声音，谁有权力发出那样的最高权力的声音呢？赫鲁晓夫现在已经完全把苏联的党政军权，包括外交事务的决策和指挥的权力，都完全彻底地集中在他一个人的手上了。

而此时此刻，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惊慌万状如处在世界末日的边缘上的赫鲁晓夫的办公厅里，人马鼎沸，乱哄哄的一片纷乱，完全变成了一锅搅不清楚米粒汤水的粘糊粥了。他们好像已经准备承受灭顶之灾的到来，他们已经似乎自顾不暇，因此，怎么还能顾得上回答远在一万三千公里以外的古巴和苏联大使馆发出来的声音呢？

简直完全不可能回答任何来自古巴，以及来自那里苏联大使馆的声音。管什么卡斯特罗是不是坐在苏联大使馆里等待，在苏联人赫鲁晓夫自顾不暇的时候，谁等待他，他都是绝不会伸出一只手来，顾及于他的。

于是，苏联人只好让在古巴忙得连轴转，辛苦劳累无比的卡斯特罗，不得不在苏联驻古巴大使馆的地下办公室内，干坐着，干等着，整整等了一整夜，从10月27日晚间开始，等到10月28日的黎明时分来临之后，还是等不来莫斯科的任何回答的声音。

还要等多久？

还要等下去吗？

一直等到10月28日早上7点钟的时候，大使馆通向古巴总统府的专线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阿列克谢耶夫大使急忙拿起电话机来：

“您好！多尔蒂科斯总统阁下。我是苏联大使。是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还在这里。是的，莫斯科还没有任何回答。”

阿列克谢耶夫大使接着多尔蒂科斯总统的电话。

突然，阿列克谢耶夫的脸色红涨起来，进而青紫起来，他突然冲着话筒喊了起来：“什么？总统先生，您说什么？这一定是美国的电台在造谣！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苏联怎么可能向美国宣布投降？事实上的投降？绝不会！形式上的投降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绝对不会，完全不会，肯定只能是美国之音在造谣，美国之音是造谣公司，我们完全不能受骗上当，绝不能让他们挑拨离间，不，不，这不可能。苏联绝不会背叛出卖古巴，赫鲁晓夫同志掌舵，他是不会这样的，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很伟大的人，他是很了不起的大政治家！……什么？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出来的？莫斯科广播电台正在广播？是吗？”

阿列克谢耶夫吃惊地接着电话。

他红头涨紫的脸，忽然开始变得苍白起来。他的嘴巴都哆嗦歪了。

阿列克谢耶夫把电话交给了卡斯特罗。

多尔蒂科斯总统，向卡斯特罗报告了情况，他告诉卡斯特罗，赫鲁晓夫已经公布了给肯尼迪总统的信件，已经正式宣布苏联将从古巴撤出全部导弹和所有全部重型武器，并且同意请美国派人来古巴监督撤离，检查撤离。

卡斯特罗听着多尔蒂科斯总统的报告。他操着电话机的手，好长一刻放不下来。他一句话也说不出。

多尔蒂科斯总统最后又补充告诉卡斯特罗一句：

“菲德尔！您现在可以亲自听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正在向古巴用西班牙语广播着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信。”

卡斯特罗撂下了电话。

阿列克谢耶夫已经命人搬来了一台老大的基辅牌收音机。收音机已经打开了，在对着古巴的频道上，果然是西班牙语，娓娓道说着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信。语调低三下四，卑躬屈节。

卡斯特罗站起来，把一支燃着的雪茄烟丢在了地毯上，他扯了扯他的军服大襟，一声不吱，迈开登着伞兵靴的双脚，从苏联大使馆走了出来。

他的几个警卫员手持冲锋枪跟在他的身后，隔开来追赶上来送他走出大使馆的苏联大使。大使气极败坏，他知道赫鲁晓夫又出卖了古巴，也完全出卖了自己国家驻古巴的大使馆，作出那样的决定，竟连本国大使馆也不通报一声，赫鲁晓夫使苏联驻古巴大使完全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灰溜溜的家伙，成了一个全世界最不幸的可怜而尴尬的可怜虫，简直像蛔虫一样令人厌恶而不值钱。

卡斯特罗不再理睬他。头也不回，蹬上他的轿车走了。

在卡斯特罗离开苏联大使馆又两个小时以后，大使馆终于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密电。向大使馆通报了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信件内容，自然主要是宣布从古巴撤出苏联导弹，请美国人来古巴监视，检验撤离事宜，并实行检查。莫斯科的密电要苏联大使把这样的决定电函呈送给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

没有办法，受人驱使的苏联大使，只好来再寻找卡斯特罗。但是，卡斯特罗哪还能再有兴趣搭理苏联大使呢？让苏联人滚得更远一点吧！此后三四天之内，苏联大使实在也再见不到菲德尔·卡斯特罗了。

卡斯特罗哪里去了呢？

卡斯特罗还在哈瓦那，只是回到了他在武装力量部的作战指挥部。

卡斯特罗迅疾干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马上把切·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从东西两个方向地区的战斗前线召回到哈瓦那来。他们开始研究接下来必须郑重对待的局势。

他们进一步认识了美国佬。

他们也深刻地认识了赫鲁晓夫。

他们当然也重新审机了一番他们自己。

菲德尔、格瓦拉和劳尔，他们非常骄傲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和共识：在这场所谓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佬暴露了它的纸老虎原形。赫鲁晓夫暴露了他软骨头的面目。他们验证了自己：只有古巴人民，是英雄的，不屈不挠地光荣挺立的人民。

美国佬可耻的退缩了。

赫鲁晓夫可耻的投降了。

只有古巴人，在高举着战斗的旗帜，在胜利中前进。

那么，赫鲁晓夫在宣布投降后，在他向美国佬许诺要撤出在古巴设置的全部导弹，怎么办呢？

那是赫鲁晓夫自己的事。那些苏联导弹，要撤走就撤走吧！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可是，赫鲁晓夫还向美国人作出了许诺，要请美国人来古巴监督和检查撤离，这又该怎么处置呢？这很简单。赫鲁晓夫可以支配苏联的导弹，却无权支配古巴的主权和土地。美国佬要登上古巴岛上来监督、检查苏联撤离导弹吗？古巴人的回答只能是，监督、检查苏联的导弹撤离那是美国佬和苏联人的事。但美国佬要登上古巴的土地上来，那可是绝对不行！美国佬和赫鲁晓夫联手出面。还请了联合国的秘书长吴丹来帮忙。吴丹来访问古巴，亲自转达美苏两方的商定，请古巴同意在古巴的海港、码头之内或者之外，允许美国来监督、检查苏联导弹的装船撤离。卡斯特罗会见了吴丹，还同意和吴丹进行了秘密会谈。但是，会谈纪要必须公开。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劳尔又

经过磋商，他们对吴丹略有好感，很想给这个希望为折冲平衡作出不懈努力的亚州人一点儿面子，但是，考虑到古巴的主权和尊严，那样折冲的平衡目标，古巴人仍然绝不接受。古巴还是这样的立场：美国人愿意怎样监视苏联人，那是美国的事。苏联人愿意怎样被监视，那是苏联人的事。但是，美苏两国的任何交易，不能在古巴的领土上进行，也不能在古巴的领海上进行，他们的监视、检查，被监视和被检查，可以到公海大洋上去做，在古巴的码头港湾里不行，在古巴的领海里，也是不行的。

在古巴坚定的尊严立场面前，苏联人又一次尴尬无奈，无计可施，最后还是美国佬给已经完全丢尽脸皮的赫鲁晓夫们留了一些可以最后周旋的余地，美国人当然主要的也还是为了全面地收获它转败为胜赢来的丰果，最早还是美国佬终于向古巴的尊严低头，同意不在古巴陆地，不在古巴的海湾和码头上，也不在古巴的领空领海中，而是到公海上去，到大洋上去，监视、检查和清点苏联撤离设置古巴所有重武器的船只。

在这一场 1962 年 10 月的所谓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实在是完全彻底地丢尽了脸，丢尽了面皮，为他再后两年彻底的崩溃和垮台作了一个加速的铺垫。

美国佬在这场危机中，由于赫鲁晓夫的投降，在转败为胜中，从“黑色的时期六”走出来，好像是赢得了一场辉煌的大胜利。可是，当历史学家们细细算计评价时，实在找不到美国佬的辉煌胜利到底胜利在了哪里。

赢得了真正胜利和尊严的赢家，后来越来越被历史证明，唯一的只能是当时充满了战斗不屈精神，充满了正义肝胆，充满了冲天革命正气的古巴，属于英雄的古巴。在这场震撼世界的巨大较量中，真正雕琢出来的最伟大最杰出的核心英雄人物，当然也只能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劳尔·卡斯特罗……副册上，也许还可以加上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美国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总统助理邦迪，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名字。他们可以说是在这场世界危机中，表现不俗，甚至是杰出的人物，真正为历史的和平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是，在这场世界性危机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和杰出人物的花名册上，却无论如何不能写上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名字。因为，正是他，始作俑，制造了这场世界性危机，而在这场危机发展解决的过程中，他又完全扮演了一个最为卑鄙和无耻的角色。

第四部生活在兄弟膀背相依之间

古巴最高领导核心的谈话方式

1965年3月14日。

切·格瓦拉访问中国、埃及、坦桑尼亚重返古巴，回到哈瓦那。

菲德尔·卡斯特罗亲自到哈瓦那“兰乔博耶罗斯”机场，把切·格瓦拉迎回到了哈瓦那市内的总统府“革命宫”。

晚间，在“革命宫”举行的欢迎聚会上，切·格瓦拉向所有来到总统府欢迎他归来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包括在哈瓦那的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和革命政府的诸多领导成员，汇报和畅谈了他在国外访问的情况和工作情况，他讲了很多话，占用了很长时间，但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还是提请他尽量多讲一点情况给大家听，以增长同志们的见识，开阔同志们的视野。

以畅谈畅叙为主要内容的欢迎聚会，差不多延续到深夜零点之后又两三个小时，才告结束。

但是，在这个较大的聚会结束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劳尔·卡斯特罗，他们三人又相约，一起来到了塞莉亚·桑切斯的办公处。这里有菲德尔·卡斯特罗特别会见客人的一间不大不小的工作室。他们来到这里，三人更加猛劲儿地抽起香喷喷的雪茄烟，要求这里的炊事员沏上更浓更酽的咖啡来，以便他们三个兄弟、同志和朋友，一边喝咖啡，一边更有精神谈话。

塞莉亚·桑切斯比不上他们三条壮汉的精力充沛，如果确实需要她在场参加谈话或工作的话，她会无条件地坚持参加的，但是，这三条汉子在一起谈话和工作的话，一般是不需要她来照顾和陪伴的，只嘱咐一声炊事员同志，保证他们有足量的咖啡喝，也便行了。

塞莉亚·桑切斯比他们三条汉子都年长，最近又血压偏高，心脏机能状况不好，所以她很快便告退，休息去了。

这样，菲德尔、劳尔和格瓦拉坐下来，也就可以更无拘无束地开始他们的谈话了。首先他们可以不受时间限制了。他们三个心地相连，思想感情完全融汇和融合的同志、朋友和兄弟，在他们作小范围的聚谈时，他们不怕他们谈话的时间无限地延长下去，只要情况允许，他们在一起，交流畅谈几个白天连续几个夜晚，似乎都会不知疲倦的，都会是愉快的。

在今晚较大范围的聚会和交谈中，切·格瓦拉已经说了许多情况，说了许多甚为重要的信息。比如关于在中国正在进行的内部“四清”运动，在埃及正在发生的新的困难情况，以及在非洲发展越来越严重的局势。有一些十分难尽表述的情况，在大的聚会范围内，切·格瓦拉只能语焉不详的粗略介绍，而且，不很可能展开研讨性的论述。可是，现在，在接下来的这个只有菲德尔、劳尔和切参加的小范围的聚会中，他们就可以进一步的谈论，更详尽地议论一些信息和事情了。

在今晚大范围的聚会中，切·格瓦拉给大家汇报和介绍他此行出国访问的情况时，他首先是从他在埃及的时候，听到了纳赛尔总统介绍赫鲁晓夫讲过的一个故事开始介绍讲起的。

切·格瓦拉在埃及见到纳赛尔总统的时候，纳赛尔总统向他介绍和转述了赫鲁晓夫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原来，1964年的5月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作为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率领苏联一个人数众多，十分庞大浩

荡的党政代表团，到达埃及访问，参加埃及阿斯旺水坝电站一个机组的开机典礼。

阿斯旺水坝，是赫鲁晓夫为了显示自己的英雄气，和美国人制气，让苏联“瘦驴拉僵屎”，硬掏腰包拿山一亿美元来支援埃及建造的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对于赫鲁晓夫的如此慷慨仗义，埃及当然要大大地讲一些感谢苏联，感谢赫鲁晓夫并表示真诚和感激的话，纳赛尔总统还慨然宣布了埃及要实行阿拉伯的社会主义体制。赫鲁晓夫由此得到的感觉是，他已经把埃及也缔造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埃及人也已经承认了他的世界领导人的地位，因此，他便也满心的高兴和欢喜起来，于是，他在1964年5月的这次对埃及的访问中，就宣布埃及总统纳赛尔是“苏联英雄”，并且作出决定，授予纳赛尔总统“苏联英雄”勋章。

于是，在隆重的正式援勋仪式将要进行的时候，赫鲁晓夫首先给纳赛尔总统讲了个故事。这个故事与古巴有关，就是纳赛尔总统在切·格瓦拉此次访问埃及时，向切·格瓦拉转达的赫鲁晓夫讲过的这个故事。

在赫鲁晓夫给纳赛尔总统讲述的故事中，赫鲁晓夫耸人听闻地对纳赛尔总统说：1962年，在那样一个令人难忘的世界严重危机的时期，是赫鲁晓夫本人，举重若轻，拯救了世界没有变成一片火海，而在那场人类行将毁灭的巨大灾难即将降的时候，古巴的领导人们聪明了起来，听了赫鲁晓夫的吆喝和指挥，关上了灾难即将发生的阀门，世界和人类才总算避免了毁灭。为此，他赫鲁晓夫本人，亲自作出了一个决定，等到第二年的五月，也就是1963年的5月，他邀请古巴领袖卡斯特罗访问了苏联，首先也宣布了卡斯特罗为“苏联英雄”，接着也授给了卡斯特罗“苏联英雄”勋章。

赫鲁晓夫实在是熬有介事地给纳赛尔总统讲了这样一个几乎可以刊为传奇小说类型的故事。

纳赛尔总统当然完全明白事情的发展经过和真相究竟是如何和怎样的。

纳赛尔总统在埃及，给切·格瓦拉转述这个赫鲁晓夫讲述的传奇故事时，还笑着对格瓦拉说：“切！我和你们古巴人的信仰不一样，我是一个伊斯兰教的信徒。不过，我还宁愿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赫鲁晓夫先生阁下，又肯掏钱帮我们的埃及建水坝，又乐于奖给我什么‘苏联英雄’称号和‘苏联英雄’勋章，虽然这种东西在苏联也许很为人们重视，很了不起，很难得，可是，在埃及，值什么呢？一钱不值。弄不好，还会被人指着脊梁骨，骂纳赛尔是卖国贼呢，埃及的总统，怎么当上了苏联的英雄，不显然是把埃及卖给苏联了吗？不过，我纳赛尔也还是不怕，因为我是个实用主义者，我主要想要的是苏联的钱，弄来这些苏联钱，我们可以造水坝，扩展埃及的良田，何乐而不为呢？至于赫鲁晓夫硬给我塞的勋章，也没有什么，又不占地方，哪还找不到一个旮旯，把它们扔到那里去呢！只要赫鲁晓夫还肯多给我们些钱，再给纳赛尔两个‘苏联英雄’的称号和勋章，我纳赛尔仍然敢要。”

纳赛尔总统给切·格瓦拉转述完了赫鲁晓夫给纳赛尔总统讲的故事，接着又说了一大段纳赛尔总统本人的议论和感想，接下来，纳赛尔总统接着又说到了与此相关的话题。

纳赛尔总统告诉切·格瓦拉说，赫鲁晓夫在讲完那个与古巴有关的传奇故事以后，接下来还有一段表演也很有趣。那天，赫鲁晓夫在给纳赛尔讲完那段与古巴相关的传奇故事后，忽然还似乎十分动情地抱怨起古巴人来，他对纳赛尔说：“那些古巴人，反过来并不识好歹。赫鲁晓夫同志大度地援助

了他们，拯救了他们，还给卡斯特罗发了‘苏联英雄’奖章，可是，他们反过来，却一点儿反应也没有，他们不仅没有来点儿报答赫鲁晓夫同志恩德的行动，比如说，也宣布赫鲁晓夫同志为‘古巴英雄’，也给赫鲁晓夫同志一枚‘古巴英雄’奖章，不，他们都舍不得给，他们甚至连一封感谢信，致敬信都没有写来。这些古巴人，真是的！

……”

赫鲁晓夫给纳赛尔总统说这些抱怨话时，似乎饱含着十足的怨气。

纳赛尔总统给切·格瓦拉转述这些情景后，接下来还说，他，纳赛尔总统本人，在听到赫鲁晓夫讲出来的这些对古巴人的抱怨话时，他曾经马上猜想过，赫鲁晓夫所以如此这般冲着纳赛尔抱怨古巴人，是不是为着给埃及人提个醒儿，让埃及人能给赫鲁晓夫一些虚荣的满足，比如说，纳赛尔总统也来对等地宣布，赫鲁晓夫是“埃及英雄”，这样一来，也许会使赫鲁晓夫高兴万分，手舞足蹈起来吧？

可是，纳赛尔总统还是马上想到了。这可是无论如何也不可取的。如果他要作出这样的决定，真的宣布赫鲁晓夫为“埃及英雄”，那以后，在埃及，谁还肯来当英雄呢？恐怕埃及人就都会不齿于此了吧！那埃及可能就会有麻烦了。

因为想到了这样可能的结果，纳赛尔总统听到赫鲁晓夫对古巴人的抱怨时，完全不予反应，完全不吱声，硬装听不见。

不过，对此，纳赛尔总统似乎不无感到后悔。在纳赛尔总统给切·格瓦拉叙述这样一些有关赫鲁晓夫的话题和议论之后，在谈话中，不知是真的，还是仍然是为了表现他的幽默，他几乎是挺认真的还对切·格瓦拉说了以下这样一些话：“切！其实，我们真可以为此而感到遗憾，如果我们当时，确实能知道赫鲁晓夫真的确实有那样一种真切的渴望与需要，我们就是真的宣布他为‘埃及英雄’、‘古巴英雄’，又能有何妨呢？反正我是实用主义者，只要埃及仍然能从赫鲁晓夫的腰包里掏出建设埃及的钱，我就不管他赫鲁晓夫的那些钱，是怎么赚来的，反正埃及是古国，但是苏联，他们是大国，而且，他们也还真比我们强大和富裕，所以，我们自然也不在乎花他们的钱，何况赫鲁晓夫差不多天天标榜，他们有国际主义义务，而我们埃及，却也真的正需要他来尽这样的义务，他心甘情愿来尽这样的义务，无论怎么说，我们还是能高兴的，能欢迎的，所以，当我们后来发现苏联人在一个早上就扫地出门，把他赶下了台，我们还真是无可可惜，无不后悔，我真的还认真想到过，如果他真的是‘埃及英雄’，真的是‘古巴英雄’，他也许还不至于被他的苏联同志们毫不客气地撵下了台吧！”切·格瓦拉当时给纳赛尔总统的回复是：“问题是真遗憾，真遗憾他不是‘古巴英雄’。不管埃及的情况如何，我们古巴却真的给过这位赫鲁晓夫成为‘古巴英雄’的机会。可惜在这样的机会中，他反而走到了更为遥远的地方。”

当纳赛尔总统听到切·格瓦拉的这样的话语和议论时，纳赛尔的目光里，传出了一丝忧虑。他接着又对切·格瓦拉说：

“现在的问题是，赫鲁晓夫下台了。在把他赶下台的苏联新领导人中，包括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他们以后将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呢？特别是对外政策，他们是全面继承赫鲁晓夫的遗产，还是全面的予以摈弃呢？”纳赛尔总统说到这里时，他还特别询问切·格瓦拉，知道不知道在赶赫鲁晓夫下台的罪名中，据说还有很重要的一项，是指责赫鲁晓夫对埃及的“大手大脚”的

支援。然而，纳赛尔总统提到此时，他甚不为意的笑了一下，接着说：“其实，对埃及来说，苏联的所谓‘大手大脚’的支援，是重要的，但却也还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苏联实在穷，我们也可以完全不要这样的支援。我们埃及所担心的最主要的问题，倒是怕因为埃及得到了苏联的‘大手大脚’援助，反遮了苏联并不真心诚意支援世界各革命国家人民的丑。比如在整个黑非洲，许多国家的人民，为着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桎梏和压迫，进行着争取民族独立的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它们渴望并至诚地期待着苏联给予强有力的支援，哪怕首先是道义上的支援，而且，这种支援必须是至诚的，真诚的，不应该含有半点的虚伪和欺骗，更不能在最关键的时候产生任何可耻的叛变和出卖，如果那样，就只能制造悲剧，制造像刚果制造的那样的悲剧，制造像卢蒙巴总理被杀害的那样的悲剧。”

纳赛尔总统说到这样的话题时，十分动情，特别是当他谈到被杀害的刚果总理卢蒙巴时，眼圈儿似乎都红了。

接着这样的话头，纳赛尔总统还说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呢？纳赛尔知道切·格瓦拉是先到中国访问，然后他才又从北京飞到开罗来的，所以，纳赛尔问起了中国的情况，问起了他的朋友周恩来的情况。

纳赛尔总统倒是很了解切·格瓦拉和周恩来的行踪的。他知道仅仅几个月前，当苏联发生政局骤变，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以后，周恩来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曾经到过莫斯科。他知道在那一个相同的时间里，切·格瓦拉，也受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派遣，前往了莫斯科。纳赛尔知道周恩来和切·格瓦拉同时到莫斯科去，借的名头是参加1964年11月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庆祝活动，而真正的主要的活动内容，肯定不是为着这个，而是为摸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的底儿。

纳赛尔熟识中国总理周恩来。纳赛尔对周恩来完全以最真诚的朋友视之和相待。自从1954年，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会议上，纳赛尔和周恩来结交认识以亲，周恩来从一开始，就特别欣赏纳赛尔异乎寻常的风彩，而纳赛尔也深被周恩来奇异的魅力所吸引，他们两人一见如故，虽然是忘年交，但明显地产生着仿佛是兄弟般的情谊。这样，几乎是自然的，也就拉开了中埃两个伟大古国间的，崭新一页的兄弟友谊的联系。

纳赛尔深深知道，中、埃两个伟大的古国，有着许许多多的共同之处。两个伟大国家各自拥有的灿烂辉煌源远流长的历史，是世界上少有国家可以比拟的。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都里程碑式地标志着中埃两个国家伟大民族的久远的文明。而同样，在近代史上，两个历史上的伟大古国，备受世界上的现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蹂躏的历史，也是十分相似的，而这样一来，在本世纪中，在两个伟大国家间所发生的两场至为深刻的革命，虽然革命的广阔内容不尽相同，但在反帝、反殖、反封建的方面，其性质却有着极为相似的共同性。因此，埃、中两个伟大国家，埃中两国人民，在崭新的历史时期，自然产生着相互的同情、相互的支持和兄弟相依关系的本能的要求和渴望。

自从1954年，在万隆会议上，纳赛尔和周恩来里程碑式的伟大握手，架起了中、埃两国人民彼此联结的金桥，疏通了中、埃两国人民联系和来往的渠道之后，两国人民的友谊交流和互相的支持帮助，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

在许多关键的时刻，中、埃两国人民的相互支持，是至为强有力的。

当帝国主义者遗留下来的问题，边界问题，使中国和印度两个伟大国家

相互在边界问题上冲突和交恶的时候，纳赛尔总统严格信守中立，他以既是印度总理尼赫鲁至诚的朋友，又是中国总理周恩来至诚的朋友的关系，从中折冲调停，绝不偏有依，从而，为中、印两个友好邻邦关系的弥合和平衡，作了大量宝贵而有成效的工作和贡献，这是十分重要的。对印、中两国和两国人民，都作出了非常难得的帮助，十分有效的帮助。

除此之外，埃及给中国的道义上的帮助，当然也还是更多的，比如在联合国，坚决要求驱逐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埃及的努力，一向是坚定的，是坚持不懈的。

总之，埃及给予中国的支持和帮助，还是尽可能的，是尽可能多的。

然而，当然，同样的，中国给予埃及和埃及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从来都是至为尽力的。特别是在难忘的 1956 年，当埃及从英、法帝国主义集团手里，毅然收复苏伊士运河的时候，特别是在后来紧接着进行的反对英法帝国主义和以色列入侵的艰难斗争中，中国坚定地站在埃及人民一边，中国不仅在道义上全力支持了埃及人民的斗争，而且在可能有的物质方面，也差不多是竭尽全力，给了埃及人民以强有力的支援，比如，纳赛尔总统曾经得到过这样的情报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支持埃及人民在帝国主义斗争中的需要，甚至几乎竭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的国家银行的法郎外汇贮备，来全力支持埃及人民在此一方面的需要。这样的友谊的支持，是真正的难能可贵，真正的至为真诚的。

说到中国的难能可贵，至为真诚的援助，不仅埃及，几乎所有奋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革命的国家，都有口皆碑，无不称颂来自中国的、真正至诚友谊的，真正无私的援助。这真是实在没有话说的。

真诚和无私，实在是中国援助的最大的特色和特点。而且，中国对所有兄弟国家的支援和援助，几乎，总是竭尽可能，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在道义方面，中国对各国人民的声援和支持，从来也是最坚定最彻底的，是从来不作任何的暧昧和退缩的事情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十分令人遗憾的是，纳赛尔总统也深切的知道，虽然中国对各国人民的支持帮助至为真诚无私，至为宝贵重要，只可惜的是，除了道义方面的充分支持和声援以外，在物质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实在还十分有限，经常难以叫人期望是大规模的，极为充分和大量的。

对此，纳赛尔总统当然也能深刻理解，而且，何止可以理解，纳赛尔总统有的时候，也会设身处地，为中国人民心疼。他能深刻的知道，中国也太不容易了，一个老大的古国，一个民众多的老大的国家，曾几何时，还受着周恩来曾经告诉过纳赛尔总统所说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沉重压迫下，特别是在近代史的历史上，中国和埃及实在十分相似，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摧残和欺凌，几乎被榨干了每一根毛细血管里的鲜血，以至使两个古老的古国，都变成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人民淹淹待毙。如果不是两国人民在革命运动中获得新生和再生，古老的民族事实上完全处在行将走向覆灭的水深火热之中，而在这样一种严重的状况下，从濒临绝境的边缘上获得新生和转折的国家，它新生和转折的时日又不是已经相当久远，所以，它即使是迅速康复的肌体，也远不可能马上会变得强健无比，充满了余力，这情况是完全真实的，是完全自然的，因此，除了坚定彻底的道义支持之外，要中国拿出更多的物质力量和可行的实际力量，更多地支持和

支援在奋起反抗和斗争中的各国人民，无疑是不现实的，是在现阶段，近期内并不可能的。

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而且是一个几乎难以弥补的，几乎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中国的物质力量的援助，纯洁而宝贵，确实是真诚和无私的，确实不会包含着任何枷锁和圈套甚至是陷阱，是完全可以令人放心的。

可惜只是太少了。

可惜只是太有限了。

可惜实在是太遗憾了。

然而，与中国的有限的物质援助相遥对的，不是也还有着各式各样的，也可以被称为是“援助”的项目类型吗？

现代帝国主义，不是也会拿出大宗的财富来，拿出他们的大宗的，简直无处花销的钱财来，不是也表示可以援助一些国家和人民吗？比如对埃及，美国的当权人物，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就曾经从腰包里掏出过很大一笔钱，那是六千万美元，在埃及人民，在纳赛尔总统面前眼前大晃特晃过，也好似热切地向埃及、向纳赛尔总统表示过，美国可以花这么多钱，拿出这么多贷款，支援埃及建造除害利民的阿斯旺水坝。

但是，接下来，约翰·杜勒斯表示，埃及使用这笔美国钱，使用这笔美国贷款，将是有条件的。这样的条件是什么呢？这样的条件就是：埃及必须参加反共阵营，埃及必须停止对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兴起的革命运动给予支持和援助。

看看，这样的援助，就明显地包含着公然的枷锁和陷阱。你要这笔美国钱，你要这笔美国的援助吗？你得参加反共阵营，你得背叛你的阿拉伯兄弟和黑非洲的兄弟。

纳赛尔总统信奉伊斯兰教，不信奉共产主义，可是，你信你的，我信我的，纳赛尔总统为什么要参加反共阵营呢？而且，特别是，当帝国主义的压迫还时时临在埃及人民的头上的时候，纳赛尔总统为什么要去参与和埃及人民相距遥远的反共阵营去呢？

同时，所有阿拉伯国家和民族，所有黑非洲的国家和民族，他们的呼息，他们的存在和命运，与埃及的存在和命运，从来具有，今后也不会割断，有着千丝万缕的，息息相关、血肌相连的联系。在这样的相关和联系中，美国只想以塞几个臭钱就来阻断，这是可能的吗？

美帝国主义真是以为金钱万能，太把金钱的能力和作用看重了，所以他们会白日作梦！

所以，在那样的“援助”面前，纳赛尔总统只能报之以何止是鄙视和轻蔑，而且简直是仇视的轻蔑，断然的拒绝。

拒绝了美国的这样的援助，埃及人民并不感到遗憾，而有的外国人，则更为高兴起来，他们也许看到了美国的影响和控制出现了真空的地区，于是，他们也便跃跃欲试，前来填充这空白。在赫鲁晓夫治下其时的苏联，是不是如此，便十分令人可疑。美国人掏六千万美元，圈套不住埃及，赫鲁晓夫为此十分高兴，他便慨然地从腰包里掏出了相当一亿美元的苏联钱，并且，号称是无私的，绝不附加任何条件，只给比平常国际规定还低微的利息就行了，绝不合任何枷锁和链条。

起初，埃及人和纳赛尔总统都有些不敢相信，埃及人怎么能逢到如此的

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呢？可是，经过一个时期的犹豫观察，竟发现这样的好事，确实还可能是真的。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也许社会主义国家，确实会多行善事，比如中国，不一直就是确实如此，非常真诚而实际地尽可能尽力的声援和支援着世界上的备受剥削受压迫的国家奋起战斗吗？也许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如此，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质，被明确规定是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质的，因此，既然有着这样的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真诚无私援助的好例可援，相信苏联对埃及真诚无私的援助，似乎也就有了根据。

这样，后来，纳赛尔总统宁肯把自己自命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慨然地把赫鲁晓夫已经掏出了腰包的一亿美元接受了过来，用来投入到对埃及人民至关重要的阿斯旺水坝工程的建设中去。

苏联的钱，当然也是好花的。埃及人民拿着这些苏联钱，让它们在巨大的有着举世影响的阿斯旺水坝的建设工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埃及人民的阿斯旺水坝工程。埃及人民深刻的感受到了这样的苏联援助的威力。对此，埃及人民开始产生着对苏联人民真挚深忱的感念和感激之情。埃及人民认识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真是伟大的人民，他们伸张正义，对争取翻身解放的世界革命人民，真是可谓怀有牺牲奉献精神，毫无民族利己主义地真正站在一起，真正无私地给予慷慨真诚的援助。这样的援助，当然是伟大的，是最可宝贵的。对此，埃及人民对苏联人民总是滋生着越来越多的尊敬和感激之情。

然而，后来，意想不到，也有些情况，开始发生着变化。这就是埃及人，包括纳赛尔总统，逐渐开始看到了一些赫鲁晓夫之类的表演。赫鲁晓夫对埃及，对纳赛尔总统，似乎始终都是充满了饱满的热情，正像他对别的一些国家一样，似乎充满着不懈的热情，甚至是特别的热情。据纳赛尔总统仔细观察，赫鲁晓夫对于古巴，包括对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包括对卡斯特罗兄弟，包括对切·格瓦拉，似乎都热烈地持有十分充沛的热情。对于赫鲁晓夫表现出来的强烈热情和友爱，纳赛尔总统本人甚至觉得，有的时候实在太难于自然容纳，甚至有些过分的令人灼痛和不舒服了。不过，尽管如此，兄弟们总还是不会拒绝过分热情的拥抱和握手的，虽然有的时候热烈的拥抱和使劲地握手，会令人手痛甚至喘不上气来，感到窒息，甜蜜的痛苦，往往也会是一种痛快，也绝不会令人不愉快和引以为意的。相反，倒是人们如果在这样的热情拥抱和热烈的握手中，如果不仅仅是发现，有的时候是感觉到了对方的虚情假意，发现和感觉到了对方的感情不仅并不深刻，而且并不真实，那才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悲剧，因为这样如此扭怩作态的表演，如果不是在舞台上、戏曲表演种种的游戏中，而是在真实的人际关系，包括政治家在国际的关系中，在人与人正常的生活关系中，如果也是这样的表演的话，那实在是太丑恶的一种表演了，简直令人恶心！

然而，最为令人头痛的是，纳赛尔总统在后来和赫鲁晓夫日益频繁的交往和接触中，纳赛尔总统起先是隐约的，后来是越明显越深刻的发现，认识和感觉到了这个胖乎乎的，笑脸总是十分可人，憨态总是十分可掬的赫鲁晓夫，有的时候明明如此进行并不高明的表演，他对埃及，对纳赛尔总统，总是在不时地，也许还是始终一贯地进行着这样的表演。纳赛尔总统已经明显的看到了证据，比如在埃及和叙利亚在1958年到1961年联合合并成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期间，赫鲁晓夫这种表演的伎俩，就越来越露骨。他首先通

过插手控制在叙利亚有广泛影响的叙利亚共产党，进而影响控制了一部分当时当权的叙利亚头面人物，接着赫鲁晓夫便特别激发起了觊觎，进一步控制整个阿联的十分的热情。赫鲁晓夫这种通过叙利亚共产党控制阿联的企图，和当时基本上同时在进行着的通过为赫鲁晓夫控制的古巴人民社会党的活动企图控制革命后古巴的企图是绝无二致的。

只是，在古巴，卡斯特罗很快发现了人民社会党的篡权阴谋，很快粉碎了古巴人民社会党企图窃取古巴革命成果，取而代之的谋略。

而在埃及，纳赛尔则是采取了更为残酷无情的铁的手腕。他把积极活动起来的埃及共产党员有多少是多少的全部逮捕起来，一网打尽，全部送到最黑暗的监狱里去受洋罪，作苦役。

纳赛尔不使埃及参加世界反共阵营，却也不准予任何埃及共产党的活动在埃及铺展开来。他认为埃及人走共产主义的道路是误入歧途，同时会把埃及导向歧路。他既然这样认为，他就坚决不让埃及走上这条道路，也不允许任何埃及人在埃及的土地上，为走上这一条道路而蛊惑。

然而，在这一件事情上，本来似乎挺聪明的赫鲁晓夫，却又想极不明事理地钻空子。

他乱插手脚，别出心裁，想暗中使劲儿，操纵他能够控制的叙利亚、埃及共产党人，篡入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领导位置上来，改变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国体和国家机制的性质。但，这样的活动很快败露了，很快被粉碎了。纳赛尔毫不留情的斩草除根。只是，纳赛尔总统他确实是革命领袖，是英明的杰出人物，他永远不会成为屠夫。当年他率领埃及自由军官团的年轻军官们，推翻法鲁克王朝，把法鲁克国王的王冠打入尘埃，在自由军官团中有重要影响的成员，蛊惑纳赛尔把被打翻在地的法鲁克国王绞死或杀掉，纳赛尔却坚决拒绝了这样的献策，他决不这样做，而是允许体重为三百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最昏聩无耻的法鲁克国王，打点他的全部行李和可以带走的钱财，马上离开埃及，让他自由地选择一个生活的去处，选择到意大利定居当富翁去了。

纳赛尔对埃及革命最主要的公敌和所全力针对的元凶，都采取了如此开明其实更得人心的处置。那么，他对他严格禁绝的埃及共产党人，他虽然残酷镇压，坚决镇压，只是也还并不格杀勿论，并不都报之以绞死和杀头的办法，而仅只是把他们投入到黑暗的监狱里去作苦役，彻底翦灭他们可能在埃及重新展开活动的可能。

对被逮捕的埃及共产党人，纳赛尔总统确实是这样处理的。

然而，当纳赛尔总统这样处置埃及的共产党人时，赫鲁晓夫看着这位总统冷酷却也英明，看着纳赛尔总统在埃及，并不像当年中国的蒋介石一样，宁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地屠杀共产党人，特别是蒋介石如果逮住了当时中共的领导干部，哪怕是最高领袖级的人物，比如瞿秋白，一律亲自手令杀害，统统实行格杀的政策。纳赛尔在埃及绝不实行蒋介石在中国实行过的这一套，因此，这能看出来纳赛尔非凡的大度。除此之外，纳赛尔还有一点大了不起，他在埃及镇压埃及共产党，却也并不刻意渲染被镇压的埃及共产党与苏联或中国，或其他任何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硬是牵扯和牵连，这也不像当年中国的蒋介石，逮着一个中共党员，就指责是拿苏俄卢布花的赤匪，其实，苏俄当时能拿得出多少卢布，能养活得了那么多风起云涌人数众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吗？有多少人拿过这样的卢布呢？几乎可以说没有，他们可并不

像许多叙利亚的共产党员一样，很多人是终年在莫斯科养着。不过，尽管如此，纳赛尔在镇压埃及共产党时，也还是并不牵扯苏联，尽管他镇压的埃及共产党内，还确实有可能会有着苏联的代理人，赫鲁晓夫的代理人。不过，即使如此，纳赛尔总统也不采取把埃及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等同和牵扯在一起的政策。

纳赛尔总统对外拒绝参加反共阵营，对内严格禁止和镇压共产党，对共产党国家，特别是对南斯拉夫，对中国，对古巴，对苏联，一律采取极为友好的政策。纳赛尔总统以他自以为是的实用主义哲学，实行着他们如此这般的实用主义的逻辑政策。而且实行的极为高明，不露任何缝隙，表现着至臻成熟的超凡的领导艺术。

可是，对这样的高人，赫鲁晓夫竟然也还想对其耍花招，对其钻空子。

他操纵了阿联的共产党活动。纳赛尔对阿联的共产党镇压后，没有牵连拉扯苏联，于是赫鲁晓夫就又想得寸进尺。他还想干涉埃及的内政，他觉得他掏了那么大的腰包，给了埃及那么大的好处，他肯定已经拥有了干涉埃及内政的权力，所以，他开始想向纳赛尔发出指示了。他想向纳赛尔发出要求，要求纳赛尔把逮捕的共产党全部无罪开释，全部快放出来。

对此，纳赛尔也并不产生激烈的反感。但是，赫鲁晓夫的这样施为，肯定是既有好心，却又有歹意。他是真想开释被镇压的埃及共产党呢，还是想试图测验埃及被控制的程度呢？纳赛尔对此想到了很多，并且，他坚决地推迟了他本来准备作出的特赦共产党在押犯的决定。他把赫鲁晓夫的招致，硬是坚决地顶了回去。

然而，仅仅这样的顶回去，纳赛尔总统还不想就此了结这场公案，他还要重新开始检查和审视埃苏两国的全部关系。他现在要查看一下苏联赫鲁晓夫的无私援助，到底含不含有任何暗算了。赫鲁晓夫无私的援助，果真不含任何暗藏的机关和动机吗？

纳赛尔本来对赫鲁晓夫的真情实意，还是深有戒心的。纳赛尔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建立着特别亲密的关系，关系最密切的，可能首推印度的尼赫鲁总理，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他们可谓是莫逆之交。纳赛尔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友谊，也是非比寻常的。对古巴的切·格瓦拉，劳尔·卡斯特罗，菲德尔·卡斯特罗，利比亚的卡扎菲，加纳的恩克鲁玛，纳赛尔也与他们建立了非常深切的友情。可是，唯独对苏联的赫鲁晓夫，虽然接触来往也不少，每到一起，赫鲁晓夫甚是热情，纳赛尔也特别客气，但是却就是不能亲密无间起来，总觉得中间有形无形地深隔着一些什么，硬是很难融洽起来。为什么会如此呢？久而久之，纳赛尔是聪明人，是有心人，他思想深刻，感情细腻，他发现他和赫鲁晓夫交往越多，接触越多，感情就越不能至诚的融合起来，首先是因为在他这边，始终似乎存在着戒心，几乎总是不能磨平，总是不能冲淡，总是挥之不去。

这其间的原因是什么呢？

纳赛尔为之进行过思考。一经思考，纳赛尔发现，原来他所以对赫鲁晓夫怀有戒心总也不能被冲淡，是因为这种戒心总是在被一些不断发生的事情更深地激发和加强着。

纳赛尔不仅可以透过埃苏关系来寻找这种戒心越来越深刻存在的理由和根据，他在从旁观察赫鲁晓夫处理苏联和别的国家间的关系时，也真是旁观者清，他总能看到赫鲁晓夫在对待别的国家，哪怕是对待友好邻邦，兄弟国

家，经常也会心怀鬼胎，居心叵测，比如他当年要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制原子弹，他们本意何为呢？据纳赛尔总统的推想，赫鲁晓夫所以帮助中国试制原子弹，其实也是企图控制中国，控制中国不能成为核武器独立拥有的国家，只是他后来发现毛泽东和中国根本是他所控制不了的，他才又宁肯甘冒背信弃义的指责，全部撤出了苏联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的专家，这时候赫鲁晓夫是又想把中国永远排拒在核大国俱乐部的大门之外，仍然想以此来控制中国，结果中国还是不受控制，于是开始了彻底反目，昨日的兄弟，变成了后来形同水火的敌手，原因主要在中国方面呢，还是主要在赫鲁晓夫方面呢？问题很明显，事实上，一切问题都是赫鲁晓夫挑起来的。赫鲁晓夫对中国是如此，另一个可援的例子，还可以说到古巴，加勒比海导弹危机，始作俑者是谁，当然不是别个，只是赫鲁晓夫，可是，他究竟是干了一场什么好事呢？他究竟为什么要把苏联的导弹运到古巴去，究竟为什么美帝国主义一压，他又马上乖乖把安装在古巴的苏联导弹撤了出来，这又是为什么呢？按照合乎逻辑的推理来看，赫鲁晓夫把苏联导弹安放到古巴去，本来就不是为着与美帝国主义抗衡和对峙，实际上的如意算盘，也不过是为了用苏联的导弹，主要目标是要来控制古巴本身。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美国逼迫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倒是首先是打消了苏联导弹对古巴的控制，否则人们可以试想，苏联人因为在古巴安置了导弹，赫鲁晓夫不就完全是可以向古巴发号施令的太上皇了吗？而那则正可能是赫鲁晓夫在古巴设置导弹的真正目的。

赫鲁晓夫对中国曾经是那个样子。

赫鲁晓夫对古巴曾经是那个样子。

那么，他对埃及、偏偏就会完全的不同于那个样子吗？

纳赛尔总统想过，赫鲁晓夫的战略目标，会不会把埃及也作为一个关键的控制目标，通过对埃及的控制，进而控制整个阿拉伯世界，控制整个非洲地区呢？

因为赫鲁晓夫有过许许多多控制别国的试图，纳赛尔对赫鲁晓夫自然也对埃及会有这样试因而越来越充满了不仅是戒心，而且逐渐变成了警惕，严重的警惕。

而由此，接下来可以有的进一步思考应该是什么呢？这当然应该思考的是，赫鲁晓夫的所有这种控制的试图，其目标到底又是什么呢？而如果真的被其控制，其结果又将会如何呢？

有一个非常现实可观的，可以透析的图样是在刚果。

1960年6月30日，刚果从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宣布独立，成立了刚果共和国。在争取刚果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斗争中，刚果有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民族运动党，在领导刚果人民奋起斗争的过程中，表现不俗，赢得了刚果人民比较广泛的支持，因此，在独立时的大选中，在议会中赢得了较多的席位，它们杰出的领袖卢蒙巴被推选为新生的刚果共和国总理，组织了独立后刚果的第一届政府。

卢蒙巴·帕特里斯·埃墨齐，1925年7月2日出生在刚果的开赛省。他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卢蒙巴在少年时期，得以在教会学校上学，受到了比较好的基础教育。后来，他又进入一所职业护士学校上学，受到了中等教育。就是在这样的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由于他的天赋秉能，他自我开拓了更广阔更大的文化熏陶范围，他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展开了大量的阅读，卢梭的作品，伏尔泰、雨果等伟大思想家和著作家的各种各样的哲学

的，政治思想，人文思想的著作和文艺作品，都成为他广为涉猎的对象，因此，他在职业训练中迅速成为专业人才的同时，也迅速自学成为具有一定的思想政治理论文化水平的杰出人物，他有了非常开阔的思想能力，和向往人文尊严自由的胸怀和倾向，因此自然地也就开始具有了革命进步的思想，具有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热烈愿望。于是后来，他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便越来越积极，越来越自觉地投入了反抗殖民压迫，反抗殖民统治的政治斗争，并且在这样的斗争过程中，逐渐成长成为领导这样斗争的组织者和领袖。在比较长时期的斗争中，他经受了锤炼，领导群众罢工，展开游行示威，进行革命的宣传，因此，他曾经是比利时殖民统治者缉拿追捕的对象，被手戴镣铐投入监狱服刑的对象。

但是，任何逮捕和监禁，只能拘禁一个人的肉身，绝难作到连他的灵魂也拘禁起来。

卢蒙巴在斗争的磨炼中成熟。

他的斗志不仅不会被挫折，反而越来越坚定。

他的思想锋芒不仅不会在挫折中被磨钝，相反的，他越来越激进，越来越仇视和痛恨殖民主义统治，越来越仇视世界帝国主义的压迫。

刚果是位处伟大非洲心脏地区的一个较大的非洲国家，面积达 234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有一千三百多万之多。物产资源十分丰富，一直被视为非洲矿藏最丰富的宝地。

早从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开始，属于部落酋长公国的刚果，就开始沦为比利时王国政府的殖民地，到 1960 年时期，比利时的殖民统治，在这里已经延续了八十多年。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刚果在成为比利时殖民地的同时，由于它丰富的矿藏资源的吸引，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列强，包括美帝国主义和英、法帝国主义势力，也把他们的大量资本，注入到这个比利时的殖民地上来，开始共享和瓜分刚果这块巨大的闪亮的璀璨宝石，帝国主义日逐深刻地吸吮着刚果璀璨宝石心中的膏血，比利时殖民地宗主国，在这里的投资高达三十亿美元，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这里的投资，也下了很大的赌注，到 1960 年，已经在刚果投资六亿多美元，用来开发刚果的矿藏。刚果盛产的铀矿石，成为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最主要的资源产地。

除了比利时和迅速填充进来的美国之外，英国、法国、荷兰帝国主义集团，都把他们的血手伸进了刚果，它们三国的投资也有近四亿美元，形成了榨取刚果人民膏血的管道。

如此嗜血成性，疯狂的鬣狗群，血腥地撕扯着刚果母亲的血肉，作为刚果母亲的伟大儿子，卢蒙巴，他的心头会燃烧着怎样的愤怒烈火，会呼啸着怎样的怒吼的旋风呢？

这是不言而喻的。

于是，在 1960 年 6 月 30 日，在刚果在斗争中赢来独立后，在独立的大选中获胜因而担任了刚果共和国第一届政府总理的卢蒙巴，在他的第一篇施政纲领的宣言中，就充满了对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的愤怒和痛恨的言词，表明着他与世界帝国主义誓不两立的立场。

他的这篇宣言，实在是堪称痛快淋漓了。

整个世界帝国主义的头子们，看到卢蒙巴的独立施政纲领时，他们第一声的惊呼是：“又出了一个卡斯特罗！又出了一个非洲的卡斯特罗！甚至是

一个比卡斯特罗更坏的卡斯特罗！”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当时气急败坏，也激发起了对卢蒙巴特别仇恨的心理，他甚至在他在白宫的美国总统办公室，马上给他的下属，中央情报局的头领艾伦·杜勒斯发出指令，让中央情报局马上行动起来，展开对这个非洲的新独立国家刚果的领袖断然的暗杀行动。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是专门用来统治和镇压各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统治和压迫的鹰犬，它得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暗杀卢蒙巴明确的指令以后，立刻便闻鸡起舞，紧张急忙地行动了起来，马上开动起了旨在杀死卢蒙巴的庞大的杀人机器。

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美国佬们，为什么会如此铭心刻骨地仇恨卢蒙巴呢？为什么如此拍案而起，闻风而动，马上要开动起杀害卢蒙巴总理的庞大的杀人轮转机来呢？

原来这情况在帝国主义看来，是最可怕、最急迫、也是最严重的。

它的可怕、急迫、严重在于，卢蒙巴在他的施政纲领宣言中，不仅刻骨地表述了他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仇恨心理和誓不两立划清界限的决心，他还同时一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仇恨心理，而以不可想象的热情和激动，几近是十分狂热地称颂了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他不仅把苏联说成是从来也没有剥削压迫过刚果人民的伟大国家，而且是一直鼓舞和同情刚果人民进行反抗，挣脱帝国主义锁链的伟大国家。因此，苏联不仅是朋友，而且还是寄托期望，照亮黑非的土地的太阳。

总之，卢蒙巴对苏联立刻表现出了非你不嫁的热烈爱情和激情，试图立刻就投入苏联温暖而厚实的怀抱，马上展开新婚蜜月一般的幸福甜蜜生活。

而作为苏联当时的领导人，苏联的代表人物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呢？这个顿河的哥萨克，一贯喜欢和漂亮的女人或富有的女人玩耍婚姻的把戏，他理所当然，乐不可支地高兴再有一位黑得透明晶亮的富有的非洲女人来充当他的性伴侣。赫鲁晓夫是不会拒绝如此的。赫鲁晓夫对漂亮的黑人女人一向情有独钟。有一次在联合国大会上，他竟然也会情不可已地热烈爱上了一位美国代表团的黑人女大使。

正因为赫鲁晓夫有这样的独钟之情，他对从黑非洲刚果传来的以身相许求爱的声音，当然也会“投我木瓜，报以琼琚”。赫鲁晓夫在听到卢蒙巴一厢情愿热情灼人的施政纲领宣言以后，立刻便派出了大批迎亲的宾相，马上坐飞机、轮船，来到了刚果，这些人当然都是军事人员、技术专家。苏联造的飞机，一些轻重武器和弹药。为了迎接这些宾相，卢蒙巴甚至亲临金沙机场和刚果河口的码头。当时，卢蒙巴真为他马上嫁给了如此强悍健壮的名叫苏联的郎君而得意、自豪，有了这样强悍健壮的无敌郎君，有谁还敢欺辱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下挣脱出来的黑非洲的小女子呢？卢蒙巴得意极了，放心极了。他庆幸着他已经使刚果得到了一场可以无限安然、甜蜜、幸福、无忧无虑，只有快乐的生活的婚姻，他可以完全放心地过日子了。

然而，他怎么能想得到，对此，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不仅气得要死，而且恨的要命，这些帝国主义恶棍和流氓们，怎么能容得他们所喜爱的怎么也玩乐不够的黑非洲最漂亮的美女之一刚果，落到苏联的怀抱中去呢？仅仅是为了嫉妒，他们也会不惜动手打架，何况，他们还更重视着这黑非洲美人身上的相当于无价之宝的财富，她有那么多的钻石和明珠挂在丰满圆实的胸前，甚至她的手腕和脚裸之上，都披戴着价值连城的无价的宝

贝，因此，如此漂亮而富有的女人，他们是怎么也不能让她落在红毛鬼苏联的手里的。

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恶棍和流氓团伙、毅然决定要动起武来，要动武争夺，要把他们失去的女人再争夺回来。可是，一谈到动武，帝国主义集团又似乎犹豫了起来。

和谁动武呢？

和苏联吗？

说实在的，帝国主义有些疑虑，不无恐惧心，他们着实也很害怕。

没有不可惧怕和不必担心疑虑的理由，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主力，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战后，苏联更成了已经把卫星送上了太空的核武器大国，苏联无疑是可以与任何国家匹敌和较量的强国，因此，轻易决定要和苏联打架，为争夺一个非洲女人而大干一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帝国主义流氓集团也还是聪明的集团，他们决定在这场争夺刚果这一名漂亮的非洲女郎时，并不展开与苏联的争夺，只想把刚果这个漂亮女人猛的一个冷子抢到手，再抢回来。他们甚至决定，宁肯把这个非洲美女撕成碎片，也不容它落到苏联这条红毛鬼的胳膊腕里。

而这样一来，作为刚果共和国政府总理的卢蒙巴，他的命运自然也就开始大成问题。

他几乎很快看到了，帝国主义已经明显的，完全明火执杖地动起了手脚来，又要夺回他们丢失的刚果，又要试图再一次来凌辱刚果这一个漂亮的美妇人了。

在这样的時候，本来，刚果这个已经获得了独立自由的美妇人，完全有理由指望她已经毫不含糊以身相许的新郎官苏联的庇佑和保护。没有一个新郎官是会拒绝保护他的新娘子的。那怕是和流氓恶势力展开一场打架的争斗，不容他的新娘子受到欺凌和伤害，是任何一个有血性的新郎官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是绝不能怀疑和犹豫彷徨的必须毅然履行的义务。

可是，不知道赫鲁晓夫这个顿河的哥萨克是怎么了，不知他为什么会变得这样胆怯和没有血性，当一个以身相许完全依在他身旁，指望依靠着他，准备和他厮守终身白头到老一起生活的女人，在猛然受到流氓恶势力抢夺和欺凌的时候，他竟然完全无动于衷，全然麻木不仁更绝不挥起铁拳来，或拔刀相向那些恶人，他甚至好像怕与女人沾上什么牵连带罪似的，马上跳开了来，立刻把刚果扔在了无人管顾的境地。

这真叫人立刻想到了一支叙利亚的民歌：

“你把我送到了井底下，
丢开井绳你就走啦，
你呀，
你呀，
……。”

于是，卢蒙巴的刚果，立刻处在了一种悲剧绝望的境地。

以身相许的新郎官既然不肯来保护自己的新娘子。已经开始又备受欺凌的刚果，该到何处去状告不平，仰诉帝国主义的强暴和欺凌呢？

既然苏联赫鲁晓夫不管，谁还有力量抗击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呢？谁还能强有力而最有效力地为刚果伸张正义，打抱不平呢？

一时，明显的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的好汉。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卢蒙巴只好糊里糊涂地向联合国发出了求告和投

诉，他要请联合国来主持公道，来解救刚果，来帮刚果的忙了。

卢蒙巴毕竟也还年轻，1960年，他时年只有三十三岁，他还并不饱富政治生活的斗争经验，他是政治家，但却仍然总是热情地怀有作为诗人的追求，他爱好写作，执迷地偏爱写诗，因此，诗人的激情，总是在激发着他的心智，使他的心中总还是充满着幻想和天真，对这个完全混浊的世界，往往还会持有十分幼稚的单纯。

卢蒙巴已忘记了联合国那时候，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已经完全变成了美帝国主义化身的魔鬼，在那个魔鬼的殿堂里，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还被腐败的蒋介石集团盘踞着。而苏联的赫鲁晓夫呢，虽然在1960年15次联合国大会期间，他一会儿脱下皮鞋来敲打桌子，一会儿大喊大叫，吵吵嚷嚷，甚至一会儿又无端地出手和西班牙年老的外交部长卡铁利亚厮打起来，一次大会期间，他蹿上蹿下，发言讲话辩论吵闹竟有十次之多，而且，尽管他表现野蛮粗俗缺少文化教养又总撒泼无赖喜欢恣意横行，其实他这样如此，在当时的联合国大会的那个魔鬼的殿堂里，不过扮演的的是一个马戏团的小丑的角色，完全只是联合国的一点儿可以看热闹的点缀。在当时的联合国，并不存在各个成员国的事实上的平等。联合国不仅成了美国的化身，而且已经完全是一柄美帝国主义可以随心所欲任意摆弄的工具。

因此，卢蒙巴天真烂漫地向联合国提出了对帝国主义新的侵略行为告诉的时候，他事实上是把刚果这个令帝国主义垂涎不置的美妇人，又推上了可供帝国主义集团恣肆轮奸的淫床。

美国佬对此简直高兴坏了，简直有些恣意忘形了。

这个时候，最可耻最卑鄙的，是不久前还充当刚果美妇人新郎官角色的苏联，它竟然充当起了将要走向淫床的美帝国主义的傧相，他明明知道美帝国主义插手刚果事务，绝不会给刚果带来任何好的结果，但他仍然毫不推委地成了美帝国主义走向欺凌刚果的淫床的抬桥子的角色。

美国和苏联联手通过了联合国出兵刚果的议案，接着便以美国大兵和他的仆从国家的走狗为主体，组成了联合国部队，开进了刚果。

接下来，卢蒙巴很快发现，他已经是引狼入室。

他领导的刚果合法政府——正是这个合法政府请来了联合国部队。但是，狼来了，合法政府也就不能存在了。联合国部队很快地完全吞下了刚果合法政府的肌体。联合国部队，完全变成了花销美国金钱，因而也完全由美国操纵指挥的雇佣军。他们占领刚果国家电台，切断政府的对外联系，包围封锁了总理府和政府大厦，他们明目张胆地干起了完全是帝国主义的伎俩。

卢蒙巴终于如梦初醒，擦亮了眼睛。他认清楚了联合国的本来面目。

于是，卢蒙巴又发出了愤怒的呼喊：“不允许用联合国军的占领代替比利时的占领。”

但是，时已至此，卢蒙巴还是又生幻想，他又一次向苏联发出了急切的呼吁，恳请苏联来为刚果解难。

而与此同时，卢蒙巴代表刚果政府，宣布断绝和联合国的关系。

这可又开始了诗人的冲动的幼稚的幻想。引而入室的恶狼饿虎，哪儿能那么容易挥之而去呢？

那是绝对挥之不去的。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最后批准了对卢蒙巴的暗杀令。美国中央情报局局

长艾伦·杜勒斯，亲自签发署名密电，命令中央情报局驻刚果工作站的站长劳伦斯·德夫林，开始执行诛杀卢蒙巴的秘密行动，为了诛杀行动不露马脚，不留痕迹，美国还迅速给德夫林派来了两名非美国籍然而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并且还派来了一个情报专家贾斯廷·奥康奈，充当监督暗杀任务的执行官。

接下来，受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把卢蒙巴软禁了起来，使卢蒙巴完全成了与外界割断联系的阶下囚。最后，联合国军又巧妙地制造出卢蒙巴“逃脱”的闹剧，使卢蒙巴落入到了美国在联合国军进入刚果后支持起来的刚果叛军的手里。美国佬为了把杀人的活计干得更漂亮些，而且不沾他们的手脚和衣服鞋袜，他们又作出决定不使卢蒙巴被杀死在美国控制的叛军手里，而是让卢蒙巴又被比利时人的走狗冲伯集团的土匪武装劫持，最后被枪杀在刚果的加丹加省的省府城市伊丽莎白维尔的一间小房子里，一名比利时雇佣军的上尉，举着美国造的左轮手枪，冲着大睁着一双政治家和诗人的眼睛瞪着他的卢蒙巴总理的脸颊、胸口和脖子，连连击发完全部六发子弹。

卢蒙巴在最后一刻，也许还在默念着豪言壮语，默念着抒情诗句，向往着苏联，期待和期望着强而有力的苏联，最终能援救他逃出虎口，援助刚果能重获自由，然而，苏联最终还是没有伸出手来。因为，事实上，赫鲁晓夫那只肥肥实实、粗粗胖胖、厚厚敦敦的圆手，才不会火中取栗似的来救援他呢。赫鲁晓夫在这样的时候，是绝不会不怕烈火烧的了他的手指头的。

事实上，这个满嘴甜如蜜的话语，满脸灿然谄笑的赫鲁晓夫，对任何一个同志、朋友、父兄和情人，从来有过什么样的真情真义吗？

总的观察是，没有过。可曾也不曾有过，这样论断他，绝不是谎言，而是万千有例可援的，全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关于黑非洲的兄弟

切·格瓦拉、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在塞利亚·桑切斯办公处属于卡斯特的这间小小的特别会客室里，促膝深谈，一杯又一杯地接连喝着咖啡，他们的精神很好，谈兴一直很浓。

因为他们一直是谈论着深刻的话题，严峻的话题，所以，在整个谈话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凝重，心情也相当的沉重。

切·格瓦拉声调徐缓，娓娓道来，他几乎是绘声绘色地，转述着他在埃及首都开罗的谢泼德饭店里，和纳赛尔总统不只一次深谈畅谈的话题。在转述他和纳赛尔总统谈及刚果，谈及卢蒙巴的话题时，切·格瓦拉已经不再强调哪些话是纳赛尔总统说的，哪些话是他本人说的，粗略地说着一些过程的时候，实际上是为了简捷地说出一些问题的性质。关于刚果，关于卢蒙巴，实际上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他们对其情况，也知道的并非很少，而是很多，有些问题，知道的甚至也很详细。

美帝国主义曾经把古巴革命和刚果的革命等同起来过。他们也把卢蒙巴和卡斯特罗等同起来过。古巴革命和刚果革命，在打碎帝国主义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统治链条方面，确实有着相同相近的性质。卢蒙巴和革命的古巴的领导人中的许多人，也确颇有相似之处，比如卢蒙巴和卡斯特罗，就都曾非常投入地深刻地学习和研究过法国哲人伏尔泰的人文主义学说，并且在青年成长时期深受其影响。比如卢蒙巴和切·格瓦拉，也有颇多相似之处，都能高水平地掌握法文语法，都曾大量地阅读文学作品，都热爱文学，喜欢写作，都曾有过作诗人的热望，而且几乎都终身习作写诗不辍。还有他们的年龄，也太相近太仿佛了，卢蒙巴比卡斯特罗大一岁，比格瓦拉大三岁，比劳尔大五岁。他们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而且他们又都是在几乎是同一个时期，以轰轰烈烈的姿态，以震动世界的声势，跃上了二十世纪世界政治的舞台。1959年的古巴革命，1960年的刚果革命，曾经使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感到过地动山摇。这是两场震动世界，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革命。古巴革命，刚果革命在冲决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的罗网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一个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最丰饶的乐园——非洲，一个在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后院——拉丁美洲。古巴革命和刚果革命无疑对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解放和人民民主的革命，产生着先导的作用和影响。因此，这两场革命，也曾是为世界人民最为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同时，这两个地区，也曾空前地激发起来过对帝国主义的仇视和深刻的仇恨。

因此，作为有着如此多共同点的两场革命中的其中一方，古巴方面的革命领导人，肯定也曾至为关注过刚果发生的事变，甚至至为深刻地研究过它的每一个细节，悉心地总结过刚果革命不同于古巴革命的胜利和稳固，只落得悲惨结局的教训，并且，总是期望从中找出完全合乎逻辑而又可以有大量事实根据作为佐证的原因，以期引为借鉴和引起警惕。

事实上，从1960年刚果事件发生，到1965年3月14日夜到3月15日的凌晨时分，古巴领导人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刚果革命的种种研究和分析。因为，研究刚果革命的种种遭遇，对古巴不是没有针对性和深切的意义的。古巴领导人认识到，让帝国主义彻底扑灭刚果革命的烈火，让帝国主义能充分地领略和他们扑灭一场革命甜滋滋的甘美滋味，因而更鼓舞他们扑灭革命的凶焰，增大他们扑灭任何革命的瘾头的话，那是一定不可以的。所有革命的人民，在和帝国主义，残酷激烈的斗争中，即使由于一时的力量悬

殊，让强大的帝国主义赢得了胜利，而革命人民输了，也一定要让帝国主义胜利者们倍尝苦果，要让他们在身上深深地烙印下永远也不能愈合的伤痛。革命者就是被帝国主义吃到肚里去，也绝不给他们造成好胃口，让他们痛痛快快消化掉。

从 1960 年刚果事件发生以来，刚果革命被帝国主义血腥镇压。从 1961 年 1 月 17 日卢蒙巴总理被美帝国主义假手他们的走狗残酷地杀害到 1965 年 3 月卡斯特罗兄弟和切·格瓦拉聚会深谈的今天，刚果革命，事实上并没有如帝国主义所愿。他们所期望的以杀害卢蒙巴来划上刚果革命的句号，事实上是完全不可能的。前赴后继的革命的刚果人民，在卢蒙巴总理被杀害以后，一直还被卢蒙巴总理热血化作的旗帜与精神所鼓舞和召唤，一直还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先是以基赞加为领导的刚果合法政府，在卢蒙巴总理还在活着的时候，当他被联合国军包围在他的总理官邸，被软禁起来时，忠于卢蒙巴总理的合法政府的副总理基赞加，组织领导合法政府从刚果首都当时的利奥波德维尔迁出，来到刚果东北部地区的斯坦利维尔，在卢蒙巴总理被联合国军扣押期间，基赞加宣布代行总理职务，主持合法政府的工作。后来，卢蒙巴总理被杀害，美帝国主义操纵联合国军，在刚果又扶植起了非法政府。基赞加仍然主持着合法政府，领导刚果人民展开与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走狗的斗争。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浴血奋战，到了 1962 年初，美帝国主义操纵联合国军以及他们的走狗集团，采用武力逼进和阴谋拢络的两手，瓦解了基赞加领导的合法政府，成立了以帝国主义走狗阿杜拉为总理的新政府，基赞加被吸纳为副总理，但很快被投入了监狱。原先忠于合法政府的军队，也被命令解除武装，实行遣散。

然而，不等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开始实行这一步骤，部分原刚果合法政府的武装，在原卢蒙巴任总理的合法政府里担任过青年和部长的廖勒尔带领下，仍然高举卢蒙巴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旗帜，继承着卢蒙巴开创的革命斗争事业，继续坚持着开展武装斗争。

这支坚持进行武装斗争的刚果革命人民武装，在刚果的东北部地区，在基伍湖一带，很快建立起了游击中心区和游击根据地，并且迅速地壮大起来，逐渐开始形成了燎原烈火之势。从 1962 年开始，到 1965 年的这个时候，这里已经形成了扑不灭的火焰。

但是，帝国主义仍然是强大的。

而且，帝国主义也会成为变色龙。

老牌殖民主义已经变成千疮百孔糜烂透了的腐尸，而在帝国主义的当权人物集团里，也不乏很多聪明灵秀的家伙，他们知道老牌殖民主义已经臭不堪闻，四处遭人厌恶、痛绝和唾骂，因此，帝国主义再以老殖民主义的面目招摇过市，那它势必马上就会无异于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或者是繁华街市上跑过的疯狗了，有的人会急忙躲避，更多的人则会奋起痛打。因此，帝国主义以老牌的殖民主义的面目出现，显然是完全不行了的。

那怎么办呢？

帝国主义的谋士们，他们都不是傻子，他们还会想办法。

他们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来呢？

他们还会想出摇身一变的好办法，他们可以巧夺天工，化腐朽为神奇，他们可以把老殖民主义的陈尸腐尸摇变成新殖民主义的美女，而且，他们可

以巧加梳妆，把这新殖民主义的美女打扮得花枝招展，人见人爱，简直比美国的风流娘们儿还要浪漫和漂亮。

她们也会身披洁白的羽纱，像是和平天使一般地走来。

她们也会把红唇抹的鲜紫发亮，时时口露白牙冲着你微笑，让那笑烈开来的红唇，好像是一朵献给你的盛开的玫瑰花，红唇白牙总是朝着你诉说着亲蜜的友爱，会向你不停地喊出“亲爱的！”“亲爱的！”字样儿。

他们摇身一变，有的时候忽然还会变成神情激动，怒气冲冲的汉子，骑士和拳手，他们也要伸张正义，拔刀相助，维持和平，甚或也会口喊和平、进步和发展，口喊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援助，甚至也还会口喊出吓人一跳的“革命”两个字来。

当然，这“革命”两个字，自从这两个字出现的时候，也就开始了被人用来作为伪饰的情况，因此，“革命”这两个字，有的时候，自然也会成为新殖民主义的化身，帝国主义自然也会利用招摇的假革命的旗帜。

不过，“革命”这两个字，有些太专门化了，反革命分子不能马上接过革命的旗帜来招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一贯镇压革命，是各国人民的死敌，他们如果忽然也招摇起革命的旗帜来，知道他们肮脏老底的各国人民，立刻会笑掉大牙，识穿他们的伎俩和欺骗。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又该怎么办呢？

帝国主义有办法，他可以寻找和塑造他们的代理人和傀儡。然而，如果这些代理人和傀儡，有的时候由于他们的劣迹斑斑，形象极为丑恶，打出革命的旗号也还是不能蒙骗人民，不能对人民产生一定的感召力时，又该怎么办呢？

帝国主义还会有办法的，这进一步的办法就是，帝国主义会大把大把地掏出钱来，为他们扶植起来的假革命、反革命的“民族独立政府”、“民主共和政府”，招募和训练大批量的雇佣军，把他们也冠以“民族军”、“政府军”的番号，让他们实际上行使镇压真正的革命人民奋起革命斗争的使命。

1964年6月，联合国在多数国家的强烈要求下，终于从刚果撤出了已经使联合国蓝色的旗帜上沾满了鲜血的，完全一直由美国控制的联合国军。

但是，联合国军撤出了刚果，美国的势力还是死赖在刚果不走，这才叫做请美国佬容易，送美国佬难。

而且，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接下来美国佬要进一步稳固它在刚果的既得权势和地位。美国佬把顶替卢蒙巴合法政府而拼凑起来的阿杜拉政府立刻推倒，马上又召回了曾经因不听美国指挥，被美国赶出了刚果的刚果加丹加省的军阀冲伯，让他重返刚果来组织和领导刚果新政府。

冲伯这个家伙，从他的父辈开始，就是比利时老牌殖民主义的忠实走狗，他出生在刚果加丹加省一个十分豪富的黑人家庭。他的父亲曾经是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在加丹加省的首要代理人。加丹加省贮藏着十分富饶的铜矿资源，比利时殖民者早已经在这里开拓出了可以攫取暴利的铜矿业，所以，加丹加成为刚果最富庶的省份，地方势力也比较强大。1960年，卢蒙巴领导刚果民族独立运动，冲伯这个比利时殖民者的忠实走狗，也一度试图投机，他借机掌握了在加丹加省的领导权，表示承认卢蒙巴领导的刚果合法政府，可是，仅只过了两个星期，在他窃夺了加丹加省的革命成果后，立刻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比利时殖民者的怀抱里去，宣布了加丹加省独立，他自命为加丹加独立国的总统，重操故技，全力以赴地为比利时殖民主义者的利益服务，因而当然也受到了比利时殖民主义者的全力武装支持和保护。由于英、法帝国主义

国家在加丹加省也有利益存在，因此，冲伯也就同时受到了英、法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

在后来的刚果事变的发展过程中，在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蓄意造成刚果一片混乱局势，在卢蒙巴总理被拘押期间，冲伯亲自指挥他所控制的军队，在比利时军事顾问人员的直接参予下，劫持卢蒙巴到达加丹加省首府伊丽莎白维尔，毫不犹豫地就彻底消灭了卢蒙巴的肉体，以示殖民主义统治者的仇恨和报复。

再后来，美帝国主义控制的联合国军在卢蒙巴死后，逐渐地控制了刚果的大部分地区，美帝国主义当然又产生了对加丹加省这块肥肉的觊觎。美国佬是一条大狗，它不管在加丹加这块肥肉骨头上，已经有一群狗，包括比利时和英、法帝国主义者这些狗们，正在撕扯着这块肥肉骨头上的油星和肉屑，美国大狗不管他们，因为他们比较说来，已经是一些老狗、小狗和弱狗，美帝国主义这条恶狗一呲牙，嗷叫一声，赶开了这群老狗、小狗和弱狗，它又把加丹加省这块肥骨头抢了过来，镇在了它的爪下，而加丹加的殖民主义者忠实的走狗冲伯呢？他自然也被美国恶狗追赶着，挟着尾巴逃跑了。

他跑到哪里去了呢？

他跑到了西班牙，躲到了法西斯分子佛朗哥开设的走狗窝里去作寓公去了。

这是 1963 年发生的事情。

物换星移，仅仅过了一年时间。联合国军也撤出刚果，美国进一步控制了刚果。

这时候，美国佬突然发现，虽然卢蒙巴在几年前，已经被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了，卢蒙巴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他所开创的事业、民族独立解放的烈火，仍然在刚果遍地燃烧，而且大有越烧越旺之势，在刚果辽阔的东北部，卢蒙巴在他的诗歌里，无数次的提到过的伟大的非洲的心脏地区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片燎原之势。卢蒙巴的激越的诗句：“让我们的刚果，在这伟大的非洲的自由的心脏，生存下去，赢得胜利吧！”仿佛已经响彻了刚果整个东北部的上空，正在整个刚果，回荡着巨大的回声。美国佬发现，这样是不行的。这样，他们是不能真正完全地控制刚果的，甚至明显还面临着失去这样的控制的危险。怎么办呢？美国佬忽然也想到了冲伯。美国佬虽然赶走了他，把他赶到西班牙的狗窝里去了，但是，美国佬已经知道，冲伯是一条厉害的恶狗，他既残忍凶猛而且还聪明，他可以在主人需要他动作的时候，只使一个眼色，就扑上去，把卢蒙巴的脖子咬断，把那样一个杰出人物活生生的咬死，他在所有的主子面前，在摇尾乞怜的时候，是多么乖觉可爱，显示着他的机巧和聪明。

美国佬想到了这条聪明和厉害的恶狗，于是，马上就决定召他回来当刚果新政府的总理，让他彻底改换门庭，充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充当美帝国主义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政策的代理人。

于是，冲伯这条恶狗和聪明狗，一听到美帝国主义的召唤，便又摇着尾巴，撒着欢儿地奔来了。

他一跃登上了刚果新政府总理的宝座，沐猴而冠，显出一种炫炫然耀耀然的样子，美国佬还指点训练了一番演技，让他学会了一些就地打滚儿的把式，然后就让他粉墨登场，大肆演起了马戏团里的狗戏来。

1964 年 7 月里，美国佬把冲伯扶上了刚果总理的宝座，8 月里，他就颁

发了刚果新宪法，宣布刚果改名成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并且立即在刚果全国展开捐弃前嫌的“全国和解运动”。这个手上沾满卢蒙巴总理鲜血的杀人凶犯和刽子手，让人们忘记了仇恨来和他实现和解。美国佬聪明太过，选来了这样的宝贝走狗，让他嘴上挂着人肉却又让人们当良犬和爱犬来待他，真是利令智昏、异想天开的可以。在中国一部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里，有一章“尴尬人难免尴尬事”，写的是一个十分尴尬难堪的故事，读来令人玩味不尽。美国佬在导演冲伯这个歹徒在政治舞台上表演狗戏的时候，有时似乎也会按捺不住利令智昏的情绪，昏头昏脑地就大演起“尴尬人难免尴尬事”的故事来，美国佬真是机关算尽。他们指挥冲伯在刚果国内搞“全国和解运动”，他还要把这样的“和解运动”搞到国际上去，美帝国主义直接扼杀刚果革命，假手利用冲伯的狗爪杀害非洲人民伟大的光荣而可以引为骄傲的儿子卢蒙巴，他们已经成了非洲人民的公敌和死敌，整个非洲人民，众多的非洲国家，对他们充满了敌意甚至是刻骨的仇恨，然而，美国佬毫不觉醒，冲伯这家伙也太不自量力，他在全非洲搞“和解运动”也还罢了，还要把“和解运动”搞到国外去，搞到全非洲去。他上台不久，正值非洲诸多国家的领导人，来到了埃及的首都开罗，大家聚集在这里开会，研究非洲的团结、革命和发展的问題，非洲一些最著名的国家领导人都来了，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几内亚总统赛古·杜尔，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等等一些非洲杰出领导人，济济一堂，十分欢欣地聚到了一起，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冲伯，也在埃及拒发签证的情况下，硬是坐飞机来到了开罗，硬是也要挤到朋友们聚会的会场上来。

于是，在开罗，立刻出现了这样一个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局面。

已经来到这里聚会的非洲各国领导人，他们大都是为非洲独立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英雄和杰出人物。

他们怎么能和明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冲伯坐到一张桌子前来开会呢？

而且，所有已经来此聚会的非洲杰出领导人，他们都曾经是刚果独立的坚定支持者，都曾经是卢蒙巴至为亲密无间的战友、同志和朋友，他们怎么能和杀害他们战友、同志和朋友的刽子手的这个杀人犯冲伯，坐下一起来开会呢？

很多人，见到了冲伯这个不共戴天的死敌，实在难以抑制欲饮其血、欲啖其肉，为卢蒙巴报仇雪恨的冲动。很多人鼓动起来，跃跃欲试，要逮捕冲伯，把他交付非洲人民公审，然后施以绞刑。

冲伯这人，这条恶狗，他杀害卢蒙巴残忍的血腥气，一直缠绕在他身上，怎么也冲淡不了，洗刷不尽，非洲人民因此对他铭心刻骨的深仇大恨，实在是难解难消的，以至他仅一年后再次被迫下台，再次妄图寄身到西班牙狗窝里去作寓公时，在路经阿尔及利亚时，被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英雄，卢蒙巴的忠实朋友布迈丁将军下令逮住，把他投入死牢，让他死在了狱中，阿尔及利亚英雄替卢蒙巴讨还了血债。

话题还是退回到1964年，那一次冲伯硬是闯到开罗来，他最后的下场是怎样的呢？他当然在那一次也没得好下场，埃及总统纳赛尔，卢蒙巴总理最赤诚的朋友，他接到冲伯不持埃及签发的护照已经坐飞机闯到开罗时的报告后，他立即下达命令，命令埃及警察，立刻把这个歹徒逮捕起来，把他关进了禁闭室。

然后，纳赛尔总统坐下来，从容不迫地主持来自非洲列国朋友们的聚会，

使聚会欢谈在洋洋喜气中结束以后，纳赛尔总统从容不迫地一批一批送走他所请来的全部贵宾之后，他才又签发一道命令给他的警察部队司令，让他派遣两名埃及警察部队的下级警官，指挥一个班的警察部队，把冲伯从埃及远郊之外的警察部队的禁闭室里，直接解送到飞机场，把他解上开往利奥波德维尔去的飞机，让他自行返回刚果。

这样，冲伯便又灰溜溜地回到了刚果，继续来做他充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统治刚果的美梦。

然而，他的如此白日梦，又怎么能做的成呢？

他的白日梦越来越难做了。就在这歹徒在美国的扶植下当上刚果政府总理的个把月之后，在刚果东方省开展武装斗争的廖勒尔指挥的，仍然忠于卢蒙巴旗帜的武装部队，一举解放了基赞加代总理曾经设置过刚果全国合法政府的临时首都斯坦利维尔，刚果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以雷霆万钧，不可阻挡之势向前推进。

在这样的情况下，冲伯这家伙，还想再耍花招。非洲所有进步国家不理睬他，他就又掏出好多美国给他的活动经费来，拢络一些中立色彩较浓的国家来和他结盟，他向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等国求援。可是，冲伯其人的形象太丑恶了，他的走狗形象不管如何沐猴而冠，也掩饰不往，因此，即使这样一些国家，也绝不愿意和他来往，绝不愿意和他结盟，绝不愿意借给他一兵一卒，来帮助他镇压风起云涌的刚果革命人民。

不过，终还是美帝国主义有眼力，它认定了冲伯是一条凶猛的厉害狗，认定了冲伯还是一条聪明的忠实于主人的狗，所以，美国佬养着这条狗，一直使用着这条狗。

这条狗虽然学会了打滚儿摇尾乞怜取悦人意的本事，但终究还是掩不往他吃人的凶相和利齿，因而，这条狗还是不能被人们视为良犬和善兽，更不能成为人们的爱犬和朋友，它不能以摇尾打滚儿来讨得人们的喜欢。

不能如此这般，那么又该行哪招呢？

当然还是行他的恶招为上。

他本来是一条恶犬，狼犬和吃人的狂犬，还是让他来当恶犬、狼犬、吃人的狂犬好了。

于是，美国佬又掏出更多的钱来，资助和豢养冲伯这条恶狗和吃人兽，让他又肆无忌惮地施展起他的咬人、吃人的技能来。

冲伯派出了大批人马，拿着美国佬赠予的大把钞票，到法国、英国、比利时、南非等地，招募白人雇佣军，让那里的一些兵痞、恶棍、职业杀手，来刚果杀人赚钱。杀人赚大钱。

美国佬当然不会只让冲伯独力来干这种大事，美国佬直接帮助冲伯训练这些白人雇佣军，直接给他们配备杀伤力很大的枪枝、弹药、火箭筒、手雷，还有白刃格斗的匕首，以及远投杀伤目标的飞刀，美国佬在这些方面，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和能手，他们能干得十分认真和仔细，在训练好、武装好冲伯的这些雇佣军后，美国佬一次出动十二架重型运输飞机，把全体雇佣军和他们的辎重车辆，坦克和自动推进炮等等重型武器，一古脑儿运到了刚果来，并立刻开赴刚果的东北部去，疯狂地去扑灭那里正在胜利展开的人民革命战争。

如此兴师动众，美国佬仍然怕不保险，仍然甚不放心，于是美国佬又鼓动和支持比利时老殖民主义回到非洲去，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美国出

动战斗轰炸机和作战飞机掩护，又派运输机把大批比利时伞兵空投到已经被刚果爱国武装解放和控制了的斯坦利维尔，于是，在那里又展开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激战。刚果爱国武装，在强大的敌人的突袭和压力下，不得不放弃已经赢得的城市和战果，又且战且退，退向到基伍湖一带的山地、丛林和荒原。

这样，刚果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爱国武装斗争，就又到了一个更为艰苦的形势严峻的时期，充满了更多的困难和曲折，也充满了更险恶的被强敌扑灭火种的危机。

关于家庭的情思

1964年2月20日。切·格瓦拉在给一位家住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安纳路36号名叫罗萨里奥的非洲朋友的复信中，曾经说过一段这样的话：如果每逢世界上发生非正义事件时，你就愤慨得发抖，那么我们就是同志。

切·格瓦拉是在回答这位陌生的非洲朋友他愿不愿意成为她的同志和朋友时作出了如此简明的回答。

1964年11月，美帝国主义出动大批飞机，空运冲伯这条吃人的恶犬在欧洲等地招募的白人雇佣军进入刚果，同时运送比利时伞兵飞临斯坦利维尔，在那里降落下来，和白人雇佣军一道，联手镇压和打击刚果革命的爱国武装，逼使刚果爱国武装又放弃他们的解放区和大片的根据地，进入更为荒芜遥远的山地和丛林，使他们一时处在极端的困难和危急的境地。

而就在这之后不久，1965年的2月间，每逢世界上发生非正义事件时，就愤慨得发抖的切·格瓦拉，在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他来到了非洲，2月11日，他首先来到了埃及的开罗。2月12日纳赛尔总统欢迎他的到来，在会见他这至诚的老朋友，与他进行彻夜的长谈时，切·格瓦拉与纳赛尔总统推心置腹，无话不谈，谈了许许多多方面的事情。

在他们所谈的许许多多话题里，有一个话题后来被明显的突出出来。这就是他们谈到了刚果的话题，谈到了刚果人民的斗争形势。他们谈到了美帝国主义的疯狂操纵，如何给走狗冲伯雇佣、训练和运送白人雇佣军，如何空投比利时伞兵，来镇压刚果的爱国武装、革命武装。

谈到美帝国主义如此嚣张地多端作恶时，纳赛尔总统愤慨得发抖，切·格瓦拉也愤慨得发抖。

于是，切·格瓦拉便对纳赛尔总统说：

“我想到刚果去，我想到那里去看一看。”

纳赛尔略略一惊，他问格瓦拉：

“你想到那里看什么？”

切·格瓦拉回答说：

“我想到那里去看看，帝国主义，冲伯集团的白人雇佣军，以及比利时伞兵，是怎样屠杀和镇压刚果爱国者的。我要去看一看，我们能在那里做些什么事，帮助战斗中的刚果人民和兄弟。”

纳赛尔问：

“卡斯特罗同意你去吗？”

切·格瓦拉说：

“我们经过了研究。”

纳赛尔看着切·格瓦拉，眼睛里流露着十分的关切。他说：

“去那里相当困难，而且充满了危险，你能不能先不亲自去，而派出一些得力能干的同志去看看。你的目标太大了。而且，你也太重要了，不可以轻率地去冒险。”

切·格瓦拉说：

“我不是要去作轻率的冒险，我可能是准备去作巨大的行动。帝国主义到处于坏事，他们简直欺人太甚，太疯狂，太嚣张了，我们必须准备让他们在一切地方吃尽苦头，在一切地方都斩断他们的魔爪，使他们最终不能再肆无忌惮地疯狂，到处作恶多端，到处横行霸道。为了作到这一点，为了这样的目标，我去，是值得的，是必须的。是必要的。即使可能付出代价和牺牲，

这也是应该的，所以，危险并不能成为阻拦我们前进的障碍，至于困难，我们已经作了准备，我们有可能克服任何困难，去达到目的。”

纳赛尔总统已经完全听明白了。

到刚果的战斗丛林中去看看，看来已经是切·格瓦拉坚定下来的决心。

纳赛尔总统十分感动。他为这些古巴人，毅然作出的对非洲人民，对刚果人民的援助而感动，他们的行动完全是正义之举；他们只想到那里被屠杀的人民中间去，拔刀相助，保护那里被屠杀的人民，帮助那里的人民去进行决死的反抗，他们完全不被私利所驱，他们才真正是无私的，而且，他们无私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肯干，他们甘于为那里的人民事业，为那里的正义事业，为那里的民族解放和人民的自由和尊严，贡献出他们的一切，包括宝贵的青春、鲜血和生命，对切·格瓦拉来说，当然还包括着崇高的地位和官职，也包括他的荣耀和权力，还有他的无限的爱。

兄弟般的纳赛尔总统，从一开始就兄弟般地爱上了切·格瓦拉少校，从一开始，他就对切·格瓦拉产生着一种兄长般的慈爱，所以，他也更多地了解和透析了切·格瓦拉的感情世界。

纳赛尔知道，切·格瓦拉的感情世界真是太辽阔，太丰富了，他的爱，实在太多，也太深，他对母亲，对父亲，对兄弟姐妹，对妻子儿女，他有多么深沉的爱啊！他一谈到母亲塞莉亚的时候，总会涌起一种男性的羞怯之情，眼睛会忽然亮晶晶泪闪闪起来，还有他提到父亲林奇先生，他说他很难发现第二个如此仁慈善良的老人。切·格瓦拉曾经告诉过纳赛尔总统，小时候，他得了严重的哮喘病，被憋闷的终夜喘不上气来，怎么也睡不着觉，只有伏在父亲林奇先主的胸脯上来，他才能够酣然入眠，进入睡梦之中，而父亲则会完全无怨无艾地以终夜的不眠来分担他儿子的痛苦。

提到他对妻子和儿女的爱，纳赛尔听来，有时候也会为切·格瓦拉感到心痛。

这次他来开罗，由于他们相互问起了各自的身体健康状况，所以自然地也便谈到了一些他们家庭的私生活状况。纳赛尔发现切·格瓦拉其实是一个真正儿女情长的人。他很爱他的妻子阿莱达·马尔奇。每逢谈起阿莱达·马尔奇时，切·格瓦拉的脸上都浮现着十分骄傲的神色，除了公然告诉纳赛尔总统他的妻子“很漂亮”之外，还总喜欢说：“她曾是个不错的女游击队员，因此，自然也是游击战专家切·格瓦拉少校的一个不错的老婆子！”

谈到儿女，切·格瓦拉对他的所有孩子，都津津乐道，赞不绝口，他夸赞他最小的女儿长的简直比鲜花还要美丽；他夸赞他的小儿子卡米洛长得很像他英雄的叔叔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少校。切·格瓦拉对牺牲的战友，也一往情深，古巴英雄卡米洛·亚恩富戈斯少校被暗藏的敌人杀害时，正好切·格瓦拉的小儿子诞生，为了纪念战友，他就给他第一个男孩儿起了卡米洛战友的名字。

在切·格瓦拉谈到他的两个大女儿时，也会公然地对他尊敬的兄长般的朋友纳赛尔总统夸赞：“这是两个女杰，绝对的女杰。小伊尔达是姐姐，小阿莱达是妹妹。”

切·格瓦拉还告诉纳赛尔总统，小伊尔达和小阿莱达不是一母所生。小伊尔达是他第一个妻子伊尔达·加德亚所生的女儿，小阿莱达是他第二个妻子阿莱达·马尔奇所生的女儿。但是，这两个千金小姐，因为她们都是切·格瓦拉的女儿，所以，她们两人之间，关系特别亲密，而且，这种亲情关系，

似乎有时候还饱含微妙，叫切·格瓦拉爸爸也能看得出来，这就是尽管大妹妹小阿莱达比大姐姐小伊尔达小五岁，但小阿莱达更懂得多亲爱，多尊重她的大姐姐，唯恐大姐姐因为不是她的亲生妈妈阿莱达·马尔奇所生，而是另一个妈妈所生，因而有时候感到委屈。小阿莱达似乎很懂得使小伊尔达大姐姐，永远不会产生这样的委屈，小阿莱达总有办法打消大姐姐产生这样委屈的任何机缘。而当然，切·格瓦拉的孩子，自然也都是天生的非常奇特的乖觉的孩子。小妹妹小阿莱达年纪小小，却很懂得，很注意珍视和处理与异母所生姐姐的关系，自然的，她的年仅八岁的大姐姐小伊尔达，也大有大姐姐的样儿和大度，在小妹妹，小弟弟们面前，她真亲真爱，活泼而天真烂漫，全不在意什么异母后娘所生什么的意思，相反总是耐心而极端负责地爱护弟弟妹妹们，帮这个扯开裤兜儿尿尿，帮那个擦鼻涕抹眼泪，绝对体谅和礼让着小弟小妹们，从来不在小弟小妹们面前撒娇，争强好胜，因此，切·格瓦拉爸爸给她起了个不伤大雅的绰号，叫她“小老太”而阿莱达·马尔奇妈妈则管她叫“小天使！”

阿莱达·马尔奇年轻、漂亮，曾经是勇敢的女游击队员，是切·格瓦拉出生入死，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和同志，在战斗中，在战场上，也是一位不怕炮火硝烟，不怕流血牺牲的战将，可是，在革命胜利之后，她和切·格瓦拉结婚以后，生儿育女，也是格瓦拉贤慧而温情满怀的好妻子，又温柔又宽宏大气，绝不是小肚鸡肠的女人，绝不是缠着男人，绊着男人难干大事业的那种女人，恰恰相反，她是格瓦拉绝对可以得到安然和放心依恃的相夫教子的贤内助，她全力以赴地支持着切·格瓦拉的工作和事业，全力以赴地替格瓦拉营造着一个幸福、温暖、充满亲情和爱的家庭，她使切·格瓦拉的生活，绝无任何缺憾，任何隐忧，而只有甜蜜和欢乐。

而且，在一件特别的事情上，阿莱达·马尔奇也还有着特别特别非常的小心，这件事情，总令她小心翼翼，慎之又慎，绝不敢差错毫分，这就是，在一件事上，阿莱达·马尔奇还要扮演好一个并不十分容易扮演好的角色，这就是后娘的角色。

特别的是，她是一个年轻的后娘。她开始时，没有任何当娘的经验，更当然不会与生俱来，就有当后娘的经验。当后娘的孩子有的时候不好当。当后娘孩子的后娘，有的时候也许更难当，有的时候后娘也许会比当后娘的孩子有更多一百倍的委屈，就是你怎么小心又小心，总之后娘总难当得好，后娘是一个很难让任何女人胜任愉快的职务。

然而，尽管如此，阿莱达·马尔奇，在给小伊尔达当后娘的时候，她似乎总是十分得体，十分成功地扮演着她的角色，甚至可以说，阿莱达·马尔奇几乎是非常成功地，胜任愉快地当了小伊尔达的一个好后娘，她们的感情深厚笃挚，爱得非常自然朴素而默契，可以说，她们的母女关系是真正亲密无间的，真正像亲生的孩儿和亲生的亲娘一个样儿。

但是，尽管如此，尽管阿莱达·马尔奇妈妈给了小伊尔达比任何妈妈都绝不会少半分的爱和亲情，却仍然不能使小伊尔达忘记了她的亲生的妈妈忘记了她的亲生的亲娘。

忘记亲娘，对小伊尔达来说，是不能够的。

小伊尔达在古巴解放后，从墨西哥来到了古巴，离开了亲爱的妈妈，来到了切·格瓦拉爸爸的身边来生活。

墨西哥城又大又破，古老陈旧，总是烟雾霏霏的。哈瓦那却是美丽的哈

瓦那，阳光灿烂，房屋真明亮。

只是，爸爸太忙了。小伊尔达总是非常难、非常少见到爸爸。而且，在最初的时候，尽管切·格瓦拉爸爸总是十分狂喜地亲吻小伊尔达，但小伊尔达却总是对爸爸一脸蓬松的黄胡子，充满了警惕和陌生感。她对爸爸的，总是充满了狂喜和热爱的长吻，特别十分难予接受，爸爸在拥抱她的时候，也总是过分用力，有的时候会搂抱得她差不多喘不上气来。另外，有的时候也隔肢得她真可笑，真有点儿受不了。当然，从一开始再见到爸爸时，小伊尔达就几乎是产生着本能的亲情。她是他的骨肉。她对这个大胡子，这个在她印象中第一次见面就目光闪闪，眼睛晶亮，笑眯眯的，令人陶醉的大胡子，她无论怎么说，还是本能的很亲的，是本能的很爱的，是非常爱的，因为，这正是她已经向妈妈要了多年的，最亲爱的爸爸呀！

1956年2月15日，小伊尔达出生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妈妈在怀着她的时候，在墨西哥城生活的十分艰难，十分的苦。

1954年，切·格瓦拉爸爸在危地马拉参加支持阿本斯合法政府的革命工作，革命失败以后，他成了反动政权的通缉犯，逃到了墨西哥来，在墨西哥街头，他几乎什么零活儿都干，还当过街头摄影师，靠给游人照相挣钱来维持生活。

时隔不久，原来在危地马拉和切·格瓦拉爸爸结识并成为好朋友的，拉丁美洲秘鲁籍的女共产党员，也就是小伊尔达亲爱的妈妈伊尔达·加德亚·阿科斯塔，也从危地马拉辗转逃了出来，来到了墨西哥城，她在这里找到了切·格瓦拉爸爸，然后，他们两个革命者，一个是秘鲁籍的女共产党员，一个是在危地马拉的革命斗争中成为了共产党员的阿根廷人，他们因为在危地马拉生死与共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不仅产生了友谊，而且产生了爱情，因此，他们现在来到了墨西哥城，又到一起时，便结了婚。

爱情。结婚。开花结果。不久，妈妈就怀上了小伊尔达。

那时候，切·格瓦拉爸爸已经在墨西哥城里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外科医生，所以，他在墨西哥的市立医院里，重操起了医生的职业，因而，他也有了比较丰裕的，足够养家糊口和花销的收入，如果追求平庸、安逸、暖烘烘的生活，这个目标可以说就已经是达到了。

但是，切·格瓦拉爸爸是天生的热血青年，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绝对不甘平庸。1955年，他听说在危地马拉时他已闻知的古巴革命英雄卡斯特罗伯伯也来到了墨西哥城，切·格瓦拉爸爸几乎立刻就与卡斯特罗伯伯结识。

而他们一见如故，一拍即合。

当即，切·格瓦拉爸爸就成为了卡斯特罗伯伯组织领导的古巴革命队伍义无反顾的一员。

那是从1955年7月里的一个闷热的晚上开始的。而那一天，小伊尔达，已经在伊尔达·加德亚妈妈的怀腹里，开始拥有了生命的形态。从那一天开始，切·格瓦拉爸爸已经作好了准备，准备要投入到古巴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去了，而他的女儿，也正在母腹中，等待着来到这个明亮灿烂的世界上的时机。

1956年2月15日，这样一个灿然辉煌的时刻来到了，小伊尔达吹响了第一声进军世界的嘹亮的军号，她灿然一闪，就脱出母体，来到了这个如此难得，宝贵和重要的世界上。

小伊尔达自己记不起来，完全不知道，她只是听亲爱的伊尔达·加德亚

妈妈说的，那一刻，在产院里，因为切·格瓦拉爸爸本身是外科医生，因此，他被允许来到了产妇临盆的产床前。他充当着助产士最得力的好帮手，所以，他也就能在小伊尔达灿然一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个美好的时刻里，他立刻就成为了爸爸，他立刻就看到了自己的女儿，而最主要，他竟然立刻就托起了浑身还湿淋淋的女儿的婴体，他能够立刻就热吻起来。

小伊尔达当然完全记不起这样的情景。这些情景，都是后来，在小伊尔达稍稍懂事的时候，亲爱的伊尔达·加德亚妈妈告诉她的。

而伊尔达·加德亚妈妈每逢告诉小伊尔达这些事情，这样的故事时，就总是先是热泪汪汪，后来就啜泣，后来就甚至大哭起来。

小伊尔达不知道加德亚妈妈，为什么一提起这样的事儿来，就如此的伤心。

尽管如此，后来的故事，加德亚妈妈也还告诉过小伊尔达许许多多遍。

加德亚妈妈告诉小伊尔达，爸爸真是爱她，真为她感到幸福和骄傲。可是，妈妈告诉小伊尔达说：“爸爸的胸怀，不因为有了女儿一朵花，就能填得满的，爸爸的胸中，有一个很大的世界。因此，在小伊尔达刚刚出生的当日，他就热吻初为产妇的妻子，热吻新生婴孩的女儿，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和她们母子告别，然后就忙匆匆地赶到墨西哥城外的古巴革命军的训练基地去，马上重新投入了在那里正在展开的自己给自己找罪受的紧张而严酷的训练。

切·格瓦拉爸爸很少回到城里来探看初为产娘的妻子和新生的爱女，他不是不想回来，只是因为他在基地的训练太紧张，也太忙。他不仅是那里的被训练的普通战士成员，他也还是受卡斯特罗委托，担任那里的干部工作负责人，同时，他也还是那里的战地救护和医疗的教官，所以，他总难抽身回来，看望他的爱妻和爱女。

而且，后来，又突然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件。那是古巴巴蒂斯塔反动政权派到墨西哥来的，专门侦探卡斯特罗革命治动的特务，他们发现了卡斯特罗在紧张地组织力量，进行着重返古巴开展革命斗争的准备和武装训练，于是就通报墨西哥政府，让墨西哥的警察，把卡斯特罗以及切·格瓦拉爸爸都抓了起来，投入到了墨西哥的外国侨民监狱。

这事情发生在1956的6月下旬。当时，小伊尔达出生，才刚刚四个来月。

而接下来发展的事件进程是，墨西哥警察搜查了古巴革命者所有的居室和住处。他们自然也搜查了格瓦拉的家室，于是，格瓦拉的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四个月的女儿，便也都成了被逮捕的对象。这样，在小伊尔达出生四个月后，和加德亚妈妈一起，押进了墨西哥外国侨民监狱。

只是，小伊尔达并不是外国侨民。

她是墨西哥出生的孩子，虽然爸爸是阿根廷人，妈妈是秘鲁人，但因为她是出生在墨西哥城的，所以，她可以拥有墨西哥国籍。当然她本来也可以随爸爸、或随妈妈，也可以或入阿根廷国籍、或入秘鲁国籍，但是在最初谈到加入国籍的问题时，格瓦拉是力主让他的女儿加入墨西哥国籍的，格瓦拉当时对他的妻子加德亚说：“共产党人的理想是成为世界公民，在现在世界各国国籍界限分明的情况下，拉丁美洲人，先可以把眼界放在拉丁美洲的范围内，让自己首先成为一个拉丁美洲的公民，在拉丁美洲的各国，都可以视为是自己的祖国，因为拉丁美洲，本来就是一个历史传统、地域近密的群体。”

所以，当时，在讨论小伊尔达加入国籍的问题时，切·格瓦拉爸爸，坚

持让小伊尔达加入墨西哥籍，成了墨西哥人。

而正因为是如此，小伊尔达虽然是墨西哥人，却又是外国侨民的女儿，因此，也只好跟着她的侨民妈妈坐进了外国侨民监狱。

经过墨西哥进步力量，著名人士声援帮助，卡斯特罗兄弟和其他大部分人，都是很快被释放了。

加德亚和小伊尔达，也很快被释放了出来。

但是，切·格瓦拉遇到了比别人更多一层的麻烦，他因为是从危地马拉逃到墨西哥来的革命者，他没有任何国家的护照，属于非法移民，因此，他只能是被遣送出墨西哥的对象，而不是被释放的对象，所以，格瓦拉一时还陷入了麻烦的纠缠中，他在监狱里多呆了许多时候，差不多呆满了两个月。

然而，经过已经在早些时候释放出狱的卡斯特的多方努力，四处托门子奔波，格瓦拉最终还是释放了出来。

这时候，时间已经在 1956 年 9 月间了。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们，在出狱以后，并没有被挫伤锐气，他们重返古巴去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一刻也没有停顿，更加紧锣密鼓地筹措和进行起来，他们每一个人，都投入到了更为紧张的繁忙中来，废寝忘食，简直都不在话下了。

在一切准备已经行将就绪，开往古巴投入战斗的行船“格拉玛”号业已买好，武器都运集到了一个秘密贮藏的地点，即将要整装出发了，但是离计划出发的时间还有一段空档，就在这样的空档时间里，忽然又出现了危急的情况，出现了窃贼和叛徒出卖革命的行为。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菲德尔·卡斯特罗毅然作出决定：“格拉玛”号，准备提前出发了。

而在这一时刻，本来只是准备在“格拉玛”号如期出发开船前的一段计划中的空档时间里，格瓦拉是要抽身回到墨西哥城里他的家中去，回到他的那个有妻有女儿的小窝里去，要和他亲爱的妻子女儿来一次深情的辞别。此一去远走天涯，生死难卜。这样的离别，简直就是生离死别。美丽的妻子还年轻、漂亮，可爱的女儿还正如待放的花蕾，刚刚生下来还不满一岁，她来到这个世界上还刚刚只有十个月，就要面临与踏上生死难卜的战斗征途的爸爸的这样的离别。但是，她当时正在丫丫学语中，她已经能够认出了爸爸，她已经能够呼唤着“爸！”“爸！”这样的单词。她似乎已经完全明白了，除了亲爱的妈妈以外，这个总是难得来看她们的，但也还总是回来探看她们娘俩的男人，一定是她最亲爱的一个人，虽然她其时还并不完全理解和明白“爸”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样的，与妻子女儿的作别，无论如何，格瓦拉还是要赶回来做的。出发的时间已经提前了。格瓦拉只能是匆匆地赶回家里来作别了。菲德尔也要求他，必须这样做。

于是，那一天，切·格瓦拉匆匆地赶回到他在墨西哥城里有妻有女的小窝里来。

这里有他热爱的亲人，有他最热爱的妻、女。这里是给了他无限幸福、甜蜜和温暖、温馨的家。

可是，格瓦拉的突然出现，加德亚立刻就站不起来了。这个聪明的女人，秘鲁利马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一个秘鲁党忠诚的共产党员，她心中什么都明白，她心中完全清楚明白地理解着亲爱的丈夫格瓦拉，她知道此时此刻，他的突然出现，就意味着他们分别的时间来到了。于是，她立刻泉涌一般地

流起泪来。

格瓦拉一定经过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他一定知道了他应该掌握处理好这样一个生离死别的时刻，所以，尽管他突然回到家里来，突然看到加德亚一经看到他，便立刻开始垂泪和哭泣，他也完全没有乱了方寸，他还保持着必要的从容和镇定。他首先不管妻子，而是抱起还在幼稚中的女儿，他开始长时间地，默默地热吻着他的女儿，他让女儿冲着他“呵呵”笑起来，他让女儿丫丫呼喊他“爸！”“爸！”最后，他搁下了女儿，把她在小床上放好，塞给女儿一只只有奶嘴儿的凉开水瓶子，让女儿去吸吮，然后，他才转过身来，把手掌按在了妻子抽动不止，颤抖不止的肩膀上，他扶起了妻来，他抱起了妻来，他开始热吻起妻来。

加德亚终于失声痛哭起来。

她对丈夫说：

“我真是怎么也亲不够你，爱不够你！”

格瓦拉说：

“我也热爱你，我亲爱的伊尔达·加德亚，我最亲爱的老婆子！我无限的热爱你和我们最娇嫩的爱情的花瓣儿：我们的女儿。不管我走到哪里，你们俩都深深地藏在我的心里。只是，亲爱的，只是在离别的时候，请你不要过分的哭泣。你得保重，我把你留下了。我还把沉重的花篮也留给了你，这就是我们的孩子。从今之后，你将开始的是既当妈妈，又当爸爸的日子。生活将十分艰难。你和我们的女儿，肯定会吃许多的苦。但是，为了解除世界上的人民的苦难，我们有的时候也必须迎着无法排解的苦难，因为，有的时候，这是难免的，是没有办法的”。

加德亚热烈地亲吻着格瓦拉的脸颊，对她来说，这张脸，似乎总是既亲切、又生熟，令她总是看不够，有的时候令她似乎还感到陌生，这样一张奇特的有着火热的细腻感情的脸，却几乎总是苍白的，因此，他在一个温情满怀的妻子的心怀里总能勾起一种对他的可怜兮兮的感觉。这样的时刻，对一个女人来说，她的妻性，忽然就会变成是一种母性，她不仅会把她怀中的这个男人看成是自己的丈夫，有的时候也会看成是自己的儿子。

加德亚和格瓦拉成为夫妻以后一些最初开始使他们产生友谊和爱情的故事，还常常涌上她的心头，最初，那是在1953年的时候，格瓦拉向往危地马拉的革命生活，他持着一封智利著名活动家阿连德写的介绍信，从萨尔瓦多来到了危地马拉城。阿连德这封介绍信正是写给伊尔达·加德亚的。他在介绍信上要求伊尔达帮助和照顾格瓦拉这个来自阿根廷向往危地马拉革命事业的热血青年。

当时，伊尔达·加德亚是一个热情奔放的女革命家，也是一个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混血儿大姑娘，她在利马圣马科斯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也是向往危地马拉革命先期来到了危地马拉城，在阿本斯合法政府，也是革命政府的全国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找到了工作。所以，后来格瓦拉来投奔她的时候，她还有条件给予帮助。

不过，格瓦拉最初来到危地马拉时，他首先遇到了一个自身带来的麻烦，一个很大的麻烦，这就是他自幼形成的严重哮喘病。来到危地马拉城后，他的哮喘病严重发作起来。伊尔达·加德亚不仅要给他安排住处，解决吃饭问题，还要给他疗病和护理他。

也许是上帝造就了他们会有一场患难夫妻的缘份。也许这种共患难的缘

份，从他们最初的相识相聚业已开始。

来到危地马拉城以后，格瓦拉的哮喘简直快把他窒闷死了。难受得要命，晚上完全的不能睡觉，只有可怕的喘息，有一天略微好些，伊尔达问起了格瓦拉的病况史，格瓦拉在给伊尔达讲自己的病况史的时候，提到了在他小的时候，犯痛时，常常只能伏在爸爸林奇先生胸脯上，才能好受些，才能得到一阵安然下来。

格瓦拉这故事引起了伊尔达的注意，她认识到在格瓦拉犯病时，人的体温，可以给哮喘病人实际上痉挛的部位增温，因而使病人的哮喘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缓解，伊尔达知道了这个常识以后，在格瓦拉再严重哮喘不息的时候，她就会张开自己的后背，让格瓦拉像靠他父亲的胸肺一样来贴靠。这样一来，果然有效，格瓦拉每每发病哮喘难受不置的时候，伊尔达·加德亚就挺起后背来，让格瓦拉来紧贴依靠，后来，因为这样的姿势时间久了太累人，使格瓦拉的哮喘缓解下来以后，伊尔达·加德亚就会转过身来，把格瓦拉的脑袋抱住，把他的头颅放在她的腿上，让他靠在自己的腹部，给他温慰，给他安然，促令他休息。

再后来，伊尔达·加德亚在一个药铺里，寻到了一具治疗哮喘病的器械：吸入器。可以帮助哮喘病人增扩气管，通畅呼吸。这样，伊尔达·加德亚帮助哮喘得很厉害，简直动弹不得的格瓦拉使用吸入器的时候，也会把格瓦拉的脑袋抱在胸前，让他舒服地躺在她的腿上，以使他得到安然。

这样，他们的热流交汇很容易把真挚的友情开始转化为火热的爱情。他们开始有了人性的交流。这样，也就自然的，在他们先后又都来到墨西哥，又相逢聚会在一起的时候，几乎是必然地便结婚成为了夫妻。

而且，他们是一对何等情深意蜜的恩爱夫妻啊！患难夫妻的恩爱，总是山高水远，地久天长的。何况，他们的爱情开花结果，他们不是还有个娇嫩的爱情的花瓣儿小伊尔达吗？这将是他们爱情的一个永恒的纽带。永恒的，不朽的纪念碑。

可是，现在，今天，他们来到了又一个远离和久别的关口，生离死别，从此一别，将前途未卜的痛苦时刻。

他们还能说什么话呢？

关于必将迎来这次离别的话题，他们已经有机会说过了很多。

现在，不能更多说了。他们只有以无限的热烈长吻，来代替所有要说的话，来代替所有要说的爱。

伊尔达·加德亚热烈地搂着他的亲爱的丈夫的脖子和肩膀，她痛哭不止，啜泣不止，心要碎了，心乱如麻，但是她还要作坚强的，镇静的叮咛：

“你走吧，亲爱的格瓦拉，孩子我会好好地替你爱护，好好抚育她长大的，她不仅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的。你可以放心的走。我知道你作为革命者，不能仅仅为着你的妻儿，你就不去战斗，作为有觉悟的一个妇女，一个自命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者的妇女，我也没有任何权利把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你走吧。我会在天天夜里的梦中去看望你的，但愿你也不要有一天关上梦中的窗户，不打开窗扉让我进来。亲爱的，你走吧。你可要走好。你不要忘记了在遥远的墨西哥城的这一幢贫民窟的房子里，居住着你的妻儿，有日夜点燃着四只明亮的灯火，会导引照耀你的脚步走向遥远的地方，那是我们娘儿俩个的四只眼睛，我们还会倾听你任何时候发回来的呼喊、笑声、想念的话语，不过，就是我宁肯听到你的哭声，亲爱的，我也不愿意听到你哮喘病发

作时的呻吟声，你走时，你一定要带好吸入器，你一定要带好你妻子给你新买的一具吸入器，让它陪伴你去战斗，像我陪伴你去战斗一样，如果你突然哮喘病又犯的时候，你马上用起吸入器来，立刻就会有你的妻子到了你的身边，她来帮助你呼吸，亲爱的，我多么想在你困难的时候全力以赴地来帮助你呼吸啊！”

伊尔达·加德亚倾诉着无限深情的叮咛，她热烈地拥抱着丈夫，啜泣不止，不知怎么能止住心灵被撕裂的伤痛。

格瓦拉在那一刻也哭了。

但他咬紧牙根，一定不让自己在与妻儿的分别的时刻，脸上没有笑容，他一定不能哭出声来，他的脸上热泪横流，但他始终还在笑着，尽管也许这更令人难受，不过，他总觉得这可以给妻子一些安慰和鼓舞，也许会鼓舞她不至于因为这样的分别而失魂落魄。

不过，他们共有的同在一起的时刻，好像在飞闪一般地迅速消逝，最后分别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然而，就在这时，聪明的小女儿小伊尔达，她一定是感觉到了，或则她是完全地感应着了，她好像已经知道了与爸爸最后分离的时刻终于已经来到了。她突然叫起来，与她亲爱的妈妈争夺着爸爸亲热她们的时间，她忽然“哇哇”哭叫起来，大声地呼唤着：“爸！”“爸！”

分手的时刻已经到了。

卡斯特罗派来迎接格瓦拉的同志，已经站在了房子那边的不远处等着。

但是，女儿叫了起来，格瓦拉不得不又抱起女儿来，再一次亲切地，亲热地亲吻着小小的爱女。可是，小伊尔达忽然好象真懂事了，她紧紧搂住爸爸的脖子，她猛劲儿地蹬着在爸爸怀里的脚丫，她硬是不想再松开她的行将远别的爸爸。

此刻再也不能多留一分钟了。

格瓦拉必须走了。

伊尔达·加德亚不得不来帮忙，不得不把格瓦拉怀中的孩儿接了下来，她不得不催了一句：

“走吧！亲爱的！”

格瓦拉走了。

他连连回头看着伊尔达·加德亚，看着小伊尔达，走出几步之外以后，他还抬起头来，全面扫视了一番他与他的亲人曾经一起居住过的这一幢房子，他好象把他的妻儿，和这一幢房子一起，完全装在他的心里，把他们一起带走。

伊尔达·加德亚张着一双泪眼，看着不断回过头来看她们的丈夫远去，最后，丈夫的背影终于也消失了。伊尔达·加德亚猛得又抱着她的爱女小伊尔达痛哭出声来，她一下子在床头上猛坐下来，但是，就在这一刻，她惊呆了，她猛的吓了一跳，她发现了丈夫走的太忙，太难分难舍，却忘下了他最必须的最重要的东西，伊尔达·加德亚给他新买的吸入器，防治哮喘病的吸入器。

格瓦拉没有吸入器怎么行呢？

伊尔达·加德亚立刻抓起吸入器来，抱起小伊尔达来，发狂似的呼喊起来：

“格——瓦——拉！亲爱的！”

“格——瓦——拉！亲爱的！”

她赤着脚板，抱着孩子，她什么也不顾，跑过了一条街，又一条街。她的悲怆的呼喊声，惊天动地，惊动了许许多多的路人，许多人都站下来看，向她投来了凄楚的，同情的目光。

可是，她悲怆的呼喊声，格瓦拉已经听不到了。格瓦拉和他的伙伴快马加鞭匆忙地赶到墨西哥城外远郊的图克斯潘港，他们越过了重重关卡，终于登上了“格拉玛”号后，菲德尔·卡斯特罗立刻发出了开船起航的命令。于是，格瓦拉和他的妻儿伊尔达，加德亚以及小伊尔达的这一次的长离和远别，终于彻底地拉开了距离，越来越大地拉开了距离。

七天后，“格拉玛”号把古巴革命的英雄们送上了古巴的科洛腊多斯海滩，切·格瓦拉和他的战友们，立刻展开了在古巴的土地上出主入死的战斗。

而他遥远的离舍在墨西哥城的妻儿，又开始了一种怎样令人难耐煎熬的生活呢？今后，伊尔达·加德亚这个年轻的女人，要含辛茹苦地独立支撑生活和哺育女儿，而且，多少牵挂被格瓦拉带走，年轻女人的心都要碎了。今后，她将要开始着怎样的惦念，要过多少个思念的日子，才能在梦中再见到亲人呢？

日日等，天天盼，终于，到了1957年的2月间，伊尔达·加德亚在墨西哥城，收到了格瓦拉从古巴战地给她寄来的一封信。这是在他们分别已经两个月后。

2月15日，是小伊尔达出世一周岁的生日，爸爸的信，无疑也是送给她的最好的生日礼物。于是，在她生日的这一天，伊尔达·加德亚妈妈一遍又一遍的念着爸爸的来信，让小伊尔达一字不落地，幸福的聆听着：

亲爱的老婆子：

这几行马蒂体的热情洋溢的文字，是我在古巴的林莽中给你写下的。我还活着，并且渴望鲜血。我俨然是一个真正的兵士了，凭什么这么说呢？至少我很脏而且衣衫褴褛，再说我是把信笺衬在军用饭盒上给你写信的，而且肩上背着步枪，嘴里还衔着新近得到的佳品——雪茄。我们的事情看来并不一帆风顺。你已经知道，我们乘着“格拉玛”号航行了七天，在这七天之内，甚至连喘口气都不行。之后，由于领航员的过失，我们落到了臭气冲天的红树丛里，而且厄运始终形影不离地伴随着我们，直到业已举世闻名的阿莱格里亚德皮奥一战之后才和我们告别。在那次战斗中，我们被打得落花流水，像一群鸽子那样被人家驱散了。我的脖子在那里挂了花，我之所以得免一死，无非因为我像猫一样命大福大：一枚瞄准我胸部的机枪子弹打在我的胸前的子弹盒上了，于是从那里蹦进了我的脖子。我在山沟里跋涉了好几天，自认为伤势险恶，除了脖子挂了花，我还觉得胸部疼得厉害。你认识的人中，只有吉米·赫茨勒已不在人世，他投降了，当了俘虏，结果被他们杀死了。而我呢，同你所熟悉的阿尔梅达和拉米里托过了整整七天饥渴的可怕的日子，直到我们冲出重围，并在农民的帮助下与菲德尔会合之后才算摆脱了这种困境（据说，可怜的尼科也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过还没有证实）。我们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队伍重新整顿好，重新武装起来，然后，我们袭击了敌人的一个军事哨所，击毙和打伤了一些士兵，还俘虏了一些。击毙的敌人就听暴尸战场。过了些时候，我们又活捉了三名兵士，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如果再加上我们一无伤亡，而且我们在山上就好像在自己家里一般，你就明白了，那些大兵的士气是何等的低落，他们永远包围不了我们。当然，斗争还未胜

利，今后还有不少战斗，但是天平秤上的指针已经偏向我们这边，而且，我们这边的重量将与日俱增。

现在来谈谈你们吧，我很想知道你是否仍旧住在我现在寄信给你的那幢房子里？你们，特别是“最娇嫩的爱情的花瓣”，近况如何？代我以她的骨骼所忍受得了的力气拥抱她，吻她。我走得如此急促，竟把你和女儿的照片都忘在潘乔家了。把这些照片寄来给我。来信可寄往叔叔处，并写明交帕托霍收。信可能会耽搁一些时候，但我想定能收到。

再一次热烈地拥抱你们，我的最亲爱的亲人！

无疑，伊尔达·加德亚收到格瓦拉的这封信的日子，是一个令她最为高兴激动的日子，也是一个属于伊尔达·加德亚和小伊尔达母女俩最幸福的日子。

不过，这封信通过以后，由于在古巴圣地亚哥的城市革命组织被破坏，也由于巴蒂斯塔反动政权派出大军，对马埃斯特山区实行了最为严密的军事包围和封锁，切·格瓦拉的信就再也寄发不出来了。

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过去了。格瓦拉再也没有来信。

一次次，格瓦拉带着流血的伤口，出现在伊尔达·加德亚的梦中，一次次，她在梦里看到人们抬着一具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人，雪白的白布遮盖着他的身体和脸面，人们向伊尔达·加德亚说：“这是你的丈夫格瓦拉，还给你吧！”

伊尔达·加德亚从梦中惊醒，她开始万分忧惧地哭泣，她抱起她的已经会说话，会唱歌的女儿来，哭泣不止，终夜不眠。

生活进入了最难煎熬的时期，一个独立支撑家庭生活和养育一个婴儿的年轻女人，孤立无援，举目无亲，又是在异国他乡，谁能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帮忙，照顾一下她们母女呢？

正好在最困难的时候，伊尔达·加德亚和在秘鲁利马圣马科斯大学时的几个同学和朋友，他们来到了墨西哥城旅游，他们巧遇了伊尔达·加德亚，他们看到了伊尔达·加德亚艰难狼狈的生活景况，他们对伊尔达·加德亚说出他们推心置腹的劝导的话来：“别等了。你的革命者可能已经不在。”“为了孩子，你应该有更明智的选择。”“走吧，回利马，回秘鲁去吧，那里有更多的亲戚朋友都会照应你，都会帮助你。”

伊尔达·加德亚哭干了眼泪，哭断了肝肠，再也收不到亲人的信息，1958年春天的时候，生活实在太艰难了，她只好抱着年龄刚满两周岁的女儿小伊尔达离开了永难忘怀的墨西哥城，回到了她的祖国，回到了秘鲁，在利马，她终于又开始了新的生活。

1958年接近岁尾时候，从古巴传来了古巴革命即将走向最后胜利的巨大喜讯，同时，辗转传来了格瓦拉四处寻找伊尔达·加德亚母女的信息。伊尔达·加德亚深为古巴革命的伟大胜利欢欣鼓舞，她也为曾经是切·格瓦拉的同志、战友、妻子和爱人而深感骄傲，但她相当冷静地告诉切·格瓦拉说：她有她的朋友，她在利马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伊尔达·加德亚同时告诉切·格瓦拉说：她将同意把他们的爱女小伊尔达，交给切·格瓦拉来教养哺育。

切·格瓦拉接受了伊尔达·加德亚的安排。

1959年6月2日，切·格瓦拉和曾经是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的地下秘密工作者，后来的女游击队员阿莱达·马尔奇结婚，组织起了新的家庭。

之后不久，伊尔达·加德亚托朋友把已经三岁半的小伊尔达送到了哈瓦那来，送到了切·格瓦拉的身边来，小伊尔达也开始了她的崭新生活。

年轻漂亮的阿莱达·马尔奇，很爱切·格瓦拉，自然也很喜欢、很爱切·格瓦拉的孩子。她热情地欢迎小伊尔达的到来，对这个三岁半的小女孩，立刻展开亲生妈妈一样的爱的攻势，她想尽快成为她的朋友和挚友，她用热烈的感情迅速冲淡小伊尔达对亲生妈妈的思念，尽快忘记离别亲生妈妈的痛苦。

然而，她的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

小伊尔达确实很快成为了阿莱达·马尔奇的朋友和挚友。

小伊尔达很快对她的这一位妈妈，开始充满了信任，产生了亲切的挚情。

但是，她们之间这种亲密关系的产生和建立，却并不能够完全代替小伊尔达对伊尔达·加德亚妈妈的感情。

小伊尔达跟着伊尔达·加德亚妈妈一起度过了血泪浸泡，生死与共的非常艰难的日月，虽然那只是三年半的时间，虽然小伊尔达小小年龄并不懂什么，但是她能知道妈妈的眼泪是酸的，她能知道妈妈的眼泪是苦的，在那些爸爸远去的日子里，在那些风雨来到的夜里，雷鸣电动，雨点敲打在房屋上的薄瓦和铁皮上，仿佛山摇地动，屋外已经是一片炮火连天的战场，伊尔达妈妈从床上惊坐起来，小伊尔达惊吓得哭泣不止，这时候，妈妈赶紧把她抱在怀里，把并不丰饶满含甜蜜乳汁的奶头塞进她的嘴里，阻住她的哭泣，镇住她的惊吓，在昏昏的微弱电灯的灯光下，妈妈倾听着外边的风雨，她一定牵挂起了在遥远古巴马埃斯特腊山区正在风雨中露营，或者是在风雨中进行激战，正在穿越着流血和死亡的格瓦拉，妈妈的牵挂，肯定是无限的沉重的，所以，她一边奶着女儿，一边在垂泪。妈妈的泪水从脸颊上滚落下来，泪滴滚落在妈妈的乳峰上，然后又从乳峰上潺流下来，渗流进了小伊尔达的嘴角，妈妈的奶水不甜了，而是变成了酸的、苦的滋味，但是，小伊尔达把妈妈的乳头含得更紧，她同时懂得了抬起手来，用她小小的手掌替妈妈擦泪，她的小嘴甚至还还会松开妈妈的乳头，对妈妈说：

“妈妈，不要哭！亲爱的妈妈！”

唉！那是什么样的艰难的日子啊！小伊尔达小，很难深深懂得什么，但是她完全能够明白什么是辛酸和苦涩，她是能懂，她再小也能懂，而且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小伊尔达和伊尔达·加德亚妈妈共患难，共煎熬过那样艰难，辛酸和苦涩的生活日月，所以，那样的生活日月给她幼小的心灵上，给她正在发育成熟起来的脑海中，留下了沉重烙印，肯定也是至为深刻的，是很难冲洗掉，很难用别的什么来填得平的。

所以小伊尔达对伊尔达·加德亚妈妈的深情，不会因为日月的流逝而变浅，恰恰相反，这种深情似乎只能因为岁月的积累而变得更深、更浓，小伊尔达对伊尔达·加德亚妈妈的思念，似乎总也不会冲淡下来，而是相反，总是在日复一日地延续着，而且明显是越来越坚韧起来。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她和这一位阿莱达·马尔奇妈妈的感情也更深切，更真挚，更亲密，特别是后来，这一位阿莱达·马尔奇妈妈又给她生出了可爱的小妹妹和可爱的小弟弟，因此，她们的亲情已有了更深刻的联系，但是尽管如此，阿莱达·马尔奇妈妈，还是不能完全代替伊尔达·加德亚妈妈，两个妈妈的爱即使是相同的，也还完全是两个妈妈的，小伊尔达永远不会因为有了这一个亲爱的妈妈，即忘记了另一个亲爱的妈妈，何况，那另一个亲爱的妈妈，正是她的亲生妈

妈。

不过小伊尔达，也逐渐的，越来越懂在这样的感情世界中，永远会包含着十分深刻的微妙，尽管她和阿莱达·马尔奇妈妈也是绝对坦诚的，关系是完全自然的，三岁半就来到这一位妈妈的身边，阿莱达·马尔奇妈妈也完全视她如己出，她们建立的亲情关系也是绝对无邪的，可是尽管如此，感情完全没有微妙，还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深刻的微妙。

因为小伊尔达越来越懂这样的深刻的微妙感情，所以，她也懂得从来不在阿莱达·马尔奇妈妈面前，热烈表演她对伊尔达·加德亚妈妈的思念，经常是到一个可以独处的地方去，往往是在长时间的沉默中进行的。在她们家在哈瓦那的居住处，在一边的房山角那边，有一个不大的小花园，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凉亭，小伊尔达向爸爸的一个年轻的警卫员，问清楚了冲着秘鲁，冲着秘鲁利马的方向，于是，小伊尔达有的时候，就独自一个人，跑到这个小凉亭来，冲着秘鲁，冲着利马的方向，张开她的小嘴巴，用很低的，为别人所听不见的声音，喊一声：“妈妈—！”再喊一声“妈妈—！”“妈妈，我喊你了！你听见了吗？”

小伊尔达这样来表现她思念伊尔达·加德亚妈妈的感情。

有的时候，也还会在睡梦中，来追逐这样的思念妈妈的深情，她从夜晚躺在床上时便开始呼唤：“妈妈，我今晚要看到你！”“妈妈，让我今晚再拥抱你一次，再亲吻你一次吧！亲爱的妈妈！”

只有在特别痛苦、思念妈妈的感情令小伊尔达特别心疼的时候，小伊尔达才会抓住偶然能够见到切·格瓦拉爸爸的机会，请他帮助女儿，能给他的小女儿一点儿特别的安慰。

在这样的时候，有的时候，小伊尔达会趁着爸爸来亲吻她的机会，把小嘴巴伏在爸爸的耳根上，对切·格瓦拉爸爸说：

“我想伊尔达·加德亚妈妈了。爸爸，你也会想吗？”

每当这时候，切·格瓦拉总会受到强烈的震撼和震惊。

可是他很难说出来。

而有这么一天，小伊尔达忽然又牵着切·格瓦拉爸爸的手，请他到自己的小房间来作客和参观，小伊尔达说她有许多图画，可以请爸爸过目。但是，当小伊尔达把她的爸爸牵引到她的小房子后，她就会很细心地关好门，让爸爸在她的小床上坐下来，然后她就开始翻箱倒柜。

小伊尔达从利马上乘飞机到古巴来时，伊尔达·加德亚妈妈戴着黑黑的墨镜，到利马的飞机场为小伊尔达送行。

妈妈交给小伊尔达一个皮箱，托护送小伊尔达的叔叔，替小伊尔达带在身边。在飞机场上的候机楼里，伊尔达·加德亚妈妈一遍又一遍地吻着即将离去的女儿，同时，一遍又一遍地叮咛嘱咐女儿：

“亲爱的乖妞儿，有的时候，如果你想妈妈时，你可以打开这只箱子，妈妈给你带上了妈妈给你买的玩具，有你最喜欢的布娃娃。妈妈还给你带上了妈妈的照片，你想吻妈妈时，你就吻这照片。妈妈还给你带上了妈妈的一缕头发，装在一个小包里，装在一个小口袋里，有妈妈的气味儿，你特别想念妈妈时，你就可以嗅一嗅这气味儿，那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妈妈又在你身边了。好啦，除了这些东西之外，还有你要带给爸爸的盒子，就是妈妈替爸爸在过去头下的盒子，妈妈也给你带在箱子里了。不过，你到了哈瓦那，你到了爸爸的新家后，也不要再把这个盒子交给爸爸了。爸爸已经再也用不着这

个盒子了。”

妈妈当时在候机室里，一边说，一边哭，但是她就是不让小伊尔达摘下她的宽大的墨镜来，让小伊尔达擦去她眼角的泪水，吮吻她眼眶里的泪花。直到后来许多日子，小伊尔达还深感遗憾，她遗憾她当时没有坚持摘下妈妈地墨镜，在离别的最后一刻吻尽妈妈的离别的痛苦和悲伤。

后来，来到哈瓦那即阿莱达·马尔奇妈妈当女主人的这个新家的时候，爸爸和这位更美丽的年轻妈妈一起，让小伊尔达任意挑选一间他们家的房子居住。小伊尔达知道自己是小孩，应该住小房子，她就特别挑了一间最小的小房子，这间房子也许真是太小了一点儿，摆过床，摆过学习的桌子和梳妆台以后，还放了两个大衣柜，这样，小伊尔达从利马带来的加德亚妈妈给她的大皮箱，好像就没有地方好放了，爸爸亲自要把它存放到专门放东西的贮藏室里去，但是，小伊尔达硬是坚持不干，她一定坚持要把这个箱子摆在她住的小房子里，因为，在小伊尔达看来，那只伊尔达·加德亚妈妈交给她的，让她随身带到哈瓦那这个新家来的箱子里，装满着的，主要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装满伊尔达·加德亚妈妈的全部爱心，装满着她的永远能令小伊尔达感到温馨和亲切的味儿。

爸爸和马尔奇妈妈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也许猜到了，在随小伊尔达来的皮箱里，一定装满了小伊尔达最珍视的，最珍贵的东西。她既然不愿把这只箱子和她分开，就同意把这只箱子摆进了小伊尔达的房间，这样，也就给小伊尔达在她的房子里，开拓出了一个别样世界的区域，可以使小伊尔达在她认为是适当和需要的时候，她就能够随便自由地打开这只皮箱，她可以立刻再热吻亲爱的妈妈的脸颊，虽然只是妈妈的照片，冰凉冰凉的照片上不会有妈妈的温暖，可那毕竟是真实生动的妈妈呀！透过照片，常常的不是还会在耳畔里突然地回荡着妈妈的呼唤吗：“小—伊—尔—达！”“小—伊—尔—达！”而且，除此之外，小伊尔达不是还可以嗅嗅妈妈给她缝制的小包，小包里还有一个小袋儿，那里有妈妈的一缕青丝，小伊尔达把小包小袋贴在脸颊上，她不是立刻还会嗅到妈妈的满身的，圣洁的仙女一般的芳菲气味吗？

小伊尔达的这只皮箱，装满着她的无价之宝，也装满着她的深藏的秘密，她从来不作任何许诺，请爸爸和马尔奇这位新妈妈，来看她的皮箱里装满着的许许多多的宝物。

当然，爸爸和马尔奇妈妈，也完全尊重小伊尔达所拥有的这样的权利。他们也不想对小伊尔达所拥有的秘密世界发生好奇心和进行任何探求，尽管他们可能已经猜想过了，那箱子里可能装满着一些小伊尔达所无限珍爱的宝物。

可是，终于，小伊尔达渐渐长大了，她从三岁半的女娃娃、小妞妞，终于长成了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寄宿学校的小学生。当然，她也已经是快满八周岁的大姑娘了。

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的这样一日，当小伊尔达从寄宿学校回家来度周末和周日，正好爸爸也回家来了，他们父女也难得见面，全家人在一起亲热了一阵之后，小伊尔达趁着马尔奇妈妈去烤面包，爸爸有功夫独处的时候；她便把爸爸牵手牵到她的小房间来，她好大一阵神秘兮兮的翻箱倒柜，终于从箱子里拿出一件她已经责任珍藏了多年的宝物，也就是妈妈曾经交给她带在身边的小盒子。妈妈交给她这只小盒子时，什么故事都交待过了，同时，告诉过她，这只小盒子随身带在她身边，也仅作纪念之物，不必把它再交给爸

爸。小伊尔达很能听伊尔达·加德亚妈妈的话，好几年过去了，她确实一直遵照着妈妈的嘱咐，把这个小盒子一直深藏在她的皮箱里，从来也没有让切·格瓦拉爸爸看过它。因此，切·格瓦拉爸爸也从来不知道爱女的身边，一直还带着这样一个奇特的小盒子。

今天，小伊尔达不知为什么，她一定要把爸爸拉到她的小屋子里来，她忽然想请爸爸开开眼，想请切·格瓦拉爸爸好好看一看这只小盒子了。

小伊尔达从箱子里拿出了这个小盒子来。她把小盒子送到了爸爸的手上。

“爸爸，你看这是什么？”

切·格瓦拉打开了有些陈旧的薄铁盒子，他认出了这是一个装医疗器械的铁盒子。他打开铁盒子后，立刻发现盒子里装的是一具已经老式的吸入器。

格瓦拉立刻明白了一些什么。

切·格瓦拉心头一震，他的心头骤然沉重起来，他一时又几乎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小伊尔达则是平静地笑着。她平静地问了一句：

“爸爸，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是吸入器。”

“你知道这是谁给你买下的吗？”

“当然。”

“你还能记得她吗？”

切·格瓦拉，几乎什么也回答不出来了。他该怎么回答呢？他能怎样回答呢？

沙丁鱼斗大鲨鱼的哲学议论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非常深情、非常感动地听着切·格瓦拉叙说着他的家庭的私生活故事。这故事使他简直心情沉重。简直也让他快喘不上气来了。

纳赛尔总统听罢切·格瓦拉讲述的他的女儿小伊尔达的故事以后，他沉默了很久。

终于，纳赛尔总统再一次摇起头来。他把话题再一次引回到严峻的政治话题上，纳赛尔总统还想打消和阻止切·格瓦拉到刚果去看一看的想法。他想劝阻切·格瓦拉的这种想法。

纳赛尔总统说：

“切！关于你要去刚果的事，我还要求你们重新审视一下，重新再考虑一下，你可以飞回哈瓦那去，去和菲德尔、劳尔再重新研究一下，去刚果，实际上会有很多问题的，不仅仅是会有十分的危险，比如，你是个白人，而且，你是切·格瓦拉，你的目标是这样明显，你的目标是这样的大，你到一个黑非洲的黑人国家里开展活动，你是很难包藏你的真实身份的，而你的真实身份如果不能深深包藏，你就会立刻陷入到寸步难行的境地，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那些猪猡们，是会有办法对付你的。他们已经再也不会像你们在墨西哥的时候一样，再也不会像你们初入古巴开劈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根据地时一样，对你们漠然视之，不加警觉，不以为意了，现在的美帝国主义已经成了受伤的老虎，它正四面楚歌，四面受敌，它已经机警的很了，它再也不会麻痹大意了，特别是在刚果，它已经费了多大的力气，四五年来，美国佬也真是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现在才把刚果控制到这种程度，尽管那里的刚果爱国者在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他们的武装力量有着很大的发展，可是，在他们发展的同时，美帝国主义、比利时老殖民主义，也联手在那里发动了更大的攻势，加大了镇压的力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古巴人介入，有切·格瓦拉介入，帝国主义的打击力度，肯定会更为疯狂的加大和加强。而在和帝国主义的较量中，我们无论如何还要承认，完全的正面较力和较量，刚刚从被压迫的状态站起来国家和人民，显然还是能够绝对压倒帝国主义的对头，我们一时实在还很难压倒他们。”

纳赛尔总统坦诚地，诚恳地向切·格瓦拉说着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话。

切·格瓦拉与纳赛尔总统无疑存在着十分深切厚重的友谊，他对纳赛尔总统是由衷的崇敬甚至是十分的崇拜的，因为纳赛尔总统也确曾给过古巴革命无尚鼓舞和激励，确曾是古巴领导人们所非常推崇和崇拜的偶像。但是，今天，当纳赛尔总统谈到这里时，切·格瓦拉却不由得想和纳赛尔总统进行友好的争辩。

切·格瓦拉说：“是的，崇敬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您说的是对的。从表面上说，你说的是对的。比如美国和古巴比，简直不能成为比例，不用作十分复杂的比较，可以作的一个简单的比较是，在一张同样比例尺的地图上，如果把古巴的地图剪下来，贴到美国的地图上去，那简直等于是一条小鱼被投进了一池水，小鱼立刻会被池水所吞没。关于这一点，还是您以前的那个比喻是最深刻，最恰当，也最生动，最形象，最能说明问题，这就是，崇敬的纳赛尔总统曾经比喻过，古巴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沙丁鱼和大鲨鱼的斗争。我们是沙丁鱼，沙丁鱼确实小得可怜，简直就像一粒沙子那么小的小小的铁钉一样，小得实在无足轻重。而美国佬是大鲨鱼，大鲨

鱼是庞然大物，一条大鲨鱼，有的时候简直能够活活吞下一个驾船捕鱼的渔夫，大鲨鱼有的是尖牙利齿，它的血盆大口，甚至有一种想要一口吞下整个世界的气势，大鲨鱼多么厉害呢？简直厉害得令人恐怖，令人畏惧。大鲨鱼和沙丁鱼对阵结果会是怎么样呢，如果在想象中，这首先是完全不可能的，人们怎么会有这样大胆的想法呢？而即使有这样的想象力，他们恐怕也会立刻作出这样的判断和结论：不用怀疑，沙丁鱼一定会被大鲨鱼吃掉，甚至无须咽进胃肠，塞在牙缝里就可以把沙丁鱼消化掉了，这还能有什么疑问呢？大鲨鱼和沙丁鱼，实在太难成比例了，大鲨鱼和沙丁鱼的斗争，结果是不容置疑的，大鲨鱼肯定对沙丁鱼，有着绝对压倒的力量，这几乎是无须任何人讨论的定理、常理。但是，问题是，世界上的任何比喻，都可能是蹩脚的。美国佬毕竟不是大鲨鱼，古巴也毕竟不是沙丁鱼。美国佬就是美国佬，古巴就是古巴。我们在和美国佬对阵的时候，我们首先没有因为美国佬是一条大鲨鱼，就被它的血盆大口所吓倒。我们自视自己是一条沙丁鱼，可是，我们不是沙丁鱼，我们完全可以是像一条沙丁鱼大小的鱼钩。我们可以让大鲨鱼吞下去，但是我们可以钩出它的肠胃来，我们可以钩住它的咽喉，让它翻江倒海，让它拼命挣扎，最后让它把一切吞下去的东西都吐出来，最后，我们还要把它拖到沙滩上来，拖到河岸上来，把它晒成鱼干儿，一块一块再拉下来，做成鱼肉来吃。纳赛尔总统，您是不是已经看见了，我们是不是这样做，是不是这样干的？”

切·格瓦拉有的时候和纳赛尔总统展开友好的争辩。切·格瓦拉在平常时候，常常会寡言少语，但是一旦进入争辩的状态时，他思维敏捷，词锋犀利，逻辑严密，充满了雄辩的机智，这时候，纳赛尔就充分地展开了兄长的姿态和胸怀，绝不会被切·格瓦拉的争辩所激恼、激怒，恰恰相反，他还会更为痛快淋漓地欣赏起他挚诚的朋友的英雄气量和智慧的闪光来。刚才，切·格瓦拉侃侃而谈，说着雄辩的话语，强调着他所要特别强调和坚持强调的逻辑。纳赛尔总统用心地听着，专注地听着，他一直严肃的，但是笑眯眯地盯着切·格瓦拉。

当切·格瓦拉说到古巴受成一个沙丁鱼般大小的鱼钩，把美国大鲨鱼钩住，把美国佬拖到沙滩上，拖到海岸上，晒起来，当鱼干儿吃，切·格瓦拉有些不无稚气地冲着纳赛尔总统问“你是不是已经看见了，我们是不是这样做，是不是这样干的？”纳赛尔马上会心地笑了。

纳赛尔突然明白了切·格瓦拉是在指什么。

确实，切·格瓦拉确实不是在痛快淋漓地说大话。切·格瓦拉当然说的是完全的事实，甚至绝对没有夸张，是绝对的事实。

这样的事实，全世界都看到了，纳赛尔总统怎么能看不到呢？

纳赛尔总统知道切·格瓦拉现在形象他说着晒美国佬鱼干的故事，当然是指说1961年4月17日至4月19日在七十二小时之内发生的二十世纪最富色彩的战争奇观。在那个七十二小时内，在古巴的吉隆滩海湾里，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在古巴近海的猪湾海滩上，发生了一场有如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所发生的赤壁之战那样激烈的战争奇观，当然也是一种奇特的战争奇观。

赤壁之战，是典型的以小克大，以弱制强，以智慧战胜鲁莽，以正义战争战胜非正义战争的典型战例。当时曹魏挥师号称百万雄师，水陆并进，来势汹汹，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志在扫灭孙吴，一统大江南北，陈兵赤壁，仿佛必然所向披靡，所向无敌。

在曹魏气焰冲击之下的弱小的孙吴，偏师江南一隅，和强大的曹魏比较，简直弱小可欺，弱小得可怜，水陆骑步各兵种统数不足十万，而且，军械老旧，辎重亏乏，简直不堪强师一击。

然而，孙吴出了雄才大略主帅孙权和名将周瑜，他们联合还在游击战争中寻求立足之地的蜀汉刘备势力，借来了高参诸葛亮，共同主战坚决抗敌，首先是不畏强敌，坚定战志，然后采取主动出击，智取火攻的策略，火烧曹操指挥的曹魏万条战船，百万雄兵，在长江水道赤壁，顷刻之间，强兵被弱兵打得落花流水，强师被弱师横扫得灰飞烟灭，结果也是小鱼吃了大鱼，蝌蚪吃了乌龟王八。

这个以弱制强，以小克大的赤壁之战的故事，后来流传下来，令人痛快淋漓地传颂了将近一千年，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宋朝时期，出了一个伟大杰出的诗人苏轼，他写了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

这首在中国一般人都会慷慨高歌，悉熟在心的词，有着这样的一些大气磅礴的词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这些气壮山河的词句，栩栩如生地表现出了赤壁之战中伟大杰出英雄们的冲天的英雄气蕴。

所谓的“千古风流人物”，“多少豪杰”，“雄姿英发”形象地写出了赤壁之战中英雄们的风流神采，“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多么痛快淋漓地写出了英雄们当时的战况和战绩。

这样的大战大捷，当时领衔指挥的统帅，大将和高参，也不过都是一班二、三十岁的杰出人物。在指挥赤壁之战中的主帅和 大将周瑜，时年只有三十六岁，另一位高参和 大将诸葛亮，时年只刚二十九岁，都还正在英年盛时。

有趣的是，在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发生的“赤壁之战”的战绩，在发生将近两千年之后，在 1961 年的 4 月间，几乎又是气蕴性质如出一辙地出现在了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古巴领海之内的猪湾。

古巴革命军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们的领导和指挥下的，在猪湾打击和消灭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持和支使的武装入侵的雇佣军之战，其出奇制胜，其战斗的精采，完全可以和中国历史上的赤壁之战比美。也是“千古风流人物”们，在“谈笑间”，使“强虏灰飞烟灭。”

这场猪湾的战斗，实际上完全是美帝国主义和小小的古巴进行了真枪实弹、明火执仗的较力。

结果是小小的古巴在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几名年轻少校的指挥下，以完全、彻底、漂亮，干净地消灭“强虏”的歼灭战战绩，打败了美国的五星上将、总统和一大班高级谋士和职业杀手们共同策划和发动的一场穷凶极恶的，极为卑鄙无耻的侵略战争。

无耻的美国佬

1959年1月，在古巴革命最初赢得政权，赢得胜利之时，全世界几乎都是都很茫然地接受这个突然到来的重大新闻。

古巴革命是什么性质？在当时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完全不知道，完全不明白，赫鲁晓夫后来逢人就讲那个上帝最初喊来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劳尔·卡斯特罗出列排队的故事，就是一再表明，对于古巴革命的性质，一开始时候，社会主义阵营这边的人们，是完全不清楚的。

古巴革命的胜利信息，最初以极大的传奇色彩传到世界各地的時候，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传奇色彩颇浓的新闻媒介报道中的古巴革命人物，也都摸不着头脑，认不出他们是一些什么面目，在绝大部分人们的印象里，这不过是一些伸张正义，感情冲动，臂力过人，杀富济贫的“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

古巴革命的胜利，当时在帝国主义集团方面，也没有引起任何特别的注意，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头面人物，他们简直不认为在美国的眼皮下，鼻孔前面，会出现一个令它刺眼，令它刺鼻的物体。大多数美国媒体，在最初的传媒中，都以猎奇和兴奋的笔调和语气，介绍着一班子古巴的和明显还包括着一位阿根廷人的大胡子青年的大学生，领导了一场武装斗争，推翻了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也绝对是个残忍血腥的家伙，一个无法无天的暴君的巴蒂斯塔政权，这些胜利者得意洋洋，潇洒恣肆，一个个漂亮的要紧，迷人的要紧。更多的美国人，甚至不把他们认为是传说中的绿林好汉罗宾汉式的英雄人物，而只是把他们看成是好莱坞电影《罗宾汉》中饰演罗宾汉这位侠客的男演员埃罗尔·弗林式的人物，不过是一伙喜欢逢场作戏，喜欢热热闹闹的电影演员而已，实在也不过是一班虽然引人注目，却无足轻重，可以被随心支使，踢来踢去的人物。

可是，时间过的好快。并没有经过很长的，许多的时间，美国人开始感觉到，他们不对了！他们眼睛里突然出现的换了新天的古巴，开始变得刺眼了起来，他们的鼻孔似乎也开始嗅到了刺鼻的异味儿，他们的嘴巴里在饮料和食品中吞下的古巴糖，怎么也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咸味儿和苦味儿，有时涩得他们的嘴巴都开始痉挛了。

1959年的4月间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古巴革命政府的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访问了美国。

他在美国各地，受到了美国人民，特别是知识界，和年轻的大学生们们的狂风暴雨般的热烈欢迎。卡斯特罗在许多大学的欢腾的俱乐部里，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控诉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的血腥罪行，在这样的控诉中，卡斯特罗并不回避对美帝国主义可耻地支持巴蒂斯塔政权的指责，同时，卡斯特罗热情地宣传着古巴的革命事业，宣传它的激发和发展过程，卡斯特罗极富逻辑力量的演讲，赢得了广大美国人民的同情和广大新闻传媒的热烈反响。

美国当时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其时已经是一个年过七十岁的身体衰迈的老朽。他已经越来越不愿意会见比他年轻太多的外国领导人，以避免使他的形象在美国的电视传媒中，显现的太为过分的相形见绌，再说，这样的相形见绌的会见，往往又会使他无端的自惭形秽和高度的紧张。两年前，也就是在1957年的11月间，艾森豪威尔就是在接见年轻英俊的摩洛哥国王默罕默德五世时，不知怎么受到了刺激，接见结束，忽然感到浑身哆嗦发冷，结果是发生了脑动脉硬化血管的破裂。从那以后，即使在康复以后，他再不敢轻

易地接见年轻的外国领导人了。

现在，在那次脑溢血事件发生的两年以后，华盛顿又来了一位更为年轻英俊大胡子满脸充满男子汉阳刚气息的外国领导人，古巴新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艾森豪威尔虽然知道，自己肩膀上的亮光闪闪的五星上将肩章，是有足够的威风，可以镇住卡斯特罗的少校肩章的，在军衔的差距方面，艾森豪威尔据有着绝对的优势，然而，艾森豪威尔总统无论如何，也还是聪明的，他知道肩膀上无论装饰着什么样花俏的饰物，所有的身外之物，都不能压得过任何人内在的魅力，在这方面，艾森豪威尔总统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这样认识到了，他明知道他不能是卡斯特罗这个年轻人的对手，他清楚的知道自己比卡斯特罗年长三十八岁，在这样一个英俊小生面前，他确实已经是一个老态聩钟的，可怜的老朽了。

正因为这样的一些考虑，在卡斯特罗访问美国时，艾森豪威尔没有安排对卡斯特罗的接见，而是安排他的副总统尼克松，和卡斯特罗进行了会见和会谈。

尼克松比艾森豪威尔年轻许多。他比卡斯特罗年长十三岁。他从 1952 年开始充当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副总统。到了 1959 年，已经是他连续两届担当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副总统的第七个年头。他是美国唯一的一位纯粹是来自赤贫家庭进入美国总统班子的聪明人，他饱经沧桑，饱经磨炼，是从农场的十岁童工磨练起步踏上他生活的征程的。他是一个天生的内向而机灵的家伙，头脑发达，思维敏捷，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获得一个与他的性格相当相附的响亮的绰号，叫做“机警的小狼”。后来，他凭着他贪婪的野心，进入了美国的政坛，在他还年仅三十九岁的 1952 年，他跃上了美国副总统的宝座。

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尼克松副总统十分信任和器重，很放心让他参与很多政治事务和重大的国际政治活动。1958 年他在莫斯科和那一位世界著名的俄罗斯蛮子尼·谢·赫鲁晓夫展开激烈的所谓“厨房辩论”，以压倒的优势：从容、冷静、理智和胆略，狠扫了跳马猴子一般的赫鲁晓夫的威风，从而标志着尼克松已经成为相当成熟老练的世界政治家。

于是，正因为尼克松有着如此分量，在 1959 年 4 月里，当卡斯特罗来到美国时，艾森豪威尔总统指示尼克松副总统代表他接待菲德尔·卡斯特罗。

在尼克松正式安排接见卡斯特罗之前，美国的国务院的官员，已经向卡斯特罗显示着相当的热乎，向卡斯特罗展示着一项似乎是十分慷慨的援助计划，然而，卡斯特罗所报以的，并不是感激的笑脸，而是冷冰冰的一种相当警惕和怀疑的目光。

卡斯特罗在理论上，早已深刻地了解了帝国主义的本性和实质。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侵略，剥削和压迫的同义词。帝国主义从来不会无条件地援助刚刚赢得独立和解放的国家和人民的。帝国主义的援助，从来都是有条件的，帝国主义的援助，从来就同时意味着是桎梏和枷锁。

所以卡斯特罗对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压根上也不抱幻想。

因此，对于美国国务院官员主动展示的援助古巴计划，卡斯特罗甚至不想亲自给予理睬，他只是派遣他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古巴政府的财政部长鲁福·洛佩斯，和美国的财政部长安德逊和国务卿帮办鲁博特姆进行了十分有限的接触，而在这种接触的同时，卡斯特罗本人，却已经向美国和报界发表讲话，表示对美国的援助了无兴趣。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尼克松接见了卡斯特罗，并与卡斯特罗进行了古美两国政府间的正式会谈。

会谈是在礼貌周到的客气的气氛中进行的。

但是，会谈的时间比预定的时间还进行了压缩。因为没得多少要谈的东西，还能谈什么呢？

但是，通过简明的会谈，聪明冷静的理查德·尼克松副总统，已经得出这样两条极为明晰的结论，并且，在与卡斯特罗刚刚结束会谈之后，他就驱车来到了正在等待他会谈信息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高尔夫球场上去，作了极为肯定的两条结论性的汇报，第一，尼克松肯定地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这个卡斯特罗，绝对不是我们的人。第二，尼克松更为肯定地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卡斯特罗，也绝不是一个可以由美国控制的人。

对于尼克松的汇报和结论，艾森豪威尔总统是相信的。

因此，他立刻就忧心忡忡起来，立刻就又隐隐发作了偏头痛。他拉着高尔夫球竿，立刻在绿茵场上展开了寻思：那么，这个卡斯特罗，到底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艾森豪威尔总统不由的自言自语起来。他并没有期望一旁站着的尼克松总统作出回答，但是，尼克松却作了回答：

“用不着忙，大约卡斯特罗很快会急切地告诉我们他是个什么人的。让我们略微再等等看吧。”

然而，用不着忙是不行的。等等看也太不必要了。

卡斯特罗从美国结束访问，回到了古巴。

他立刻迅雷不及掩耳地，接二连三地发布起古巴革命政府的政令来。

他首先发布一条政令，在古巴全国，严格实行降低所有住房房租的决定。这一决定，无疑给古巴所有居住房屋的人民，带来了好处和福音，但是，古巴大部分居民区的房子，很少不是美国人的资产，大幅度下调住房租金，简直等于让美国的房地产资本家破产。

于是，美国人开始跳起来了。但是，美国人跳一跳，并不能影响卡斯特罗迅雷不及掩耳发布新的政令的声浪。头一天，卡斯特罗让美国的房地产资本家气极败坏的跳了起来，第二天，他又一道政令，让又一批美国的资本家跳了起来。

卡斯特罗接着又发布了对电力和电话公司收费标准大幅度降价的限令。美国控制着古巴 90% 的电力公司，同时控制着古巴 90% 的公用事业设施，包括百分之百地控制着古巴全部的电话电报公司，卡斯特罗发布这样政令如何了得，这不是要在美国人的屁股眼上插腊点灯吗？美国人怎么能让呢？

于是，美国人一片哗然，跳得更高了。

怪不得这个卡斯特罗不想要美国的援助，原来他是想从美国资本家们这里得到比美国援助更多的东西。

虽然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古巴自家的东西。

然而，至此，卡斯特罗简直完全就是针对美国人的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声又一声的惊雷般的政令，还是并无嘎然而止停下来的迹象，相反的，卡斯特罗作出了更为令美国佬心惊肉悸的杀手锏，卡斯特罗宣布封闭了赌场，妓院和只允许特权阶级进出的夜总会和俱乐部，把那里许多地方收归国家所有，甚至开始收归美国人控制的古巴铁路运输，以及其他许多行业的美国资产。

这可如何了得！卡斯特罗这样一来，不就完全变成了一个类同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了吗？他一挥金箍棒，就完全打乱了

美国佬的天堂秩序。

这可不得了。

美国鲨鱼在古巴受到了解剖和割切，美国佬的大财阀们，简直像被翻肠破肚，古巴人要他们把吞下去的古巴财物宝物都倒出来，都吐出来。

这可是太过份了！在美国的代表人物和头面人物总统艾森豪威尔看来，这怎么是可以的呢？世界上谁敢在美国太岁头上动土？谁敢上来卡一卡美国的脖子，古巴人算什么？古巴人哪来的这么大的胆子呢？

艾森豪威尔总统咬牙切齿，怒不可遏，立刻火冒三丈，暴跳如雷起来。他决心马上下令，美国绝不接受古巴的“欺负”别说是欺负，就是冒犯一下也不行。

于是，你卡斯特罗会发出一道又一道政令通令吗？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有这样的发布命令的权力和条件。艾森豪威尔总统得知古巴卡斯特罗开始在古巴采取行动和措施，限制和剥夺美国人在古巴的既得利益时，他马上在华盛顿召开他的紧急会议，他马上召来了他的最得力的两条汉子和两个打手，这就是杜勒斯兄弟这一对儿，一个是美国国务院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一个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艾伦·杜勒斯。

两个杜勒斯，这是一对儿强硬的手。

约翰·杜勒斯是艾伦·杜勒斯的亲哥哥，这是一个最死硬的反共老手，可以说是一个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所有革命共产党人的仇敌。但是，这个老家伙，却也是一个聪明至极，老奸巨滑，颇有韬略和智谋的老家伙，他痛恨共产主义，一腔肝胆都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但他由于极至的聪明而十分的狡诈，总是在谋略着最有效地一劳永逸地消灭共产主义思想和倾向的策略是：要坚决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和趋向的漫延，实行边缘政策，对共产主义发展的趋向进行限制，耐心等待共产主义在自身的发展中走向覆亡。为此，他也不排斥和拒绝对此采取可能的促动措施，甚至也可以同意不择手段，比如对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实行肉体消灭的恐怖活动和暗杀行为。

这个约翰·杜勒斯与然是个心肠刻毒的家伙。

而他的兄弟艾伦·杜勒斯，更是一个心肠变本加厉，无比刻毒的东西。他生于1893年的4月7日。在1959年的时候，他已经是年近七十岁的老家伙了，但在办坏事方面，他似乎仍然有着比一个年轻的歹徒和无赖更充沛的激情。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便成为美国政府的官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他成为美国在欧洲的情报中心头目，在瑞士主持美国的秘密情报工作多年。他在那个期间，干过的一件最有名的坏事是，企图使抗击德国法西斯的盟国分崩离析，而由美国和德国法西斯中反对希特勒的势力单独构和，然后在德国法西斯希特勒的反对派们踢开希特勒而得势以后，促使美国 and 没有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势力联合起来，以共同对付苏联，当时，艾伦·杜勒斯给他阴谋实施的这项行动，冠了一个很好的美名，叫做“日出行动”。

这个无耻而罪恶的行动，由于被本事也很不小的苏联红军情报总局侦彼，马上向斯大林作了证据确凿的报告，斯大林又迅速向罗斯福总统提出强烈的质询和抗议，这样，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邱吉尔首相共同干预，才坚决制止了这样的无耻贩卖盟友的罪恶行为。

不过，尽管如此，艾伦·杜勒斯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并没有变臭，反而变得更香喷喷起来。1953年2月26日，刚刚当选为美国三十四届总统走马

上任的艾森豪威尔，任命他担任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长，使他从此开始了美国连任八年情报局长的生涯，使他成为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位上任职最长的一人，并且，在他任职期间，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权力和影响，推上了这个美国政府特殊机构的顶峰，使它几乎成了凌驾在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财政部以及其他任何部门之上的超级机构。

1959年4月以后，当革命的古巴越来越令美国不安，越来越令美国人因为失去他们在古巴那个美丽的岛屿上的利益和天堂，而气极败坏，而撕心裂肺地狂呼滥叫起来之时，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同时也暴跳如雷，怒不可遏的时候，他把他的高参和左右两只手杜勒斯兄弟，召到了他的白宫椭圆型办公室，他们开始共议和密谋针对古巴，针对卡斯特罗的“锦囊妙计”。

这三个美国的杰出人物，美国的最高层的政治家，相加起来总年龄已经超过二百一十岁的老混蛋，他们三个人坐下来商谈妙计时，几乎很快就一起想到了一个最捷径的办法，这办法愚蠢得简直令后来的人们难以置信，但却实实在在又是完全真实的，这个可以取得走捷径的办法，就是这三位现代文明国家的文明的老人，却想到了可以对卡斯特罗实行野蛮的肉体暗杀行动。这样，可以通过消灭领袖的办法，使古巴革命走向衰落和灭亡。

这一个艾克和两个杜勒斯，为他们在美国白宫的总统办公室，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一致共识共谋出如此的锦囊妙计和上乘办法，他们简直手舞足蹈，乐不可支，每人要来一杯香槟酒，还胁肩搂腰共干了一杯。

之后，艾森豪威尔马上拍着艾伦·杜勒斯的肩膀，说：

“请你的那些专家们，马上制定出一整套行动计划来。不能只有一个计划。总司令需要很多可供选择的计划，你们可以多搞一些，然后立刻向我报告，我会立刻批准实行的。”

艾伦·杜勒斯领衔受命，肩当大任，从白宫出来，马不停蹄地飞车赶回到位在华盛顿林肯纪念碑附近的中央情报局办公大厦。他迫不及待地召来了他在中央情报局的主要助手：行动计划处的处长比斯尔。

艾伦·杜勒斯坐在安乐椅上，他把两只长腿高高地翘在他的办公室桌上，左手握着烟斗，得意而洒脱地喷吐着烟雾，看着比斯尔匆匆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就挥起右手来，打了个响指，像个老少年似的，幽默地喊了一声：

“好买卖来啦，伙计！”

“什么好买卖，局长先生？”

“我要让你们玩起来，干一些漂亮的游戏。”

“怎么玩？”

“这就要看你们的啦。怎么聪明，就怎么玩儿。”杜勒斯说着，用右手把掌比成一把刀，作了个砍头锯脑袋的手势。

比斯尔笑了。他的智力也很可以。他立刻明白了局长想要他来干什么了。何况，这样的手势也已经不是今天第一次打，而是久已可以交流汇通的一种真正的语言信号了。这信号就是暗杀两字的隐语。

“对谁呢？”

“对那个古巴的大胡子。对那个卡斯特罗。”

比斯尔立刻倒抽了一口凉气。他知道这将是采取非常危险的重大行动。

于是，他问了一句：

“这是您给我的授权吗？”

艾伦·杜勒斯说：

“不。这是最高机关的授权。”

杜勒斯当然不能说出艾森豪威尔的名字。

但是比斯尔马上全明白了。

他这样的明白很重要，因为他知道了大来头，自然便会产生出更大的行动的动力来。

于是，他便即刻辞别局长，马上回到他的计划处去，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他马上召来了他手卜的一大批专门养活着干这种事情的专家，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具体策划。

他们首先是开始组织和物色执行暗杀行动任务的兵马和人选。

他们知道干这样的事情，必须是作恶多端的亡命徒。这样的亡命徒，只要多给钱，或者给比钱还重要的许诺，他们就会无所顾忌，勇往直前地去冒险。不过，这样的家伙，大体上只能在黑社会、黑手党里才能找到。

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的黑社会、黑手党，不管是在公开的方面还是秘密的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有着千条万条瞬息可通的渠道，在这样的联系渠道上，比斯尔可以一点儿也不费力气地找到他所可资利用和需要的人选。

在执行暗杀任务的罪犯和亡命徒物色和组织起来以后，比斯尔立刻展开了边研究，边实施的行动。

比斯尔完全明白此中规距，既然最高机关已经授权了如此行动，行动的过程中，就不必要繁文缛节的过多的请示报告，有的时候完全可以先斩后奏，不然，多奏而应验不了，反而显得无能和有辱使命，而干这种事情，明显的，成功的系数，总是有限的，失败的可能又总是无限的。

所以比斯尔的组织计划行动投入动作以后，他即刻便在边研究办法手段的过程中，付诸了行动的实施。

先是，中央情报局这位行动计划处的处长理查德·比斯尔，招募到了美国正在通缉的十大罪犯之一的萨姆·戈尔德，他是黑手党的头目，又是职业杀手。比斯尔亲自把这个亡命的歹徒请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和他密切地磋商，提议请这位萨姆·戈尔德潜入古巴，用打冷枪的方式，来除掉卡斯特罗。

当然，回报将是丰厚的，中央情报局将保护萨姆·戈尔德在美国的任何罪恶将不被追究，并且还可以赠予他一座王宫一般的大厦，但是条件是务必完成使命和任务。

萨姆·戈尔德很乐于成交这一笔生意，这笔主意对他来说，实在是太诱人了。

但是，这个家伙原来也有人性的聪明和人性的畏惧。他知道潜入古巴容易，但是打冷枪暗杀卡斯特罗，恐怕并不那么易行。古巴革命以后，很多黑手党头目，黑社会的渣滓在古巴都不能存在，不能容留，都纷纷跑出了古巴。古巴现在没有黑社会黑手党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和气候，也没有那样的土壤，因此，黑社会、黑手党这样的罂粟花，自然在那里不能开花结果，大吐芬芳，所以，那里的黑社会黑手党的形影，已经迅速陷入沉寂，那样的罂粟花，正在萎缩和凋谢中，所以，再隐匿到古巴去伏击和打冷枪，暗杀卡斯特罗，实际上也只能是有去无回的自杀行动，再大的回报，还能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亡命徒萨姆·戈尔德拒绝埋伏到哈瓦那去打冷枪暗杀卡斯特罗，但还想成交好买卖，他提出了一个投毒暗杀卡斯特罗的好办法，他的这个办法不仅可行，而且不会露出蛛丝马迹，杀了卡斯特罗，还能让谁也不知道是怎么杀

的，更不知道是谁杀的。

萨姆·戈尔德这样献计献策。

比斯尔立刻高兴地拍起手巴掌来，连声叫：

“好！好！妙极了！”

萨姆·戈尔德提出要求，中央情报局应提供毒药。

中央情报局早准备好了这样的毒药。

比斯尔立刻向萨姆·戈尔德提供了一种肉毒杆菌菌株胶囊。这是一种烈性剧毒药，在猴子身上作过许多次实验，可以取得投服之后立竿见影的杀伤效果，是中央情报局现有的一大专利发明。

萨姆·戈尔德十分欣喜。这家伙也实在聪明的可以。在得到这样的杀人宝物之后，他仍然不想去亲自冒险，他在他的黑社会朋友中，找到了一个从古巴逃出来的过去在哈瓦那一家妓院里当过大茶壶的无赖。他逃到了美国来，美国并不给他免费可以吃饱肚子的面包和香肠，这家伙正穷愁潦倒，生活无着，萨姆·戈尔德便掏出一把美国中央情报局已支给他的钱，雇用了他，并且对他进行了一番教导和训练，也和他签了一份完成使命必有厚报的协定，然后派他潜回古巴，千方百计，去探寻往卡斯特罗饮用咖啡的碗里投放毒药菌株的机会和可能。

比斯尔认真监督萨姆·戈尔德的行动。他质问萨姆·戈尔德为什么还留在美国而没有马上潜到古巴去。

萨姆·戈尔德向比斯尔报告了他已经展开行动的情况。比斯尔倒觉得萨姆·戈尔德不亲自去冒险，而选择更合适的人选去执行任务，是一种明智的创举。因此，他并不认为萨姆·戈尔德是一个不可靠的人，倒显然是一个可以悉心合作的伙伴。所以，比斯尔又决定派遣他在计划处的一个下属，名字叫罗塞利的人，和萨姆·戈尔德组成了一个特别行动组，扩大他们进行暗杀卡斯特的行动范围，同时提供了后来计划发明准备实行的一些新的办法，也由罗塞利和萨姆·戈尔德一起，招募黑社会、黑手党内的合适的人选，去投入行动。

除了在卡斯特罗饮用咖啡的杯子里投放肉毒杆菌菌株之外，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们，还设计了这样一种方案，可供执行暗杀任务的杀手们选择使用，这就是制造出一种可致迷幻的迷幻药，想办法在他发表演说和讲话的时候，放置在他的话筒前，造成迷幻中毒现象，以破坏他的讲话效果。

不过，这个方案最大的弊病是不能使卡斯特罗致死，达不到暗杀的效果，因此，比斯尔认为没有多大意思，指示不必实行这个方案，同时，他推荐另一种方案，就是想办法把注了毒素的雪茄烟插在卡斯特的嘴巴上去，以使这个嗜雪茄烟如命的人，能吸一口这样的雪茄就致死。

比斯尔觉得这个办法最好。

不过，还有一个不能致卡斯特罗死命的办法，比斯尔也没有予以否定，相反，他倒认为这个办法也是大可实行的。

这个办法就是，中央情报局的化学有毒制剂的专家们，还特别发明了一种非常独特的铊盐，这种铊盐可以在卡斯特罗访问外国时，收买那里他所下榻饭店的服务人员，把这种粉状的铊盐，洒在卡斯特的靴子上，它完全可能不被注意，不被发现，然而，卡斯特罗再穿起这样的洒过铊盐的靴子以后，他的皮质神经就会受到全身性的刺激，主要的效能将是使卡斯特罗全身搔痒难耐，而且全部头发胡须将脱落脱光，他将变得非常怪模怪样而再不能具有

男性的魅力，再不能具有领袖的风采。那样，他甚至会自惭形秽，也就再不会到大庭广众中间来，鼓动人民，号召人民了。而且，那样一来，所有的人，看见他的怪模怪样就会大笑不止，谁还能尊敬他，仰视他，听他的号召，听他的讲话呢？那样的话，他即使活着，也就形同死了。

所以，这个办法，也还真是不错的，是可行的，比斯尔绝不否定这样的办法。甚至，他倒十分乐于看到这种办法所能达到的奇效。

比斯尔奉命努力地推行着暗杀卡斯特罗的步骤。好在他的上司艾伦·杜勒斯也能理解暗杀卡斯特罗，不是唾手即可得来的事情，他倒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比斯尔的终获成功，并不十分催逼。因为他还相信，比斯尔在执行这一项暗杀卡斯特罗的任务时，既不会犹豫不决，也不会是消极的进行。因为杜勒斯知道比斯尔野心勃勃，急欲立大功，急欲在艾森豪威尔总统面前露两手大动作，他急欲成为杜勒斯的接班人，期想在最近的时日内，能够攀上中央情报局长的高位呢。

卑鄙的阴谋伎俩

然而，正在艾伦·杜勒斯亲自坐镇指挥，由他手下的大将理查德·比斯积极行动，紧锣密鼓，环环紧扣，一套一套魑魅魍魉的肮脏无耻把戏一场一场粉墨登台的时候，中央情报局的另一个机构，即西半球处，这个处的处长金，耳闻并掌握到了一些由计划处长比斯尔运作的暗杀卡斯特罗的行动信息。于是，这位西半球处的金处长，就把他的一份由西半球处搜集整理的情报资料，编写成一份备忘录，呈交给了艾伦·杜勒斯。

作为中央情报局的西半球处，它的情报网遍布拉丁美洲，当然也包括古巴的情报侦察，因此，它掌握着更为权威的古巴的情报资料，同时，有着似乎更近逻辑的分析。

金处长在备忘录中，向艾伦·杜勒斯陈述着一些什么情况呢？

首先一条是对暗杀卡斯特罗的质疑和辨析。

在金处长的备忘录中，他指出，首先，在古巴，光暗杀一个卡斯特罗，是不够的。

金认为，古巴革命无疑卡斯特罗是一个领袖，是一个代表和象征。但是，他不是古巴全部的领导核心。金知道，古巴革命最坚硬的领导核心，是由三个人组成的，这三个人，第一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二是切·格瓦拉，第三是劳尔·卡斯特罗。这三个人，几乎浑然而为三位一体。如果暗杀其中的一个，三分之一倒下，三分之二还会站着，还会坚挺，而且可能立刻更加坚挺，因为他们会更加百倍地机警和警惕起来。所以，暗杀他们三个中的一个，是不可取的，要暗杀，得同时暗杀这三个人，否则，将无济于事，反而会激发更为严重的事态。而暗杀他们三个人的活动同时进行，却几乎完全行不通的，因为这三个人都机警百倍，三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将是三百倍的机警，任何想对付他们的人，可能只能反过来被他们所对付，这三个人，文韬武略，每个人都是文武兼备，打枪放炮都不是外行，就是进行拳击和格斗，他们可能也只愿意参加重量级的比赛，不会争着往轻量级的拳击队里挤，他们实在机智果敢，而且总是子弹上膛，枪不离身，他们是真不好对付的。所以，暗杀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百分的不容易，暗杀他们三个人，更是三百分的不容易，实在是难行通的。

金处长作着这样的分析。

接下来，他还有更为新奇的进一步的分析，这就是，暗杀卡斯特罗，如果得手，而后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卡斯特罗如果被消除了，接班的，接上来的领袖，会不会是切·格瓦拉？

这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格瓦拉本来就是古巴革命的第二个少校，第二个纵队司令，第一个是卡斯特罗，第二个就是他。

他和卡斯特罗可以有怎样的比较呢？他们的坚定和强硬，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这样的特点，还可以同时包括在劳尔·卡斯特罗身上。但是，在领导艺术的圆熟，特别是掌握分寸和时机的灵活性方面，切·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肯定不如菲德尔·卡斯特罗更善于把握火候和稳健，相反，切和劳尔，很有可能更为强硬坚定有余而灵活通变不足，因此，如果卡斯特罗缺席不存在的情况下，切·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将是两个更为僵硬，几乎会完全阻死对话渠道的对手。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还不如让卡斯特罗代表他们，似乎总还有可能与其寻求通变和权宜的机会。因此，还不如由卡斯特

罗存在更好。

因此，西半球处的金处长，也极不主张仅仅暗杀卡斯特罗，或者首先暗杀卡斯特罗。

所以，他提请艾伦·杜勒斯深入一步考虑采取更为有力有效的行动，不要指望把全部输赢，都压在暗杀这一个键盘的黑心赌汪上，应该打开更为宽阔可行的方面和范围。

打开什么样的更为宽阔可行的方面和范围呢？

原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西半球处处长金，也并不是一个不想吃肉的狼。他在不建议对卡斯特罗个人实行暗杀行动的同时，却提出了比暗杀卡斯特罗还要大得多的行动建议。这就是一举扼杀整个古巴革命政权，一举通体消灭卡斯特罗政府的全面计划，他建议大干一场，而不是仅仅偷偷摸摸，小打小闹。

金处长在提出这个行动建议时，还特别强调，古巴卡斯特罗政权，在美国人面前越来越放肆和肆无忌惮，他们在古巴，一方面加紧限制甚至没收美国投资的资产，另一方面，加紧稳固政权的步骤，大搞统络民心的土地改革，把本来属于美国资本家和古巴地主的甘蔗田和耕地，分给了没有土地的农民，而与此同时，他们还迅速把全国的老百姓都武装起来，卡斯特罗担任总司令、总指挥，劳尔指挥全体古巴的正规军和所有的野战营，而切·格瓦拉则负责宣传、发动和组建民兵队伍，把古巴的全体工人、农民、学生和商店职员、城市居民都武装起来，正在把整个古巴迅速军事化，全国都快变成是一个军营了。

所以，搞慢慢腾腾的暗杀行为，远不能利刀斩乱麻，应该进行大的手术，凭借着美国如此大的强势和力量，稍微拨拉一下古巴，就能把古巴扫平，因此，干扫灭卡斯特罗政府的活计，实在不应该太小里小气，小手小脚起来，应该大刀阔斧起来进行，不然，古巴的声色气势，长久地存在下去，会成为整个拉丁美洲诸多国家效仿的榜样，他们也都连锁反应起来，那时候事情就将更难办了，所以还不如早下决心早来一次大刀阔斧的手术开刀为好。

金处长拿着他的备忘录和报告，来到艾伦·杜勒斯的办公室里，喋喋陈词，说得似乎也还条条有理，头头是道。

艾伦·杜斯坐在他宽大的写字台后面，他两个胳膊肘支在写字台上，一只手捏着烟斗，另一只手捻着他红灰色的髭须，他银光烁闪的花白头发下面，两只看上去并不神秘莫测，似乎也不含冷酷色彩的眼睛，透过略有反光的镜片，不无鄙夷地扫视着站在他面前好是喋喋了一阵子的这个上校处长。

金反对暗杀卡斯特罗个人的陈词，令杜勒斯听来十分刺耳和反感，因为这对他内心深处的自尊心，是不无伤害的。因为，最早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出主意要走捷径消灭古巴政权，要从暗杀卡斯特罗开始，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妙计，并且立刻得到了他的哥哥约翰·杜勒斯国务卿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认同和赏识，那是三个大人物共同作出的决定，然而，眼面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不知好歹的小小的上校处长，却要公然给予批判，公然给予否定，简直也是太放肆，太混仗东西了。

然而，杜勒斯并不为此而发作起来，因为他听出来了，这个年轻的上校先生，似乎他也说得并不是没有道理，甚至是很有道理，很有可取之处的。基于这一点，他深刻的理智，又不容他不对这个小小上校的可用和聪明，在内心深处给予肯定和承认。

但是，他难得不用相当冷淡的语言，对这位处长说：

“年轻人，你不要试图取消对卡斯特罗的暗杀计划。暗杀计划的那一班车已经开出去了。现在拉不回来，也收不住了。何况，那是……”杜勒斯几乎说出：何况那是经最高机关批准执行的计划，但是，话到唇边，他还是收住了口，即使在中央情报局内部，也必须控制范围，决不能让所有人知道，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是经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决定和批准的，实行恐怖手段，采取卑鄙肮脏的暗杀行动，是会弄坏了艾克总统的形象的，但是，为着美国的需要和利益，又是必须采取的断然行动，所以，唯一最好的办法是，坚决干这样的事，却同样要永远坚决强调艾森豪威尔总统是永远不会干这种肮脏事儿的干净人。这是美国人的交际原则，当然也是中央情报局的办事准则。

所以，杜勒斯喷到唇边的泄露天机的话，又硬是咽了回去。但是，接下来，杜勒斯开始要说出令金处长能感到欣慰和鼓舞的话了。

杜勒斯抬起头来，又看了一眼金，他冷笑出一声来。但是，在话语里却开始包含着热情，甚至是激情，他以欣赏的语调问金处长：

“年轻人，你的这个大刀阔斧的动手术的想法很好。我想你既然已经提出来了，你就一定已经想过，该是个怎样的大刀阔斧地动手术法。我想你也是知道的，美国现在是不能搞直接的大举入侵的，因为现在还不是这样的时机，我们的战略战术思想和指导方针，你应该是知道的。”

金听着杜勒斯开始热情地对他的妙计作出反映，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于是，马上说：

“当然。我们现在必须执行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我是清楚的，美国确实不宜直接插手进攻和直接打击古巴。但是，我们不是有很好的现成经验，可以用来对付古巴，对付卡斯特罗吗？这样现成的经验就是，您不要忘记了，正是您创造出来的经验：亦即消灭危地马拉阿本斯政权的经验，而且，现在在我们有着比在对付危地马拉时更好的基础和条件。”

杜勒斯听着，有些振奋起来，他的眼镜片子似乎更闪亮起来，他更专注地盯着金，说：

“什么好的基础和条件呢？”

金说：

“我们每天都有给您的专呈报告。您应该是知道的，现在，在迈阿密，每天都有从古巴跑出来的杰出人物，从前古巴政权的军警头目，典狱长和巴蒂斯塔前总统的私人卫队成员，还有一些娱乐业的专业经营者，比如，……”

杜勒斯打断他的话说：

“你是不是把古巴黑社会的渣滓们，包括那些赌场经营者，和妓院老板，夜总会的经理先生们，也都列为了杰出人物？那是一些渣滓，你不要指望他们去为美国的利益进行战斗。”

金笑了。说：

“我不指望他们去为美国的利益去流血，去送死，去投入战斗。可是，我们可以期待他们去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投入战斗，为夺回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拼死拼活。你不要轻视这样一些无耻的社会渣滓。一点儿也不错，他们不过是一些流氓、歹人和暴徒，但是，他们失去的利益不比美国人少，他们的赌场被关闭，妓院被取缔，他们还被迫去干苦力活，他们有的人的损失，比美国人还多，最少受到的折磨和打击，比美国人多，所以，他们更愤恨，更

仇视卡斯特罗政权，他们更是与卡斯特罗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当然这中间还包括着许许多多古巴的土地改革中被瓜分了土地和甘蔗园的庄园主，以及其他一些失去大宗财产的人，甚或还有一些纯粹是政见不同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我们都不能轻视他们，他们对古巴政权的愤慨，对卡斯特罗的仇视、敌视，决不亚于我们。”

金说的很快，他还点到了一些著名的古巴人的名字，说出了一些具体的统计数字，比如现在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已经集纳了多少古巴“难民”，多少“流亡者”，只是他点出的一些著名古巴名人的名字，似乎都是古巴的黑社会、黑手党或者与巴蒂斯塔政权有密切联系的人物，似乎没有一个形象还算不错的人物。

尽管如此，杜勒斯听着金的陈词，显然越来越有了更浓的兴趣，他开始催促着金处长：

“说下去。说下去。年轻人，把你的想法都统统说出来。”

杜勒斯鼓励着金。

受到鼓励的金，接着说下去的时候，就眉飞色舞起来，所用词语也就更流畅了。而且，他还偏起了脑袋来，显然不无得意地反问杜勒斯：

“局长先生，我们现在的手上，掌握着这么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他们组织起来，也像当年在危地马拉干过的一样，组织起一支雇佣军队，我们可以花钱支持这支队伍，我们有的是可以武装他们的多余的武器装备，给他们舰船，给他们飞机，给他们坦克大炮，给他们充分的辎重和给养，经过一番训练，把他们训练，武装成一支钢铁一般棒的队伍。然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像卡斯特罗他们自己当年的样子，从墨西哥打回古巴去，现在，我们可以从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派遣他们的敌人，打回他们的古巴去，而且，我们可以是强大的派遣，可以海陆空三军并进，一但在古巴岛上站住脚跟，建立起足以支撑的桥头堡来，他们可以立刻宣布古巴新政府业已成立，古巴不满意卡斯特罗的人民，可以人心所向，人心来归，美国立刻行动，对新的古巴政府带头给予国际承认，我们对拉丁美洲绝大多数国家，现在还掌握着可以一呼百应的影响，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包括美国的所有盟国，立刻对古巴新政府给予承认，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采取广泛的联合行动，对古巴新政府给予更为可以堂而皇之，名正言顺的国际支持和国际援助了，到那时候，强大的古巴新政府，扫除卡斯特罗政权，也就只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了。哈哈，那时候，局长先生，美国总统就得又像在危地马拉事件中我们完全得手后一样，得给您颁发新的紫心勋章了。”

金越说越兴奋，越说越激动，好像他说的一套，已经在古巴岛上全部应验和兑现，因此，他越是嘴冒白沫，手舞足蹈起来，完全忘记了他作为军人，作为上校，在上司面前说话和作报告时应有的军仪。虽然他今天来到此间局长办公室的此刻，身上穿的是便服，肩上没有肩章，胸前没有授带，但如此放浪形骸，说明他实在缺乏军人的素养。

美国不乏素质优秀的军人，但是也不乏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拥有了上校军衔的家伙，比如像金上校这样的家伙。

不过，杜勒斯倒也见怪不怪，他早已看惯了在中央情报局中工作的形形色色的放浪形骸的各种各样人物，因此，在他看来对此并不刺眼，再说，他已经是年近七十岁的老人，他还有老人心肠，能容纳得了一些年轻人得意忘形的举动。

更何况，在杜勒斯看来，这个年轻的西半球处处长金，确实并没有长着一颗没有多大用处的脑袋，他想出来的一整套的东西，已经是一个内容十分周密周详的东西，好像方方面面他都思考到了，这很不简单，很投合杜勒斯局长的心意。

杜勒斯还立刻感到，金的这一套好主意，肯定也还是能投合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心意的。

想到这里，杜勒斯几乎也要学起少年狂来，一反他惯有的文质彬彬的学者式的风度，他“啪”的一声又打了个指响，并且，马上按响电铃，叫来他的女秘书，要她通知理查德·比斯尔马上到他的办公室来。

理查德·比斯尔应召立刻来到了局长办公室。

杜勒斯立刻指着金，对比斯尔说。

“这位年轻的上校有一些好主意，不囿于仅仅对卡斯特罗实行特殊消灭的行动，他还有一些更为宏大的想法。所以，我现在正式向你们宣布，中央情报局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现在已经正式成立，理查德·比斯尔先生将是主要负责人，而金，从现在起，全力协同比斯尔先生处理对古巴采取行动的一切事宜，在不取消对卡斯特罗的暗杀令的同时，可以计划采取更强有力，更壮观的伟大行动。你们马上行动起来，把制定好的全盘计划，在24小时之内，呈报到我的这张办公桌上来。”

这样，在1959年12月岁尾将至的时候，由中央情报局行动计划处处长理查德·比斯尔牵头，由中央情报局两半球处处长金协同为副的中央情报局特别行动小组，制定出了一项完备的，计划周详的“反对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秘密行动纲要”。

纲要的宗旨是：“尽快消灭卡斯特罗政权”。

纲要分四个步骤，第一步，马上在逃亡到美国来的各色古巴人群中，物色和组建事实上的古巴流亡政府；第二步，以古巴流亡政府组织的名义，开始招募和组建训练雇佣军；第三步，派遣先遣游击行动小组，建立游击走廊，开展破坏活动，作好与雇佣军里应外合的联合作战准备，第四个步骤是，在古巴近海的岛屿上建设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控制的自由古巴之声电台，加大反对卡斯特罗政府的宣传攻势。

这个纲要简明扼要，但却并不粗略。有一些部分，是十分具体和明确的。

艾伦·杜勒斯认真审定了这个计划纲要，他相当满意，认为这是一个十分精采的可行的计划纲要，因此，他在接到这份计划纲要报告的第二天，他就把这份重要文件装在他的皮包里，来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椭圆型办公室，向艾森豪威尔总统作了汇报，恳请总统批准执行。

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这个计划严密周详而主要是目标明确的行动纲要，十分欣喜。他差不多是立刻批准了付诸实施。艾森豪威尔总统急于要消灭卡斯特罗政府的心，是十分急切的。这个老人对古巴的几个少校在那里掀起的太不对他胃口和心思的革命，早已经产生了太多的烦躁情绪了。赶快迅速地采取行动消灭卡斯特罗政权，已经是他的一种老年人的偏执的渴望。

艾伦·杜勒斯心满意足，兴冲冲地从艾森豪威尔总统那里取回比斯尔——金行动计划纲要以后，马上开始付诸实施。

第一步，马上开始在古巴流亡分子中物色完全合美国心思的人选，以组建古巴事实上的流亡政府。可是，这一步，刚刚迈开腿脚，就遇到了困难，因为几乎完全找不到落脚的支撑点，经过略微仔细的一筛选，才发现尽管从

古巴逃亡到美国迈阿密来的古巴流亡者不少，但却找不到任何一个可谓是杰出的人物，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具有号召力的人物。野心家倒能找到几个，可是这些家伙一个比一个的胃口大，他要当总统，他也要当总统。他要当总理，他也要当总理。还并没有真正掌权，就已经争权夺利不可开交。他要当财政部长，他要当总司令，都还要抢着管钱，而去组建雇佣军，训练雇佣军，领导雇佣军，有兴趣的人倒反而极少。这些人要地位，要名利，要满足野心，期望复仇和报复，但是却绝没有作出流血的贡献和富有牺牲精神的热情。在这样一些沙子一般的古巴渣滓堆上，营造一个哪怕是稍微可观的古巴政府大厦，几乎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这第一步，就很有点儿难于迈开阵脚。

第一步迈不开阵脚，对中央情报局来说，并不算什么大事，本来也只是物色一些代理人和傀儡，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找不到得力的干将和打手，找不到可以豢养而好听使唤的走狗，他们可以先不忙走这第一步，他们可以跃过这第一步，以后再说第一步的问题，而直接飞跃到第二步上来，从第二步上开始，甚至还可以把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连系起来，同时大踏步地前进起来。

这第二步，就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招募、组建、训练和指挥准备投入反卡斯特罗政权的战斗的雇佣军：第三步，马上选拔一些反卡斯特罗政权的骨干分子，先行派遣回古巴本土上去，开展游击战，建立游击走廊，第四步就是建立反卡斯特罗政权的自由古巴之声电台，开展宣传攻势。这些步骤，完全可以由中央情报局来越俎代庖，控制操纵就行了。

于是，在 1960 年春天的时候，计划迅速消灭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全面行动就完全全面地启动了起来。

为了实施这样的行动，中央情报局作的第一步的花销预算，是准备投入一千三百万美元。

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投资数字，但艾森豪威尔总统马上也予以批准了，为了消灭古巴革命政权，消灭卡斯特罗，美国帝国主义的大头目艾森豪威尔，是很舍得下点儿大投入的。

针对古巴革命政权的中央情报局全面行动计划的实施，坐阵指挥的前线司令员，当然首先还是艾伦·社勒斯。而具体在前线作战执行使命的，还是他的得力干将，对这桩消灭古巴革命政权的战斗有疯狂激情的理查德·比斯尔。

比斯尔开始迅速地招募一批又一批的雇佣军，他首先是在迈阿密城的郊外，建立了训练基地，他花大价钱，在古巴流亡者中招募亡命徒，但是，尽管花很大的价钱，应召的亡命徒并不是很多，很多人一开始前来报名预支了津贴费，但一听说是他们回古巴去参加反卡斯特罗政权的战争，一些前来领取预支津贴费的前古巴巴蒂斯塔政权的军警，都和古巴革命起义军作过战，知道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队伍锐不可敌，因此，心有余悸，所以，他们带着津贴费，吃过几顿饱饭以后，就开小差跑了。

看起来，在迈阿密办训练营地不行，这里的古巴应招者，混一顿饭吃，混几个津贴就又开小差跑回迈阿密城里去了，这不行。于是，比斯尔又把训练营地改在了巴拿马的运河区属于中央情报局的专门训练基地上去。不过，到了那里，也还是不行，凝聚不住这些古巴的既想吃肥喝辣，又不想送死的歹徒。最后，比斯尔决定把招募来的雇佣军弄到危地马拉的荒野丛林中去，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无人烟的地区，集中训练那些从古巴亡命徒中招

募来的雇佣军，这总算集合起了第一批准备用来进攻古巴的队伍。

从这时开始，比斯尔亲自从这些雇佣军杂碎们中间，挑选一些骨干分子，分批强化训练，强化武装，开始组织向古巴本土的渗透和潜入。

卡斯特罗当年从墨西哥出发，登上《格拉玛》号，回到古巴时，进入的是马埃斯特腊山区。

现在，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出来的反卡斯特罗政权的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游击队员们，被派遣运动到了埃斯坎布拉山区，准备在这里组建他们的游击根据地。

他们来了一批又一批的人马。

有的是空投进入的。

有的是用小艇潜运进来的。

他们的来到，可绝不像卡斯特罗从墨西哥搭乘小游艇，回古巴时，八十一二人挤在一条超载的小船上，憋得连气也透不过来。

几天吃不上饭食，喝不上足量的淡水，那样困难和穷酸。

夹带武装起来的潜入古巴的雇佣军游击队员。可是不仅带足了精良的武器装备，也带足厂可口可乐、白兰地、巧克力和肉罐头之类的给养。

而且，他们一经进入埃斯坎布拉山区，一旦发出了他们的电讯联系，第一批来到这里的雇佣军骨干游击队员，在他们发出通讯联络的第一个星期之内。美国人就在他们指明的地域里，开始不断地空投着供他们补充的武器和弹药，给他们空投下了准重型的武器，包括反坦克炮，各种型号的拍击炮，以及火箭筒，数量竟达千件之多，空投下来的装备给养，更是应有尽有，包括蚊帐、毯子、吊床、便携式帐篷以及各种食品饮料和烟酒，美国人是准备在古巴埃斯坎布拉山区养一批世界上最富足的、不愁吃、不愁穿的游击队员的。

当然，这些不愁吃、不愁穿的美国雇佣的游击队员们，既然已经拿了美国的大价钱，而且还准备进一步拿，何况，他们确实也是产巴革命的仇敌，古巴革命砸烂了他们的赌场、妓院、色情夜总会等等类型的天堂，他们当然也愤恨这场革命，充满了对这场革命的仇恨心和报复心，所以，他们既然来了，就要大肆地、积极地展开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了。

他们想拢络和收买一些当地的农民中的不满分子，但是这很难办到，古巴革命不到两年的时间，全国已经完全实现了土地改革，过去在巴蒂斯塔政权时期贫苦无着的农民，现在部分得了甘蔗田，分得了耕地，他们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得到了迅速的改善，他们为什么会给他们带来了美好生活的古巴革命不满意呢？这样的不满分子，几乎完全找不到，而且，相反，更令这些美国雇来的游击队员们气恼的是，仅仅不到两年，古巴深山里的农民，也已经差不多被古巴革命给完全赤化了，古巴革命政府派出来的大量的扫除文盲的教师队伍，几乎使每一个没有文化的古巴人，迅速脱盲，特别是在青少年中，差不多很快就扫除了一切文盲，使他们都已经受成了有知识、能读书、能看报的聪明人，卡斯特罗和他的兄弟们，来的这一手，实在太厉害了。除此以外，卡斯特罗政权厉害的一手还很多，比如遍地修筑公路、疏通山地和平原，农村和城市的联系，过去山里的甘蔗运不出去，山里的木炭也运不出去，山民的经济来源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现在路修通了，大量的山货可以运出山区进行贸易，山民的收入自然比过去成十倍成百倍的增加了，这自然最有效地迅速改善着山区人民的主活，还有一条最有趣的好处是，据说，卡斯

特罗根据切·格瓦拉的建议，组织了城市里的医院医生和护士，进入山区和农村，为广大山民和农民实行巡回医疗保健和卫生知识宣传，这似乎也深得民心。

这样大得民心的卡斯特罗政权，在正经八百的人民群众中，怎么能容易找到极为心怀不满的分子呢？

不用说，完全是不可能的。

当然，美国雇佣的游击队员们，在进入埃斯坎布拉山区开展活动时，一开始，也还是带着一些类似中国革命现代戏《智取威虎山》中座山雕所需要的那样的“联络图”的。在那样的“联络图”上，也写着一些昔日与巴蒂斯塔反动政权有根深蒂固联系的人，比如前军警人员，还有本来是巴蒂斯塔政权安插下来的特务，以及一些过去和流氓集团黑社会势力有联系的人物。真正如果把这样的人员都联系组合起来，也可以壮大美国派遣来的游击队的力量，也可能帮助美国雇来的游击队，不会显得太势孤力单。

令美国雇来的游击队成员们懊恼的是，他们带来的“联络图”，由于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的强有力打击，也使他们的联络图都成了废纸。劳尔·卡斯特罗亲自指挥的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在古巴并没有搞什么镇压反革命的轰轰烈烈的运动，也没有让这种镇压产生出任何恐怖气氛和血腥气，他们偶而发现逮捕错了人的时候，一经查明，马上予以赔礼和补偿，立即无条件释放。但是，他们逮到真正的谋图不轨的罪犯和反革命分子，虽然大多不杀，一般却也要被送到远离古巴本上的皮诺斯岛的劳改监狱里关押起来的。

皮诺斯岛，也就是松树岛，那里的监狱是巴蒂斯塔政权建造起来，留下来的。

当年，卡斯特罗领导古巴大学生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以后，被投入监狱，也是被关押在松树岛上的。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都在那里的监狱中，受过长时间的监狱生活。

因此，这里现在自然也就成了古巴革命政权关押死顽反革命分子和现行犯罪分子的现成的场所。

一时，这里确实关押了不少这样的反动分子。但是，流散在古巴社会生活中的这样的分子，就是十分难得罕见的了。

由于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完全不动声色而卓有成效的工作，美国雇佣的游击队员们，潜进埃斯坎布拉山区后，很难再找到扎根和扩展的基础。于是，这些美国的雇佣游击队员们，只能开始孤军作战。

他们作战，能够进行怎样的作战呢？

他们不敢袭击任何一个古巴革命军的哨所，也完全不敢袭击任何一个民兵训练营地，因为，如果袭击，无疑会使他们暴露，无疑会导致他们被立刻包围和聚歼。

于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就投放到了捣乱和破坏的方面，美国佬为他们空投下来许多可以用来进行捣乱破坏的有效武器，比如燃烧装置，烈性爆炸物，这样，美国雇佣的游击队员们，便可以在埃斯坎布拉的山里山外，大搞一番破坏活动了。他们向正在生产的榨糖厂投掷燃烧弹，引起糖厂的大火。他们在城市里或村镇上的商店里，装置安放强烈的定时爆破弹，以引起爆炸和杀伤，引发混乱和恐怖，引发动乱和不安的情绪，尽可能给卡斯特罗政权造成越来越多的滋扰和麻烦。

但是，美国雇佣的这些空投到埃斯坎布拉山里的亡命徒游击队，一旦他

们杀人放火搞起了破坏活动，事实上也就暴露了他们的罪恶魔爪和他们在暗中活动的魔影。同时，美帝国主义的间谍飞机，大批量的，一批又一批地向埃斯卡布拉山空投武器，弹药和给养物质，埃斯卡布拉山区的农业合作社员，人民农场的职工和广大的民兵，许多人收集到了这样的空投物质，于是，马上向哈瓦那方面报告，这样，哈瓦那革命政府和古巴革命的最高总司令部，立刻得知了美国雇佣游击队在埃斯卡布拉山区活动的信息。

怎么办呢？

卡斯特罗没有慌忙。

他只是马上拿起电话来，请切·格瓦拉少校来到他的司令部一下。

切·格瓦拉来到以后，卡斯特罗只是轻轻地弹了弹他手指上的雪茄烟，对格瓦拉说：

“切，埃斯卡布拉山区，本来是你们第八纵队后来进军拉斯维利亚斯省的时候，开辟出来的革命根据地，现在美国佬投下了雇佣的游击队，有一些人马，也可能有很多，也可能并不很多，但是，我们收集来的他们丢下的武器，包括迫击炮和火箭筒，轻重机关枪，卡宾枪和自动步枪，以及步话机，通讯电讯器材，已经是很可观的一大堆了。”卡斯特罗冲着切·格瓦拉笑了笑说：“美国佬从现在开始，大约也要给我们充当运输大队长了。”他接着，对格瓦拉继续说：“切！你对埃斯卡布拉山区的地形是很熟的，你去执行打扫干净那里美国雇佣游击的任务吧，可以捎带着同干别的事情一起进行，可以结合着去整顿一下拉斯维利亚斯省的革命统一组织的问题同时进行。”

这是在1960年的秋月里，当时，除了美国明目张胆，基本上是公然的组织准备对古巴的武装干涉，并不断派遣武装特务潜入古巴，展开相当规模破坏活动以外，在古巴革命的内部，有苏联赫鲁晓夫集团背景的古巴人民社会党，也正趁着与卡斯特罗原来领导的“七·二六运动”合并为“革命统一组织”的时机，在古巴革命阵线之内，激烈地展开着趁机夺权篡权的阴谋活动，拉斯维利亚斯省，成了原古巴人民社会党组织书记，这种夺权篡权阴谋活动的头目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活动的一个中心，他几乎在这里已经牢固地建立起了他的活动基地，已经在大肆地胡作非为。比如，他大肆地打击和清洗曾经参加过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的老战士和领导干部，企图在那里取而代之建立他自己的一统天下。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领导核心，发现这个情况和问题后。原已作出决定，准备让切·格瓦拉前往这个地区，解决处理这样的问题，扭转和改变这种状况，现在，埃斯卡布拉山区的剿匪任务也提上了切·格瓦拉奔赴拉斯维利亚斯省的工作日程。自然的，切·格瓦拉领受了菲德尔·卡斯特的指示以后，他就迅速地赶赴到了拉斯维利亚斯省来。

切·格瓦拉的到来，一切问题几乎统统利刀斩乱麻，迎刃而解。切·瓦拉不仅拥有很高的大权，更重要的是他拥有解决任何艰巨任务、困难的能力和魄力，特别是，他还有着足令任何人倾倒的崇高影响威信。原来在拉斯维利亚斯省开展积极阴谋活动的头目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在切·格瓦拉的影响和威信下面，简直不过是一粒望尘不及的细砂。

切·格瓦拉迅速解决拉斯维利亚斯省的组织机构，扭转政局的同时，他迅速果断地指挥了对美国投入到埃斯卡布拉山区的特务武装和雇佣游击队的大规模清剿战役。

切·格瓦拉在这场清剿战役中，似乎是出于实验，或者是为着训练的目的，他主要是调动了埃斯卡布拉山区的民兵组织，几乎没有调动任何一个正

规的野战营，他就是完全依靠了武装起来的人民的力量。他设置了一道又一道民兵封锁线，组织了一队又一队的民兵队伍突袭和巡逻，美国向他们的雇佣游击队特务们空投的一切武器、弹药和给养，古巴的人民武装报之以统统没收。那些美国人投放到埃斯埃布拉山区来的武装匪徒，在这坐寸步难行绝无任何回旋的余地，他们只能整日猫在山旮旯的阴沟里，整日忍饥挨饿。挨蚊虫蛇蝎嘶咬吃喝，他们的给养得不到补充，他们是不得不爬出阴沟来找些什么能吃的东西的，结果是，他们出来一个，便被民兵们发现一个，逮住一个，出来两个时，便被民兵们发现一对儿，逮住一双，结果，在埃斯坎布拉山区，匪徒们很快被肃清，美国佬接下来也就打消了在埃斯坎布拉山区建立反卡斯特罗政权的武装游击基地的步骤。

美国佬当然并不能因此而甘心挫折和失败。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头目艾伦·杜勒斯和他的得力干将理查德·比斯尔，进一步地接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督促和指令。艾森豪威尔总统甚至冷酷地嘲笑杜勒斯呈给他过目的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炸毁糖厂的搞破坏活动的照片，总统一边扔开这样的照片，一边说：

“这算什么！炸毁一个糖厂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今天炸毁，他们明天还会再盖出一个来。最主要的，还是要从根儿上动手术。”

于是，艾伦·杜勒斯和理查德·比斯尔，按照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旨意，进一步加大反对古巴革命，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行动力度，他们开始更疯狂地、大规模地继续招募、训练用来对付古巴的雇佣军，扩大了在危地马拉的训练基地，同时在与危地马拉毗邻的也是美帝国主义忠实走狗声名极坏的血腥刽子手索摩查控制的尼加拉瓜，也设置了准备用来入侵古巴的雇佣军训练营地。

美国中央情报局执行美国政府的冠冕堂皇的对外政策，在不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在美国本土开拓大规模的外国雇佣军训练营地，因为这样就会使美国的肮脏的手太暴露了，有损美国冠冕堂皇的整体形象，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还是要尽可能避免这样做的。

不过，后来，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的走狗政权，也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出了担心，担心在他们的国家土地上设置反对古巴的雇佣军训练营地，会不会招来卡斯特罗派遣切·格瓦拉领导和指挥的古巴准军事部队，以反击为借口，趁机进入这两个国家展开游击战争。因此，他们提出了这种大规模的训练准备入侵古巴雇佣军的营地，还是最好设置到美国的本土上去为好。

中央情报局的比斯尔准备同意这样的请求了。但是，比他更高层的大特务，还是不同意这样做，只是答应派遣美国海军舰艇巡逻队，加强对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海岸线的巡逻和警戒，以强有力地防范招来切·格瓦拉指挥的古巴准军事部队的进入，防范切·格瓦拉把古巴的民兵带到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来打游击。

这样，美国基本上等于是公开或半公开的，开始以正式的军事手段来支持对准备入侵古巴的雇佣军的武装和训练了。因此，美国把反对卡斯特罗古巴政权的军事步骤，也升级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在这个同步的时候，美国的大特务比斯尔亲自选择加勒比海地区属于洪都拉斯领海之内的一个巴拿大的小岛，名为“鹅岛”，建立起了一个50千瓦的，功率很大的广播电台，号称“自由古巴之声”，每天开始24小时昼夜不停的广播，大量制造谣言，展开人身攻击和毁谤，散布恐慌情绪和混乱消息，以扰乱古巴国内的民心，煽

动古巴社会的动荡。但是，这样的宣传攻势，成效甚微，几乎很难被应验能产生什么作用。古巴人宁肯收视哈瓦那电台、电视台的娱乐节目，也不想听打着“自由古巴之声”旗号而明明是美国电台的造谣广播，美国人的油滑腔调，就是用西班牙文说出来，也是能被听的一清二楚的。宣传攻势成效甚微、甚至几乎没有任何成效。潜入古巴境内埃斯坎布拉特游击活动组，又一批一批地被歼灭。在危地马拉、尼加拉瓜，以及波多黎各，后来在美国的本土新奥尔良州，也开设了进攻古巴的雇佣军训练基地，开始不断地扩大这样的雇佣军队伍，不断的对他们加大投资强化训练。可是，不知如何才好，这些雇佣军队伍，不管怎么组织，怎么武装，怎么训练，到头来不过是一些乌合之众，怎么也捏不成豆腐，成不了气候。因此，从 1959 年的岁尾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着的准备大规模武装入侵古巴的军事行动 经过 1960 年整整一年的准备，花费了大量资金和力气，到了这一年岁尽的时候，还是完全没有一点儿可能投入行动，完全不能去攻占古巴。

而这个时候，却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个伤心的时刻到了。1960 年是他第二任总统任期届满的时候。经过美国全国大选。年轻的，只有四十二岁的新总统肯尼迪，已经击败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全力举荐的总统候选人，原副总统尼克松，业已被选出来了。是时已经年过七十的老总统艾森豪威尔，该是下台从白宫卷铺盖的时候了。

这位老总统临将下台回他葛底斯堡老家去当逸民之时，最令他失望和遗憾的一件事是：在他任上，尽管他曾经那样期待和渴望过，但却终于并没有迎来那样一个令他心花怒放，心头大快的时候，那就是美同雇佣军终于入侵古巴，终于如愿以偿地拿下古巴的时刻。

不过，这位老总统，同时是美国的五星上将，曾经当过麦克阿瑟元帅的随从参谋，当过马歇尔元帅的手下爱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军欧洲大陆，指挥诺曼底登陆的盟军司令，二战之后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的最高司令，这是美国身经百战的伟大英雄和司令官、指挥官，一贯以周密的运筹计划组织安排指挥调动兵马投入行动赢得胜利而著称。在他行将去职的过去一年间，他已经为又一场不大不小的，消灭一个国家政权的战争，进行了不懈的督察和筹谋，事实上正在临近他下台的时刻。他认为赢得这场战争胜利的准备和筹划，已经到了成熟和可以揭锅的时候了。可惜由于美国的法律制度不容他缓期下台，所以他就不得不放弃这个发动一场新侵略战争的主灶厨师的职责和使命了。也许，这使这位身经百战，总是在赢得胜利的老将军实在感到万分遗憾。

不过，他并不完全失望而去。

1961 年 1 月 19 日，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临将下台的前一天，他还和 20 日即将宣誓就任美国 36 届总统的肯尼迪，就进攻古巴的事宜作了磋商和明确的交待。

艾将军告诉年轻的肯尼迪，手术已经完全准备好了，该是掌刀动这场必须动的手术的时候了。艾森豪威尔即使到了老年时候，办事仍然具有随从参谋的习惯。他在和肯尼迪总统交待关于处置古巴问题的事宜时，他特别指定一名白宫高级顾问官员克利福德作了谈话纪要，并且让他整理成条理明确的备忘录，在肯尼迪总统宣誓就任总统后呈交给这位年轻的总统，以使他决不能忽略和忘记该马上指挥一场为捍卫美国利益，而坚决打击古巴革命政权，消灭卡斯特罗政府的决战行动。

肯尼迪总统大打出手

约翰·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以后，他春风得意，大有不可一世之感。刚刚四十二岁，已经主宰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其情是甚可骄人的。

不过，无论如何，谁也不能否认，肯尼迪是美国人很难得的最聪明的总统中的一个。

当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最聪明的总统之一，也当然不可能不会有犯错误办砸锅事的时候。

特别是，在发动美国雇佣军向古巴大举进攻，企图一举消灭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这一件事情上，肯尼迪也许太相信了那位地位崇高的前总统的遗产，那位曾经几乎是百战百胜的五星上将，已经完全筹谋策划好了的一场胜利在握的战争，肯尼迪总统为什么不可以借以露上漂亮的一手，来显示一下他无可比拟的杰出和辉煌呢？

那么伟大的将军、北大西洋武装力量的最高司令，还能指挥一场没有把握赢得巨大胜利而规模并不很大的战争吗？

似乎是没大问题的。

肯尼迪几乎绝对地相信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留下来的进攻古巴，消灭古巴的计划和准备，将是一笔最可靠的遗产。

肯尼迪很想使这笔遗产再锦上添花。

肯尼迪是不想当败家子的。

不过，这位年轻的四十二岁的总统，尽管如此崇敬和相信他的前任的才能和英明，他却仍然并不忘记自己独立的责任，他在继承艾森豪威尔总统关于进攻古巴的这笔计划中的遗产的时候，他的责任心驱使他，终还是决定进行一场必要的重新的审议。

肯尼迪在重新审议入侵古巴的决战计划时，他首先召来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和入侵古巴计划主要执行负责人比斯尔汇报。

肯尼迪总统也许是为着很好地继承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筹划好的入侵古巴的这一计划遗产，所以，在他粉墨登场当上美国总统，一朝天子一朝臣，实施政府人选大换班时，并没有想使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两届任内已经任职八年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易位。

杜勒斯还安居在他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位置上。只是，他的这个位置，现在有了明确的接班人，但不是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卡贝尔，而是协助杜勒斯制定和组织对古巴实行入侵攻击行动的计划处长比斯尔。

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秘密是，比斯尔是肯尼迪总统非常莫逆的朋友。肯尼迪总统风流倜傥，爱好女色，经常也会被漂亮的妓女所吸引，而漂亮的妓女，往往会与黑社会黑手党的头面人物们有瓜葛。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经常离不开黑手党黑社会头面人物的帮忙，所以，在这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肯尼迪与比斯尔早就拥有相识和产生莫逆友谊的关系。他们的私交是根深蒂固的。在肯尼迪总统上台以后，已经对比斯尔有过明确的许诺，将来杜勒斯空缺出来的局长宝座，将由比斯尔来顶替。

于是，现在，当肯尼迪总统召请杜勒斯和比斯尔给他有头有尾地汇报和介绍进攻古巴的计划的策划，组织和实施过程时，杜勒斯极尽强调这项计划执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意义，而比斯尔更是极力炫耀这业已是他八九不离十即将漂亮完成的一部佳作。

肯尼迪被杜勒斯的强调理由所深深折服。

肯尼迪知道杜勒斯的历史，他虽也已经是一匹珠黄老马了，但是也确实有过能征惯战的历史，也是一个可资器重和依靠的人物，他的头脑、智谋，显然也是有分量的。所以，肯尼迪对杜勒斯智力和能力经验的信赖，基本上也不持怀疑。

肯尼迪在和理查德·比斯尔的接触中也深感比斯尔是一个头脑灵敏的家伙，而且，明显的野心勃勃，很有想干大事，建大功业的气概，这家伙的聪明才智，无疑也是不容怀疑的。

特别是，比斯尔把业已组成的准备进攻古巴的战斗旅“2506”旅的全部战斗力，它的装备和进攻能力，人员配置情况，以及空军、海军的协同作战能力，飞机和舰艇的配备，全天候的立体作战水平，以及充分的后勤保障和后勤供应，按照比斯尔的说法，单单为“2506”旅机动车辆、船只、坦克、飞机准备贮备的汽油，也可以把大半个古巴岛淹没，至于飞机扫射的机关炮弹和可以在任何地方投掷的燃烧弹、杀伤弹，基本上可以让六百万古巴人不得不在枪林弹雨和炮火硝烟的火焰里游泳。

比斯尔说到这些准备情况时，他唯恐肯尼迪总统产生犹豫和怀疑，所以，他追求了戏曲表演的夸张效果，并且，特别强调着他的轻松和俏皮自如，尽力显示着他的自信情绪。

实际上，比斯尔对攻击和入侵古巴计划的实施，早已经产生了一种狂热的赌搏心理，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可突然一举建立下顶天立地大功大业的机会，一旦赢了，他就会拥有一切，何止中央情报局长的宝座，还有更多的机会和美妙的东西肯定可以任他来自由选择，所以，比斯尔想把他的宝，他的整个命运的宝，都要压到这桩事情上了，他下决心，要用最大的热情，来促成这一件可令他平步青云和突然辉煌盖世的事情，他极力想说动、说服肯尼迪总统听过他的陈词以后，就立刻敲定下来，以他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开始执行入侵古巴，把“2506”旅数千名雇佣军投入战斗的命令。

肯尼迪总统为杜勒斯和比斯尔的汇报和说项，深深地鼓舞和振奋起来，他也是年轻人，渴望着更大的荣誉和虚荣，如果在他刚刚上任不日之内，为美国赢得一个丰硕而甜蜜的瓜熟蒂落的果实，赢得一场漂亮而胜利战争，无疑，他这个年轻的新总统，在广大的美国人民中，就再不会有人怀疑他的能力和水平了。因为他的当选，事实上比尼克松并非多了很多选票，他只是以微弱的多数当选的，因此，有将近一半的美国人，本来还对他的能力怀疑着呢，而如果他在进攻古巴，赢得古巴的战斗中能够打一个响炮，那一半对他持不信赖态度的美国人，不也就会转而充分地信任他和充分地尊敬他了吗？

所以，从本心来说，肯尼迪也是渴望着，很需要赢得一场漂亮仗、赢得一场大胜利的。

不过，此人还是聪明而且谨慎。他的责任心相当可以，虽然他急于创奇功，立大业，但又绝不肯急图轻进，贸然行事。

听过杜勒斯和比斯尔的汇报说项以后，在他上任仅一个半月以后，在1961年的3月11日，他又召开了一次最高国策会议，请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财政部长狄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以及三军参谋长，因为是讨论战争问题，差不多还请来了华盛顿的陆海空军四星以上的将军，以及其他一些有关官员，来参加这个会议。

肯尼迪让杜勒斯和比斯尔这两名中央情报局的大将，再次向这个最高国

策会议汇报和报告经过前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悉心经营，已经完全准备好了的攻击古巴的行动计划的全部细节和步骤。请最高国策会议最后来决定实施。

国务卿腊斯克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一方面，对于这一行动计划的细节，很难一时悉心了解很透，既然这是中央情报局独立策划的事情，而且又是从艾森豪威尔总统手上传下来的事情，该怎么办，不该怎么办，最好还是由肯尼迪总统和中央情报局来拿主意，他们不想再说长道短，说三道四。

只有肯尼迪总统特聘的总统顾问施莱辛格，对这一发动对古巴的攻击和入侵计划，提出了极为尖锐的批评，甚至提出了几乎是针锋相对的指责，指出这可能是干一场肮脏的丑事，道义上说不过去，将来无法向历史交待，而且，后果并非一定可以保证是良好和万无一失的。

施莱辛格的陈词相当直率，坚定甚至十分激昂。

但是，他的发言，立刻遭到了暴风雨般的反击。

而且，这反击，首先不是来自杜勒斯，也不是来自比斯尔。而主要是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和其他诸多的将军们。

这些肩有四颗星以上的将军们，也许对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有很深的执行他意志的情结和不可动摇的迷信，他们开始竞相发言，指责施莱辛格是“书生娃娃”，是“信口雌黄”，“完全没有政治家的应有品质”，“不配给总统出谋划策”，等等，他们是坚决支持实施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决定下来，并且已经充分作好了准备的打击古巴的入侵计划的。

绝大多数将军们，还作出了极为乐观的展望，有些将军阁下们甚至指出：古巴算什么？那里不也就是有几个小小的少校吗？而且，那些少校，还不都是一些自封的少校吗？骇怕他们的人，肯定不可以继续成为美国的将军。

将军们这样发言、议论和论断着。

将军们这样的发言、论断，对肯尼迪总统，尤其产生着一种刺激，这就是令他不得不在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无法弥补的欠缺感，他深知，谈论战争，谈论军事知识，他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充作权威，不能充作是经验丰富的大将，因此，作为美国的总司令，明智的举措，还是应该多听一些参谋长们的谋略。

但是，将军们的发言，所给他的刺激，这还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是，将军们似乎好像还在“将”他的“军”，他们扬言没有一个美国将军会骇怕任何年轻的古巴少校，言下之意，是不是说如果肯尼迪总统举棋不定，不敢下达攻击古巴和消灭卡斯特罗政权的命令的话，也不配成为美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呢？

将军们的弦外之音，包含着不包含着这样的音调，肯尼迪有些捉摸不定。但是，有一条，他作了权衡，这就是，作为美国的总统，他不必要扮演一个胆小鬼的角色。他何必要扮演这样一种形象呢？同时，他还想到了，既然艾森豪威尔总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经营和运筹，展示着他的勇往直前的冲决精神和魄力，作为年轻的肯尼迪总统，仅仅因为缺少经验而非常地缩手缩脚起来吗？

他想他不该这样。

于是他终于签发了执行中央情报局拟定的派遣雇佣军入侵古巴的命令。

美国雇佣军葬身猪湾美国中央情报局拟定的雇佣入侵古巴的行动计划，是十分周密和详细的。

他们拟定的初期作战目标，是首先摧毁古巴拥有的空军力量，第一步完

全的掌握制空权，这一点，他们觉得好像并不难予作到。

不过，掌握古巴的制空权，在拉开入侵古巴的帷幕以后，需要立刻由地面部队配合，迅速攻入古巴的陆地，在迅速扩展滩头阵地的同时，一定要迅速控制一个可供飞机起降的机场。否则，入侵古巴的飞机全部由美国的迈阿密机场起降飞来飞去，好像就不是古巴的流亡政府“临时政府”在返回古巴，而完全就是赤裸裸的美国帝国主义的入侵行动了。美国无论如何，还是需要有一层面纱的，它不能完全把面纱撕下来，完全暴露自己的凶相和狰狞面孔。

然而，关于这方面的设想和计划，本来安排的是很好的。

在原来的计划和安排中，入侵古巴雇佣军的登陆点，是瞄准在古巴南部海岸的特里尼达地区的。

特里尼达是古巴南部海岸地区的一个中心小镇。

它的背后就是埃斯坎布拉山区。

按照中央情报局的设想，它们在埃斯坎布拉成功地建立起游击基地后，在特里尼达地区登陆，立刻会形成里应外合的夹击局面，因此，这样就很容易争夺到一个滩头区域，在特里尼达镇，本来还是有一个小型机场的，所以，如果攻占了特里尼达，雇佣军部队也就能够在古巴的本土上拥有一个可以掌握制空权的飞机场了。

怎奈，当中央情报局把一批又一批颇能战斗的特务骨干派遣到埃斯坎布拉山区展开活动后，很快召来了切·格瓦拉组织指挥的清剿和围歼，很快把潜入到埃斯坎布拉山区的特务，肃清的特别干净和彻底，几乎一个也没有保留下来。

切·格瓦拉是打游击战的专家。

而同时，他也是消灭雇佣军游击队的专家，他来到埃斯坎布拉山区组织这里的民兵剿灭派遣特务和游击雇佣军时，他发布的一道非常奇绝的命令是：不首先搜索追剿藏匿的匪特，而是首先警惕起来，切断美国的空投支援，让潜入的雇佣军特务们完全断绝给养，让他们在深藏在山沟里饿的半死渴得半死被蚊虫蛇蝎咬叮的半死的时候，自己跑出来投降。

这一个绝招儿百灵百验。后来埃斯坎布拉山里，也就再也传不出一声游击雇佣军特务的电讯信息了，只有逃逸出来的几个特务，带出了这样的情报：埃斯坎布拉山区，已经真正变成了“人民战争的海洋”，真正受成了“铜墙铁壁”的地区。

特里尼达镇，是埃斯坎布拉群山环绕的一个镇，它已经完全变成了任何入侵者可怕的陷阱。

这样，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聪明的头头们，自然就不会再把他们的雇佣军派遣到特里尼达这边来作为入侵的登陆点了。

如果特里尼达不是理想的攻击登陆点，那么，还有何处是可供选择的理想登陆点呢？

美国在古巴的关塔那摩，还有一个军事基地，那是美国的租借地，是历史留给美国的财产，美国在古巴革命胜利后，仍然赖在那里不肯撤出。

因此，那边，有一些美国的海岸环境，也可以是雇佣军选取登陆的好地点。但是，那也当然有问题，那样一来，雇佣军的入侵，美国的标识也就更明显了，再说，那样也可能招来古巴人攻击关塔那摩军事基地的借口。所以，关塔那摩美军基地那边登陆入侵古巴，环境虽好，却也并不可取。

还有什么地方是可供登陆入侵的好地方呢？

还有一个皮诺斯岛，也就是松树岛。这个岛在古巴的南部海湾，离古巴本土有根长一段海路。

美国的雇佣军，如果登上松树岛，在古巴的领土上，就可以说是占有了一块地盘，古巴的由雇佣军支撑的“临时政府”，似乎也就可以在古巴的土地上正式升起一面旗帜了，美国政府显然也就可以迅速组织起国际承认的声浪来了。

而且，松树岛上有着很大不小的劳改监狱，巴蒂斯塔政府的许多杀人犯和刽子手，黑社会、黑手党的许多大头目和他们手下的职业杀手，以及一些杀人越货的流氓无赖，还有一些用死顽的手段和行动来反对古巴革命的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捣乱分子、阴谋颠覆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在这里实行劳动改造，在这里种甘蔗或刨土挖石植造树木。如果雇佣军在这里登陆入侵成功，这一班子被劳动改造的囚犯，甚至也不乏野心家，便会立刻被雇佣军吸纳进来，进而甚至可能成为雇佣军的中坚骨干人物，使雇佣军更加壮大起来，更加具有战斗的能力。

不过，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知道了，这也可能是一厢情愿的选择。因为，从松树岛劳改监狱不断有人被释放出来，而古巴政府对从松树岛监狱释放出来的刑满释放犯，并不限制他们走出古巴来到美国充当移民，美国中央情报局总是如获至宝地接待这样的移民，经常想从他们身上获取一些具有价值的情报，这些移民也确实能向他们提供很有价值的情报，比如，不止一个人，可以向他们报告说，松树岛绝不是一个可以轻易登陆的地方，因为卡斯特罗已经在那里布署了好几个最精锐的野战营，充分地加强了在那里的警备，除了美国派遣大兵团进行海陆空立体战争袭击，准备付出十万八万美国士兵生命的代价，否则，要想登上松树岛，谈何容易，简直是完全不可能的。

那么，还选择何处来作为攻击登陆的好地点呢？

到奥连特省，从圣地亚哥那边开始吗？

显然在那边是不行的。

菲德尔·卡斯特罗派遣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少校，在古巴东部地区统帅军队，负责戒备和指挥，劳尔·卡斯特罗思维敏捷，办事精细，指挥果断，出手有力，从来是任何敌人的克星，在他指挥部队戒备的地域里攻击和登陆，所遭受到的迎头痛击，肯定会是灭顶之灾，那是不可以去试一试的。

东部不行。西部行不行呢？

西部同样无论如何也不行。

菲德尔·卡斯特罗坐镇哈瓦那，他把劳尔派到了东部区域，全权指挥古巴东部地区的战备，西部他交托给了谁了呢？当然还是交给了切·格瓦拉少校，因为西部地区是更临近美国海岸的前线，因此也是更为重要的战区，那里是必须有强将统帅的。

古巴革命保卫委员会，在情报工作方面，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在相当准确的程度上，掌握着美国中央情报局计划行动的进程，所以，古巴有针对性的战备活动，在全国的各地各处，是十分到位的。

特别是当古巴革命指挥核心以菲德尔少校为总司令的一班少校们，在他们嗅觉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雇佣军即将在古巴展开入侵行动的前夕，他们几乎都警惕地守备在各自的战位上。

特别是，愚蠢的美国佬，他们在指挥二十世纪世界战争史上最愚蠢的这

次入侵古巴猪湾的战争行动时，他们完全不采取任何突然袭击的方式，而是凭借他们武器和装备的精良，首先是慢条斯理地展开对古巴的有限而频繁的空中的打击，实际上首先为古巴军民拉响了战斗警报。

1960年4月15日，由美国提供的战斗飞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飞行员的驾驶下，从尼加拉瓜的空军基地起飞，以首批八架飞机的机群，展开对古巴列岛既定目标的轰炸。

这样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肮脏的战争行动，当然立刻引起全世界的舆论哗然。联合国的机器也不得不开动起来，响起了揭露和谴责美国侵略者、战争贩子的声浪。

因为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非常秘密的状态下策划的行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一点几也不知道信息，所以，他还在联合国矢口否认美国的罪责。

但是，不管美国佬如何矢口否认，古巴领导人却坚信不疑，一场美国佬进攻入侵古巴的恶战已经拉开了序幕。

古巴领导人都进入了人不解甲，马不卸鞍的特级战备状态。

1960年4月17日午夜过后凌晨3点15分，在哈瓦那总司令部作战指挥室的地板上和衣而睡的古巴革命军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突然响起来的电话铃声中，接到了美国雇佣军在古巴吉隆滩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和登陆行动的紧急报告。

菲德尔·卡斯特罗，迅速地站到了作战室作战地图的前面。他马上皱了皱眉头，嘴角却难为人所观察到地掠过了一丝微笑。

菲德尔立刻断定，入侵的敌人已经正在踏上一条死路。

事实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战术专家们，经过了相当仔细的斟酌，在仔细权衡过古巴可供雇佣军登陆的所有地点以后，他们觉得各处都是危险的，大部分地区的路径，已经被完全堵死了。唯有这个位处古巴南海岸地区，比较邻近哈瓦那的古巴海湾，也即是俗称中的猪湾地域，是一个好的，可供登陆和建立滩头堡阵地的地方。但是他们忘记了详细地进行调查和摸底儿，他们不知道这一片海湾里，到处布满了乱石，暗礁和珊瑚礁，而且，在前面的海陆相间地带，又是一片人马机械都无法行走的沼泽地，那是著名的萨帕塔沼泽地。

不过，尽管如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奉美国两届总统共同的命令组织指挥的这一场大规模的雇佣军入侵登陆行动，还是大有声势，颇有气势的。

当海面上，在海雾苍茫的夜色中，出现了运送雇佣军的“梭鱼”号、“小海豚”号、“长喙鱼”号、“沙丁鱼”号、“鲨鱼”号、“鲸鱼”号等等大大小小一百多条浩浩荡荡的舰船时，在船队舰队的上空，还飞掠而过十多架护航的美国造B26飞机和佩刀式战斗机。

真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在这些浩浩荡荡的舰船上，装载着“2506”旅近两千多名战斗人员和战斗辅助人员，他们都膘肥体壮，一个个腮帮子鼓鼓的，他们的口袋里的钱包也是鼓鼓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给每一个雇佣军官兵，在登船前又发了一笔大饷，是加了码的。

几个小时前，他们在从尼加拉瓜海湾的卡贝萨斯港出发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以及美国在尼加拉瓜的忠实走狗，其后又一些年后，终于被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军赶下台，赶到美国去的杀人魔王，当时的尼加拉

瓜总统索摩查，还亲自到港口为“2506”旅送行，并且发表讲话说：“谁能把卡斯特罗的胡子拔来一根，我就奖他十万美金！”

有美金支撑着的“2506”旅的雇佣军们，头上有飞机掩护，脚下有铁甲军舰，五千吨级的坦克登陆舰还飞驶在船队的前面，简直也是排山倒海的队伍，简直也能令人惊心动魄，所以，深被鼓动起来的雇佣军士兵，也还真是雄纠纠气昂昂。

只是他们当然也并不整齐，他们到头来仍然还不过是一帮被招兵买马用金钱雇佣来的雇佣兵，全是一些杂牌货色，有的还只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年龄最大的已经六十多岁，腰弯背驼，白发苍苍，老态龙钟，而且，他们中间，除了少数一些骨干分子外，大多数人都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到哪里打仗，有些人甚至完全不知道他们前面要到达投入战斗的地方是古巴。

不过，这些人当然也还是被一些亡命徒骨干分子裹挟着的。

他们终于到达古巴近海的猪湾时，就听从着战斗的号令开始登陆了。

为了这个攻击登陆的时刻的到来，美国的军舰、船只，在古巴东部奥连特省的圣地亚哥海域，巴拉高海岸地区，关塔那摩基地周围，制造挑衅性的佯动，假造集结兵力准备攻击登陆的迹象，在古巴最西端的圣安东尼奥海角，美国兵船在近海游戈，也仿佛要拿出进攻登陆的架势，实行着战术心理的佯攻。

美国佬挖空心思，想着各种办法，给他们的雇佣军创造着最好的攻击和在古巴的领土上登陆的良机。

4月17日凌晨2点30分，第一艘登陆艇在黑色的夜雾中。开进了猪湾的湾沟深处的长滩海滩上，第一批雇佣军开始登上了海边的烂石滩。他们迅速展开散兵线，向着古巴的海岸摸了上去。

从这里登上海岸的，是雇佣军的特别加强营第二营，这是雇佣军的先头部队，是主攻营。

但是，绝非出于偶然，而完全是出于必然。这个雇佣军的先头部队，从下船踏上古巴的海滩还不到二十分钟，前方就传来了“口令”的喝令声，他们马上已经遭遇到了一支在海岸巡逻的古巴民兵队伍，大约是一个民兵排。

雇佣军哪能答上口令，立即开火，于是战斗开始打响，古巴民兵排和入侵的登陆部队展开了坚决的抵抗和激战。

与此同时，雇佣军的第三营，也是一个加强营，第四营，是一个装甲坦克营，开始在猪湾突出部的吉隆滩上登陆，结果也立即遭到了古巴革命军的两个巡逻排的狙击。

古巴革命军的几个排和一个排的古巴民兵，面对着三个加强营潮水般涌来的雇佣军的冲击，没有一个后退和逃遁，全部忘我地投入到了浴血的战斗中去，在他们面前，马上展开了抗击入侵者的弹雨和火海，同时，他们马上把发生战斗的情况，向他们各自的指挥系统，作出紧急的战斗报告。

这样，卡斯特罗在雇佣军登陆的半个多小时以后，在雇佣军和古巴军民展开激战的十几分钟以后，在哈瓦那的最高作战司令部里，展开了应战的指挥。

古巴南海岸猪湾地区的所有守备点和哨所，都开始用短波电台向司令部机关报告他们从各个海域发现的敌情，这使古巴最高作战指挥机关，立刻纵观到了战役的全局全貌。

卡斯特罗立刻开始调兵遣将。

他首先调动起来由切·格瓦拉负责组建训练起来的一个糖厂工人民兵战斗营和也是相当一个战斗营的民兵干部学校，马上投入战斗，因为这两个战斗单位距离前线阵地最近，同时，卡斯特罗迅速调集坦克部队、炮兵部队、防空部队，这都是机械化部队，调动起来可以快速行动。同时，卡斯特罗马上发布命令让古巴革命空军迅速作好战斗准备。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飞行员们，15日轰炸袭击了古巴的所有空军基地，他们邀功请赏，谎报军情，给他们的主子说他们已经完全摧毁了古巴革命空军的战斗飞机。当时，古巴革命空军拥有的全部从巴蒂斯塔政权手里接过来的战斗和轰炸机，总共不过十架，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飞行员们报告他们的上司说，15日一天的空袭中，他们已经击毁了古巴革命空军的28架飞机。实际上，除了两架破旧的飞机在袭击中受到损失以外，已经准备好投入战斗的其他十架飞机，早已分散多处，用高射机枪防卫起来。

所以，古巴革命空军，在“2506”旅雇佣军入侵古巴时，它们完全是摆着严阵以待的架式。

敌人来势汹汹。好大的一场战斗啊。海陆空一起并进，完全是一场现代化的立体战争。

但是，卡斯特罗从容镇定，果决指挥。他命令切·格瓦拉少校和劳尔·卡斯特罗少校，在他们的指挥区域高度警惕和戒备，保证两翼不受敌人侵犯，在猎湾地区消灭入侵雇佣军的战斗，由他来亲自指挥和直接指挥。

4月17日黎明来到了。

雇佣军的伞兵第一营，开始在古巴革命军滩头抵抗战斗各排，包括战斗民兵排的背后降落下来，把古巴革命武装的抵抗部队事实上包夹了起来。但是，这几个古巴革命武装的战斗排，他们仍然像钉子一样钉死在自己的战位上，他们的阵脚仍然绝不纷乱。他们知道最高司令一定会指挥调动战斗力量来支援和加强他们。

卡斯特罗当然是在这样做。

只是，敌机疯狂地袭扰和轰击扫射古巴革命军的增援部队，迟滞着增援部队的迅速挺进。

古巴革命军、民兵战士们，在英勇地挺进中，付出着巨大的牺牲，一个同志又一个同志，挂花负伤，流血牺牲。

但是，这不能动摇革命领袖的革命毅力。为了革命的总体利益。为了祖国的胜利，有的时候，牺牲是必要的，流血也是不可避免的。

前线战士们的流血牺牲，不能动摇卡斯特罗的战略抱负。他在4月17日黎明来到时，他马上命令古巴革命空军的战斗飞机，轰炸机迅速起飞出动。他命令这些战机，不必去迎战敌人的飞机，不必去掩护自己的向前线挺进的战友，首先是扑到最前线上，狠狠地打击敌人，去狠狠地掐断敌人的咽喉。

卡斯特罗不想把敌人打走赶跑拉倒。他是志在完全、彻底、干干净净地歼灭敌人，干干净净地把敌人全部歼灭。

十架古巴革命空军的战斗飞机，不足十名战斗飞机驾驶员，轮番起飞，去投入战斗。子弹打光，炸弹投尽，马上返回基地，让机械师和地勤人员检修飞机，重新装弹，然后再跳上另一架飞机，去重新投入战斗，古巴革命空军的战鹰们，真是忘我牺牲，英勇无比。

从17日6点30分开始，古巴空军的飞机，奉卡斯特罗之令，主要打击目标集中在敌人的舰船上，首先击沉敌人的两艘近海登陆艇，接着马上击沉

一艘五千吨级的的坦克登陆舰，紧接着又集中打击另一艘五千吨级的浑名“长啄鱼”的大型舰船，这个舰船装载着雇佣军预备机动的第五营的兵员，军舰被一支火箭击中，立刻爆炸沉入海底，满船的兵员都成了鱼虾的食物，后来有一部分游到了岸上，充当了古巴军民的俘虏。紧接着，古巴革命空军奉命继续攻击敌人舰船，一连又是六艘舰船被击沉，从6点30分开始，到12点20分，古巴空军在不到六个小时之内，击沉整整十艘数万吨位的雇佣军舰船。卡斯特罗就是要关起门来打狗，让来犯的敌人统统有来无回。

敌人的舰船一艘接一艘地被击沉，这对海滩上作战的雇佣军心理的压力比炮火的压力似乎还要严重，他们的退路已经被切断，逃是无路好逃了。

有趣的是，古巴革命空军，集中力量攻击敌人舰船，一艘一艘地击沉敌人的舰船，他们一般在最初的阶段不迎击，也不迫击雇佣军的飞机，但是，雇佣军的飞机，眼睁睁的在天空高处，看着古巴革命军的飞机炸沉一艘又一艘舰船，不知怎么竟被古巴空军的神威吓得丧魂落魄，在天空里，一旦遭迂古巴空军的飞机，马上便掉转屁股逃蹿，而古巴空军的飞机绝不放过战机，马上搂草打兔子，趁势追歼敌机，结果，第一天，即4月17日一天整天打下来，古巴空军飞机不仅击沉雇佣军的十艘舰船，而且还打掉了雇佣军的四架B26飞机。

古巴空军也损失了两架飞机。

其中一架飞机是起落架发生了故障，在返回基地时，打不开起落架，只好又重上蓝天，待汽油用尽，英雄的驾驶员为了避免飞机爆炸给机场，给古巴祖国的土地带来损伤，他把飞机驾到深海之上空，在那里让飞机爆炸，而自己以身殉国。

入侵古巴海滩的美国雇佣军，天上的飞机，海上的舰船，被打得一塌糊涂，落花流水，陆上的兵员，已经爬到了海滩上的二、三、四、六营，以及重炮营和坦克加强连，都被控制在难以进展的沼泽地上，空投到海岸上的第一营，也迅速被疾速赶来的古巴民兵营和民兵干部学校的指战员们把他们分割开来，一块一块地挤压和吃掉。

古巴两个民兵营的兵力和古巴革命军的几个独立的战斗排，在顽强地狙击，抵抗雇佣军的优势兵力数小时以后，古巴革命军的四个野战营、四个溜弹炮连、一个120迫击炮连、八个高射机枪防空连、驰援进入了主阵地，雇佣军的攻势迅速失去了优势和主动能力。

到了4月18日，古巴革命军调集来了更加优势的兵力，又投入五个野战营、一个坦克营、两个坦克连、十一个溜弹炮连、一个迫击炮连、八个防空连，还有一个内务部队营。战役对阵的优势，完全转入到了古巴革命军方面。

在17日雇佣军最初进入的长滩、吉隆滩、卡约、拉蒙纳、圣布拉斯四个登陆点，现在都沉沦在了古巴革命军的重兵包围之中。

但是，雇佣军凭着他们中间的一些骨干分子，他们操纵着十分先进的M-41坦克和薛尔曼坦克，和数十辆装甲车，他们操纵着80多支火箭筒，十多门重型迫击炮、十多门无后座力的反坦克炮，还有各种各样的机关枪。他们负隅进行着顽抗。他们并不甘心一败涂地，束手就擒，不到最后灭亡之时，他们还是要垂死挣扎的。

怎么办呢？打狗不能手软。古巴革命军的优势兵力集中起来以后，卡斯特罗就下令：所有的溜弹炮连，所有的迫击炮连不停顿、不间断地轰击敌人，一刻也不让敌人喘息，即使到了夜间，也不停炮击，不容敌人有一刻松懈休

息的时间。同时，在长滩和吉隆滩两处，古巴革命军的坦克部队排成铁壁，向雇佣军的阵地轰击推进。雇佣军完全被压爬蛋了。他们开始紧缩阵地。他们有的部分，已经开始投降。在行将形成歼灭战格局的时候，卡斯特罗非常及时地把切格瓦拉少校从比那尔德里奥省前线，迅速调回到吉隆滩战斗前线这边来，担任了猪湾战役的前线总指挥，协调和统帅现在在这里越来越多的集结起来的古巴革命部队，包括所有的野战营、炮兵部队、坦克部队、防空军，以及所有民兵部队。

切·格瓦拉来到前线后，他坚决执行菲德尔·卡斯特的命令，集中一切火力，坚决压制敌人，战役目标是速决。同时，切·格瓦拉马上组织人员，开展对入侵雇佣军的政治瓦解工作，对所有的雇佣军投降官兵俘虏，一律实行优待，保全他们的性命，对他们也实行救死扶伤，不打不骂，不搜他们的个人财产腰包，不对他们进行人格侮辱。

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在围剿革命起义军的政府军中，曾经流传很广过一句相当响亮流传的几乎每个政府军官兵都皆知的话，叫作“切说不杀俘虏！”

切说不杀俘虏。就是指切·格瓦拉说过：“起义军不杀俘虏。”

起义军在马埃斯特腊山区作战的年份，就是在开始势力很弱的时候，也坚决执行这样的俘虏政策。在切·格瓦拉指挥的第一次赢得胜利的战斗，袭击一个敌军哨所，击毙两名抵抗的敌人生俘三名缴械投降的敌军军士兵后，格瓦拉亲自给他们训了话，给他们吃了一顿饭，然后就释放了他们，并且告诉他们，如果在释放走出山地丛林的途中，如果再被别的游击小组生俘的话，可以对他们讲，他们是被切·格瓦拉释放的战俘，并且还可以强调告诉再次生俘他们的游击组，就说“切说不杀俘虏”！

“切说不杀俘虏”，后来在政府军中流传。在起义军中，菲德尔也就把这句话作为起义军的一项既定政策，进一步明确下来。

古巴起义一向的政策是，除了枪毙奸细和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外，对俘虏官兵，是实行着完全的宽大政策的。

这个政策，现在在吉隆滩上，在猪湾战役中，继续被强调坚决执行。

于是，从4月18日夜开始，被包围的雇佣军开始一批一批地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充当了古巴革命军的俘虏。许多从海里爬上岸来的雇佣军，一不打，二不逃，纷纷自动前来，争当古巴革命军的俘虏。

从17日凌晨2点30分开始的这场美国雇佣军入侵登陆的战役。打到第三天也就是19日的时候，雇佣军更完全处在了被压倒的态势中。古巴革命军越战越勇。雇佣军的全部剩余船只，都远离战场，跑到了三十海里之外的深海之处。但是，雇佣军还有飞机，来继续侵扰和袭击。

在4月17日，古巴革命空军击落四架雇佣军B26飞机，古巴防空连击落一架雇佣军飞机，包括在4月15日雇佣军飞机在袭击圣地亚哥和圣安东尼奥两处古巴机场时被古巴防空部队打伤打落的，在整个战役期间，他们已经损失了七、八架飞机；到了4月19日这天，雇佣军能飞到古巴上空来的，也只能是五架飞机了。

在已经过去的17日、18日两天，从美国本土佛罗里达州奥帕洛卡飞机场起飞的，纯粹的美佩刀式战斗机，直接飞来参战，支援雇佣军，这种适合超低空飞行的美国战斗机，飞得很高，从高空远距离对古巴革命军的增援部队进行扫射和拦击，但是，到了4月19日，这种纯粹的美国作战飞机不敢飞来了，因为古巴革命军已经有八个防空连进入前线战地，而且，还配置了八

门独立的防空火器，在游动追逐轰击入侵敌机。

地面上，古巴各武装部队，越战越勇，天空里，古巴革命空军也越来越拥有锐不可挡之势。进入 19 日以后，古巴空军在了无伤亡的情况下，又击落两架轰炸革命军阵地的雇佣军 B26 飞机，古巴防空军，同时击落另两架入侵飞机，最后一架雇佣军飞机的驾驶员，不知是魂飞魄散完全吓慌了神，还是怎么的，驾着武器弹药都还齐备的一架 B26 飞机，降落在了一个古巴的飞机着陆场，干脆跳出机仓也举手投降了。

不过，尽管如此，登陆的残余的雇佣军份子，现在留下来大多是死硬的骨干分子，到了 19 日黄昏的时候，他们从几公里，十几公里以外的几个支撑点上，收缩集中到吉隆滩这边来，这里还拥有着重炮营的一部分武器装备和战斗人员、还有数辆主战坦克和机关枪装甲车，还有数百名雇佣军，主要是一些雇佣军的骨干和头目了。

他们想组织撤退和逃跑了。

古巴革命军以数倍的兵力，配置着坦克大炮，在他们的退路上进行着阻截，是绝不肯再把他们放走的。

雇佣军终于又调来了一艘装甲运兵船，在 19 日下午 3 点半的时候，几百名雇佣军企图登船逃跑。古巴空军的神威再次展现，它们和古巴陆军的加农炮配合，迅速又击沉了这艘装甲运兵船。

余下的雇佣军，仍然缩在吉隆滩最后的阵地上，他们想顽抗到黑夜到来的时候，然后，再呼来他们早已逃逸远去的运兵船，把他们接送出去。

龟缩在吉隆滩滩头阵地上的雇佣军头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顾问，现在气极败坏，歇斯底里地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发出请求支援，请求救援的呼叫。

美国装备雇佣军的电讯器材也真好，在三天的战斗中，雇佣军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没有一刻钟，不保持着灵通的电讯联系，整个猪湾战役这里发生的一切情况，都非常及时地反映到了雇佣军作战的最高司令机关美国中央情报局。

艾伦·托勒斯局长，计划处长理查德·比斯尔以及他们从美军三军各自的参谋总部聘请调集来的顾问、专家，诸多的上校和将军们，一直也在密切地关注着猪湾战役的每一个细节，直接指挥着那里的每一处战斗，指挥着雇佣军的战斗营、空军和海上的舰队兵船。

雇佣军 4 月 17 日入侵登陆的第一天，就开始受到完全意想不到的强有力的抵抗和阻击，使整个雇佣军 2506 旅，已经蒙受巨大灾难性损失，处在了完全被动的状态下，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境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眼看是在面临着了一场巨大的危机和失败，杜勒斯首先十分不安地狂燥起来，他马上命令他的下属比斯尔：

“解铃还需系铃人！比斯尔先生，一切都是你摘的。你现在也要对一切负责。你必须马上去向肯尼迪总统报告所出现的严重局势，你要向他请求采取更果断的应急行动，不惜采取美国军事人员直接插手的选择。”

奉着杜勒斯的指示，比斯尔匆匆忙忙来到美国总统府。

此时，美国总统正在进行着一个快乐交际的时刻。他正在白宫的宴会厅里，穿着讲究高雅的夜礼服，在盛情地与他的爱妻杰基一起，招待着美国的国会议员们。美国总统是很需要国会议员们的捧场和支持的。

而就在这样一个愉快而绝不能失礼的时刻，比斯尔匆匆地赶来。通过肯

尼迪的特别助理，向肯尼迪通报紧急军情要务，坚决要求紧急接见。

没有办法，肯尼迪只好匆匆结束晚宴。拉着长长的，极不高兴的脸条子，来到白宫办公室，接见比斯尔，听他汇报有关猪湾入侵之战的情况。

比斯尔把局势描述的既悲惨，又严重。他心情沉重而沉痛极了，但他的描述，还是绝对客观和冷静的。

他作完客观，冷静的局势报告之后，他提出了坚定的要求。要求肯尼迪总统立即发布命令，命令停泊在离猪湾战场只距 50 海里之外的美国的“博克塞”航空母舰，不再作为威慑力量，而是作为战斗力量，开始参加猪湾的战役行动，首先从“博克塞”航空母舰上出动战斗飞机、对入侵古巴的雇佣军实行火力支援。

肯尼迪总统尽管很不高兴听比斯尔的报告和汇报，但他还是极为冷静和专注地听了。

并且，他当然也马上认识到了猪湾局势的严重性，立刻开始联想到了由此而引发的严重后果。

他非常地不安起来。

但是，当比斯尔向他提出坚定的要求，要求美国下决心进行正面的军事卷入时，肯尼迪总统更为不安了起来。

关于派遣雇佣军进攻古巴入侵登陆的行动计划，在肯尼迪总统考虑到这是前总统，可尊敬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一笔非常热衷的遗产，因此终于迅速批准执行后，他的总统特别顾问施莱辛格，在公开反对过一番这项计划之后，又向总统呈交了一份备忘录。再次陈述他的反对意见。

善于兼听的肯尼迪总统，又冷静地考虑施莱辛格的意见，他认识到了施莱辛格的意见，似乎包含着更为深远的战略目光。这就是，在时代已经进入到二十世纪的这样一个时期，美国应该回避把自己打扮成强盗和匪霸的角色，因为强盗和匪霸的行径，在当今的世界上，已经很难行得通了。如果美国太多的一意孤行，他势必就会成为一个世界大家庭中的最丑恶的公敌。它就会被沉没在世界大家庭的一片指责、唾骂声中，被仇恨和愤怒包围，从而被人见人弃，被全世界所摒弃，美国将完全得不到被人尊敬和产生影响的地位，美国将会非常令人痛恨和讨厌地孤立起来。那样，美国就势必将进入最黑暗的悲剧时期了。

为了不让这样的时期迅速来到。美国必须抛弃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执行的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制定的“冷战”政策，对这样的政策，必须进行战略性的转变，美国必须改变自己的恶魔和战神的形象，应该也具有佛爷喇嘛和和平鸽的面孔才好。从而，不仅用战争的手段，同时也用和平的手段，来控制世界。

肯尼迪总统聪明之处在于，他能选择适从高明的主意和思想。实际上，施莱辛格的这样的战略远见和战略思想，也是很吻合肯尼迪总统的思维过程的。肯尼迪总统所以能够如此聪明，也许是因为他有更为开放的人格素质和更高的文化水平。

看到施莱辛格在他批准执行中央情报局的入侵计划之后又送上来的备忘录，肯尼迪总统又深入地对那一项已经批准执行的计划进行了一番重新审视。他开始发现了一些在批准执行那项计划时的问题。最起码的一条，他认识到了，最少在形式上，他犯了一个迷信和盲从的错误。他认识到了自己出于对艾森豪威尔的迷信，盲从了这位老总统、老将军拟定下来的准备执行的

计划。肯尼迪认为自己还是应该仔细地审视和思量一番，再决定这项计划的执行与否，而不应该草率地盲从。

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他进而对已经批准执行的这项入侵古巴的行动计划的战略目标，开始产生了怀疑，他在脑海深处，开始产生着一些推理：这样公开半公开的招募、训练、指挥和派遣一支强大的雇佣军，去入侵颠覆一个革命的国家，美国可以最终卷入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可以卷入到一个什么样的上限高度，如果突破了那个上限高度，美国赤裸裸地露骨卷入起来，美国的战略形象，不又会无可聊赖地回到了战魔、匪霸、强盗的角色面目上来了吗？这不就完全破坏了美国新总统准备实行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步骤了吗？

而如此，在肯尼迪看来，对采取更高一筹的战略企图，显然是不可取的。他将绝不那样施为。

所以，肯尼迪总统在批准中央情报局执行那样一个雇佣军入侵计划后，他立刻同时拥有了一个控制这一计划实行的想法。他将计划的推行，完全控制在这个准备执行的计划范围之内，他将不容这个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大程度地突破范围。正好相反，事实上他还在这个计划投入实施的开始阶段，他就规定缩小了这个计划实施的范围和它所投放的力度。

肯尼迪的这样决策。是出于长远的战略目标的需要，应该说，从历史的观点看，他是高明一筹，他是英明的。他是正确的。然而，这样一来，比斯尔就只能碰一鼻子灰了。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比斯尔之流，坚决请求肯尼迪总统批准进行美国的直接军事卷入时，肯尼迪总统不仅坚决严加拒绝。他还请来了国务卿腊斯克，给比斯尔上课，陈述美国不能进行军事卷入之理。

只是在后来，比斯尔和支持比斯尔的几位美国将军潸然泪下，庸哭起来以后，肯尼迪总统才作出了一个略让一步的决定，美国的军事卷入，将只局限命令从“博克塞”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美军战斗机，在入侵古巴“2506”旅的残余败将，在登船撤出古巴领海进入公海以后，开始对他们进行公开的保护，后来，又作出的进一步让步是肯尼迪总统还答应在古巴的雇佣军登陆部队，最后彻退登船之时，美国海军的飞机，可以进行为时仅限一个小时的空中掩护。但肯尼迪同时则又命令这些执行掩护任务的美国飞机，不得和古巴空军的飞机进行空中交战。

这样，从美国那边，事实上就切断了对中央情报局指挥的入侵古巴雇佣军作战旅的全力的保障和支援。“2506”旅，也就只好仅以它的六个战斗营外加一个重炮营和一个坦克加强连的兵力，坚持进行嗣后又近两天两夜的艰难苦战。它们的头顶上，始终面临着古巴革命武装的急风暴雨般的打击。

最后，到了3月19日，他们终于再也顶不住了。下午3点钟呼叫来的撤兵船，被炸沉之后，最后的死硬的雇佣军骨干想挨到黑夜的到来。但是，到了19日下午6点差十分钟的时候，卡斯特罗命令古巴空军投放五千磅炸弹来轰炸雇佣军的最后的滩头顽抗点，古巴革命军民不容这些入侵的雇佣军再挨到19日的夜里了。于是，轰炸过后，所有包围上来的古巴野战营，开始对最后的雇佣军阵地发起最后的冲击。

切·格与瓦拉少校指挥着这场决战的冲击。

他穿着普通的军装，穿着一双轻便的高腰球鞋，大约是为了在沼泽地上不致被陷住脚，他也握着一支冲锋枪，和冲锋部队的其他军官和战士们一起

冲击。

最后的敌堡被冲垮了。

最后的敌人完全溃散开来，他们纷纷逃散进他们身后的一片灌木丛林。

切·格瓦拉指挥冲决部队形成包围网，像梳篦一样，在灌木丛林里，像老鹰逮小鸡似的，一个一个活捉逃散的敌兵，俘虏每一个残敌。

时至4月19日夜零点来到之前，整个吉隆滩地区，再也听不到一声枪响和炮声，战斗沉寂了下来，战役已经全部结束了。

雇佣军被击毙多少？因为有一个营葬身大海鱼腹，还有其他一些战斗人员在其他舰船上被炸沉时淹死了，所以，最后统计不出准确的死亡数字来。

但是，生俘的雇佣战俘，都是活生生的，都是精精壮壮、白白胖胖或黑黑胖胖的，雇佣军中，有不少白人，也有不少是黑人。

被生俘的雇佣军战俘，后来的数字达到了一千二百之多。

被古巴革命武装在三天的战斗中所缴获的雇佣军的武器装备简直堆成了山，马上被数百辆运货车，拉载到哈瓦那的革命广场上进行展览，在那里立刻摆开了那么多美国造的精良武器。那些武器真好，火箭筒、自动推进炮、迫击炮和各种各样的机关枪、重机关枪，还有完整的新式坦克，薛尔曼坦克和装甲运兵车，装甲机关炮车，真是十全十美，应有尽有，简直叫人羡慕不已。

只不过是，用这么多，这么好的精良的武器装备起来的号称“2506”旅的美国雇佣军，除了逃到三十海里之外的几条舰船逃脱之时，全军在不到七十二个小时之内，被卡斯特罗指挥的古巴革命军民，直打得落花流水，屈滚尿流，统统地被消灭了。

一千二百多名雇佣军战俘，被关到了一个巨大的，进行足球比赛的体育场内。给他们面包吃，只是有的面包是玉米面包，虽然别有滋味，且并不如美国的白麦面包好吃，不过绝不会让他们饿着。此外，给他们足量的水喝。古巴人甚至还供给他们雪茄和砂糖，只是不给他们太多的肉罐头和酒类。

古巴革命军有不杀俘虏，释放俘虏的政策。

古巴一个不杀俘虏，伤残者全部给予救护和治疗。

但是，他们是雇佣军，他们虽然绝大多数是古巴人，但是也有一些别的国籍的人，其中有不少美国籍的黑人。

古巴能怎么释放他们呢？

他们许多人是从国外雇来的。

现在把他们释放在古巴国内，不是把一些虱子、臭虫和跳蚤洒向古巴的社会吗？古巴释放这些战俘，只能释放给曾经雇佣支使他们的主人。

只能是释放给美国中央情报局。

当然，美国中央情报局，包括诸多的美国人士，马上开始呼吁释放这些美国雇佣军战俘。在这一点上，肯尼迪总统也成了积极的呼吁者。

古巴呢？古巴事实上很想马上释放这些雇佣军战俘。这是多少张无用的嘴啊！即使是玉米面包，一天也要吃掉多少古巴人的血汗。古巴人并不高兴长时间的白养活他们。

古巴迅速地答应要释放这些雇佣军战俘。但是，古巴提出了正当的战争赔偿要求。

美国人如此无耻地把一场大规模派遣雇佣军的战争强加在古巴国家和人民头上，他们飞机轰炸、袭击、火炮枪弹杀伤，给古巴国家和人民，造成了

多么巨大损失呢？

他们炸毁了古巴的奥大利亚糖厂，被他们空军袭击的目标有四十多处，他们炸毁了许多学校和居民的房子，他们破坏了古巴革命军民用义务劳动坚韧地建设起来的长滩、吉隆滩、多宝湖旅游中心的游览设施。他们的轰炸和入侵，杀害了许许多多无辜的古巴平民，主要是老人，母亲和孩子。因为年轻人都去战斗去了，老人、母亲和孩子就成了美国雇佣军杀害的主要对象。

在从4月17日到4月19日进行的反抗入侵战斗中，人们还使保卫自己祖国人民的古巴革命武装的八十七名龙腾虎跃的军官和战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使二百五十多人身负了战伤。

这是美国佬欠下古巴的血债。

这是美国雇佣军欠下古巴的血债。

这样的血债，不还怎么行呢？

这样的血债是应该讨还的。

但是，革命的古巴人民知道美帝国主义，不仅有最无耻的面目，它还有最无赖的心肠。他们会抵赖他们的一切不义和罪恶，他们全死也不会认账，绝不会对被他们欺辱蹂躏的古巴人民，哪怕是给予一些儿陪礼道歉、战争赔偿呢，作为强盗和匪霸的美帝国主义，什么时候会办出这样有仁有义的事情来呢？

根本是不会的。

于是，绝不忍辱受欺的古巴革命人民就向美帝国主义提出了这样的条件：

你们要求释放你们被俘的雇佣军官兵吗？

可以，请拿些农业机械来。可以拿拖拉机来换，一辆拖拉机换回一个雇佣军俘虏，美国人拿那么多钱，能买那么多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运兵船。武装穷凶极恶的雇佣军，怎么就舍不得拿一辆拖拉机来换一个雇佣军被俘人员呢？美国不是有的是钱，有的是钢铁吗？美国能不能再有一些正义感和道义心呢？

古巴的这个要求，其实是很实际，也很合理的。

但是，在美帝国主义看来，古巴真是“欺人太甚”，也太想难为美国，太想让美国佬丢面子了。

虽然美国佬后来不是通过政府的形式，而是转弯抹角，通过民间团体的形式，搞了一番集资、募捐，凑集足了钱财。总还是按照古巴的要求，基本上是按照一辆拖拉机换回一名雇佣军的比价，换回去了全部被生俘的雇佣军。这已是在其后晚一些时候的事了。

而在当时，当猪湾入侵，美国雇佣军惨败，在全世界各地到处成为传媒的头条可耻丑闻之初，火冒九丈，气极败坏的肯尼迪总统，首先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大头目艾伦·杠勒斯叫到他的办公室。四十二岁的总统，对这位已经年近七十岁的情报局长，总统的下属，完全像是训斥孙子一样狗血喷头训了个臭够。高个子的漂漂亮亮的老头儿，耷拉着肩膀，立时矮了半截，灰红胡须下的嘴巴歪了，把一张长条脸也扭歪了起来。

肯尼迪骂烦了以后，让杜勒斯回中央情局的办公大楼时，他竟腿脚发麻，浑身颤抖，长时间下不了轿车。他一辈子于手上干过许多得手的堂皇事儿，但是这一回却于出了完全砸锅的事，儿给他的全部生活里程最后划上了一个令他永远沮丧和悲哀的句最可笑的，是那个中央情报局的计划处长理查德·比

斯尔。

这东西一直亲自制定和负责执行派遣雇佣军入侵古巴试图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计划。现在，一场可悲的猪湾入侵，十分可悲而可耻地失败了。作为这项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人，他是罪责当头的。

可是，这家伙官迷心窍，完全不识时务，他听说了杜勒斯已经即将被赶下台，他想到了肯尼迪对他有过的许诺，因此，他又跑到肯尼迪总统那里跑官，还想讨来总统对他局长的任命。可是，肯尼迪总统仰坐在长沙发上，高翘着二郎腿，一手端着咖啡杯喝咖啡，一手扶着沙发面儿，冷淡而高傲地做视着他说：“你干出了这么大的蠢事儿，就是总统干了，也该辞职。你还当什么局长，情报局的要害处处长之职，你也不能干了。不过，以后，你也还是我的私人的朋友，我们还可以找机会去喝一杯！”

紧接着，杜勒斯下台。比斯尔下台。肯尼迪总统派遣他的亲兄弟，美国政府的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坐阵美国中央情报局，对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了一番很大的改组和彻底的清洗。

不过，不管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兄弟罗伯特·肯尼迪对中央情报局如何进行一番清洗，美国在指挥派遣雇佣军入侵古巴猪湾所造成的惨剧，所带给美国的十分深刻而沉重的耻辱，却是怎么也清洗不掉，洗涮不净的。

崭新的命题

现在，话题可以再回到 1965 年的 2 月间。在埃及的首都。在开罗，两位亲密的朋友，两位伟大杰出的人物，纳赛尔和格瓦拉进行着时而亲切如兄弟，时而严肃如战友的这个对话的室内来了。

切·格瓦拉差不多又是从头到尾，当然，语言是简洁的，他向纳赛尔总统再一次介绍和解说了一番古巴革命军民，在卡斯特罗领导下，1961 年 4 月间，在吉巴猪湾的反击美国雇佣军的战斗中，所赢得的完全彻底胜利的经过。

纳赛尔总统早已悉知了那场反击战胜利经过的全部情况和细节。但是，他今天再听切·格瓦拉讲，仍然极为饶有兴趣。同时，他知道切·格瓦拉为什么给他又讲起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因此，纳赛尔总统在悉听切·格瓦拉讲述时，也在脑海里展开了深刻的沉思。

纳赛尔自然也联想到了埃及在 1956 年收归苏伊士运河时所经历的斗争，和后来的抗击英、法联军以及抗击以色列入侵所进行的战争。当时，埃及人民站在正义的方面，但是却也是站在弱的方面，柔弱的与强大的敌人不可匹敌，那确实形同是羊和狼展开了一场斗争，很像切·格瓦拉类比古巴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沙丁鱼对大鲨鱼的斗争一样。

不过，在这样的斗争中，却竟然就出现了这样的世界奇观，出现了这样的奇妙现象：在古巴沙丁鱼和美国大鲨鱼的斗争中，沙丁鱼战胜了大鲨鱼，古巴战胜了美国，猪湾战争就是证明，就是最好的证明。

同样，埃及和世界老牌帝国主义英、法联军以及以色列的斗争，不也真是羊和狼的一场恶战吗？有谁敢想象羊和狼会进行一场斗争，而且是进行一场结果是羊的胜利的斗争呢？几乎是没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想象力的。但竟有埃及人如此大胆地想象了。埃及人伸出了自己的羊犄角，向着英、法帝国主义及以色列恶狼直冲过去，竟然也豁开了英、法帝国主义的肚子，让以色列在埃及面前收敛起了它的狼子野心。埃及人民这样的胜利，不同样是可以证明一些什么吗？

古巴和埃及人民的斗争和胜利，能够足以证明：只要不屈的革命人民勇于斗争，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敢于一往无前的斗争和敢于主要靠自己的力量赢得胜利，貌似强大，不可一世似乎不可匹敌的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几乎是决没有被攻不破的。帝国主义统治压迫世界人民的链条是决没有冲不破的。

切·格瓦拉给纳赛尔总统讲着猪湾反击战的胜利，使纳赛尔总统开始与他共鸣着了对同一问题的思考。纳赛尔总统完全明白了切·格瓦拉为什么想去刚果看一看去的意志和心思。

纳赛尔总统完全明白了古巴革命领导核心成员们所考虑问题的现实意义，迫切意义和重要意义。

埃及人民，古巴人民，在坚决的战斗和斗争中，打破了帝国主义不可被冲决和战胜的神话。

而今天，在刚果，在那里，帝国主义却似乎又在创造着不可被匹敌，不可被战胜的神话，因此他们仍然可以为所欲为，横行于世，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可以肆意恣为而也还算是奋勇不屈的进行斗争中的刚果人民，却总是不能非常成功而有效地打破这样的神话，战胜这样的神话。反而，总是被这样的神话所无情的席卷，这中间的问题出在哪里，这里的症结出现在哪里

呢？

也许，正是为了弄清楚这样的问题所在，古巴的领导人们，才派遣自告奋勇前往刚果考察的切·格瓦拉，一定要奔赴到刚果去吧？

他到那里去考察。

当然，他到了那里，自然就同时会强有力的帮助那里的刚果人民的。

不过，纳赛尔总统已经想到了对任何一个革命的国家来说，赢得伟大的胜利、赢得决定性的胜利，最主要，最根本的关键在何处呢？

纳赛尔已经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真理的真蒂，这就是，不论在哪个国家，那里的人民，如果期想在斗争中赢得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的话，永远只能是：第一靠自己的力量，包括靠自己的斗争意志，斗争决心，斗争毅力，自己的斗争思想和战略。永远首先靠自己的聪明的脑袋，而这样的聪明的脑袋，永远不能产生那样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别人的帮忙和救助。世界上可能有许多好心人，可以成为你的兄弟和朋友，但是，他们谁也不能替你主宰你自己的命运，在你跌倒的时候，他们可以拉你一把，让你重新站起，但是他们永远不能代替你走路。在你过河的时候。如果你被淹，他们也可以救助你一把，拉你上岸，却不会代替你游泳。这完全可以类同一个革命的国家，如果它想赢得独立，生存下去，赢得胜利，他也只能是自己靠自己国家的人民，这是最首要的，也是最主要的，如果把期望寄托在别的国家的帮助上，甚至是寄托在联合国的帮助上，那么，刚果不就是一个最实际的例子吗？

当然，这中间存着许多深刻的哲学学问，有着许多深刻的复杂性，有一些方面确实是需要深刻观察，深刻实践，深入来研究的。

想到所有这些以后，纳赛尔总统就不再十分劝阻切·格瓦拉冒险到刚果去了。

纳赛尔总统后来甚至向切·格瓦拉说：

“切，你想怎么走呢？从埃及直接过去吗？如果你想这样走的话，我可以派出一营埃及武装力量来护送你。在卢蒙巴活着的时候，我们曾经组织过埃及志愿军到刚果去，我们有熟悉刚果地理民情的部队。”

切·格瓦拉说：

“不能这样。尊敬的纳赛尔总统，埃及现在承担世界革命重任的分量已经不轻，你们正领导着整个阿拉伯世界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巨大斗争，为世界人民已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古巴革命为着学习埃及的榜样，我们可以凭借我们自己可能的力量，去作一些必要和可能的新工作。”

纳赛尔总统仍然关切地询问切·格瓦拉：“那你准备怎么走呢？你要到非洲的心脏去，你要到刚果去，埃及无论如何可以是你的后方。”

切格瓦拉说：

“出发去刚果的路线和途径，我准备在访问坦桑尼亚时再考虑和确定下来。在达累斯萨拉姆，刚果爱国武装的办事处已经和古巴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建立了联系。在我访问贵国期间，我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里巴尔塔同志，也作为我国驻开罗大使馆的客人，目前正在开罗。他给我已经介绍了刚果爱国武装力量驻达累斯萨拉姆的代表和我国使馆接触的情况，他们向古巴提出了十分恳切的援助和帮助的期望，是根本不能拒绝的。好啦！我还差一点儿忘了！”

切·格瓦拉和纳赛尔总统把话谈到这里时，他忽然似乎是一下跳了起来，喜气洋洋地对纳赛尔总统说：

“真的，尊敬的纳赛尔总统，我真的差点儿忘了，忘了我该送给您的两件礼品。您知道吧，我国驻坦桑尼亚共和国大使里巴尔塔同志，在参加古巴革命前，是制造雪茄烟工厂的工艺师傅，有一手很好的卷烟手艺。他后来当了古巴革命军的指挥员，现在当了外交官、大使，但是，总还不丢他的手艺，随身总带着制雪茄的工具和原料。昨天晚上，我在会见他时，一边和他谈话，一边不让他手闲着，请他给纳赛尔总统，特意卷出来两支最棒的雪茄烟，烟质是最好的，工艺也是最棒的！”

说着，切·格瓦拉简直高兴的变成了一个孩子似的，从他随身的手提箱里，拿出了两支黑油油闪亮，卷得十分有模有样的雪茄烟来，把它立刻像珍宝一般地送给了纳赛尔总统。

纳赛尔总统欣喜非常，他高兴地接过两支雪茄烟来，他马上高兴地点燃起一支来，插在了自己的嘴上，高高兴兴地喷吐起雪茄烟的香气来。纳赛尔笑了。他对切·格瓦拉说：

埃及医生已经向我发出了禁止我吸烟的命令，主要目标是要保护我的心脏。不过，我已经向这位医师先生提出了请求，请求他同意我等切·格瓦拉此次访问过埃及后，再容我戒烟，因为我向卡斯特罗总理要过雪茄烟。因此，我相信切·格瓦拉这次来开罗，也是一定能带给我两支最好的雪茄烟的。果然，我的估计一点儿也没有错，现在完全应验了！我在抽完这两支雪茄烟后，就正式戒烟不再抽烟了。但我要让古巴兄弟战友们的烟火味儿，永远保留在我的胸腔里，保留在我的心里边。”

纳赛尔总统难得地流露着一种真挚的深情。

切·格瓦拉听着，眼角里仿佛已经涌出了在闪光的泪水。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雪白的蝴蝶花

早晨。

塞莉亚，桑切斯从床上醒来后，她干的第一件事，是翻过床头柜上的日历卡。

今天是 1965 年 3 月 15 日了。

今天的要事有些什么？她一般都记载在个这日历卡上。

今天的日历卡上，已经记载着的第一条备忘录是：送切——阿莱达一束蝴蝶花。

蝴蝶花，是古巴的国花。

蝴蝶花有三个白色的花瓣儿，花心包是一束黄色的花蕊，花瓣和花蕊之间，还有两条飘柔的花瓣，盛开之时，宛若一片翩飞的蝴蝶。

在古巴各地，遍地都有蝴蝶花，它的花期往往长达半年之久，生命力极强，很相似古巴人民纯洁、坚强、柔韧的性格，因此，许久以来，蝴蝶花一直被定为古巴的国花。

塞莉亚·桑切斯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大学上学时的同学。他比卡斯特罗年长五岁。从卡斯特罗最初领导古巴全国的大学生展开革命活动时，她就是卡斯特罗积极而坚定忠诚的支持者，也是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组织“七·二六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1955 年卡斯特罗前往墨西哥准备发动古巴武装斗争的时期，塞莉亚·桑切斯留在古巴国内，保持着和卡斯特罗密切的联系，坚持着国内的地下斗争。

1958 年年初，当卡斯特罗领导的武装斗争在马埃斯特猎山区初步展开的时候，塞莉亚·桑切斯也便进入山区，参加武装斗争，成为女游击队员，同时，担任着革命领导核心的政治秘书。她的字写的特别漂亮，而且写起来又快又工整，当时革命领导核心的重要文书和文件，都是由她来起草和书写的。作为女游击队员，她在转战行军，拿起枪来投入战斗的时候，从来不让须眉，也是非常勇敢而善战的，因此，在文、武两个方面，她很快成为了革命起义军中的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

不过，毕竟她还是女人。

虽然她脸盘儿远算不上十分漂亮，当然她也绝不是个丑女人。她的体态也不能算苗条，只能算是一个不算太矮，也不算太胖的女人吧，不过，倒是颇有一番老大姐的风度，热情而亲切、诚挚，似乎叫任何人都能从她身上感到温馨，而且也能从她身上感到美。

作为女人，她也当然爱美。她也挺喜欢打扮自己，不过，战地生活，在游击战争的状态下，涂脂抹粉，装点红唇，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爱美的女人总还是有办法装扮自己的。

塞莉亚·桑切斯，有的时候，就摘取一支蝴蝶花，偏插在自己的鬓发上，好像在她乌黑的鬓发间，正好刚刚飞落下了一只雪洁的白蝴蝶，这一点儿装饰，简直叫一个女人一时美极了，简直美的叫人不知该怎么说。

起义军的指挥员和战士们，不乏美的灵感，所以，就给塞莉亚·桑切斯送一个令人心醉的称号，把她叫作“革命之花”。

古巴革命胜利后，塞莉亚·桑切斯一直担任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治秘书和事实上的办公室主任，她同时负责照顾着卡斯特罗的生活，他们肯定有不朽的友谊和最深挚的爱情。但是他们也许实在抽不出哪怕是任何一点儿多余的时间，去处理结婚登记之类的事务，也不想花一些时间来答对朋友们

的祝贺和应酬，何苦呢！最主要的不是夫妻生活，而是作为战友和同志为之共同奋斗的事业。有朋友的亲情就够了。朋友的亲情可以是无私的。作为朋友，可以作出无需朋友承担任何义务的无私奉献给朋友，并不需要任何回报。但是，如果是另外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结构，有的时候则会显得杂质太多，而且有的时候难免产生危机和脆弱。

作为朋友，这样的危机和脆弱，却永远不会在忠实的朋友之间产生。

塞莉亚·桑切斯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大约就可以说是绝不会产生任何危机和脆弱感情状态的最亲密无间的朋友。

她和他相依相持，他们的友情是很深的。

由于有这样一种关系的存在，塞莉亚·桑切斯，对卡斯特罗至亲的兄弟和朋友，自然也会有一种至亲的亲情。

塞莉亚·桑切斯对切·格瓦拉，完全像对卡斯特的亲兄弟劳尔一样，有一种至诚的亲情。他们从马埃斯特腊山区开始建立起来的生死与共战友的深情，是一般常人所难以理解和理解不了的，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和体会到曾经生死相依、生死与共的战友感情的无比珍贵和重要，很少人能够深刻的理解，这样的坚贞的友谊和感情，是任何力量也摧毁不了的，而特别是对他们自己来说，是永远最可珍视的。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珍贵的感情和深情的友谊，昨天，塞莉亚·桑切斯知道切·格瓦拉出国长时间访问，即日返回哈瓦那时，她信手在日历卡上记下了这样的备忘录，这样的重要记事：15日早上，应该给切——阿莱达送去一束蝴蝶花。这样一个举措，将会包含着多少深情呢？简直包含着诗一样的深情。

切·格瓦拉和他的妻子、女战友阿莱达·马尔奇，也是十分喜欢这种蝴蝶花的。切·格瓦拉也很欣赏妇女同志们用蝴蝶花来插鬓。

桑切斯记得，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当切·格瓦拉第一次看到塞莉亚·桑切斯鬓间插着一朵洁白的蝴蝶花时，他欣喜非常，赞叹不止，一个劲儿冲着塞莉亚伸着大姆指，赞叹着：“美极了！”“美极了！”

当时，切·格瓦拉还特别风趣幽默起来，指着第二纵队一个五十多岁的黑人老大姐联络员，这是马埃斯特腊山区一个农民的妻子，和她的丈夫一起，积极参加了支援起义军的工作。后来充当着起义军的联络员，经常上起义军中来，有时送情报，有时送给养，她每到队伍上来，就帮助起义军战士们烧火煮饭，缝补鞋袜衣服，还给大家唱歌跳舞，十分热情活跃，她在跳舞的时候需要搭档，她就特别喜欢拉着切·格瓦拉司令员来配合她。切·格瓦拉很乐于当她的搭档，配合她给起义军战士们跳舞。这个黑人老大姐，舞到尽兴处，一边舞蹈，一边就亲吻起切·格瓦拉的长满黄胡子的脸颊来。切·格瓦拉就特别伸长脖子，张着脸颊让这位黑人老大姐亲吻。黑人老大姐高兴极了，越高兴越手舞足蹈，舞蹈表演的绝对成功，能给战友们带来很大的欢乐。切·格瓦拉很赞赏她的这表演，表演完了的时候，切·格瓦拉还要再添上一点儿幽默，打问在场的观众道：“怎么样，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看我和我的未婚妻配合的怎么样？”格瓦拉不很大爱开玩笑，但是他时有幽默。他这样一幽默，搞的大家前仰后合，大笑不止。

不过，从此，那位五十多岁的黑人老大姐，也就成了有名的“格瓦拉的未婚妻”。

所以，那一次，切·格瓦拉第一次看见桑切斯鬓插蝴蝶花，大赞“美极

了！”“美极了！”时，还曾经指着那位黑人老大姐联络员，对桑切斯说：

“看你鬓插蝴蝶花，变得这么美，如果我要不是已经有了这样一位未婚妻的话，我就要向您求婚了！”

当然，这是格瓦拉的又一桩幽默。

后来，切·格瓦拉和美丽的女游击队员阿莱达·马尔奇结了婚，有的时候，他亲自采朵蝴蝶花，也来插在马尔奇的鬓发间，使得马尔奇立刻也会更加美若天仙。

这样马尔奇自然也就有了鬓间爱插蝴蝶花的习惯，她也特别地喜欢起了雪洁的蝴蝶花来。

正因为如此，今天，为了特别欢迎切·格瓦拉的归来，塞莉亚·桑切斯原来准备是要特别送给切和马尔奇一束盛开的蝴蝶花的。

蝴蝶花盛开的季节是在雨季。三月还不是雨季，蝴蝶花还不是在遍地都能看到的。只是在桑切斯居住的地方，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小小的花窖和暖棚，在哪里，不仅种植着一些蕃茄和卷心菜，也还种植着一畦蝴蝶花，所以，塞莉亚·桑切斯拥有着早开的蝴蝶花。

塞莉亚·桑切斯下床以后，她只穿着睡袍，就来花窖里采摘蝴蝶花。她很快挑选最鲜嫩的，最灿然的花枝采好了一束。她很细心地用塑料纸包好，然后就准备请通信员驾吉普车给切·格瓦拉——阿莱达·马尔奇家送去。

但是，当她喊来通讯员时，通讯员向她报告说：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劳尔·卡斯特罗，还在前院的办公楼里，他们仍然在卡斯特罗的那间并不很大的会客室里，还没有结束他们已经通晓达旦的聚会呢。

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是古巴革命领导核心中的核心。他们三个人的通晓达旦的聚会是常有的。他们本来已经都养成了只在下午才睡觉的习惯，上午和晚间，一般都是他们正常的工作时间。

因此，本来，这样的通晓达旦的聚会，也并不能引起桑切斯的惊奇。

她听到通讯员的报告后，还是请他把一束已经准备好的蝴蝶花，给格瓦拉的妻子马尔奇送去。她自己又精心地采摘了小小一束，并掐一支插在自己的鬓间，然后就拿着一束蝴蝶花，进入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特别会客室来。

室内显得相当凌乱。茶几和椅子都挪了位，不摆在原来的位置上了，地上到处都是烟灰，他们三人显然已经抽过了许多雪茄烟，显然他们这次聚会中进行了相当激动的谈话。桌子上，茶几上，还放着一些没有喝干净的咖啡杯。

桑切斯一进这间屋子，马上就能敏感地感觉到了这间屋子里，今天的气氛格外不同寻常，好象充满了十分的沉重和紧张。

她进来后，几乎谁也没有立即向她吱声和打招呼。

平时，塞莉亚·桑切斯是永远可以无条件进入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谈话空间的唯一的一个人，别的任何人，有的时候，是绝对不容进入到这三个领导核心成员的谈话空间的，因为有一些事情需要高度地保持机密，这是完全自然的事情。

不过，塞莉亚·桑切斯往往可以参与和知道这个核心的任何机密，他们对她，不会有什么更为保密的事情。

今天，这三个男性公民，他们是谈论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此刻，这间屋子里，怎么会有这样一种从来也没有过的令人感到沉重的气氛呢？

塞莉亚·桑切斯看了菲德尔一眼。

今天的菲德尔，显然忽然好像只经一夜的别离，就显见的苍老了许多。他的脸色是沉重的。

塞莉亚再看一眼劳尔，她不觉心头惊跳了一下，她敏感地发现，劳尔的脸颊上，似乎还残留着泪痕。

倒是格瓦拉，他还似乎仍然是乐观的，看不到他脸上有什么不安和忧伤，只是，眼神里，似乎也包含着一种神秘。

塞莉亚·桑切斯严重地不安起来。她想马上寻问大家，寻问明白，这里，这间屋子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坐下来。她马上问大家：

“你们怎么了？你们谈了一些什么？”

她立刻也点燃了一支雪茄烟来。

如果在平时，谁都会立刻回答她的任何问题，甚至总会迫不及待地告诉她一切。

但是，今天，卡斯特罗低下了头，垂下了眼帘来，专注地吸烟，不肯马上回答她的问题。劳尔甚至有些惊慌，他瞅着切·格瓦拉面面相觑。倒还是切·格瓦拉，依然一如既往，只冲着塞莉亚·桑切斯笑一笑，然后，他说：

“我们三个人，昨天晚上，主要谈了应该让男人们知道的事情。至于您，有一天我来告诉您，我们谈了什么事情。这件事，对您也不得不暂时保密，因为这是实在的完全的必要的。所以，希望的你一定谅解我们，您应该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信赖我们三个人，都会对您怀有最纯洁的忠实，所以，希望您也不要再审问我们任何一个人了。我们已经有了约定，昨晚，我们谈论的最后的话题，暂时，在很短的时间内，是绝对保证要不向任何人讲出来的。”

塞莉亚·桑切斯一时完全更摸不着头脑了。这三个男性公民，他们到底谈论了一些什么问题呢？看来，一时还真难马上就能知道了。因为他们已经约定，这三个男人约定的事情，世界上恐怕不会再有什么人能来打破他们的这种约定吧！

切·格瓦拉站起来告辞了：

“我走啦。我得先回家，看一看马尔奇和孩子们，然后和他们大家，同吃一顿早饭。而后，我还得回工业部去，向工业部的同志们，汇报出国访问的情况。他们大家已经向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菲德尔·卡斯特罗站起来，作了个无声的送别切·格瓦拉离开的姿态。

切·格瓦拉吻了吻塞莉亚的鬓角，迅速离开了。

劳尔在格瓦拉离开后不满三十秒，也离开了卡斯特罗在此处的特别会客室，匆匆地走了，他甚至没有向塞莉亚再打一个招呼。

塞莉亚·桑切斯更深切地感觉到，这一个早晨，实在太不同寻常了。她简直忽然间感觉到，有一点儿令人窒息的味道。

格瓦拉又到远方去了

1965年3月14日，切·格瓦拉回到了哈瓦那。

第二天，3月15日。古巴《革命报》出版登载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机场上欢迎切·格瓦拉归来时，热烈拥抱的大幅照片。

1965年3月16日，《革命报》还在头版显著的位置上，登载了切·格瓦拉少校在他任职为部长的古巴革命政府工业部作报告的消息。

从此以后，切·格瓦拉忽然消失了。

哈瓦那的电视台上，人们再不能够看到他特具魅力，总能令人感到亲切和鼓舞身影了。

在《革命报》上，也完全再看不到切·格瓦拉活动的消息了。

而过去，切·格瓦拉活跃的，充满活力和朝气的面貌和身影，总是出现在电视台的荧屏上，他的亲切诚挚忠恳的话语和声音，也是总不断地出现在广播中的。还有他活动的消息，他今天在这个工厂的开工典礼上讲话，明天在某个建筑工地参加劳动，后天又在某一个医院里领导医师们开会，或者给某一个扫盲工作队辅导教学或讲解政治常识。他是个忙人，总是在干着最有意义的，革命和人民最迫切最需要的工作，所以，报纸上也总是在传播着他活动的消息和照片。

切·格瓦拉活动的一切影像、消息和照片，都能带给古巴革命军民以亲切的鼓舞和温馨，古巴人民为自己的国家有着这样人民忠诚的儿子、战士和杰出的领导人深感欣慰，深感骄傲。切·格瓦拉像菲德尔和劳尔一样，在古巴军民中享有极为崇高的威信，是无可置疑的。

可是，从1965年3月17日以后，切·格瓦拉突然消失了，仿佛已经断无消息了。

切·格瓦拉哪里去了呢？

切·格瓦拉怎么样了？

古巴革命军民，开始祈望着再看到切·格瓦拉的身影和面孔，期望着再听到他的亲切声音，再看到他的任何的行踪和消息。

可是，听不到了。看不到了。

人民开始产生着不安的情绪。

古巴军民开始想念着切·格瓦拉。

古巴军民在心中呼唤：“切·格瓦拉！你在哪里？”

古巴人民和军队的敌人，古巴的敌人，也开始产生着几乎是更为敏感的反应。

美国的情报机关，又开动起机器来，开始紧张地探询其中奥秘。令他们最开怀的一个猜想是：格瓦拉已经死了。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从古巴革命赢得胜利以来，几乎没有一天不与古巴革命发生对抗和磨擦，简直产生了完全的，铭心刻骨的，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

他们对古巴革命领导人肉体消灭的热望，几乎始终就不曾有过消沉下来的时候。

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制定了暗杀古巴领导人的计划，暗杀的目标一直针对着菲德尔·卡斯特罗。1961年，肯尼迪当了美国总统，发动了猪湾雇佣军入侵古巴的事件，猪湾入侵美国中央情报局惨败以后，肯尼迪总统禁止了中央情报局对古巴进一步的入侵

计划，但是，却并不撤消中央情报局对古巴领导人的暗杀计划，肯尼迪总统不仅不撤消这个计划，他还又进一步强调执行这个计划，并给这个计划命名为“行动”计划。主要目标，还是暗杀卡斯特罗、格瓦拉和劳尔。肯尼迪总统为着美国的目标实行两手的策略，包括不反对暗杀手脚，所以，他对暗杀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劳尔的行动，从来也没有反对过。

因此，中央情报局对古巴革命领导人实行肉体谋杀的行动，始终并没有中断，而是在一贯的延续性中执行着。

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支持的最近的一次这样暗杀行动，是发生在 1964 年的 12 月 11 日。这次行动，正是针对着切·格瓦拉来的。

那一天，切·格瓦拉作为古巴参加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团长，来到纽约的曼哈顿岛，参加这里的大会，登上联合国大会的讲坛发表讲话。

那一天，联合国大会盛况空前，座无虚席，各联合国会员国的外交代表们，都正襟危坐在自己国家的代表席上，前来大会旁听的客人，几乎从来也难得这么多过，各国驻联合国的记者，更是站满了联合国大会可以允许记者们站立的每一个角落。这些听众，当然有些人是肩负国家使命，政治使命的，但更多的人，是热望着见到当时世界上最为传奇的英雄人物之一：切·格瓦拉。许多人都十分渴望和欣喜一睹他的英姿和芳容，他实在是人们所共同向往和崇敬的英雄。

但是，这样一个被世人所敬仰和爱戴的人物，竟然也会有人丧心病狂到这样一种程度，正在切·格瓦拉开始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发表他的演讲时，从美国纽约的某一个角落，突然升起了火箭炮弹，直冲联合国大厦飞来。多亏了联合国多国警察部队警惕性高，非常及时地紧急采用电子武器制导，才使轰击格瓦拉讲坛的火箭弹落在了联合国大厦外的河里。

这样的与古巴人民为敌的歹徒，实在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

然而，到了这样一步，这一天切·格瓦拉遇险的故事还并没有结束。在切·格瓦拉发表完讲话，走下讲坛，从联合国大厦出来之时，忽然又有一位衣着妖艳的美女向桔瓦拉迎了过来，仿佛是一个无孔不入很有本事的女记者。但是，这个白骨精她逃不开劳尔·卡斯特罗派来保卫切·格瓦拉的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的特别助理人员的火眼金睛。机警的切·格瓦拉的特别助理，立刻召来了联合国大会警察，擒拿住这个打扮成美女和记者的女妖精，马上解除了她准备刺向切·格瓦拉的白刃刀子。

丧心病狂的古巴的敌人，简直有点儿无以复加的疯狂了。

他们多么渴望和期盼古巴各主要领导人以死命啊！他们暗杀古巴领导人的狼子野心，真是实在大的很呢。

而如今，切·格瓦拉不在了。

切·格瓦拉能那里去呢？

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渴望和期盼得到证实的消息是：切·格瓦拉已经死了。

然而，一时，这样的情报得不到证实。

相反，出卖各种各样消息的人越来越多。

有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是说：切·格瓦拉向美国人出卖了古巴国家的全部机密，出卖了卡斯特罗，获利一千万美元，已经逃到美国，被美国中央情报局严密地保护起来了。

1965 年 4 月 24 日，与古巴临近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爆发了爱国军人和爱国学生参加的革命起义，推翻了美国走狗卡夫拉尔的独裁政权。于是，有消

息说，这场起义，是切·格瓦拉组织领导的。而且，切·格瓦拉在指挥多米尼加爱国军人，在和卡夫拉尔卫队的作战中，已经战死了。

还有一条消息，是从香港传出来的，作为独家新闻登载在伦敦的《晚邮报》上，说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发生了分歧，愤而出走，已经来到了既欣赏又欢迎他的毛泽东的中国。

各式各样的花边新闻和消息，令世人开始眼花缭乱起来，完全莫衷一是。

切·格瓦拉究竟怎么样了呢？

1965年4月20日，有几个外国新闻记者，打听到了卡斯特罗离开哈瓦那到古巴中部卡马圭省参加甘蔗收获季节砍甘蔗的劳动。

这几乎已经形成了习惯和制度。古巴革命后，实行土改，组织了人民合作社和人民农场。每到甘蔗收获的季节，古巴国家的党政干部，军队官兵，从总理到部长，从第一书记到中央委员，从军区司令到普通士兵，都要奔赴甘蔗之乡，参加砍甘蔗，收获甘蔗的劳动。因为甘蔗是古巴经济命脉食糖的主要资源。所以，砍甘蔗的季节，大家都要为收获甘蔗，作出尽可能的努力，要来义务性地奉献劳动。

这几个外国记者很聪明，当然也很狡滑，他们首先想办法请古巴外交部新闻司长拉米罗·德奥尼斯吃了一顿饭，表述了他

618，618·们想报导卡斯特罗和老百姓在一起参加收获甘蔗劳动的愿望。

拉米罗·德奥尼斯觉得这个想法不错，于是，就想办法安排这几名记者到卡马圭省来采访卡斯特罗。拉米罗还教给这几位记者能够如愿以偿，终能够得以采访到卡斯特罗的办法，那就是他们最好不要急于展开采访活动，不妨先从参加劳动开始。

这几个本来够狡猾的外国记者，就这样干了起来。他们也像古巴国家干部一样，在卡斯特罗砍甘蔗的甘蔗田里，挥着砍刀大砍起甘蔗来，干得很卖力气，一个个也都干得汗流夹背，很像给自家人干活，很像没有外心，所以，这给卡斯特罗看见后，对他们几个产生了较好的印象，于是，在后来在一起休息的时候，主动表示可以回答一些他们提出的问题。

有一个记者也许最机敏，他立刻抓住时机，拐弯抹角绕了个小弯儿，称赞了古巴今年的甘蔗丰收，称赞了古巴干部参加收获甘蔗的劳动，他忽然把话题一转，就提出一个尖锐性的问题来：

“总理先生，记得去年砍甘蔗的季节，你们著名的工业部长格瓦拉少校，参加了整个收获甘蔗季节的砍甘蔗劳动，因此，彼古巴评为社会主义劳动突击手，是你们古巴高级干部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一人。可是，今年他在哪里？他今年为什么不来再参加砍甘蔗的体力劳动呢？总理先生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情况吗？”

卡斯特罗抬起头来，仰望了一眼暗蓝的天空，他略略沉默了片刻，但是，他还是作出了回答：

“记者先生，关于格瓦拉少校目前的情况，我可以事先说的是，他现在正待在对对我们、对革命最为有益的地方。”

记者：

“冒昧地请问您，您与格瓦拉少校，还有着良好的关系吗？”

卡斯特罗看了一眼这位提问题的记者，他一笑，肯定地回“不是良好，是非常之好。我们俩人的关系，是一见如故，心心相印的，发展到今天，现

在，可以说，我们的关系甚至更成熟啦，开花结果，现在的关系完全融合在了同一个甜蜜的果实里，肯定比任何时候更好。”

卡斯特罗的如此回答，可以说是给了新闻界一个明确的、肯定的回答。

不过，外国记者们马上已经证实了这样的猜测：此时此刻、切·格瓦拉已经不在古巴了。

那么，他到何处去了呢？

显然，这是古巴党和政府的最高机密。记者们的问题，是问不出最高机密来的。

但是，新闻界，开始了更为密切的注意，开始紧急地搜寻着切·格瓦拉的行踪和去向。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此更是心急火燎地注视起来，他们迅速展开一切触角，对切·格瓦拉的行踪和去向进行搜寻和侦察，他们的紧张和不安心情，更是完全提到嗓子眼儿上了。

他们也大大睁开了眼睛。

接下来，又一个消息传了出来，切·格瓦拉的母亲病危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医院里。她挂长途电话到哈瓦那来，想要找到她的儿子。

切·格瓦拉虽然作为古巴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作为古巴革命政府的部长，但他并没有把他的家庭接到哈瓦那来。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们，还全部留在阿根廷，完全过着普通的、平民的生活。

他的母亲塞莉亚太爱他了。在古巴革命刚刚胜利，革命进入哈瓦那第七天的头上，占领着飞机场的起义军第四纵队司令卡米洛，因为拥有闲置的飞机，马上把切·格瓦拉的母亲从阿根廷接到哈瓦那，赠给切·格瓦拉一个惊喜。而卡米洛这样做，是因为曾经作过格瓦拉下属和助手的他，他知道格瓦拉是怎样想念他的母亲，切·格瓦拉对他母亲抱有怎样的深情。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争的年代，格瓦拉最喜欢给战友们提起的一个话题就是母亲。他总是提起妈妈怎样教他学游泳，妈妈怎样每天开一辆破车接他下学，送他上学，在第一次分别的时候，妈妈怎样哭红了眼睛，一说起母亲来，切·格瓦拉总是热泪浸浸的。他肯定是世界上最爱母亲的儿子之一。

可是，现在，塞莉亚由于生病，不能久留人世了，她渴望再见一回儿子的面庞，再听一声儿子的声音。她一定曾经期望儿子再呼唤她一声“妈妈！”

然而，切·格瓦拉已经不在哈瓦那。此刻此时，他身在一完全陌生的，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不是一个母亲在病危，那里是数十万、数百万的母亲和孩子、老人和受难的平民流离失所、贫病交加、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像一群羚羊和羔羊，正在被虎豹豺狼食肉兽们疯狂的撕咬和追逐中。那里的情势实在太危险，实在危险极了。那里十万、百万的母亲和孩子，也许更需要格瓦拉前去拯救他们，帮助他们走出深渊，走出水火。所以，目下，格瓦拉已经去那里了。他一时很难顾及在阿根廷病危的母亲了。

那么，谁来给阿根廷病危的母亲回话呢？

切·格瓦拉的妻子阿莱达·马尔奇，和婆母已经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塞莉亚很赞赏自己的大儿媳妇。马尔奇也很敬爱婆母，她们经常会有会聚和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她们的婆媳感情根深，很好。

但是。阿莱达能怎样给婆母回话呢？

阿莱达能对婆母说：她也不知道切·格瓦拉限下的去向吗？

这会产主多少解释不清楚的误会呢？

怎样回答塞莉亚妈妈她的儿子在哪里呢？最后还是菲德尔·卡斯特罗，请塞莉亚·桑切斯给切·格瓦拉的母亲回电话。

格瓦拉的母亲来古巴时，桑切斯不止一次去看望过老太太。她和格瓦拉的母亲也是很熟悉的。格瓦拉的母亲能接到桑切斯的回话，能感到一定意义上的安慰。

塞莉亚·桑切斯在电话中，告诉格瓦拉妈妈说：切·格瓦拉的身体很好，一切平安。他正在执行革命托付他的特别使命和任务。他目前不在哈瓦那，但是，如果一定想和他联系的话，他会联系的，只是不能在有危险的时候。

塞莉亚·桑切斯说话，从来语调亲切而从容。她的话很简洁。为了格瓦拉的安全，她不能什么都说。在拉丁美洲打长途电话，是很不可能不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监听的。

这一方面的知识和警惕，格瓦拉的母亲塞莉亚女士也有。她也是知识很高，很有觉悟的妇女。

遗憾的母亲，她至死再没有看到儿子，也没有能够再听到儿子的声音。1965年5月10日，老人家与世长辞了。

切·格瓦拉再次回到哈瓦那时，他得知了母亲去世的消息。他非常悲痛。他流了泪。为了永远纪念母亲，他给他和阿莱达生养的二女儿，起名叫小塞莉亚。他让自己的女儿来作纪念母亲的纪念碑。

这一次短暂的归来，他行色匆匆，秘密归来，又秘密地走了。革命的任务规定他从此不能在近期内抛头露面，这一方面是革命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斗争策略和他安全的需要。

卡斯特罗公布国家最高机密

1965年10月3日。

领导古巴的执政党，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代表大会，改名为古巴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在哈瓦那隆重举行。

在这样的隆重的、重大的代表大会上，切·格瓦拉仍然没有再次出现在主席台上，这是不可思议的。作为古巴革命胜利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怎么能在这样的重要的代表大会上缺席呢？

全国军民，全党同志，都会发出热切的问题了：他们所爱戴的、品质崇高而纯洁的切·格瓦拉同志，究竟去到了哪里了呢？

切·格瓦拉的行踪，仍然是必须保密的最高机密。

然而，也到必须把切·格瓦拉同志的一些已经发生的情况，通报告知全国军民、全党同志了。否则，没有必要的交待，是会令人产生不安的。

于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代表大会第一天的大会报告中，在他的主旨讲话中仍然是相当策略地，向全国军民、向全党同志，报告了切·格瓦拉一些革命行动的信息。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主席台上举起了切·格瓦拉书写的一份手稿，这是切·格瓦拉亲笔写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一封信。

事实上，这也是早就准备好，要在党的领导机构或全国代表大会上宣读的一份重要文件。

文件已经打印了副本。

原件是仅供在重要档案中珍藏的。

卡斯特罗所以今天拿出切·格瓦拉用工整的小字体写的亲笔信来展示，大约用意在于让大家见字如见面，亲自能再见到切·格瓦拉的宝贵踪影。

切·格瓦拉对古巴来说，太重要了。

卡斯特罗用平静而严肃的语调，对切·格瓦拉的这封信的来龙去脉作了必要的说明和解释。关于他本人和切·格瓦拉的深刻关系和亲密友情，他说没有必要总是挂在嘴上，更主要的是深切埋在心中，使自己能够时刻感到仍然在与切·格瓦拉同在，也就行了，是无须说了又说的。

卡斯特罗说这些话时，满含挚情，语调是极为朴素的。

他作了一些必要性的阐释以后，他告知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他现在准备念出来的切·格瓦拉的信，写于1965年的3月间，是4月1日那天，交到了卡斯特罗本人的手上的。卡斯特罗说：

“切的这封沉甸甸的信，已经交到我的手上有六个月又零两天了。”

接着，他开始念及切·格瓦拉这封信的全文：菲德尔：

此刻我忆起很多往事，忆起在玛丽亚·安东尼娅家跟你结识的情景，忆起你建议我到这里来，忆起当时的筹备工作是何等的紧张。

有一天，有人问我们，万一我们死了，应该通知谁。这种事的实际可能性使我们大家为之震惊。后来我们知道了，在革命中（如果这是真正的话），的确不是胜利就是牺牲。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很多同志都倒下了。

今天，这一切已经不再具有那么浓厚的戏剧性的色彩了，因为我们更加成熟了，但是这种情况是会重演的。我觉得，我已经完成了把我同古巴土地上的古巴革命结合在一起的一部分职责，因此我要向你、向同志们、向你的人民同时也已经是我的人民告别。

我正式辞去我在党的领导机构中的职务和我的部长职务，放弃我的少校军职和我的古巴国籍。从此，我和古巴不存在什么法律上的联系了，仅存的是另一种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不能象职务那样辞去的。

回顾我过去的生活，我认为，为了巩固革命的胜利，我是鞠躬尽瘁地工作的。我唯一严重的错误是，我上马埃斯特猎山之后，未能从最初一刻起就更充分地信任你，未能尽快地看出你身上那种领袖和革命家的品德。

我度过了壮丽的岁月：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那些光辉而又不幸的日子里，在你的身旁，我感到属于我们的人民而自豪。

你作为国务活动家，很少有比在那些日子里表现得更光辉夺目了。我同样也为我们当时能够毫不动摇地追随你，能够在考虑和观察问题、估计危险性和坚持原则方面都目的一致而感到自豪。

世界的另一些地方需要我去献出我微薄的力量。由于你担负着古巴领导的重任，我可以做你不能去做的工作，我们分别的时刻到了。

你要知道，我此刻的心情是悲喜交集，在这里，我留下了我作为一个创业者的最美好的希望，留下了我最亲爱的人……留下了把我当作一个儿子看待的人民，这使我的内心深感痛苦。我将把下面这些东西带到新的战场上去，即你灌输给我的信念，我的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履行我最神圣的天职的心情：哪里有帝国主义就在哪里同它斗争。这一切足以鼓舞人心，治愈任何创伤。

我再说一遍，我不要古巴负任何责任，我只是学习了古巴的榜样而已。如果我葬身异国，那么我临终时想到的将是古巴人民，特别是你。我感谢你的教导和榜样，并将尽力做到至死不渝地忠于你的教导和榜样。我过去一贯同意我们革命的外交政策，并将继续如此。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特意识到作一个古巴革命者的责任，并且将象一个古巴革命者那样行事。我没有给我的子女和妻子留下任何财产，我并不为此难过，反而感到高兴。我不为他们提出任何请求，因为国家会对他们作出充分安排，让他们能够生活和受教育。

我还有许多话要向你和我们的人民讲，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多讲了，千言万语表达不了我要说的一切，又何苦浪费笔墨呢。

祝永远胜利！誓死保卫祖国！

用全部革命热情拥抱你。

切

写于哈瓦那“农业年”

菲德尔语调平静，每个字音都十分清晰地念完了切·格瓦拉的这封信。

整个代表大会的所有的代表席上每一个代表，都屏声静气，注意力至为专注地倾听着菲德尔·卡斯特罗吐出来的每一个音阶。

因为这也是切·格瓦拉的声音。

卡斯行罗把信念完了。

他长时间地站在讲坛上，双手紧攥着讲坛的边缘，他沉默了很长一刻，他不再多说一句什么。

他也不是在等待着掌声。

他知道，此刻，如果切·格瓦拉出现在这里，无可置疑，会立刻激发起暴风骤雨般的掌声的。

但是，此刻，在念及切·格瓦拉的如此一封情义深长而如诗一般悲壮的信时，同志们不会响起掌声，只会在心涛心海的深处，回荡和响起同样的悲壮的共鸣。革命的道路多么艰难，革命的道路多么不容易啊！它总是在如此

召唤着如此杰出的人物，如此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为着胜利，却又面对着牺牲，在所有世纪中，哪有比革命更为悲壮的事业呢？

整个代表大会的代表席上，几乎每个人都潜然泪下。有的同志强忍不住，开始呜咽起来。

于是，卡斯特罗只又说了一句话：

“同志们，让我们期盼着听到切的胜利信息吧，但愿我们终能听到这胜利的消息吧！”

说完，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几天以后，代表大会胜利结束了。

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菲德尔·卡斯特罗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担任了党的第二书记。

在党的代表大会结束以后，数名新当选的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古巴国家的政府部长，古巴革命武装部队的最高军衔少校军衔的拥有者，他们纷纷上书菲德尔和劳尔，纷纷提出请求，他们不能让切·格瓦拉去独力支撑战斗的重任，他们也表示可以辞去中央委员、部长和少校、上尉的军衔，放弃古巴国籍，前往到切·格瓦拉的身边去，去充当他的左右和助手，去和切·格瓦拉一起，投入新的战场，同生死，共患难，同心协力，并肩去战斗。

菲德尔和劳尔，他们当然也不能让切·格瓦拉单枪匹马，仅仅作为孤胆英雄去深入新的战场，去奋勇冒险参加战斗。事实上，切·格瓦拉现在去进行的工作和战斗，本来应该是菲德尔亲自来担当的，或者说本来是菲德尔想来担当的，却又因为有着明显的理由不能来担当的。而在切·格瓦拉担当起了这样的重任，菲德尔和劳尔当然仍然在与他同呼吸，共命运，没有一刻是对他不加支持，不加关注的。

正因为如此，菲德尔和劳尔，很快同意并批准了一部分古共中央的中央委员、政府部长、革命军的部分军官，前往来到了切·格瓦拉新的战斗和工作的战场，来到了切·格瓦拉的身边。

格瓦拉来到玻利维亚

切·格瓦拉从古巴党和国家活跃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以后，又过了十九个月，他于1966年11月间，突然地出现在南美洲的腹地，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

不过，他是经过了彻底的化妆，秘密地来到拉巴斯的。

而且，他不是从古巴，不是从哈瓦那，而是由巴西的圣保罗市，搭乘飞机抵达拉巴斯的。

他的化名已经是拉蒙·贝尼特斯·费尔南德斯。他已经不再公开称呼自己是切·格瓦拉了。

他的腰间，揣着一张可以在拉丁美洲各国当作通行证使用的“美洲国家组织研究和搜集玻利维亚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情况的特派员”的证件。

同时，在他的腰间，还揣着一张乌拉圭公民的护照。护照上写明他的身份是商人，完全隐匿着他的真实身份。

他彻底的化装，是完全叫人看不出他的本来面目的。西服革履，气派排场，扎着漂亮的领带，领带上显然还洒着香气逼人的昂贵的法国高级香水，这样的装扮，可以显出他的富有和很高的社会地位，有这样派头的人物，在许多实行着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奴隶制度的拉丁美洲国家，是能够令一般人望而生畏和毕恭毕敬的。

切·格瓦拉完全脱下了他的伞兵靴和陆战队服，完全脱下了那在古巴的过去岁月中总也不离身的橄榄绿军装。而且，即使在切·格瓦拉过去当政府部长、当古巴国家的政治代表团、经济代表团、国家党政代表团团长时，从来也没有扎过领带，现在却扎起了绝对花俏的领带。

他的面貌也经过化装，完全地变了模样，他卷曲的浓密的又长又硬的黑头发不见了。过去他有一脑袋那样乌黑卷曲的漂亮头发，总是扣在无沿的、缀着红星的软帽下。那种软帽就是格瓦拉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组建游击队的被服厂时，由他亲自指挥设计的软帽，这种软帽，后来就成了古巴革命军的正式军便帽。切·格瓦拉在过去的岁月中，总是戴着这样的帽子，压着扣着他的漂亮头发，可是，经过化装以后，他却露出了他的光秃秃的脑门儿，完全受成了一个业已谢顶的老人。不知道怎样的化装技术，能把他的那么年轻而英俊的面目，打扮成现在这样的满脸安祥老态，两鬓斑白，脸颊却完全刮的光光净净，任何人，在这副形象面前，大约都不会想象到，这就是切·格瓦拉了。

切·格瓦拉如此的化装，确实很成功，以至他在其间回到哈瓦那，在探看他的孩子们的时候，孩子们竟不再叫他“爸爸”，而是叫起他“老爷爷”来。只是当他大笑起来，和孩子们说话时，孩子们才惊呼：“哟，这个老爷爷的笑声，说话声，怎么完全像是爸爸！”

可见，切·格瓦拉的成功化装，应该说是太到家了。

但是，再好的化装，也还是外表的，外在的方面，光靠这样的外在的化装，演技还是很难成功的。演员需要内在的功力，才能在舞台上把角色演好。而政治家、革命家在革命斗争的舞台上扮演角色时，对胆略的大的需要，几乎总必须是绝对的。一般的说，一个政治家，一个革命家，只有他真正具有革命的胆略，他才能够任何时候镇定而从容，临危而不惧。

切·格瓦拉化名拉蒙，胜似闲亭信步，来到美帝国主义链条最紧，所豢养的走狗也最为忠实的，他们统治的国家玻利维亚，他们的玻利维亚首都拉

巴斯。而且是搭乘飞机飞来，大模大样飞来，在这个军警林立，美国特务四处出没和活动的拉巴斯，只有彻底的化装而没有巨大的胆略和魄力的人，他是很难迈开脚步的。

还是在最后一次去到开罗的时候，切·格瓦拉在和纳赛尔总统谈到国家与革命的问题时，谈话涉及到了非常深刻方面的内容。

他们谈到了革命和国家政权的关系。

无疑，革命总的来说，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其实质和内容，总是要针对压迫和反对压迫的。革命总是要反对不义和不公道，总是要反对黑暗衙门的。

但是，国家呢？国家就其实质的性质来说，凡是国家，就都意味着统治，包含着压迫，只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有的时候会有不同。比如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是压迫者，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是被压迫者，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翻身解放了的、站起来的革命人民转而成为压迫者，而一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势力，成为被压迫者，这压迫的内容会有所不同。

然而，一个不可更改或很难更改的情况是，尽管国家压迫与被压迫的内容会有不同，但是国家的存在状态，即国家存在状态的形式，往往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而且，国家既是一个压迫机器，它就必须要拥有着它的特定的压迫机制，首先都是一样和都是必须的仍这就是，首先都会有一个衙门，而有了衙门，衙门里就不能是空的，像庙里不会缺少泥胎神像一样，是一个衙门，就总还是要设置官员的，有的地方，设置皇帝和大臣，有的地方会设置总统、总理和部长，总的说来，都要设置官员而且要划分等级，甚至完全是要严格划分等级的。而划分等级，严格地划分等级，自然的，不可逾越的，就必然会形成一种不管名称多么不同，其性质则不会有变的官僚机制。没有这样的官僚机制，就完全不可能形成压迫的手段和力量。

但是，官僚机制，是不是一定必然就会是一种官僚体制呢？比如千百年来在许多国家实行的王朝制度，皇帝都是世袭的，皇帝国王成了一种独家专门的职业，拥有统治权和压迫权成为他们与生具有的一种职能。这样，他们所形成的独裁或开明、半开明的统治和压迫，只能说是一种皇权贵族的纯粹官僚体制的统治和压迫，是完全的官僚体制的统治和压迫，是一种完全的、名正言顺和封建的官僚体制，然而，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国家制度在进入自由资本主义的年代，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政治，或代议制政治制度，通过民主选举议会，而通过议会选举政府，或者还可以进行总统直接或半直接由国家全民选举，以此来形成统治和压迫机制，形成执行这种机制的官僚体系。

这样的体系，完全标志着民主的标号，或者公开或半公开的打开着民主的旗帜，自由的旗帜，然而，这样的体系，往往的，在绝大多数的時候，总是在产生着独夫民贼、军阀和独裁者，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帜上台，通过民主的渠道上台，拥有统治权力以后就把这种权力完全变成私人资本，成为独家经营的民主和自由的垄断者，也成为完全像神仙和皇帝一般的统治者，绝对地作威作福、高踞在国家和人民的头上。

这样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国家世界，差不多完全是通常的、公然的情况。

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治机制中，一般的都在延袭着虽然没有皇帝大臣，没有主教和神权，但依然如有皇帝大臣，如有神权和主教的体制。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官僚体制也还是不变的，是在公然的运行中的。

因此，这样的体制势必产生独裁和特权，势必产生与封建主义国家体制同样的黑暗和不公平，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就其性质，它不仅不反对不公平，反而在本质上，是特别专门要保护不公平的。这样，出现官僚统治阶级的荒唐，也就成了自然不可避免的事情，滥用权力，贪污腐化，形成特权阶级阶层，形成鱼肉人民，社会蛀虫和最腐败的集团，也就成了十分自然的事情。

资本主义国家对内，对本国人民实行黑暗压迫，对外，对别国人民实行侵略和掠夺的帝国主义政策，都是官僚体制的结果，绝不是这样的国家人民的所谓的民主和自由的果实。

从这样一些状态观察，国家，无论怎么考察，都可能是革命的对象。当然，这主要是说旧的国家体制，并不是说经过人民民主革命，赢得的胜利果实，赢得政权，所赢得的国家统治权力。在革命中或在革命过程中产生的国家，本来的，它只应说是一种革命的果实。

比如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既然都是革命的果实，这样的果实无疑应该是，永远是鲜红鲜艳的，应该是永远甜蜜的。

它的国家体制，本来应该是最彻底的最完全的民主体制。它本来不应该有同样的皇帝、大臣和国王与子民的区别。但是，这样的体制在哪里实行过呢？最现成的，仍然只能是换人不换机器，反动的统治者被赶下了台，而由革命者，再来当总统、当部长，继续驾驭所谓的国家机器。这样在革命政府中，势所必然的，几乎是无可奈何的，仍然也就出现了官僚的角色。

不出现官僚，怎么能来运作国家机器呢？也许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儿”，只应该永远是个革命者是革命行列里的齿轮或螺丝钉，不应该变成高踞在革命人的头顶之上的老爷。然而，即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儿”也还势必要拥有管理财产、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统筹指挥建设、调动警察和军队的发号施令的权力，而在这样的权力行使中，会不会受到腐蚀呢？会不会在权力和财产的分配中，优惠和优待自己的亲属和裙带联系的亲族，会不会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中，有宽有严，有偏有向，借讥排挤打击异己和心志不同者，而怂容和宽待自己的同类胡作匪为呢？

权力的行使，给许多权力的行使者同时具有着一种被腐蚀的机会。

权力，是绝对可以腐蚀人的。

权力，往往可以颠倒别人，也可以颠倒自己。

权力，扭曲任何一个人的力度，有的时候会出神入化，超过任何恶魔驱使的魔力。

中国人有一句最常用的描述权力使人形态变化的话，叫做：“官升脾气长”。确实，这句话说的相当准确，权力往往可以使一个人变态，因而同时变质，过去本来谦和的人，由于有了发号施今的权力，开始养成发号施令，颐指气使的习惯，进而完全变成一个趾高气扬的家火，这是常有的事儿，是司空见惯的事儿。权力，甚至使一个人走路步伐和习惯，都不再像他的爹爹亲娘一样，他要追求二种合辙的款式。权力，甚至经常把一些人的嘴脸都完全扭曲起来，当然，他们的心胸有的时候会被扭曲的更歪。

即使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如果忽然当了大官儿，几乎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在他的里里外外、浑身上下、立刻产生出一种令人觉得怪怪的不同于人的味道。

这差不多总是难免的。

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几乎也仍然是不好避免的。

社会主义国家既然不能不要国家机器，因此，自然也不能不要一定的官僚机制，不能不要一定的官家制度、职务等级，名称可以很不同，但官僚等级的程式是一样的。官僚机制的机制，也还是一样的，因此，不可抗拒的腐蚀，还是一定会产生的。

而这样一来，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社会主义革命本身，有的时候也就难免产生起了冲突来。这中间，无疑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是需要解决和必须解决的。否则，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就终会有那么一天：同归于尽。

那将是可怕的后果。

在埃及。在开罗。切·格瓦拉，曾经向纳赛尔总统十分深切他说过他的种种观察，说过他的十分深刻的种种忧虑。

切·格瓦拉告诉纳赛尔总统，他学习和研究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一时还找不到解决这样的矛盾，这样的问题的十分完整的可以令人完全解悟的答案。

切·格瓦拉还告诉纳赛尔总统，他还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访问中国，想从中国那里寻求另一些解决问题的经验和答案。

但是，中国的同志们是很谨慎的，他们告诉切·格瓦拉说，毛泽东同志已经很严重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官僚主义性质的问题。但是，中国同志们说，他们提出了问题，但是，还没有解决这方面矛盾和问题的经验。他们说中国和古巴的情况有很大差异，所以，中国目前在全国进行的“四清运动”经验，他们都认为不宜在古巴套用，所以，他们不愿意多说，中国同志强调不成熟的经验不可以拿出来“误人子弟”。

中国人不像苏联人一样，总是好为人师。

赫鲁晓夫在台上的时候，总是喜欢说长道短，比比划划，总想指指点点，告诉古巴人一些经验和道理，要他们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

可是，1962年，一场加勒比海导弹危机，完全使赫鲁晓夫这位教师爷现了原形，原来这个教师爷无知愚昧而且愚顽，他当古巴人的老师不仅完全不够格，反而，古巴人倒产生了一种愿望，很想给赫鲁晓夫上课：首先从ABC教起，首先来提高他的文化水平，然后再教给他政治常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以及革命斗争的策略和艺术。

在这方面，古巴革命家绝对比赫鲁晓夫更有水平。

而这样的问题提出来了，产生了，古巴革命领导人们，也就自然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愚人赫鲁晓夫，他是怎样爬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排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岗位上的呢？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排头的社会主义国家最高领导人，无疑应该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者可以崇敬和效仿的榜样。他在一切方面，都应该是顶天立地的一个英雄和表率。

可是，赫鲁晓夫能够充当这样的角色吗？他一会儿是一个马屁精，满脸满脸，浑身上下，全是奴颜卑膝；一会儿又成了吹牛的大炮，不可一世的狂人，好像就是个神仙皇帝，动辙口出狂言，几乎想对全世界的人都发号施令，颐指气使。而他所有的一切形迹，更是卑鄙的可以，在联合国的高峰会议上大敲皮鞋底也可能不能算是什么，但是在莫斯科他讲究的豪华，他讲究的排场，他讲究的尊荣，他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政策，他的那个流氓、无赖

加文痞的女婿阿朱别伊，切·格瓦拉都见识过，不就是这个阿朱别依，嚼着美国的口香糖，抽着美国的香烟、喝着法国的白兰地、穿着意大利的皮鞋吗？就凭他是一个世界名牌化了的赫鲁晓夫的名牌女婿，切·格瓦拉也不能不对他报之以十足的不屑和鄙夷。

这样的家伙，已经与革命离开了多大的距离啊！他们像油一样地浮在苏维埃国家政体的上面，而苏维埃国家的革命人民呢？赫鲁晓夫甚至只作出这样的许诺：到了共产主义，也只能不过土豆烧牛肉而已。而他们自己，今天也岂止是土豆烧牛肉吗？

切·格瓦拉亲眼看到的过，善饮的赫鲁晓夫，即使在他的会客室里，也几乎总是滋滋有味儿地，总是不停地暖饮着最为昂贵的，从法国进口的自兰地酒，饮着像是玛瑙玉液一般的琼浆。

切·格瓦拉，在苏联看到的如此景像，曾经使他惊讶不已，甚至几乎使他目瞪口呆。

在古巴革命赢得胜利，赢得政权以后，当然也在政府的各级机构和部门里，设置了各式各样的官员。既然是开场了一台戏。总是要有这样或那样的角色的。

最初，有人造谣和攻击说切·格瓦拉少校住进了巴蒂斯塔政权留下来的最豪华的别墅，而且在迅速购置私产。

事实上，这当然完全是攻击和造谣，为了静养严重发作的哮喘病，他确实借住过一套别墅房子，但一旦康复以后，他立刻退出了那一套房子，他在当古巴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的期间，他几乎掌握着全古巴所有的国家财产，但他从来都呆在只有十二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办公。他的家庭居室也只是住在哈瓦那的公寓房子里。他每月一百二十五元与美元价格相等的比索，是他少校和部长的月薪，也是他唯一的经济来源。这是仅够他用来养家糊口支付必须的花销的。正是因为如此，切·格瓦拉在最后离开古巴时，他竟没能给他留在古巴的妻子儿女，哪怕是留下存有一个美元或比索的存折。

切·格瓦拉在作为古巴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作为全国最高的管钱管物的官员，作为银行行长，计委主席和工业部长，作为国家的高级官员期间；他的无私和纯洁，他的绝对的神圣的圣洁和清廉，也是不容任何魔鬼来亵读的。

而越是如此，越是如此地圣洁和清廉，也是越为侵蚀和腐化、腐败不可沾染，也是不能对任何腐败和腐化现象熟视无睹、麻木不仁的。

在古巴，他不会。

在苏联，他也不会。

在古巴革命胜利最初的年代里，在党和国家各级机构，政权建立的最初的日子里，在古巴最高领导层不容腐蚀，不被权力腐蚀的情况下，在下面，古巴最高领导层，却很快的，相当能敏锐地发见到了一些权力侵蚀所产生的腐化、腐败现象的迅速滋生和漫延。

有些本来并不纯洁的人，混进了革命队伍，有的是野心家，有的是投机分子，有的本来还是流氓、无赖和很不正经的人，绝非善类。

这样一些人，如果有一些被推上了国家机器、党和政府机构扮演角色时，有的人很快就会原形毕露，有的人则会被权力侵蚀变质。首先从权力分配开始，有些地方就开始搞起一家天下，括起了裙带风，丈夫当了行政领导，老婆就当上了人事处长，儿子呢，当上了办公室主任，女儿呢，当上了财务主

任，女婿呢，当上了保卫队长。别的老共产党员、革命老战士，别的杰出人物，他们到哪里去呢？他们可以被挤走，调开，靠边站，或者去看大门，或者干脆离职退休去当普通老百姓了。

这是在权力分配方面开始出现的腐败的和变质。

接着，在财务分配方面，极端无聊的荒唐事情，开始出现了。当了官的，可以住最好的房子，一处不行再搞两处三处。在人民农场，五口之家的农工之家，可以只住一间茅草小房，而场长同志，一家人可以分到住上两幢三幢每幢都有十几套房子的别墅楼。格瓦拉还发现不止一个地方干部住进了宫殿，有的人甚至住进了迷宫，格瓦拉在一个地方干部的这样的迷宫里，替这里居住的官老爷查过他一人一家一户所拥有的空调设备和电视机，这一家领导干部的住处，甚至在厕所里也安着空调机，在每一个房屋的角落里，都摆着电视机，总共竟有十七台电视机。而他手下的工人们，一百户人家，竟一台电视机也没有。

这样，明显的又是权力变成了财富，权力成了特权和特殊。

接下来是生活方式和人格的变化。拥有很大权力的家伙们，开始借用权力的力量，借用权力相当于财富的力量，过起了不仅滥用权力，专横霸道，而且作威作福的养尊处优，挥霍无度，糜烂腐败的生活来，他们开始吃喝玩乐、终日无所事事；总是沉迷在大吃大喝的宴会中，总是狂饮滥吃，吃喝的东倒西歪，沉醉的一塌糊涂，而在烂醉如泥的状态中，他们也还不能忘记要他们漂亮而年轻的女秘书们来陪他们睡觉，也许这是为了等他们玩乐尽兴以后，不耽误把女秘书放在腿上，抱在怀里办公。

看看，这些原来也便是社会主义国家为数并不很少的一部分官僚的形象，一部这样的官僚的形态和形状。当然如果是需要的话，他们自然也还会一本正经，冠冕堂皇，说教训别人的话说的滔滔不绝，吹牛也直吹的天花乱坠，弄虚作假，瞒天过海，欺上瞒下，甚至也拉上边的人下水来同流合污。对下边的不满作乱造反之人实行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镇压。

到了这样的时候，国家与革命，又处在一种怎样的对峙中呢？

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如何来解决这样矛盾和问题呢？

切·格瓦拉，在和纳赛尔总统探讨这样的深邃的革命哲学和问题时，纳赛尔总统更觉得切·格瓦拉的聪明和思想的深刻。

纳赛尔总统不是无神论者，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他也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他自命为是实用主义者，其实也是百分之百的理想主义者。他是坚决反对社会剥削和压迫，坚决主张社会公平和公正的。如果果不是如此，纳赛尔总统不会总以这样一件事而感到不是沮丧，而是高兴和骄傲，这就是，在埃及，在他领导的革命的影响下，这样的局面已经开始形成了，这就是，作为他的女儿，总统的女儿，在国家的大考中，因为分数不够分儿，完全进不了开罗大学，而他的司机，为总统开车的一名工人，他的儿子，则可以因为考试达到了分数线，因此可以完全昂首地进入开罗大学。

纳赛尔为缔造了这样的社会平等而骄傲和高兴。

而这样的社会平等，正是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

相反，如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这样的理想目标，被走后门和特殊化特权来催毁和破坏的话，那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叫作是社会主义制度吗？可以叫，只不过那就是徒有虚名的假社会主义了。

为了考查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真假，切·格瓦拉对苏联，是进行过认

真的考查的，他考查的一个具体对象是赫鲁晓夫，也许还有米高扬，也许还有别的一些人，他的印象，情况是严重的。

为此，1964年11月期间，在尼·谢·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他曾也赶到了苏联，借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庆典的机会，也到了那里，像中国的周恩来、贺龙同志一样，以参加庆典为名，主要考察苏联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的政治走向和趋势。切·格瓦拉不晓得中国同志们是怎么想的。切·格瓦拉和古巴革命领导核心的一些其他领导同志，当时曾经期望，赫鲁晓夫下台，应该说可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革命在进程中的自我完善的步骤，应该是一个铲除毒瘤，铲除腐败的步骤，特别是，赫鲁晓夫被迫下台，曾被明显暗示指责为的一项罪名，是他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中先是机会主义，后是投降主义的可耻可鄙丑行和严重失误。这样，赫鲁晓夫的下台，很可能是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革命自身完善的措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其意义一定会有针对性。

然而，经过切·格瓦拉的实地考察，原来并不像古巴的同志们推想的情况一样，赫鲁晓夫的下台，不过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权力交替。并不意味着任何革命，虽然有革命的形式，却并不具备革命的内容。因此，赫鲁晓夫下台，苏联还是在实行着赫鲁晓夫大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也还是不同于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的。

切·格瓦拉在和纳赛尔总统的谈话中，自然也曾谈到了斯大林。

赫鲁晓夫自称是纳赛尔的忠实朋友、亲密朋友，他还曾把“苏联英雄”的称号和奖章奖授给了纳赛尔总统。但是，纳赛尔始终对赫鲁晓夫怀有戒心，从来不说赫鲁晓夫是他的亲密朋友，他对赫鲁晓夫并无深刻的好感，因此，他对赫鲁晓夫赌天立誓指责罪犯的苏联前领袖斯大林，也并无大深的恶感。

当切·格瓦拉向他谈起斯大林时，他并不讨厌这个话题，甚而他也谈起了这个话题来，说有一次他与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一起，在戴高乐总统向他谈起斯大林时，尽管尽人皆知，在斯大林在世时戴高乐是斯大林的一个十分强硬的对手，死硬的反共人物，总会成为斯大林强硬的对手的。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年代，戴高乐为法国重新争得世界大国的地位，和斯大林曾经进行过绝不退让绝不调和的争斗，当然他有时候斗不过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打败希特勒法西斯德国，他有了更多的力量和王牌，所以，他对斯大林，是怀有许多铭心刻骨的痛恨的。但是，这位曾经痛恨过斯大林的法国总统，在和纳赛尔总统谈到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戴高乐总统说过：“如果二十世纪有伟人的话，斯大林肯定是一个，因为斯大林为世界干下了大事。至于赫鲁晓夫，还看不出他有这种可能，因为他除了揭露斯大林的阴暗面可以算是一个壮举之外，他还干什么事情了呢？他不过是一个跳蚤，连一个杰出的政治家都算不上。”纳赛尔总统这样说过以后，切·格瓦拉也引出一个例子来说，在苏联，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大批斯大林个人迷信时，一个苏联历史时期成长起来的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作家肖洛霍夫，也是苏共二十大的代表。肖洛霍夫二十二岁那年，还是小泥瓦匠时，写出了《静静的顿河》的第一部，当时的苏联“普罗”文学俱乐部——所谓的左翼作家联盟，一轰而上，围攻和批判这部作品，然而，正是斯大林读过这个小泥水匠的《静静的顿河》第一部时，第一个站出来，给小泥水匠和他的这一部作品，写了一封热情肯定的信，这才使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得到了应有的地位。也许正由于有这样的历史根由，所以，赫鲁晓夫全面否定

斯大林时，作为“二十大”的代表和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他是第一个公开反驳赫鲁晓夫攻讦斯大林“秘密报告”的人，他说过：“斯大林不仅有迷信，但是也有个性！”他当然也是在拐弯抹角地维护斯大林，因为在1956年，赫鲁晓夫正是风起育坪之末，人们还不能完全看透他是一股什么风。肖洛霍夫只觉得全面否定斯大林是不道德的，也是不能符合事实的。在俄语中，“个人迷信”的“个人”一词，含有“个性”的意思，所以，肖洛霍夫用这个词来很俏皮地反驳赫鲁晓夫，而且，还并不以此为止，肖洛霍夫还嘲笑讥讽赫鲁晓夫，想从别人那里，偷来人家扔在脚下的王冠，然后给自己戴在头上。

肖洛霍夫对赫鲁晓夫的批判，实在是意味深长的。此后，赫鲁晓夫也许为了附庸风雅，总想把肖洛霍夫引为朋友，访问美国，访问日本，赫鲁晓夫率领的代表团里，总要点缀上肖洛霍夫这一位作家。并且，总以他本人和肖洛霍夫都是顿河的哥萨克，是同乡而搂脖子抱腰，逢人逢机会便夸耀一番，吹嘘一番他们是朋友，可是，对此，肖洛霍夫却从来并不热情附和，他始终也保有着他自己的个性，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

而正是从这个有独立性的思考的人的身上，可以看到对斯大林正确和客观的评价，中国人说斯大林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样的评价，应该说可以认为是杰出的。斯大林也许确实犯过很多严重错误，比如肃反扩大化，蒙受敌人的反好计之骗，妄杀无辜，这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套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也是斯大林建立起来的。列宁曾经一再批判和否定的行政手段，在斯大林时期，事实上被强化了。但是，有一个不能不令人惊叹的事实是：斯大林时期的官僚机制尽管也是越来越完备起来，而监督机制并没有非常广泛地建立起来，同步跟上，然而，斯大林时期的那种官僚机制，却还是多么朝气蓬勃，饱富生命力而多么难得看到腐败现象啊，贪污腐化几乎是罕见的，裙带风，太子党，夫人专政现象，几乎也是没有的，官僚的清廉而刻板有余，谁都不会超越任何规定的享受和待遇，绝不允许有任何人的贪婪和暴富，成为富爷、富婆和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在斯大林时期的国家机制上，由于革命的气氛的强烈笼罩，腐败现象滋生难得适应的气候，所以，虽然那样的国家机制也是官僚机制，但是，国家与革命，似乎还没有形成强烈的矛盾和对峙，这样的问题并没有十分严重而普遍地突出出来，所以，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是不同于赫鲁晓夫时期的社会主义机制的。

而当然，还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机制给赫鲁夫时期的社会主义机制提供了基础和土壤。斯大林之后，由于涤荡了斯大林时期的气候，形成了赫鲁晓夫的新的气候，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官僚主义化，也就成了势所必然的正统。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新领导层，包括阿·伊·米高扬，怎么看，怎么都能看出来他们已经是封建皇帝和帝王一般的人物，怎么看，都能看出他们比资产阶级老爷更像资产阶级老爷。切·格瓦拉和赫鲁夫和米高扬，都打过直接的交道，而且都打过比较多的交道，因此，在很多时候，有过一种思想总是在他与这样的一些人物们面对面的时候，在脑海里索回。他不断地发问：这样高居于上层的人物，还是有下层人民的思想吗？处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脑海里充满了统治的思想，他们还能拥有一垦一点几被统治的人民的合乎常情的对不公不平不义非礼无道的事物的愤恨吗？他们完全还能和革命人民、劳动人民，心气相通，心心相印地站在一起吗？大约是不可能的。他们

已经是神仙皇帝，大资产阶级老爷化了。让这样的神仙皇帝，资产阶级老爷，对内放弃他们贪得无厌的特权，停止他们完全不顾及人民的困难和死活的恣肆挥霍，不再像封建统治阶级一样构筑他们家族的权力的继承和延续，这是可能的吗？对外，他们还能有支援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他们的走狗的斗争的充沛热情吗？他们也许会囿于传统的习惯和要求，作一些适当的样子，也可能会付出一些投入，但是这些样子和投入，能有多少是真诚的，全心全意的，全力以赴的呢？

比如在刚果，如果赫鲁晓夫能全力以赴，作出一些全心全意的支援，刚果革命人民的领袖怎么能被帝国主义所杀害，怎么能把一场形势大好的革命运动，一场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斗争，最终演成一场十足的悲剧呢？

从这些侧面，不是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也会产生与革命冲突和对峙的端倪吗？

那么，到底该怎样解决这样的国家与革命的矛盾和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样的矛盾和问题呢？

切·格瓦拉有志想着进行这方面的探索，他有志于从国家权力的至高无尚的殿堂再走到统治权力笼罩着的人们中去，投入到反抗帝国主义实行着奴役和压迫的国家人民的反抗斗争中去，再成为一个普通的革命者，成为一个普通的横扫不平、伸张正义的战士、重新享有纯洁的革命者的欢乐，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切·格瓦拉可不可以使自己成为这样的一面旗帜和榜样呢？

切·格瓦拉向往着这样的实验和探索，他将绝不畏惧地勇敢投入这种探索，他宁肯进行无条件的放弃权力，放弃很大权力的实验。他宁肯投身到崭新的革命暴风雨中去，重新做一个除了革命思想和勇敢精神，除了斗争的志气和夺取胜利的抱负，除了拥有斗争武器以外，什么也不再拥有的纯洁的革命者。

当然，切·格瓦拉产生这样的思想和意志，实行这样的行动，也自然并不是为着个人的净化心灵，自我完善的需要。作为他这样的杰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家，成熟的无产阶级国家的领导人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和行为，总是和整个人类的进步事业联系在一起。他想他有必要探索一条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永远融为一体的道路，他想锤炼一种革命领导人革命的激情永远能压倒或抑制统治欲和权力欲望的心灵，他想知道怎样可以永葆革命的青春和热情，怎样又可以永葆革命的坚贞和纯洁。

当然，除了这样的精神情愫之外，他自然还会有一些实际的追求、自然也还会有一些实际期望的目标。

他的行动并不是他完全的个人的兴趣所在。他全力以赴支争取的事业，完全是革命的需要。他的行动并不是个人的行动，而是肩负着革命的任务去战斗。

为着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早在 1960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周密策划派遣雇佣军入侵古巴，开始对招募来的雇佣军进行训练之时，使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们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为训练雇佣军选择的场地，会不会招来可怕的、严重的后果和麻烦。

虚伪的美帝国主义不肯在美国的本上建立大规模的雇佣军训练营地，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既要作婊子，又要立牌坊；既要办坏事，又怕坏名声；既要搞侵略，又怕摊侵略者的罪责。但是，这也还不是美帝国主义统治者的全部担心，他们还担心另外一件事，这就是也担心别人也来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美帝国主义也就害怕古巴训练美国的“黑豹党”，来到美国打游击，也到美国来搞武装斗争。

所以，美国佬把入侵古巴雇佣军的训练营地，确定在了危地马拉最偏僻难为人知的山地峡谷和荒岛上，确定在了波多黎各的比耶克斯岛，以及尼加拉瓜的一些地方。

美国在这些加勒比海的各个小国，豢养的走狗，是完全操纵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手中的。但是，这些小国家的走狗们，几乎也都一致地向中央情报局表示着一种担心，而中央情报局事实上比他们还要早一些，已经在产生着这样的担心，他们的这种担心就是：他们害怕在哪个走狗国家训练入侵古巴的雇佣军，便会在哪个走狗国家招惹来由卡斯特罗派遣的，切·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

美国中央情报局知道切·格瓦拉不仅是游击战专家，从理论到实践，他都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典范和权威。同时，他们知道古巴革命后，古巴领导层的分工，切·格瓦拉不仅主要负责古巴的经济工作，他也主管着对外事务，特别是他还主管着、领导着古巴已全国的所有准军事组织包括民会组织，预备役军人组织，军事动员组织。从这些组织中组建的游击队，进入训练入侵古巴雇佣军的国家来打游击，搞报复性的活动，或者干脆就以此为契机，展开在这些国家的革命，完全是一种可能被激发的行动。

因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一些国家的走狗们，对这一点担心的紧，骇怕的紧，他们是充满了恐惧的。

那么，既然这是敌人的一个痛穴，既然这是敌人腹部的软组织，作为如此凶恶顽敌的对头一方的古巴方面，会不会想到和考虑到敌人害怕打哪儿，偏偏就打哪儿的出拳方位和手段呢？

这当然是无需说的。

善于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古巴领导人，同时是富于斗争策略和战斗艺术的。

因此，连傻子都能想到的事情，古巴领导人们，不会不能想得到。只是，他们也许想得更深一层，当时，他们可能想到了这样出手制敌的方法，但是他们可能进行了克制，为的是避免授人以柄，给敌人冒犯和入侵提供一个借口。

不过，猪湾事件以后，这样的借口就再也不能成立了。猪湾事件，美国佬组织雇佣军，利用它的仆从国的走狗，来冒犯和入侵古巴，他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破坏了国际秩序的规矩。古巴人自然也就有理由来破坏这本来就令人不满的国际世界秩序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和压迫的秩序，本来早就应该打破了。因此，由于帝国主义和他们走狗的蠢举，他们派遣雇佣军入侵古巴的行动，事实上也就是对古巴革命者发出的永远有效的对

他们进行革命的邀请。1961年4月的美国中央情报组织雇佣军人侵古巴，给古巴无条件进入自人美帝国主义控制的一切仆从国家开展革命活动打开了大门。

美国佬不能只搞州官放火而不容百姓点灯。

从哪里开始组织反革命，就可以针锋相对地去哪里组织进行革命。有压迫就有斗争。对于站起来的革命人民来说，压迫是不行的，压迫只能引发斗争，永远的压迫，就有永远的反抗和斗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将是必然的状态，这将是不可制驭的状态。

因此，如果说，在猪湾事件发生之前，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他们的走狗最担心招来切·格瓦拉的游击队之初，古巴人并没有在他们想到的时候，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古巴人不能让他们掌握有根灵的预见性。

但是，从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以后，古巴革命领导层，开始对古巴面临的形势，为了生存和发展，进行更为广泛的革命手段的选择，产生着了十分深刻的考虑。

面对着如此横行霸道、究凶极恶的美帝国主义，古巴不能不对自己的命运寄托有更多方位的考虑。

通过1962年的导弹危机，古巴人发现，依靠别人，是绝对不行的。赫鲁晓夫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可以依靠和信赖的人吗？他气壮如牛的时候，仿佛完全可以依靠，好像他会是强有力的，而他胆小如鼠，还没有怎么地就屁滚尿流的时候还能指望可以依靠他、借助他的力量来支撑和帮助吗？那几乎就是完全不能够的了。

所以，古巴人不能不多想一些门道。

想什么样的门道呢？

门道当然很多，很多。

大约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从导弹危机之后开始，其中所想到的门道之一，大约就包括切·格瓦拉放弃古巴国籍，放弃古巴党和政府中的高级职位和古巴国家的当时最高军衔，放弃与古巴的任何法律上的关系和牵连，然后去开辟新的战场，开辟新的大地。

古巴在拉丁美洲的斗争中，是不能孤立的。古巴在针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反抗斗争和进攻中，应该能形成犄角力量，应该形成先锋和后卫的部局，不能总是横站和独力支持。

出于这样的考虑，最高领导核心大约同意了切·格瓦拉的这样的建议，同时确定了由切·格瓦拉来主持这方面活动的全权策划，他不仅具有这种全权策划的非凡能力，同时也有这方面的绝对权威和资格。

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切·格瓦拉的绝对信赖和依恃，是绝对无可置疑的。

由于有了这样的策略，事实上1962年年底古巴导弹危机全面结束以后，从1963年的年初开始，切·格瓦拉在哈瓦那，就开始独立地组织着一个班子，组织着一套人马，开始了一系列的高度机密的组织工作。

最初，是由几位从古巴革命军中抽调选拔出来的精干的上尉，来充当切·格瓦拉的助手，协助格瓦拉展开在这方面的工作的。

最初的工作，主要是两项，第一项是全面地掌握拉丁美洲帝国主义走狗统治的部分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等诸多方面的情况，第二项就是组织适合到古巴以外的地区开展工作的队伍。

这两项工作，最初是在切·格瓦拉的指导下，由他的主要助手们来实施

进行的。

也就在这时候，一个尚未取得古巴国籍来到古巴居住的外国共产党的女共产党员。通过工作联络，被组织进入了这个切·格瓦拉领导下的特殊部门工作。

这个外国女共产党员的真实名字叫塔玛拉。

一开始，切，格瓦拉没有直接接触她。一开始和她建立联系的是格瓦拉手下的助手，是那些年轻精干的上尉们。

这一位塔玛拉，当时具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籍，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籍。

塔玛拉的爸爸妈妈都曾是德国共产党的老党员，1935年，希特勒在德国实行白色恐怖，到处搜查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塔玛拉的爸爸埃里希和母亲娜佳，逃出德国，迁徙到南美洲的阿根廷来投亲靠友，并在这里立下脚来。埃里希后来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语言学教授。他和他的妻子娜佳，始终不渝地坚守着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1937年，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生了女儿塔玛拉。

因为塔玛拉是在阿根廷出生的，所以，她也拥有了阿根廷的国籍。

她的父母在阿根廷，后来也与这里的共产党组织发生了联系。仍然坚持着革命活动。

1952年，埃里希一家举家迁回了民主德国，他们又在东柏林落脚下来。埃里希和他的妻子仍然在教育部门工作。这时候，塔玛拉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她在阿根廷受完了中学教育。回到德国后，她就考入了柏林洪堡大学的语言文学系。

塔玛拉生得十分漂亮而且聪明，婷婷玉立，苗苗条条，健康而结实。由于她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她从很小开始便很有思想，很富于政治生活的热情，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并且，她也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和大量的文学书籍。其间她强烈地喜欢着一些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比如《青年近卫军》、《毁灭》、《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以及《绞刑架下的报告》，这些书籍对她的影响是很深刻的。

塔玛拉生性活泼、热情，喜欢音乐、舞蹈，弹琴唱歌，她都很有两手，而且，她酷爱体育运动，长跑、短跑、体操、跳高、跳远，还有一些球类运动，打网球，打排球，她都热衷而且练就一定的水平。

她在大学一年级的時候，加入了德国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她由于政治上的成熟，成为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员，她开始成为一个热情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外事部门工作。由于她是出生在拉丁美洲，出生在阿根廷的，她能非常熟练地掌握西班牙语和法语，同时，也十分明白拉丁美洲的一切风情民俗，比较熟知拉丁美洲的情况。正因为如此，1960年初，当一个古巴革命政府的科学教育代表团访问民主德国时，塔玛拉成为了民主德国有关部门的一名接待成员，并且充当接待代表团的翻译。

当时，访问民主德国的这个古巴代表团的团长，是古巴科学院的院长安东尼奥·努涅斯上尉。

努涅斯上尉当时已经是一位中年人，他的文化水平很高，在参加古巴革

命之前，已经是拉斯维利亚斯大学的教授，后来参加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地下组织。1958年第三季度，当切·格瓦拉带领第八纵队进军来到拉斯维利亚斯省后，他就投奔到第八纵队来参加了武装斗争，当时，切·格瓦拉任命他为第八纵队的作战参谋，并且授予上尉军衔，在解放圣克拉腊的战斗中，他身入虎穴，作为格瓦拉的全权代表，劝降了该市最大的要塞兵营，因而立下了很大的战功。同时，也进一步成为了切·格瓦拉的得力助手。

努涅斯上尉是切·格瓦拉的下屬和亲密战友，他率团来民主德国访问，其间遇到了切·格瓦拉的女老乡塔玛拉，他们自然会十分热烈地谈论起切·格瓦拉来。而谈起切·格瓦拉来，自然也会谈起古巴革命决定性胜利的时日里的许多惊心动魄简直传奇般的动人故事，努涅斯和塔玛拉谈话不存在语言障碍问题，他们可以交谈得十分透彻而投机，英雄的古巴革命事迹，马上激起了塔玛拉对古巴的无比向往。

1960年12月，切·格瓦拉率领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苏联、中国之后，来到民主德国访问。塔玛拉作为接待代表团的翻译，她参加了接待切·格瓦拉访问柏林的工作，使她见到并且熟悉了她其实早已熟知并且无比敬仰着的这位古巴革命的英雄。

切·格瓦拉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了这位年轻的德国女革命家。她当然也和格瓦拉谈到了她曾经在阿根廷生活的经历，当然，这也引起了格瓦拉的兴趣。接着，塔玛拉就充满激情地向格瓦拉提出到古巴革命斗争前线去参加战斗工作的请求，格瓦拉向塔玛拉强调了当时古巴作为革命的前线国家，斗争任务的严峻和斗争生活的艰苦，所以，当时并没有答应塔玛拉的请求。

但是，强烈向往着投入革命战斗，充满理想激情的这位德国姑娘，充分地利用了她同时是阿根廷生人的优势，她的语言会话能力和生活习惯，都不会给她造成障碍使她来到令她神往的革命的古巴。最终她还是想方设法，使她如愿以偿，来到了古巴。

古巴在革命胜利后，最突出最中心抓的几项工作中，土地改革和全面扫盲教育，是尤其强调的。知识分子的缺乏和需要因而被珍视和欢迎，是自然的。当时古巴对拉丁美洲的所有教师和医生，几乎都敞开着进入的大门。于是，塔玛拉被欢迎来到哈瓦那，她首先在教育部门找到了工作位置，她当时既是个大姑娘，也还是个小姑娘，只有二十三岁，精力十分充沛，所以，除了干一份工作之外，她还考进了哈瓦那大学新闻专业学习进修。她也参加了哈瓦那的部门民兵组织，参加那里的军事训练，她不怕苦不怕累，同时也由于她有体育锻炼出来的好体力，她总是争先恐后地积极参加各种各样的义务劳动，她最爱干的活计是到甘蔗田里砍甘蔗，她最喜欢吃得食品，也就是啃甜甘蔗，真是既是饮料，又是面包。

塔玛拉很快成了哈瓦那的一个小有名气的明星。

她和切·格瓦拉有过联系，但是，很难得见到切·格瓦拉。切·格瓦拉在古巴，可以说是最大的忙人之一，可以想象他肩负着多少职务，他总是肩负着十个以上必须做实际工作的职务，而且，几乎都是主持工作和领导工作的职务。有一些工作职务是无形的，但几乎是更为繁忙的，比如意识形态和外事工作，所有宣传出版广播影视书刊印刷，几乎无不在他主管过问之列。外事工作更是繁忙，他是众所周知的不在位的外交部长，所有的外国代表团、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他都在接待者之列，有些外国代表团也奇怪，访问古巴时，好像不见到菲德尔、劳尔和切，就硬是不肯离开。所以，

塔玛拉难得有见到格瓦拉的机会，但是，有时她也会偏得，民主德国的各种革命代表团，几乎每年都有几批来访古巴，这时候，塔玛拉总是被请来作翻译工作，在这样的时候，在切·格瓦拉接见德国同志时，塔玛拉经常也就有能见到切·格瓦拉的机会了。

塔玛拉不仅因为与切·切瓦拉有联系，而被格瓦拉手下的助手们所熟悉，她和努涅斯上尉的频繁联系，也使他熟悉了许多格瓦拉的老部下，主要是在第八纵队干过的一些老战友和老同志。

这样，在进入1963年年初的时候，当初，格瓦拉领导下的一个特别行动组已经成立起来以后，在协助格瓦拉组建队伍的上尉们看来，塔玛拉既然是个外国人，既然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拉丁美洲的天然公民，所以，认定她可以是一个被吸收进入格瓦拉特别工作组的对象。

恰好在这时候，一个尼加拉瓜的革命组织，准备吸收塔玛拉到尼加拉瓜去参加那里的桑地诺革命阵线，塔玛拉表现出了积极参加的热情。这样，格瓦拉下属的上尉们，认准了塔玛拉是一个有志于参加革命地下工作，有志于完成艰巨任务的战士材料，因此，便也向她提出建议，请她来参与他们正在进行的秘密工作，塔玛拉当然欣然答应，甚至是喜之不尽的，因为她终于找到了为人类最伟大的解放事业去战斗和去献身的机会。

虽然，这时候，上尉们还没有告诉塔玛拉，她参加的是由切·格瓦拉直接领导和指挥的特别行动组织。

长时期的艰巨的战斗和斗争生活，培养和训练了古巴革命者最卓越最超凡的进行秘密工作的能力。他们执行着保密工作的铁的纪律和保密工作完备的铁的原则。他们的任何秘密机关，火候不到时候，是绝不随便揭开的。

塔玛拉在完全不知道她已经是切·格瓦拉直接领导和指挥下的特别行动组织的成员，开始接受秘密工作的严格训练。她被训练使用密码书写的技术，她被训练使用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她当然还被训练驾车、驾机和熟悉各种武器的使用，她被训练掌握秘密工作的反映、判断的能力和行动的规则，行动的铁的纪律。

所有这些训练工作基本结束以后，塔玛拉被派遣到西欧国家执行秘密任务。这些任务，有的是她经过适当的努力，轻易便可以完成的，有的是完全给她出的难题，是很难达到目标，甚至几乎是完全达不到目标的。塔玛拉在领受和执行这些任务时，完全不知道这是派遣她去作秘密工作的演习，完全不知道这是派遣她去适应秘密工作的生活，完全不知道这只是在考验她的品质锻炼她的能力。她最明确清楚知道的是，在她前往西欧进行这场演习和锻炼的时候，她已经不再是塔玛拉了，而是已经变成了塔尼娅。她的护照，也不是古巴签发的，而是另外一个南美国家签发的。她的身边，她的家族历史，自然也都不是实在的真实的了，而是完全变成了像是一部小说一样虚构的人物角色，只是每一个细节都合情合理，完全的天衣无缝。

塔玛拉，从此完全变成了塔尼娅。

塔尼娅似乎比塔玛拉更聪明了，特别是，更机警了。

她一切完全遵照秘密工作的规则行事，她的所有活动都没有出现任何麻烦和漏洞，看起来她是一个做秘密工作的天才。

在她进行整个演习和锻炼期间，切·格瓦拉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们，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秘密的，对她实行了配合。当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测验和考察。

测验和考察的结果，当然也是令人满意的。

大约半年以后，塔尼娅又回到了哈瓦那。

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她返回到哈瓦那以后的第二天，她被通知到古巴政府的工业部来，她被陪她来的上尉，领进了一间不大的，设备完全谈不上像样的房间。

切·格瓦拉已经在这间屋子里等着她。

格瓦拉请塔尼娅在椅子上坐下。

塔尼娅不知道该向切·格瓦拉说什么话。她只是感到非常惊奇，格瓦拉怎么会单独接见她，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重要了昵？

切·格瓦拉首先向她一笑，说：

“塔尼娅同志，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您一直是在我的领导和指挥下进行工作和学习的。您的一切情况，我是都了解的，我都已经知道了。”

塔尼娅感到惊诧。她瞪起了圆圆的，像是多瑙河水一样晶蓝的蓝眼睛，她眼叮叮地看着切·格瓦拉只说了一声：

“是吗？”

格瓦拉一笑，说：

“当然。”

塔尼娅立时感到激动和幸福。她真没有想到，她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在切·格瓦拉的直接指挥和领导下从事着工作和学习，这也真是太神圣、太伟大了。

于是，她说：

“我真完全想像不到。切·格瓦拉同志，我真是太幸福了！”

切·格瓦拉说：

“我将完全不能保证您的幸福。相反，我们要您去执行的主要的任务，将可能是十分困难，十分艰巨，也是十分危险的，你必须要有完成任务的决心，也要有着作出牺牲的准备，这可能是最难的。”

塔尼娅说：

“不。切·格瓦拉同志，这样的准备，在我奉命到西欧工作的时候，就已准备好了。您想问我怎样准备的吗？需要不需要我先向您背诵一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呢？”切·格瓦拉说：

“为人类最伟大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一切，直至生命。这是无需经常背熟在嘴上的，但必须是常埋在心，必须是坚定的，准备必须是十分充分的。这样，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就能够无所畏惧，一往无前地前进，否则，动摇和摇摆都是可能发生的。而我们现在要你去执行的使命，任何的动摇和摇摆，都将是致命的，都将是危险的。”

塔尼娅大睁着眼睛说：

“我坚信，我不会发生这样的致命的危险。我相信我能完成一切任务。我并不想死，而且，我想活得更美好、更幸福。但是我决不怕死。作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同志，我甚至愿意向格瓦拉同志作出个人的忠诚的保证，我将完全愿意无条件地完成您交托给我的任何革命的工作和任务。希望您能完全的信赖我。”

切·格瓦拉说：

“我们已经在完全信赖着您了。塔尼娅同志。”

接下来，切·格瓦拉向塔尼娅交待了派她到玻利维亚执行特别使命的问

题。

这是在 1964 年的 10 月。

塔尼娅

在塔尼娅和格瓦拉谈话，领受使命之后，她又有了另外的名字和身份。她又被叫成了劳拉·古斯特雷·鲍尔，她的出身，也不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而是变成了阿根廷的一个大牧场主的家庭，她的父母被说成是阿根廷人，只是她的母亲还被说成是德国人，以此标明她的德国血统的来历。她俨然打扮成了一个阔绰的富家小姐千金，衣着考究而华丽，仪态非凡不俗，她已不持古巴国家的护照，而是持着南美洲其他国家的护照，以历史学家和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于1964年的11月间离开哈瓦那，沿途来到了南美洲的国家秘鲁的首都利马。

她在利马游玩了半个多月，实际上自然是在演习，以使她能够完全自然地进入秘密工作的状态。

她自我感觉良好，感觉到自己已经能够十分自然地把握自己扮演的角色了，她迫不及待地急于走上舞台。1964年11月18日，她终于又从利马来到了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

其时，玻利维亚正好从刚刚发生过的一场军事政变的政治动乱过后，开始稳定下来。

前不久，仅仅就在不到二十来天前的时间里，这里的玻利维亚的“猩猩党”，美国的十分忠实的走狗雷内·巴里恩托斯·奥图尼奥将军，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具有民族主义，民主倾向的前总统帕斯·埃斯登索罗政权，由这位巴里恩托斯将军跃上了总统的宝座。成为了玻利维亚的新的统治者，同时，马上开始推行着军事独裁的专政，大批军人，涌进了玻利维亚的国家政府机关来工作。

这种局面，很利于塔尼娅在拉巴斯迅速地安顿下来，迅速地打开她的活动局面。

一般的说，军人的自然天性，似乎都特别喜欢美人和骏马。

塔尼娅来到拉巴斯，无疑是一个光灿耀眼的美人。

她住在拉巴斯最豪华排场的饭店里，作为一个花销阔绰富有的单身活动的女郎，她在出入俱乐部，娱乐场寻开心的时候，自然也就成了军人新贵们注目和追逐的一个目标。

因此，很快，塔尼娅和新的总统府的新闻和情报处长贡萨洛·洛佩斯就搭上了关系。当然只是从认识到深交，开始成为朋友，但绝不更深入一步。塔尼娅能很好地把握分寸。

塔尼娅结交认识了这样的人物。她自然也就掌握了一把打开与拉巴斯更多的权贵交际的大门的钥匙。

她如此年轻漂亮，楚楚动人，仪态高贵、富足而阔绰，这都有诱人的魅力，特别是她熟练地掌握着好几种外语，她和这里的任何人谈话和交际，都不存在任何隔阂和障碍，都可以十分自如。而还有一个特别的优势是，她的德国血统，在玻利维亚军界，是尤其受到推崇和尊敬的。因为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许多年来，玻利维亚的军队，都是聘请德国军官来训练和指挥的，玻利维亚的军规制度，一直照抄着德国的军规制度，他们把德国的军规制度，一直崇拜为玻利维亚军队神圣信条，他们对德国人的崇拜迷信，是相当深刻的。这大约还因为在玻利维亚现代史上，有过一个最有作为，也最得人心的总统，他就是1937年到1939年间在玻利维亚当过总统的赫尔曼·布莱希中校，而这个总统，虽然确系玻利维亚人，但他确实也还是一个德国人的儿子。

由此，德国血统在玻利维亚更受到特别的尊重，而德语，自然也便在玻利维亚受到了重视。在阿根廷和其他南美国家，除了通用西班牙语以外，因为往昔的西班牙贵族崇尚法语，所以法语也相当流行，在玻利维亚，法语自然也有一席之地，但是德语，却因为现代历史的影响，似乎更具被推崇的地位。

而所有这些，都为塔尼娅在这里开展活动凭添了优势。

凭着她与总统府新闻和情报处长贡萨洛·洛佩斯的关系，塔尼娅很快成了玻利维亚一家官办的周刊社的编辑和记者，她同时又在玻利维亚教育部得以安排了一件差事，她被特聘为给政府的部长级以上高官们的子女讲授德语课的教师，而有了这个渠道和便利，她可以把她的脚下路径通向到玻利维亚更高统治阶层的台阶上去了。

她特别结识了玻利维亚内政部长兼司法部长安东尼奥·阿赫德斯的私人女秘书安妮塔·海因里希。海因里希经常招乎和照顾阿赫德斯的子女们来塔尼娅这里学习德语，所以，海因里希和塔尼娅结识，并且成为好友，便也有了机会。而且，因为海因里希也是一个有德国血统的女子，因此也更容易和塔尼娅非常地亲密起来。

这样，海因里希自然也就把塔尼娅引荐到阿赫德斯部长那里。

阿赫德斯部长立刻也被塔尼娅的魅力所吸引，他马上主张把塔尼娅也吸收到他内政部属下的机构里来工作，阿赫德斯听着塔尼娅的语词清浙、声韵优美，就建议她到内政部的广播局来主持电台的节目。

这样，塔尼娅便在拉巴斯的国家电台，也找到了一个位置。她主持的节目是妇女问题的节目，凭着塔尼娅广阔的思路，她用少许聪明，就可以把这个节目办得颇具特色，广有影响，她成了拉巴斯很有名气的女明星，以至在一次很盛大的总统府宴会上，巴里恩托斯总统亲自向塔尼娅发出参加宴会的邀请，并且，在宴会上一见塔尼娅便叫出了她此间公开使用的名字：劳拉·古特雷斯。并且，立刻向她大声地，唯恐别人听不到地宣布：他是她的朋友，他是她的很好的朋友。

这时候，无疑，塔尼娅在拉巴斯，已经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她几乎开始对玻利维亚的一切了如指掌，她差不多能够完全随心所欲地掌握玻利维亚国家的一切底细和情报了。

但是，尽管如此，她还没有玻利维亚国籍，她仍然被叫作是外国人。

她在离开哈瓦那时，曾经得到过指示和允许，在感情需要和工作生活需要时，她可以寻找适当人选恋爱和结婚，但是这样的结婚和恋爱，都不能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不能有碍于执行使命，不允许暴露任何秘密，包括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真正的来历。

因为有着这样的指示和活动余地，塔尼娅后来认为有必要取得玻利维亚国籍，于是，她就选择了一位还堪可爱的玻利维亚大学生，名字叫马利奥·马丁内斯，和他恋爱、结婚。在举行结婚登记的同时，她便同时拥有了玻利维亚国籍。

这时候，大体已是她来到玻利维亚一年多时间以后的事情了。

在这个期间，哈瓦那几乎和她绝无进行任何联系。

她好像被遗忘了。

但是她非常清楚，她无比想念的哈瓦那，绝不会忘记她。

她甚至有的时候能感觉到，哈瓦那仿佛经常就在她的身边，她知道哈瓦

那的聪明极至，世界上的任何人，几乎都是不能比拟的，特别是哈瓦那的坚持和忠诚，简直可以说完全是纯粹的。因此，她也很期望着自己，能够同样地纯粹起来，而且，由于她已经过了训练和考验，在这个纯粹起来的过程中，她能保持着巨大的克制和耐心。

她俨然尊守着秘密工作的铁的纪律，绝不主动出击，绝不和任何组织、团体和个人进行未经授命的任何与秘密工作任务相关的联系。

因为心中有团火，她自然也不会寂寞。

她不急不燥，始终尽心尽力，极有分寸，神情自若地扮演着她的角色，她一直在默默地、安心地静静地等待着。

她准备着等待漫长的时间。

对此，她也是心中有备，是无可畏惧的。

然而，忽然，有一天，在她完全不经意的情况下，在她从拉巴斯内务部广播电台下班后走出大厦，来到大街上的路径上时，一位路人仿佛是偶然与他同步并肩而行。此人也是西服革履，一脸富相，一身贵气。他连头也不扭，突然用似乎仅能使她听到的声音，说出了一句她盼望已久的联络暗号。

按照规定，她立刻开始查着这个人行动的步伐。终于，她还看到了此人在又走出到几步以外后，作出了一个几乎是很难令人觉察的形体动作。

一切都完全对上了联络信号。

塔尼亚马上随上这位文质彬彬的坤士，并且挎起了他的胳膊，随他来到了一个已经有夜色笼罩着的广场露天酒吧的双人圆桌上来。

他们面对面坐了下来。

他们仅要了一杯不加奶、不放糖的咖啡和一杯柠檬汁。

塔尼亚尽管训练为素，但是她仍然禁不住心跳出声，也许是因为过分的激动，也许是因为过分的紧张。

坐下来后，她仍然认不出对面与她坐着的这位坤士，是不是曾与她似曾相识。

后来，还是对方平静的，甚至是平淡的，几乎是慢条斯理的说话声，使她自然一惊：

“上尉！，是您呀！”

对方冷静的回答是：

“我是里卡多。里卡多，从西班牙来此定居的土地经营商。”

塔尼亚明白了。她轻轻地，仿佛若无其事地点了点头。

塔尼亚主要是从声音，而不是从面孔上，知道了在她对面坐下的，原来就是切·格瓦拉的特别行动组的主要助手之一何塞·马丁内斯上尉。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当过古巴革命空军的飞行员，也当过古巴起义军坦克部队的指挥员，他是参加过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的老战士。在解放战争年代，曾经是另一位著名的古巴伟大革命英雄卡米洛的得力助手，他是古巴最早进入秘密工作组织的先锋，已经到过许多地方，支援过许多兄弟国家革命者开展的斗争，有着非常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

不用多说什么，塔尼亚已经完全明白了，随着这位了不起的，能干的，切·格瓦拉的干将的出现，一场大的活动和行动的序幕，大约已经是在玻利维亚的空间里拉开了。

想到此，塔尼亚不仅激动万分，而且激动不已，她渴盼的时刻，战斗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走向新的战斗生活

1966年11月初，切·格瓦拉出现在了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的街头。他也完全像个阔绰的商人，西装革履，仪态不凡，在拉巴斯走街串巷，考察这里的民俗和民情。

1952年，作为年轻的大学生，实习的外科医生和探险家，格瓦拉和他永生的好朋友阿尔维托医师，曾经漫游过玻利维亚，来到过拉巴斯。

今天，切·格瓦拉重返拉巴斯，他可谓是旧地重游。

令格瓦拉惊异的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整个外部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比如吉巴，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新生景象，可是，在拉巴斯呢？依然如旧，一片死气沉沉，到处是破旧脏乱的街巷房屋，所有的人几乎都无精打采，懒懒洋洋的，生活实在太阴暗太晦涩了。这气象，可以充分说明帝国主义和它们的走狗，在这里仍然继续着怎样的黑暗统治，残酷剥削和压榨的罪行。

切·格瓦拉是有兴趣深入考察一番拉巴斯的。他很想仔细考察一番这里的政治、经济形势。

但是，考虑到安全，他还是不能在拉巴斯久留，而是仅把拉巴斯作为匆匆忙忙的过站，基本上是在这里打了一下尘，然后就匆匆忙忙又离开拉巴斯奔赴来到远离拉巴斯，位处在玻利维亚中心南部地区的已经在开发中的，尼阿卡瓦苏河畔的游击队营地。

切·格瓦拉当然不是单人匹马，独来独往，单人行走的。

塔尼亚在切·格瓦拉来到玻利维亚之前，已经展开了大量的，有效的基础性的工作。

堪称是秘密工作专家的里卡多即何塞·马丁内斯上尉，在前期来到玻利维亚时，就已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而且，在里卡多之后，化名庞博的加里·塔马约上尉，和化名图马的卡洛斯·科埃略中尉，也已经先期进入玻利维亚。这些人，都是切·格瓦拉的老部下和爱将，都是一些能征惯战的好手。

迎接和具体负责警卫切·格瓦拉从巴西进入玻利维亚，进入拉巴斯，并且陪同切·格瓦拉来到游击队营地的，是已经化名叫帕乔的阿尔维托·奥卡上尉。他也已经是久经锻炼和考验的秘密工作专家，他已经几出几进玻利维亚，几出几进拉巴斯，完全把来往的路途都踏熟了。

他陪同切·格瓦拉进入玻利维亚之前的最后一次进出拉巴斯，仅仅是在两个多月之前，那一次，他是持着乌拉圭的护照，由智利飞到拉巴斯来的，他最后一次踏查进出路线万无一失，他才又飞到了巴西，接来了切·格瓦拉。在拉巴斯，切·格瓦拉平安小住两日以后，帕乔就一切按照事前安排好的程序，和一直在拉巴斯等待着切·格瓦拉到来的加里·塔马约上尉，卡洛斯·科埃略中尉，也就是庞博和图马会合，驾驶两辆吉普车，扮演成一支科学考察队或巡回医疗队的样子，驰离了拉巴斯，经过科哈班巴省的省会，经过圣克鲁斯城，然后平安到达了尼阿卡瓦苏河畔的“卡拉米那”庄园。

这个“卡拉米那”庄园，是在里卡多来到玻利维亚，和塔尼亚建立起联系之后，在迅速展开的行动中，经过一番实地的踏查，然后开拓建立起来的。

里卡多完成联络任务以后，紧接着庞博和图马到了玻利维亚，他们在玻利维亚境内进行了一场紧张的考察和漫游，他们选择了在玻利维亚建立游击中心的地场。

最初，他们看中了玻利维亚北部的上贝尼省地区。但是，后来他们还是选中了玻利维亚南部的尼阿卡瓦苏河畔，因为这里地势险峻，人烟稀少，丛林茂密，适合游击队的存在和活动，而且，这里邻近阿根廷，进出阿根廷也比较方便。

他们选好这个大的地场和方位后，就由玻利维亚人科科·佩雷多出而，花销两千五百美元，买下了这里的一个已经开发出来的农场，这就是“卡拉米那”农场。

这个“卡拉米那”农场，拥有一千二百二十七公顷土地，这是一个很辽阔的范围。但是，农场本身没有居民，只有一排空落落的房舍。

它的附近有两个小小的村镇，一个是拉古尼利亚村，另一个是古铁雷斯村。

在“卡拉米那”那排空落的房舍远处，大约是在三公里之外，不久前也建起了一幢房舍，那是过去玻利维亚地方政府的一个官员，名字叫西罗·阿加尼亚拉斯的房子。此人就在离此不远的丘基萨卡的卡米里市当过法官，在那里还开过肉铺，作过生意，所以，当官作买卖，都敛了一点钱，于是，便在这边也买下了一大片土地，当起了这边富有的大地主来，在他的自己的土地上，也建造起了一个庄园，营造起一个土地主的王国来。

后来发生的悲剧证明，这个官僚资产阶级加上土地主的家伙，确实不是革命者们的芳邻，而是革命者们一个死敌。

这个阿加尼亚拉斯法官，虽然不再在卡米里拥有官职了，但他和卡米里市，始终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既有经济上的联系，也有政治上的联系。

卡米里市，是一个不大的小城市，但是，却是玻利维亚南部驻军的一个中心。玻利维亚陆军第四师的司令部，就设置在这里，阿加尼亚拉斯和第四师的军官们，有很多的过往和联系。

也许这是当时革命者们所始料不及的。

用一个玻利维亚人的名份买下的“卡拉米那”农场的科科·佩雷多，是一点假也不参的真正的玻利维亚人。

科科·佩雷多有两个哥哥，其中一个 是安东尼奥·佩雷多；一个是因蒂·佩雷多。

安东尼奥·佩雷多，就是塔尼亚任职的拉巴斯广播电台的上属的内务部广播局的局长，这人是一个职业的公职人员，非军人，是知识分子，是前政府留下来的官员，有进步思想，不是反动分子。

他们两个兄弟因蒂和科科，却完全是两个革命分子。

因蒂和科科，都是拉巴斯大学的学生，从来就是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因蒂很早就成为玻利维亚共产党的成员，一开始的时候，负责玻利维亚的学生工作和青年团组织工作，后来还曾是玻利维亚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并担任过玻共拉巴斯委员会的组织书记，算是玻共的重要干部。

他的兄弟科科，也曾是玻利维亚共产党领导下的共青团的领导人，是一个十分向往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年轻人，曾经两次访问古巴。古巴革命的英雄们，令他崇拜不已。特别是切·格瓦拉的个人品格和魅力，对科科有非常深刻的吸引，他从古巴返回拉巴斯后，他也学习桔瓦拉早年锻炼自己的作法，去充当过内河轮船的水手，当过货车司机和捕鳄者，在冒险生活中锻炼自己。

由于科科和因蒂是这样的一些人物，塔尼亚经过他们的兄长安东尼奥的介绍认识后，并没有马上动声动色地和他们进行深入的接触和交往，后来，

当里卡多在拉巴斯出现以后，经塔尼亚介绍他们认识后，经过里卡多的多方考虑，因蒂和科科，也才被同时吸收到了玻利维亚特别行动的组织中来。

当然，这时候他们仍然只与里卡多建立了联系，他们还完全不知道塔尼亚也在这个联系网上。

后来庞博和图马也来到了拉巴斯，他们带来了比较丰裕的一些活动经费，他们和因蒂、科科兄弟联络起来，展开了活动，后来经过一番周折安排，就物色并买下了“卡拉米那”这一个农场，确定在这里建立玻利维亚的游击中心基地和大本营。

其间，帕乔和里卡多，也都来过这个地场，很仔细地踏查过这里的环境。首先由里卡多返回到切·格瓦拉的身边，向格瓦拉仔细汇报了情况，切·格瓦拉认为此处与马埃斯特腊山区颇多相似之处，于是，就同意了此处作为中心基地的计划。之后，约定好行动的时间和步骤，切·格瓦拉迅速离开古巴，转道巴西圣保罗市和帕乔汇合在一起，在帕乔的陪同和警卫下，来到了玻利维亚，进而来到了这里，来到了“卡拉米那”。

给双亲的一封信

1966年11月7日深夜凌晨两点钟，切·格瓦拉在帕乔、庞博和图马等人的陪同下，到达了“卡拉米那”那一幢原来是空落落房子。

他们在离此还很远的地方，隐匿起了一辆吉普车，然后共乘一辆吉普车，向“卡拉米那”这边靠近，在二十公里之外，他们把吉普车驰离开公路，开到一个悬崖处去，然后从那里弃车绕道，踏着夜色，徒步急行军，向这边走来。

他们已经完全背起了沉重的背包和作战武器，仿佛又回到了1956年12月26日走下“格拉玛”号踏上马埃斯特腊山那样的征途。

从现在起，切·格瓦拉已经完完全全地，再不是一名国家领导人，一名国务活动家和部长了，从现在起，他开始真正的又变成了一个普通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纯粹的革命者了。从现在起，切·格瓦拉开始完成一个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他把自己认国家的权力高峰上完全地自动下降下来成为一个横扫不平和压迫，横扫帝国主义奴役的革命者。

他在实践着他的理想、誓言和他的追求。

1965年的3月，当他辞去古巴党和国家的崇高职务，放弃当时古巴的最高军衔，放弃古巴国籍，准备作为一个普通的革命者，投身到支援各国人民寻求解放的革命斗争中时，他给菲德尔·长斯特罗，也是给古巴党内，军内同志和古巴全国人民，留下过一封史诗一般的，气壮山河的告别信。

在那个同时，他还写过一封充满誓死如归情怀的告别信，寄回到南美洲的故国阿根廷，寄给一直在那里仍然完全过着平民生活的父亲和母亲。

在那封告别双亲的信中，好像切·格瓦拉已经向他的父母双亲，描述过他重上征途，重上战场的情景。

那封信这样写着：

两位亲爱的老人：

我的脚跟再一次挨到罗西南特的肋骨。我挽着盾牌，重上征途。

将近十年前，我曾给你们写过另一封告别信。据记忆所及，当时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不是一名比较优秀的战士和比较优秀的医生；而今，我对医生一行已无兴趣，但作为战士，我却不是那么差劲的。

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觉悟大有提高，我的马克思主义也正在生根，逐渐纯粹起来。我相信武装斗争是各族人民争取解放的唯一途径，而且我是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信念的。许多人会称我为冒险家，我是冒险家；只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是一个为宣扬真理而不惜捐躯的冒险家。也许结局就是这样。我并不寻找这样的结局，但这是势所难免的。如果这样的话，我在此最后一次拥抱你们。

我热爱你们，只是不知如何表达我的爱；我办事是非常坚决的，我认为你们有时我并不理解。另一方面，要理解我也不容易，不过，这一次请相信我说的话。

我以艺术家的趣味所渲染过的意志，将会支持虚弱的双腿和疲惫的肺。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有时候也请不要忘记二十世纪这个渺小的征人。吻塞莉亚、罗伯托、胡安·马丁和波托丁，吻贝亚特里斯，吻所有的人。你们倔强的浪子热烈拥抱你们。

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是切·格瓦拉的父亲。

这封信，除了是写给他的妈妈和爸爸以外，显然同时也是写给他的弟弟妹妹和其他亲人的。塞莉亚是他的妹妹，罗伯托、胡安·马丁和波托丁，是他的弟弟，贝亚特里斯是他最亲爱的年老而多病的老姑妈。

格瓦拉在这封信的开头，提到的罗西南特，是西班牙伟大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珂德》中的描述的为追求真理和正义而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主人翁唐·吉珂德骑的一匹瘦马。切·格瓦拉不无自嘲地笔调，把自己在这里比成了不自量力但路见不平却会拔刀相向的唐·吉珂德。

不过，当然，切·格瓦拉绝非是唐·吉珂德一类的人物。他只能是更有思想，更有伟大觉悟的战士；他是绝非平常传奇传说中的侠义之士。否则，他怎么会以如此的形状，背着如此沉重的军旅背包，背着如此子弹上膛的步枪，会踏着如此艰难艰险的行军路途，来到如此荒凉而完全陌生的地场上来呢？

有福不享，偏偏赶来吃苦，偏偏赶到这里来经历磨难和经历风险，经历生死难卜的险关，何苦呢？

这是一般常人所不能理解的，是世间的庸人们更为完全不能理解的。

只有真正的伟大的英雄和真正纯粹的革命者，才能兴致勃发地领略其中纯洁不俗，圣洁而崇高的意味。

这实在是并不平常的。

这一天，后半夜里，切·格瓦拉和他的一班战友，终于抵达“卡拉米那”的房舍时，除了与他同来的战友，一些玻利维亚的革命者，包括因蒂、科科兄弟，以及另一位已经表示要投身这里参加战斗生活的玻利维亚大学生豪尔赫·巴斯克斯，亦即后来参加了游击队战斗的绰号“鸚鵡”的豪尔斯，也在这里迎接了切·格瓦拉的到来。

这一时刻，对切·格瓦拉和在这里的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非常的时刻，无比激动和兴奋的时刻。

因为，从这一刻开始，新的战旗已经正式展开。切·格瓦拉和他的战友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阵地了。

在这一天，切·格瓦拉在他留下来的玻利维亚战场日记的第一页上，也就是1966年11月7日的这一页日记上，他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切·格瓦拉对这个新阶段，是充满着决心，也充满着抱负的。同时，他的内心深处，也充满着光明的期待和无比灿烂的蓝图。革命者不怕付出最大的牺牲和代价，革命者却同时期冀着赢得最伟大的胜利和辉煌，革命者永远充满着最完整，最不朽的良心和希望。

并肩来到新战场的壮丽英华

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无疑可以被列为是人类的最高品级。他们和任何平庸的人，是永远无可比拟的。

在这个到处充满剥削和压迫，非礼不义和不公不平的世界上，如果有机会而拒绝成为一个革命者，就很难说有资格成为一个合格的人。

切·格瓦拉无疑是人类最高品级的人，无疑也是人类最为合格的真正的人。

他这样伟大的英雄人物，并非是神仙和上帝选出来的天才，而是伟大的革命时代的伟大历史产物。

切·格瓦拉来到玻利维亚，同他同时出现，并肩来到这同一革命战场的真正的革命战士，他们的能力、水平、脾气和性格有所不同和差异，但是，作为并不差劲的革命者，在本质上，他们都进入了人类的最高品级，他们都是真正的人，纯粹的人。作为崇高的伟大的人，他们都是合格的。

最初进入玻利维亚，为切·格瓦拉在这里展开活动探路和开辟行径的里卡多，他的实际身份是何塞·马丁内斯·塔马拉上尉。

首先，这是一个最健康，最优秀，也是最聪明的人，他是工人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什么苦差事多都吃过，什么累差事多也受过。但是，吃苦、受累，并不影响他的健康和聪明，有时甚至正好是相反的，吃苦受累可以使人变得更加健康和聪明。

里卡多大约就是这样的。参加古巴革命军之前，他是一个开拖拉机的工人，从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争年代开始，他参加了革命队伍。由于他的勇敢、机智和顽强，他很快成为战斗部队的骨干和初级指挥员，在革命胜利后，他还学会了开飞机，成为古巴革命空军的飞行员，后来他还担任了坦克部队的指挥员，1961年4月，他亲自驾驶着苏制坦克，并且指挥一个坦克连，在猪湾战役的长滩战斗中，成为轰击和进攻入侵雇佣军的一支最为坚不可摧的力量。

里卡多为赢得古巴革命胜利和保卫古巴革命胜利果实，建立下不朽的丰功伟绩，是古巴革命的元老，也是古巴革命的功臣。

在猪湾战役以及后来的导弹危机结束以后，为了多有几手的革命需要，里卡多开始转入秘密工作战线，成为秘密工作战线的尖兵，他先后出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先是曾经进入危地马拉，帮助危地马拉革命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战斗，嗣后，历尽千辛万苦，他跟随着切·格瓦拉，穿过非洲的高原和丛林，穿过坦噶尼喀湖洲，穿过基伍湖，进入到非洲的心脏，去支援了刚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侵略的殊死战斗，在那里近二百个日日夜夜的激烈战斗中，他始终和切·格瓦拉在一起，历尽了各种各样的千难万险。

由于长时期的游击战争和总是承担和完成艰巨任务的经历，养成了懒于琐事和比较散慢的生活习惯。在玻利维亚的战斗生活中，他被切·格瓦拉批评为是最不守纪律的古巴人。但是，就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献身精神来说，他是矢志不移的。所以，在他英勇牺牲以后，切·格瓦拉崇高地评价他是“品质优秀”“出色的战斗员”，指出他的牺牲是革命的“重大损失”。

在切·格瓦拉化装进入玻利维亚，在拉巴斯飞机场降落伊始，除了帕乔（奥卡上尉）陪同他走下飞机外，来机场迎接他并同时保卫他的，还有他多年形影不离的警卫员，年纪刚刚二十岁多一点的卡洛斯·科埃略中尉。他先格瓦拉一步，和庞博——加里·塔马约上尉一起，来到拉巴斯，负责安排切，

格瓦拉到达这里时的安全保卫事宜。他来此间时的化名是图马。切·格瓦拉有时候亲切地把他叫成“图迈尼”，这是像叫小孩子一样的昵称。

事实上，卡洛斯·科埃略中尉（图马），是来到玻利维亚追随切·格瓦拉开辟新天地的军衔最低的古巴革命者，同时，他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战士，多年来，他一直是切·格瓦拉的警卫员，1964年，切·格瓦拉作为古巴代表团的团长，在联合国大会发表完讲话，走出联合国大厦的出口处时，忽然一个浓装艳抹的妖女人扑向格瓦拉，从她的手提包里快捷地掏出了一把雪亮的白刀，然而，就在她飞刀闪过来的一刻，一只钢铁一般冰凉而无情的手，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抓住了这个妖女人的罪恶的手。这只抓住妖女人的手，怎么来得那么快速而机警？是从什么样的电子武器中闪现出来的呢？

不是从电子武器中闪现出来的，而是就是来自格瓦拉的贴身警卫员，就是来自科埃略中尉的一只手。

科埃略中尉胜利地保卫了切·格瓦拉，他的功劳是很大的。

之后，切·格瓦拉到非洲去，到那里去投入反对帝国主义，支援刚果人民走出水深火热的出生人死的战斗。卡洛斯·科埃略中尉义无反顾，劝慰他的恋人同意推迟婚期，让他去随同切·格瓦拉战斗和工作。

这个年纪轻轻的卡洛斯·科埃略中尉，已经是多少年来，与切·格瓦拉生死与共战友感情笃深的老战友了。

切·格瓦拉此行玻利维亚，这个年轻的图马，又告别新婚不久，已经怀有身孕的妻子，毅然决然地再次跟随切·格瓦拉走上新的战场。

但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不幸，有的时候会是难免的。

1967年6月26日，在玻利维亚游击战胜利开展半年以后，在历次胜利的战斗中，立了许许多多新的功勋的这个宝贵的年轻中尉，牺牲在了激烈的战斗中。

切·格瓦拉在留下来的战斗日记中，在这一天的日记上，他记述了图马壮烈献身时候的情景。

切·格瓦拉的日记上，留着这样的笔迹：

图马腹部受伤，我们马上把他抬到屋里，准备立刻就地动手术。图马的肝脏被打碎，肠子被打穿，在动手术时死去了。他的死使我失去了一位近年来形影不离的同伴，他的忠诚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他的离开使我感到好像失去了我的儿子一样。当他被打伤时，要求把他的手表转交给我，但是由于大家忙于照料他而没有这样做，他自己就摘下来，并交给了阿图罗，用这一行动表示他希望我把这只手表转交给他的还未见过面的儿子。过去我就这样处理死去的伙伴们的手表的。我将在整个战争期间把它带上，我们把尸体放在一匹牲口身上，准备埋葬在远处。

年轻的卡洛斯·科埃略中尉——图马，在这场战斗中，就如此悲壮地献出了他年轻的，因而也更为宝贵的生命。

年轻同志的生命是更为宝贵的，这不等于说年纪较大的同志的生命就不足珍重。

其实，来到玻利维亚参加游击战争的古巴革命者，除了切·格瓦拉在1967年是39岁以外，其他十六位同志，最“老”的同志，也不过只有35岁。

这位最老的同志，就是古巴医生安东尼奥·桑切斯·迪亚斯少校，来到玻利维亚，他的化名是马科斯。

他不是以技术军官、军医的身份来参加玻利维亚游击队的。他毅然放弃

当时在古巴拥有的最高军衔少校的职衔，放弃医师的职衔，来到游击队里，只充当着一名普通的战斗员。

他十分满足于他这个普通战斗员的角色。

他对切·格瓦拉满怀着崇高的，崇敬的感情。他对切·格瓦拉是十分尊重和爱戴的。

有一位曾经是古巴人民社会党的领导成员，在古巴革命后革命统一组织中，也作过很重要的负责工作，后来也是古巴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这位同志也追随切·格瓦拉来到玻利维亚，参加这里的革命斗争工作。切·格瓦拉对这一位不是从马埃斯特腊山区来的革命同志，古巴人民社会党的老党员，相当器重，甚至委以重托。但是，这位同志，有的时候，喜欢以“老革命”“更有水平”自居。对切·格瓦拉有时不够尊重，甚至轻慢的表现，他承认切·格瓦拉是革命领袖，但有时候他觉得，似乎他本人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他便有一些自行其事的言行。

在原则问题上，切·格瓦拉对任何人都绝不妥协，绝不退让，但是在非原则的问题上，切·格瓦拉从来不作任何计较，态度总是十分宽容的。所以，他与那一位人民社会党的老党员，从来发生不了磨擦，合作的仍然是默契的。

然而，安东尼奥·迪亚斯少校，也就是马科斯，对任何轻慢切·格瓦拉的言行表现，却是绝不宽容和原谅的。于是，为此，他便和那位人民社会党的“老革命”，不断产生计较，最后甚至超越说粗话的吵闹水平，以武器相威胁起来，这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

切·格瓦拉严厉地批评了马科斯。

马科斯是愿意接受格瓦拉的批评的。但是，在遇到冲突时，他依然会十分激动，以砍刀和拳头相威胁他的对方。

对此，切·格瓦拉郑重地向他发出警告：如果他不能改正和克服这种严重的毛病，他很有可能被从这支游击队不光彩地清除出去。

马科斯的回答却是：“宁肯被枪毙也不走。”他誓死要跟着切·格瓦拉战斗到底。

这位忠勇的革命者，拥有古巴最高军衔的少校，后来在1967年6月的一场激战中，一往无前地献出了他的生命。

在这样的无比忠勇的革命者，切·格瓦拉的忠实的战友们中间，还有一位是奥兰多·潘托哈上尉。他是协助切·格瓦拉指挥仅有二百多人的第八纵队，在古巴革命战争中，以闪电战的进攻方式攻打数千敌军守据的圣克拉腊城并赢得胜利，建树过奇功的伟杰，是第八纵队的参谋长，一直是格瓦拉最亲密忠诚的战友。在古巴革命胜利后，他担任过更为重要的军职，在古巴国内和国外，多次完成过非常艰巨的战斗任务。也是一个功勋卓著的英雄，但是，由于他在古巴解放战争中，负过两次重伤，其中一次是脑袋受伤，他的神经系统受到了损伤，有的时候由于过劳和激动，会引发神智错乱，因此，事实上他已经是一个有了残疾的同志。

然而，当切·格瓦拉出师玻利维亚时，他知道新的战场充满了艰难和危险，他对切·格瓦拉再三请求说：“参谋长是永远不该离开司令员的。他坚持要与格瓦拉同到玻利维亚来，并肩战斗。只是，他向格瓦拉提出一项要求，就是考虑到他的脑部负过伤，有时会犯病出现麻烦，所以，在新的战场上，只作战斗员，不作指挥员。

切·格瓦拉满足了他的这个请求

在玻利维亚，当年在古巴英雄的第八纵队的参谋长，传奇式的英雄奥罗兰多·潘托哈上尉，后来一直作为普通的战斗员，和切·格瓦拉始终并肩战斗在一起，最后，在格瓦拉牺牲的前一天，在与敌人的殊死决战中，他战死在格瓦拉的身旁，他在最后一息的时候，他伸出五个手指来，告诉身旁的战友：前方有五个敌人，快消灭！

实际上，这时候他已被战友们背离了战场，一个敌人也看不到了。他是犯了脑病，他的神智又有些模糊了。不过，在最后一刻，他还是认出了跑过来的切·格瓦拉，他的泪水从他的眼眶里流了出来。那是他最后从心中涌出来的，对切·格瓦拉挚爱的热流。

多么悲壮的队伍啊！

在玻利维亚战场上，切·格瓦拉依重最多，期望甚高的罗兰多，也就是埃利塞奥·罗德里格斯上尉。他在这里演出的最后一幕，也充满着惊天地、泣鬼神的色彩。

他也年纪很轻，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的时候，他还是个少年，是个孩子。在切·格瓦拉当第二纵队、第四纵队司令员时，他是切·格瓦拉的小通讯员。后来到了第八纵队，他成了切·格瓦拉手下的一支战斗分队的指挥员，当然因此成了古巴革命的著名英雄战士，古巴革命胜利后，曾经是最年轻的军区司令员，后来，他还成为了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他是切·格瓦拉一手培养、教育，提拔起来的干部。他是在切·格瓦拉进入玻利维亚以后，才辞去古巴党内、军内的领导职务，又赶赴到玻利维亚来，追随到切·格瓦拉其后的。当时，切·格瓦拉问过他：“你怎么也来了？”罗兰多的回答是：“司令员来了，通讯员怎么不来？”

他来了，格瓦拉确定他担任了指挥部的主要领导成员。格瓦拉对他寄以很高的期望，本来已经在准备着派遣他来当第二战线的司令员的，然而，在1967年4月25日的一场非常激烈而重要的战斗中，罗兰多过早地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

这位年轻的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党和国家年轻的高级干部，在他离开亲爱的祖国古巴时，也离开了五个最亲最爱的亲人，这就是年轻的妻子内莉亚·巴雷拉斯和三个幼子，以及他年迈的母亲。

他在给他的亲爱的妻子留下来的告别信中，充满了无限的深情，同时也预言到了阵亡：

内莉亚·巴雷拉斯：

离别是不好受的，但我知道，你也像我一样非常了解，一个正直的人为了履行最神圣的天职：同帝国主义斗争，总是愿意作出自我牺牲的。

你要勇敢，要撑得住。我希望，如果我在斗争中牺牲了，我们的孩子一到年龄就能接我的班，并且也跟我们一样，对兄弟民族遭受的苦难和贫困感到义愤填膺。

也许有一段时间会得不到我的音讯。但是别忘记，不管相隔多远，分别多久，我的心是永远和你在一起的。

一方面，我丢下我最亲近的人——丢下你，我的孩子，我的母亲，我感到心酸；另一方面，我知道，我这样于是为了去同使千百万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敌人作斗争，又感到快慰。

你要保重自己，爱护孩子，热爱我母亲。你们所有的人，加上我的革命的祖国，都是我的至宝。

假如我注定要阵亡，那么在临终的时刻我会想到你们的。

埃利塞奥

1966年11月16日哈瓦那

这位年轻的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在写给他妻子的这封信后又五个月零十天，他果然视死如归，阵亡在了革命的战场上。

切·格瓦拉在战斗日记上，他以诗一般的悲壮的笔调，写下这一位壮士归去的经过。时间是1967年4月25日：

罗兰多受了伤。过了一会，他们把他带回来，他流血过多。刚开始给他输血。他就死了。一发子弹打断了他的大腿骨和整个血管神经节，还未来得及抢救，他就流了大量的血。我们失去了游击队里最好的人，当然也失去了游击队的一个支柱。从他小时当第四纵队通讯员，到后来的登陆，以及在这次新的革命冒险事业中，他一直是我的伙伴。对于他默默无闻的死去，只能在将来有朝一日这样讲：“你这个勇敢的上尉的小小尸体，已经把你钢铁般的形象扩展到整个宇宙中。”

罗兰多——埃利塞奥·罗德里格斯上尉，是在玻利维亚游击战争中牺牲的第二位古巴英雄，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给切·格瓦拉带来的悲痛，是难以言喻的。

而在这场英勇的战斗生活中，第一个献出生命和鲜血的，却还是曾经是古巴革命政府的一位部长的鲜血和生命。

这位在玻利维亚献出生命和鲜血的部长，便是古巴革命的老战士赫苏斯·苏亚雷斯·加约尔。在古巴革命前，他就积极参加反对巴蒂斯塔政权的活动，几次被捕，几次下狱，后来流亡到墨西哥，1958年潜回古巴，奔赴到马埃斯特腊山区参加革命武装斗争。后来，他也是切·格瓦拉指挥的英雄的第八纵队的一员勇不可挡的战将，屡建奇功，也曾多次负伤。

古巴革命胜利后，由于他是农民家庭出身的农民的儿子，最懂得农民对土地的珍惜和感情，因此，他被任命担任了拉斯维利亚斯省的土地改革委员会主席，后来调回哈瓦那，担任国家面粉托拉斯和矿物资源委员会主席，从1964年开始，成为主管古巴经济支柱产业的食糖工业部的副部长。

1966年12月，在切·格瓦拉前往玻利维亚已经展开一场新的战斗近一个多月的時候，这位副部长，也辞掉了在古巴政府中崇高的官职，追随切·格瓦拉来到玻利维亚，作一名普通的游击队的战斗队员，他化名费利克斯，但大家更喜欢称呼他的绰号，叫作“黄头发”。

1966年12月里，当他行将告别哈瓦那，踏上走向远方的征途时，他也写下了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这即是他写给他儿子赫苏斯·贾利克斯·苏亚雷斯的告别信。

此时，他的亲爱的儿子苏亚雷斯还是一个仅仅刚满四岁的孩子。父亲写给这样一个幼小的儿子的信，可以说饱含着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的全部的对儿子的热爱之情：

亲爱的儿子：

促使我给你写这封信的原因很多。我是在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写这封信的。将来待你长大成人，读这封信的时候，你是能够完全理解我所采取的决定性的……

今天你满四岁了。你是我寄予希望的未来。在我能够呆在你身边的有限的日子里，你给了我莫大的愉快。你是我唯一的儿子，要是你在我身边长大，

我一定会跟你说很多话的，如今当我去履行我的革命职责时，而我在斗争中是很有可能牺牲的，如果不把我本来会对你说的话哪怕写几句给你，我认为，那是不可饶恕的。

我能生活在我国历史的关键性时期，我感到异常幸运。古巴，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正在创造人类历史上一首宏伟的史诗。它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革命，战胜着针对它的每一个威胁和每一次侵略……

古巴革命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给正在遭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榨取的其他各国人民指出了解放的道路。那些国家的人民，不能象我国人民这样，自己建设自己的未来。在那里，千百万男女的劳动，只养肥了一小撮剥削者，使他们发财致富。在那里，成千上万像你这样年龄的儿童，或者年龄更小一些的，因为缺医少药而夭折，许许多多孩子读不上书，请不起老师。伴随剥削而来的贫困和无知，便是他们的命运。

这就说明，为什么在这个阶段，一个古巴革命者的职责应当超越本国的范围，把他引导到至今还存在着剥削的地方去，引导到帝国主义还在榨取人民血汗的地方去。

由于我这样理解革命的职责，我势必离开祖国，到异国去同帝国主义作战。我知道我这样做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我在这里留下了我最热烈留恋的东西和我最亲近的人，但同时我感到无比高兴和骄傲的是，我将在各国人民同剥削者进行残酷斗争的前沿阵地上占有一个岗位。

在我亲近的人当中占首位的就是你，我的儿子。我很想守在你身边，注视着你的成长，看着你成为一个男子汉和革命者。但是考虑到我的决定，这是很难办到的，我希望，我的榜样，我留给你的我一生的精神遗产（我的一生整个献给了革命），以及作为革命的国家年所受到的教育，能绰绰有余地弥补我不在你身旁这一不足。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决定，永远不要为此责备我。我希望（这是父亲的合理希望）你将以我为荣。既然我没有可能像其他做父亲的人那样给你个人以舐犊之情这类细微的快乐，但是我的决定能成为你幸福的源泉。

我希望你能刻苦学习，并以最好的方式把自己锻炼得能够担负起革命的任务来。我想，至少我希望，你将来不至于再要使用武器来为人类的幸福作战了。你将在科学、技术或者任何创造性劳动的舞台上活动。在这些领域中，也可以为正义事业作战，也可以表现自己的英雄主义，并获得荣誉，如果一个革命者满腔热情地、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这些领域的话。

你要时刻警惕，坚决果断地捍卫本国的革命。它是用许多鲜血换来的，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莫大的宝物。

我希望你永远做一个真诚、严正、善良的人。你要永远看重真理，不管它是多么不合口味。要听取批评，但同时要毫不动摇地维护自己的意见，如果确信自己是对的。

不要听人家阿谀奉承，也永远不要去阿谀奉承人家。要永远严于自我批评。

等到你能看懂这封信的时候，大概你已经知道何塞·马蒂所写的绝妙的诗篇了。这位先驱者写过一首题为《轭和星》的诗。你一定要读这首诗，并且要加以深思。要记住，我希望你在选择各种不同的生活道路时，要永远偏重于“星，它能够照耀，也能够惩罚坏人”。

祝你做一个无愧于祖国的儿子！

祝你成为一个革命者。
祝你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你爸爸拥抱你。

赫苏斯·苏亚雷斯·加约尔

1966年12月2日哈瓦那

“黄头发”多么热爱他的儿子啊！

临行前，他给他四岁的儿子，留下了这样一封胜于年年月月絮絮叨叨千言万语的信，说出了他多少希望和爱的深情，这样深挚的爱，是多么宝贵和崇高，是比千金万金还要贵重的。这才是革命者留给自己后代的，永远不朽的财产。

然而，就他本人来说，他荣幸也不幸地成为了切·格瓦拉领导的玻利维亚游击队里来自古巴战友中的第一名烈士。他也同时是牺牲在切·格瓦拉游击队展开的第一场激烈的战斗中。这一场战斗旗开得胜，使切·格瓦拉游击队获得了一次震动整个世界的很大的胜利。这一场战斗，可以说是初战告捷的一次战斗，切·格瓦拉指挥着的刚刚组建不久的全新的玻利维亚革命武装部队，全部兵员不过四十几位的游击队，一举歼灭了由一名少校和数名尉官指挥的一支数量多于游击队人数的政府军，是清剿游击队的政府军，十名敌人被击毙，包括两名中尉，三十名敌军被生俘，包括一名少校，还有六名受伤的敌军士兵。游击队第一战全歼四十六名敌人，而游击队方面也付出了一死一伤的代价，牺牲的就是“黄头发”，原古巴食糖工业部的副部长，老战士苏亚雷斯同志。

比较小的代价赢得了较大的胜利。

苏亚雷斯同志为这一场胜利贡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仅只是在他给他四岁的儿子留下那封长信的一百多天以后。

对切·格瓦拉来说，这样的胜利，他仍然是不足为喜的。他为在这一场战斗中失去“黄头发”苏亚雷斯同志心头特别沉重，他在他的战地日记中写道这样的“结局很不幸。”他在战地追悼“黄头发”的简单仪式中，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和悼词，他甚至伤心地恸哭出了声来。同时，他亲自掘土，安葬了苏亚雷斯同志，在他的墓穴上立了一块红石，权作烈士的纪念碑。

切·格瓦拉带领的玻利维亚展开新的革命战斗行动的古巴战友，总共包括格瓦拉本人，是十七人，其中有四名古巴共产党的中央委员，除了几名中尉以外，十多人是古巴的党和国家的高中级干部，绝大多数是从马埃斯特腊山走过来的老战士，除了切·格瓦拉本人39岁以外，其他人都在35岁以下，他们在古巴国内都留下了年老的双亲，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女。最后十四人血洒玻利维亚，在经过一番轰轰烈烈的崭新的、照亮着拉丁美洲，也照亮着整个世界的雷鸣电动的革命暴风雨后，最后回归古巴祖国的英雄只留下三个同志，他们是庞博、乌尔瓦诺和贝尼尼奥。

他们三个幸存者，在战斗中也曾负过战伤。在切·格瓦拉最后壮烈牺牲的前四天，1967年10月5日，作为外科医生的切·格瓦拉还成功而有效地以手术治疗了贝尼尼奥已经有点儿化脓的枪伤伤口。

回到战士的位置上来

1966年11月7日，切·格瓦拉在几名战友的陪同下，到达尼阿卡瓦苏河畔的“卡拉米那”基地后，立刻投入了一种进行一场新的战斗必须开始的新的、紧张的、艰苦的、战地性质的生活。

一场新的战斗的帷幕已经拉开，在锣鼓还没有敲响起来的时候，演员就得作好随时准备登场的准备了。何况，现在在这里开始的舞台生活，将完全不是假凤虚凰的演戏，从一开始就将是真枪实弹的搏斗，从一开始就将充满着危险和艰辛，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可能的流血和牺牲。

所以，来到这样的基地，来到了这样的战场，显然已经不能再是平常的生活，不能再是轻松的生活了。来到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的人们，必须时刻把严峻两个字写进他们的生活内容，必须时时充满着警惕的战斗准备，必须开始准备着迎接随时可能到来的战斗，每个人，必须绷紧自己的肌肉的每一根肌腱，必须绷紧着自己的每一根神经。革命战场上的生活，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必须是异常的非凡的生活。

此行从拉巴斯来到“卡拉米那”营地，途经科恰班巴、圣克鲁斯，横跨玻利维亚数省，几十个大小城市和村镇，坐吉普车行走额波了整整两天，穿过陆军四师驻扎的卡米里市以后，在临近营地之时，又把乘坐的吉普车隐匿起来，开始隐蔽的夜行军和急行军徒步走过了二十多公里，走了将近四五个小时，终于在后半夜，也即是7日的临界两三点钟，进到了营地的房子里，显然，这已经是经历了一场令人十分辛劳的艰苦行军。

但是，切·格瓦拉到达营地后，几乎一分钟也不肯休闲和间歇，他放下自己的沉重的背包、枪支弹药以后，马上听取等候在营地上迎接他的玻利维亚同志科科等人的情况汇报。科科后来成为了玻利维亚游击队的骨干和杰出人物，被切·格瓦拉认为可以是未来的玻利维亚的革命领袖，然而，他后来光荣地成为了战斗中的英雄，同时也成为了战场上为胜利付出代价的烈士。

在迎接切·格瓦拉到来的玻利维亚人中，还有一位是留着两撇小胡子的准备投身革命的玻利维亚大学生，名字叫豪尔赫，和科科一样，也是玻利维亚共产党的党员，此人很健谈，说话嗓音又细又尖，而且有一点儿怪味儿，所以，后来，在游击队里，大家都喜欢叫他“小胡子”或“鸚鵡”。

切·格瓦拉是豪尔赫狂热崇拜的偶像，当偶像成为活生生的人物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简直兴奋不已，激动不已，立刻打开他的话匣子，像鸚鵡唱歌似的，没完没了地和切·格瓦拉啦呱起来。

当然，他们不会啦呱任何闲话。

他们啦呱的，都是革命的行动和革命理论问题。

“小胡子”对玻利维亚的情况，当然知道的很多，包括玻利维亚共产党内部的情况，他都非常了解，非常熟悉。

玻利维亚有一个比较完整，组织健全的共产党，在玻利维亚有着半公开活动的基础和条件。

玻利维亚本来有着十分良好的革命条件和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玻利维亚和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一样，出现过蓬勃发展的民主革命运动的形势。1952年，玻利维亚在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埃斯登索罗的领导下，发动工农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了独立的民族主义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民主革命的发展很有势头。这样的势头，一直发展到1964年，美国自从出现古巴问题以后，加强了对它后院拉丁美洲的干预和注视，它发现

了玻利维亚的埃斯登索罗政权也相当不是滋味，他领导的社会改革，已经开始威胁到了美国在玻利维亚的利益，于是，美帝国主义就支使美国在玻利维亚豢养已久的走狗，目不识丁的空军司令巴里恩托斯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玻利维亚国家政权，建立了完全忠实于美帝国主义的军事独裁专政。“猩猩”专制的政权。

不过，尽管如此，多少年来形成的比较民主的社会结构，一时还没有完全打破。军事独裁在愚昧的“猩猩”们的统治下，一时还有许多漏洞和空子好钻，而且，进入国家政权的“猩猩”们，一班子帝国主义走狗，在同抢同啃一块肉骨头的时候，难免你多我少，分配不公平，因此，狗咬狗的情况一直是在持续发生着的，所以，他们对于社会的严密专制，一时还都无暇顾及。

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有着很好的革命的基础和条件，如果玻利维亚有一个真正组织健全而具战斗能力的革命政党，发劝群众，组织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完全有可能推翻不得人心的，而且十分丑恶愚蠢的“猩猩”政权。

拉丁美洲诸多国家的将军们，他们的狰狞而且在被用差不多是夸张着他们，放大着他们的大盖军帽和肥大军装包裹起来以后，实在形同猩猩，因此，人们管这些将军们叫作是“猩猩”，是约定俗成的，是谁都知道的。所以，凡是这样的“猩猩”们通过军事政变掌握的国家政权，一般都统称为是“猩猩”专制的政权。而所有这样的“猩猩”政权，通常的情况，差不多都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政权。美帝国主义的充裕的美元，一般买不动革命志士的心，却能有效地买动几乎整个拉丁美洲的“猩猩”。

然而，这些狰狞的“猩猩”们，实在都不过是一班不堪一击的纸老虎，他们虽然最反动，却也最愚昧，永远只晓得金钱的力量，仅力的力量和武器的力量，对思想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他们都全然不在乎。

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如果有一个真正的革命的组织和政党，用一把燃烧的火种点燃人民的思想，照亮人民通往真理的道路，赢得属于人民的胜利，赢得属于人民自己的政权，有什么是不可思议的呢？

遗憾的是，这样的革命组织和政党，却也并不是可以轻易地产生的。

当时，玻利维亚，就不存在这样的政党。

最少，当时的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玻利维亚共产党，并不是这样的政党。

当时，玻利维亚共产党所以不是这样的一个革命的政党，它有自己的内在的原由，也有外在的原由，它有历史的原由，也有现实的原由。

首先，这个玻利维亚共产党，只不过是一帮空想的激进分子的组合，它没有任何革命行动和革命实践的锻炼和经历，因此，它自然不会产生出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家和可以作为领袖的人物。当时的玻利维亚共产党的总书记马里奥·蒙赫，自然也不是这样的人物。

不过，这个马里奥·蒙赫，虽然不是一个思想家，不是一个拥有领袖的资格和能力的人物，却仍然不失为是一个活动家，他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忠于苏联赫鲁晓夫的人物。他是赫鲁晓夫的热烈崇拜者和追随者，赫鲁晓夫在台上的时候，也还会时不时地关顾他，让他经常有很长时间居住在莫斯科的高级别墅里，好吃好喝好招待，不时地派遣他代表玻利维亚共产党，去参加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代表会议，充当一个与赫鲁晓夫观点一致的发言人，充当一个赫鲁晓夫合唱队的队员。

由于他是赫鲁晓夫如此忠诚的学生，所以，在玻利维亚，他领导玻利维

亚共产党执行的路线，自然也完全是一条赫鲁晓夫的路线，主张在玻利维亚实行和平过渡，争取议会民主，通过议会民主，议会道路来掌握政权。

这样的道路，在后来蓬勃发展的世界形势中，能否有希望行得通，只能另当别论。当时在美帝国主义完全操纵下的玻利维亚猩猩政权，却是绝不会允许人们行走这样的道路的。

当时，在玻利维亚，要走和平过渡的议会道路，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如果发动革命，却几乎是明显存在着赢得政权的可能。何况，古巴的胜利，古巴革命政权的存在，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和榜样吗？

所以，在玻利维亚共产党内，对行走什么样的道路，也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和不同的认识。

“小胡子”豪尔赫来到“卡拉米那”营地之始，他是倾向走革命道路的，但同时又想是一个忠于玻利维亚共产党的党员。而当时玻共的主流指导思想，是走和平过渡的道路，所以，豪尔赫在思想上，也产生着十分现实和深刻的矛盾。

正因为如此，11月7日夜里，在“卡拉米那”营地迎来了切·格瓦拉以后，他与科科等人，迫不及待地就与切·格瓦拉展开了非常热烈的谈话和讨论，他们完全并不顾及切·格瓦拉经过长途跋涉，浑身的肌肉也会感到疲劳。他们不容格瓦拉来到基地后，能有片刻的休息。

这如果是在常人身上，是难于接受的。

然而在切·格瓦拉身上，这原来却也并不算什么。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切·格瓦拉已经饱经过怎样的千辛万苦，眼前的这样一些劳累，在他的生活经历中，实在又能算作是什么呢？事实上，他早已千辛万苦惯了，他早已经超负荷的劳累惯了。习惯可以产生一种巨大的魔力，在此时此处，似乎也可以说是应验的。

何况，切·格瓦拉是何等如饥似渴地希望知道更多的玻利维亚情况，何等渴望来到玻利维亚以后，马上直接接触到来自玻利维亚本土的革命者啊！

有了“小胡子”豪尔赫如此健谈的“鸚鵡”般的谈话对象，而且，他和科科，都很有水平，确实掌握玻利维亚许多的详尽资料和第一手情况，因此，切·格瓦拉在和他们长时间的谈话中，完全忘记了旅途中的一切辛劳。体力，似乎在这样的坐下来的谈话中，也能恢复下来，得到了休息。

第一天来到“卡拉米那”营地，切·格瓦拉觉得在和豪尔赫以及科科等玻利维亚同志的谈话过程中，已经真正展开了在这里的工作，他认为谈话是极有价值的，使他进一步了解了許多情况和眼前面临的局势。

除了这样的长时间的谈话以外，格瓦拉也从这里的同志进一步了解了“卡拉米那”地区的环境，他特别打听了“卡拉米那”营地的四方邻居的情况和状态，他听说了他们在这方营地上的活跃起来的活动状态，业已引起了一个“芳邻”的疑心和注意，这即是引起了在附近也有一处庄园的那个旧政权的官吏，现在的大地主阿加尼亚拉斯的疑心和注意，不过，他大体上还只是想到，来“卡拉米那”活动的这班人马，很有可能只是一些准备在这里开发土地种植大麻，以制造古柯硷毒品为业的人们。

切·格瓦拉觉得，如果这样的“芳邻”，对这里的活动，仅存这样的疑虑和关注，是不会有碍大体的，但是，必须及时掌握他超出这样范围的疑虑。

11月7日，不管这一天切·格瓦拉来到“卡拉米那”营地后，已经是何等的筋疲力乏，在他和“鸚鵡”以及科科等玻利维亚同志长时间谈话结束以

后，又了解了一番此处的环境地形，然后吃饭喝咖啡，抽燃起他的烟斗后，在该要打开背包准备歇息之前，他还是从背包里首先拿出他的小小的战地日记本来。从今天开始，他又要用一个全新的小小日记本，开始记录着他全新的战地生活的日记了。

格瓦拉的战地背包是很大很重的，装满了一切必要的什物。除了毯子和一些必备的衣物之外，有这样几种什物，也是不能缺少的，这就是几部革命理论书籍，马蒂诗选，聂普达诗选——这是切·格瓦拉最喜欢的两位诗人，此外，当然还有他永远不能不备的克制他严重哮喘病的药物，而什么也可能忘记，唯独最难忘记的一件东西，就是他的小小的日记本，在他的沉重的背包里，小小的日记本，永远不可能是他轻装不备的宝物。切·格瓦拉从小养成了勤记勤写日记的良好习惯，有过不吃饭，不睡觉，不休息的日子，在切·格瓦拉这里，从很早的年代开始，就不再有过不记日记的日子，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最严重困难的战斗岁月中，他的日记，都是一日不少，一篇不拉的。以至，在后来古巴革命胜利后，在撰写革命的编年史时，切·格瓦拉的日记，成了唯一的，最为系统、全面、准确因而也是最为权威的文字记载资料。

1966年11月7日，切·格瓦拉在来到了玻利维亚新的战场上，他用他的不很工整，而且难于辨认的很小的字体，很细致地开始记录下了这新的一日的战斗生活。

从这时候开始，在整个玻利维亚战争期间，切·格瓦拉仍然从来没有中断过写他的日记。这日记，一直记录到他结束自己伟大的生命的征程最后前一天：1967年10月7日。

战斗的生活如诗

1966年11月8日到9日，即切·格瓦拉到达“卡拉米那”营地的第二天和以后数天，切·格瓦拉便亲自投入了紧张的战地侦察。

他开始迅速踏查“卡拉米那”四周的地形地物，寻访周围的所有溪流、丛林、河界和峭壁。

他们的侦察行动都是隐蔽进行的，所以，选择的路径都是在荒芜的丛林中，在浓密的荒草滩地里。

玻利维亚是内陆国家，但全国都处在热带区域，这里的气候潮湿而温热，即使到了并非雨季的11月间，仍然时有暴风雨袭来。雨水多，气候温热，是玻利维亚南部地区的气候特点。而这样的气候特点，必然造成众多的蚊蚋的滋生。因此，在丛林荒草中行走，自然也便会受到各种飞虫和小咬的袭击。而且，有一种名称为“马里基”的美洲凶蚊，咬人是极为凶狠的。除此以外，植物草梢上爬行的扁虱，叮人咬人也令人痛痒难耐。

切·格瓦拉和战友们分头分向去侦察，一连三天，在“卡拉米那”附近左右侦察，熟背各处的地形地物，在侦察中，切·格瓦拉的手和脸，被蚊虫叮咬的处处伤痕，而且，在第三天的时候，他自己从他自己的身上，捉下了六个正在叮咬皮肉的扁虱。这种毒虫，已经在开始侵犯切·格瓦拉的内衣了。

在切·格瓦拉来到营地的第四天，缺乏游击队秘密工作经验的玻利维亚同志，警惕性不高，允许外来的运货卡车司机进入了“卡拉米那”基地。切·格瓦拉当即严厉地批评了这种麻痹大意的行为，并且，马上作出决定，从此放弃在中心营地里宿营，而是迁移到野外的丛林中来过夜，中心营地从此只作为生活基地。

搬到野外丛林中来宿营，温热不存在问题，只是在黎明时分比较凉一些，但是，蚊虫的袭击，咬得人实在要命，切·格瓦拉不得不在吊床上再安装起蚊帐来，但是蚊帐很小，也很难挡住厉害的蚊子。

不过，这样的恶劣的生活环境，并不能影响格瓦拉和战友们准备在这里生活下去的高昂情绪。切·格瓦拉在日记上写到：“这里有田园风光”。“可以在这里呆很长时间”。

有着这样的认识，切·格瓦拉迅速作出决定，开始投入紧张艰苦的劳动，开始进行基地的建设，主要是在山涧里挖掘可以掩藏武器，给养和器物电讯设备的坑道和山洞。

格瓦拉当然全力以赴带头投入这样的劳动，他和战友们分成小组，轮组进行挖掘。格瓦拉在担任古巴国家领导人的日子里，从来也没有长时间的不参加体力劳动，所以，他对艰巨的，刨土挖石的体力劳动，既不打怵，也还能胜任。在这方面，切·格瓦拉绝对不要任何例外的特殊。他甚至只能比别人干得更猛，比别人干得更多。他这个人的这样的特点是明显的：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绝不要别人去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他也会严格要求别人做到，而且他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一定做到他严格要求别人所应作到的事情，绝不含糊。

他身先士卒，是毫不折扣，毫不含糊的。

在营地上左近的山涧里，迅速挖筑出了一处又一处洞穴和秘密仓库，进行了隐蔽的伪装。

同时，他把侦察的界域范围不断的扩大和放宽，他和战友们分头肩扛沉重的旅行包和武器，可以保证在任何地方露营和作战，侦察更远的区域，熟

悉远处的山川、丛林、河流，探寻能够找到的居民点和村庄。选择可以开辟二号营地、三号营地的地场。

战斗的生活绝不能疲疲塌塌，松松垮垮。战斗的生活节奏，必须是快捷的，是被强化了了的。

但是，战斗的生活，也可以并不单调地、乏味地进行。

紧张的侦察和构筑营地的生活，是战斗的生活。

为了在物质上保障战斗生活的有条不紊的进行，指挥员总是要想办法改善战友们的物质生活，主要要解决好伙食问题。

切·格瓦拉亲自动手给战友们砌面包炉，烤制面包。他还确定了保证后勤工作的干部，买来肥猪、母鸡和火鸡饲养起来，他还规定了侦察兵猎获野兽作为给养补充的义务。

在保证物质生活的同时，切·格瓦拉如他一向所强调的，特别重视和注重游击队的精神生活。非常重视游击队的精神武器。

在“卡拉米那”营地上，从切·格瓦拉来到的第二天开始，规定了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六点钟，是政治课学习的时间，分别讲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游击战的实践经验和战例，讲革命的理论问题，讲世界的形势，讲玻利维亚的历史、国情和经济、政治军事状况。

除了政治课以外，切·格瓦拉还规定，在每天的晚饭后，全体游击队员都要学习在玻利维亚南部地区比较多用的克丘亚语。切·格瓦拉还亲自开设法语课，可以允许自由选修。

实际上大家都乐于听切·格瓦拉讲授法语课。因为，切·格瓦拉讲授法语课的时候，往往并不囿于语言的传授，有的时候他还会大量地谈到法国文学，法国的作家和政治家，从巴尔扎克，雨果到罗素、戴高乐，有时他还因讲法国的语言文学，忽然又讲起了纳赛尔所受的法国文学国影响，中国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都如何善操法语，而讲到这些话题的时候，自然也会把话题指向远方，引向世界上一切最为壮丽辉煌的地方。

格瓦拉是去过许多地方的，除了拉丁美洲各国都还在他年轻时候走遍以外，在古巴革命胜利后，他作为古巴的国家领导人，他还访问了世界各大洲的三十三个国家，他的阅历甚丰，他是非常经多识广的，所以，战友们趁着向他学习法语的时候，与他进行平常难得的轻松谈话，也自然会是一种美好享受和精神享受。

重新拉开帷幕的玻利维亚战地生活，在一开始的时候，虽然也还算是平静的，但也同时是属于紧张的，高度紧张的生活，同时也是相当艰苦，相当艰辛的生活了日子越来越延伸的时候，不管这是一个多么乐观主义的战斗团体，在有些同志的精神生活方面，难免的也会发生寂寞和忧郁，这是正常的，因为他们都是人。他们都有人的感情。他们都熟知人间烟火亲情温暖的滋味，他们都知道人在父母双亲们的膝前目下，会领略怎样的比太阳还要光明和温暖的慈爱的目光。他们都知道在爱人的怀抱里，会领略怎样的比山高海深还深长的柔情；他们会知道每一次在抱起自己的幼小的孩儿热烈亲吻他们的时候，怎么不会有胜似母鹿们的舐犊之情呢！人是一种高等动物。

人有人的高等的感情。

而且，越是优秀的人，这样高等的感情，越是坚厚的，越是丰富的。

在进入营地行将两个月的时候，有的同志开始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和家。

切·格瓦拉深切地同情这些同志。

他自己呢？不管多么遥远，不管多么千辛万苦和重大的责任压在他的肩上，他绝不例外，会有对亲人的怀念之情。一缕一缕的萦绕他的心头。

他不会忘记他的爱妻。11月24日，他在战地的日记上记下一句话；阿莱达的生日。

他很感激世界送给他挚爱的这个日子，所以，他不会忘记这个日子。

甚至，他也没有忘记了在圣诞节的那一天，寄给仍然在南美洲阿根廷的亲人们的一个祝福。母亲已经去世，老姑妈贝亚特里斯和弟弟妹妹们在更加惦记着他，思念着他，因此，在圣诞之夜，他应该向亲人们送一份能够带来最大慰安的礼物。这就是向他们报告，他还活着。

他这样做了。

他已经提前作好了安排。

后来知道，1966年12月24日圣诞节的夜里，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一处公寓房子里，当全家人正在忧郁地谈着他们的“泰泰”的时候，他们终于收到了“泰泰”报告平安的信息，不需说全家又会如何欢欣起来。

虽然那是这个家庭最后一次经受和领略那样的欢欣。

而当时，在远离这个炽热温暖家庭的玻利维亚那个时刻都在充满着警惕气息的“卡拉米那”营地中，坚决彻底的无神论思想家和革命家，切·格瓦拉，却同时并没有忘记给游击队的同志操办圣诞节节日的欢宴，虽然由于条件的所限和困难，他让他的后勤部长用了很大的努力，才使大家吃到了一些别有滋味的土产和小吃。

面对尴尬的客人

1966年的最后一天，玻利维亚共产党的总书记马里奥·蒙赫，来到了“卡拉米那”营地。陪同他来的还有一名名叫佩德罗的玻共党员，也是玻共的中央委员，他是为着参加切·格瓦拉的游击队，才陪同蒙赫来到这里的。

蒙赫来这里干什么来了呢？

他大约是来这里扮演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

一个不想革命的共产党人，碰到了一伙奋起革命的共产党人，这就提出了谁是谁非，真假共产党人的问题。

按说，既然是共产党人，就是主张和坚持进行革命斗争的分子，如果不进行和不坚持革命斗争，共产党还有什么必要组织起来，存在下去呢？

问题是，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马里奥·蒙赫领导的玻利维亚共产党，已经是个事实上存在着的党。原来，它也曾是要求过革命的，最起码有过非常热情的学习和宣传共产主义、马列主义，宣传革命和进步的实际行动，可是，自从有了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路线以后，它就开始完全放弃了一切实际的革命行动，只留下了继续标榜着的目标。

赫鲁晓夫对古巴革命，特别是对古巴武装夺取政权，以战斗来保卫革命，始终是很觉不妥，并不情愿认同的。因为古巴革命是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唯一胜利的国家，然而，它却并不是和平过渡的产物。

古巴革命的光芒所向，横扫着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思想。赫鲁晓夫对此，是充满了忧虑、担心，也充满了反感的。他事实上十分不满意看到古巴革命在拉丁美洲产生连锁式的反映，他一方面知道这样一来，是对他和平过渡思想路线的否定，另一方面，他知道这样一来，很可能惹怒帝国主义的兽性大肆发作，他担心激发可怕的战争。

然而，作为古巴，美帝国主义几乎每天都把侵略战争的严重威胁强加在它的头上。

古巴要想不被压垮和吓倒，它除了一方面准备战斗，准备誓死保卫祖国以外，它还必须采取不止一项的斗争和战斗的策略，它必须打破美帝国主义的战略包围和它们的战略布局。

切·格瓦拉以他个人的条件和优势，放弃古巴国籍和古巴的一切资格，脱离和古巴的一切法律联系，来玻利维亚组织这里的武装斗争，实际上是策应古巴打破美帝国主义包围、封锁战略的一个最迫切、最现实的需要。

这是帝国主义的无时不存在的侵略战争威胁逼出来的迂回防范的手段。

而事实上，反对帝国主义的穷凶极恶的侵略和压迫，既是世界各国人民的需要，也是玻利维亚人民的需要。

但是，即使如此，当切·格瓦拉以拉丁美洲的公民的身份，出现在玻利维亚，联合古巴的革命者，玻利维亚的革命者，在这里进行着一场共产党员们集合起来反对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的斗争时，那么，作为玻利维亚的共产党，它如果不站在在这场斗争的同一水平线上，它将站到何处何方去呢？难道它只能站到事实上被扬弃，被抛开的位置上去吗？

最少蒙赫者流，对此也并不甘心。

也许他为此马上问计于莫斯科，请问对此应该怎么办。

1966年，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两年，但是他的主义，他的作风和行为方式，在莫斯科仍然照抄照搬着，可谓一直阴魂不散，操纵和控制兄弟党，莫斯科

的这种个性更是有增无减的发展。所以，应该怎么办，莫斯科对蒙赫可能不无教导。事实上他来到“卡拉米那”营地前，他是刚刚访问莫斯科和保加利亚，几乎连拉巴斯还没回，就从阿根廷直接来到这边了。

那么，他来此干什么来了呢？他和切·格瓦拉展开了谈判。

首先，切·格瓦拉热情欢迎他的到来，拿出了营地上仅备的一瓶白兰地酒，招待他，与他干杯。欢迎玻利维亚共产党参与这里的斗争生活。

然而，蒙赫立刻表示，玻利维亚共产党不便参与，但他本人可以辞却总书记职务，来此参加领导斗争，他的条件是，他既要作这里的政治负责人，又要同时是这里的最高军事司令员。

可是，这位要当最高司令员的蒙赫，搬得开枪栓，推得上子弹，打过仗吗？他连手榴弹的雷管都不会打开，却要来当游击司令。

真是的！他差不多是梦游来到了这里，他想如此轻而易举地完成在这里的夺权，完成在这里的控制程序，简直是白日作梦。

切·格瓦拉当然断然拒绝了他。

切·格瓦拉不在乎这里游击队司令的职位。比这样的司令大多少倍的司令他都当过了。他绝不会恋栈任何司令的职务。他只是绝不会把一场革命的命运交到一位只能扼杀它和断送它的大员手里。

这样，蒙赫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临走，他把所有在“卡拉米那”营地的玻利维亚共产党员集合起来，要他们作出选择，请他们决定是选择党，跟他走，还是与党决裂，留在这里。

已经来到这里的玻利维亚共产党员，除了蒙赫本人以外，完全一致地都作出了留下来的选择，包括陪同蒙赫来到此间的佩德罗，也决不充当陪送蒙赫离去的随从，而是坚决地留在了切·格瓦拉的游击队里，参加了这里的斗争生活。

而蒙赫本人，从“卡拉米那”离开以后，行色匆匆，很快回到拉巴斯，然后带着一些细软，很快又转回到莫斯科去了。而且，此一去他一连好几年，竟再也没有返回到玻利维亚来。

格瓦拉思念亲人的浓烈情结

至 1966 年 12 月 19 日 ,预定好到玻利维亚来的古巴战斗人员都已经到齐了。

最后来到游击队的两个人是曾任古巴政府食糖工业部副部长的苏亚雷斯同志 ,他来到游击队后 ,便被称作是“黄头发”。

另一位是在古巴国内担任过很高军职的 ,原切·格瓦拉指挥的第八纵队的参谋长塔马约上尉。他来到游击队后 ,化名为安东尼奥。

他们俩人约定好 ,在新战场的游击队里 ,在开始阶段 ,只充当普通的战斗队员 ,不承担任何领导工作。

12 月底 ,1 月初 ,玻利维亚共产党总书记马里奥·蒙赫 ,来到“卡拉米那”营地 ,企图争夺游击队的领导权 ,进而操纵这里的游击队的行动未遂。他离开这里后 ,又陆续地来了一些玻利维亚的革命者 ,投身到了这支队伍中来。同时 ,也还有一些秘鲁、阿根廷的革命者 ,有的是以“留学生”的姿态 ,也参加到了这支队伍中来。

进入 1967 年的 1 月 ,切·格瓦拉组织指挥人数已经有四十人的这支武装游击队。一方面 ,继续紧张的开拓和建设营地 ,贮藏和贮备武器、弹药的粮食、给养 ,继续扩大侦察范围 ,有些侦察活动已经延伸到了很远的地区 ,来去需要走过好几天的路程。同时 ,切·格瓦拉还组织了辎重运输队伍 ,配备了一些车马和毛驴 ,以保证武器装备 ,给养运输的必要能力。

另一方面 ,切·格瓦拉对这支部队进一步进行强化训练 ,包括政治上的强化训练 ,切·格瓦拉和每个战斗队员 ,都分别进行过单独的谈话 ,他不断地轮换和不同的战斗队员 ,包括古巴人 ,玻利维亚人和秘鲁、阿根廷人 ,结合成为战斗组 ,战斗对子 ,去劳动 ,去侦察 ,去开展活动 ,他身体力行 ,力求具体地把每一个人都由他亲自带动起来 ,进行一番训练 ,当然在这样的训练和带动中 ,他还十分依重战斗经验十分丰富的古巴老同志。

进入 1967 年 1 月月份的时候 ,除了以“卡拉米那”为中心 ,开发建立多处营地之外 ,切·格瓦拉在塔尼娅、里卡多、因蒂和科科、豪尔赫的协同下 ,特别组建了营地之外的情报联络和城市工作联络网 ,其间 ,塔尼娅也在蒙赫来到营地的那个期间 ,来到过“卡拉米那”营地 ,她被指令仍然隐蔽坚守在拉巴斯 ,并且负责与国外的联络事宜 ,严守秘密工作的制度和纪律。

同时 ,新吸收了几位城市秘密工作的联络员 ,包括玻利维亚的女革命者洛约拉 ,和一位名叫帕雷哈的博士。他们分别在圣克鲁斯 ,苏克雷和卡米里市 ,建立了活动网和联络点。

年轻、随和而爽朗坚贞的洛约拉 ,负责在城市里主管游击队的财务和账目 ,经她收钱和花钱 ,后来的革命历史证明 ,切·格瓦拉第一次见到她就有很好的印象是完全正确的。她始终是最坚贞的革命者 ,也是游击队最清廉优秀的“财政部长”。她始终很好地掌管着游击队存在城市里的为数不少的财经 ,她没有乱花过一分钱 ,也没有丢失和缺少过一分钱 ,直到她后来被反动政府逮捕 ,她也没有使游击队员的钱财受到损失。

广泛活动的联络网也建立起来 ,一切事务都安排好以后 ,切·格瓦拉等待着进一步的强化训练 ,主要是进行游击战的实战演习和环境适应 ,以及负重行军 ,野营野炊 ,生存能力的训练。为此 ,到了 1967 年 1 月底的时候 ,切·格瓦拉计划准备好实行一场长时间、长距离的野营拉练行军 ,他计划行军拉练 25 天 ,准备穿越地图上已经标示好的几处高山 ,大河和荒原。

虽然这时候出现了既是意想之中的，也是意想不到的麻烦，有的同志开始患病，出现了疟疾的症候，时冷时热，冷得发抖，高烧难退。而且，不止一个人犯了这样的毛病。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也开始袭扰着这支队伍了。在热带地区的丛林和荒原的地域里，有的是容易流行的病痛。

然而，尽管如此，切·格瓦拉还是毅然决定，仍然按计划展开训练，从1967年的2月1日开始，这样的实战行军拉练的活动，开始拉开帷幕了，每人都背负着沉重的装备、武器、弹药和必备的粮食、水、救急药物等等，许多人背负不动自己的背包，被压得站不起来，包括有个别从古巴来的同志。

但是，格瓦拉的背包是最沉重的，他的背包里，有比别人得多的东西，比如书籍和笔记本，他的身上也有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比如指南针、测地仪和望远镜，他配置着短枪，同时也配置着步枪，游击队员不配置步枪是不行的，只有步枪才能在较远的射程内射杀敌人。

所以，切·格瓦拉的背负最沉重，他身上的负荷也最沉重。但是，他就是要作出这种选择，这是他长期以来养成的作风和习惯，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要坚定地实行身先士卒的原则。“虽然肩上的疼痛有时是难以忍受的。”在野营拉练开始第四天，也就是1967年2月4日的格瓦拉日记上，就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他们一连数日，几乎天天冒雨行军，在雨地里宿营，拖泥带水，在石砬子地上走路，每天连续行军近十个小时，爬山涉水，完全是爬山涉水，在河滩上行走，就是最好行走的便道，几天行军下来，有的人几乎只能是赤脚走路了，他们的鞋袜早已经磨穿了。

碰到了荆棘挡路怎么办？

砍。

碰到了狂舞的毒蛇拦路怎么办？

打死。

这里的毒蛇当然是很多的。

还有顽石、巨石呢？拦在路上，就要把它们撬动、搬开。

碰到大河过不去，怎么办呢？

扎绑起木伐来，横渡。

吃什么呢？

游击队员的野营拉练，绝没有好饭吃，因为在这样的拉练训练中，包含着生存训练，吃的东西常常得留有预备，又得常常设法补充和代替，打死毒蛇煮来吃，是自然的，捉一只穿山甲，当然也可以增一餐美味，挽一个弹弓打下正在飞走的小鸟，采来野地植物的嫩芽，或者采摘棕榈叶来煮食，陷到一只鹿，即可以使大家有一顿大大改善的伙食，罗兰多有一天在一个河洞里捉到十七条大肥鱼，也给大家喝了好香一顿鱼肉汤，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也会捉来山里飞奔逃蹿的猴子，让它们成为牺牲品，成为游击队员炊事锅里的肉汤。主食和备用的高档食物补品，比如大米、肉干和炼乳罐头，是严禁在通常的情况下随便就用的，主食的大部分，一般靠就地筹粮。在游击队拉练行军走过的地区，基本上都是贫瘠的山区，这里的农民庄户人家，除了养牛养猪养鸡之外，农作物主要是玉米。所以游击队员筹集到的粮食，也主要的就是玉米。有的是嫩玉米棒。有的是未曾加工的玉米粒。嫩玉米和玉米粒，游击队用炊事锅来煮着吃。加工过的玉米面，游击队设法烤成面包。但是这样的面包不会有蛋奶糖以及适当的油脂，只是一种来不及发酵实心烤制的硬

面包，很不好吃，吃过了也很不好消化。

1967年2月12日这天，切·格瓦拉背起枪支弹药和背包，从入夜7点30分出发上路开始夜行军。到半夜，实在走不动了，他们只好宿营在一个小树林里睡觉。切·格瓦拉在这一刻，在临睡前写下来的日记上写着：我累极了，因为我吃了玉米面小面包感到不舒服，一天没有吃东西。一天没有吃东西，一个闹病的病人，怎么能来坚持夜行军呢？

然而，切·格瓦拉实在是坚强的超人，就是在他的日记上写着这样的话的日子：“我的身体整天象断了似的。”“我的两腿开始发生水肿。”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也不会在他脸上看到任何苦忧的颜色。

切·格瓦拉始终是坚强的。

1967年2月23日，切·格瓦拉的日记上写着：对我来说，这是倒霉的一天，我咬着牙坚持下来，因为我觉得精疲力竭。

12点钟时，我们出发了，烈日炎炎，一会儿以后，爬到最高的山顶时，我发晕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凭意志力走路。这个地区最高的地方是一千四百二十公尺。

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状态下，切·格瓦拉也从来不产生一丝灰心，也绝不叫出哪怕是一声苦累来。

他的意志力，是被重压所摧折不了的。他的意志力无疑是无比的坚强的。然而，这又绝不能表明，他的心肠会冷如铁石，像不知伤痛的野兽一样。

完全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尽管艰难困苦，艰险严峻的斗争生活像万丈大山似的压在他的身上，在摧不垮，压不断他难以摧折的坚强意志之外，同时也还冲不灭，割不断他的满腹胸腔的充满爱恋的柔情。

切·格瓦拉在他的日记上，写着：

2月11日，老头的生日：六十七岁。这老头，指的是他年老的父亲林奇先生。他远方的游子，即使是在艰难困苦的战场上，也没有忘记人家生日。可以说，切·格瓦拉无疑是一个孝子。

2月18日，何塞菲娜的生日（三十三岁）。

这是记录着他大妹妹生日。连妹妹的生日都不会忘记的长兄，肯定是一个最为能够令兄弟姐妹感到无限温暖的兄长。

2月24日小埃内斯托的生日（二岁）。

这是记着他小儿子的生日。是他最小的儿子的生日。

小埃内斯托生于1965年2月24日。从他诞生以来，直到他已经两周岁的日子，他和爸爸分别的日子，远比在一起的日子更多。以至在格瓦拉最后告别哈瓦那，告别自己的妻儿时，尽管格瓦拉亲热无比，小埃内斯托却总是无动于衷，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只能够甚感生熟和陌生地瞧着父亲，他几乎完全不认识这是他的父亲。

但是，尽管如此，他父亲对他的爱，无疑是无与伦比的。他父亲无论如何都会最钟爱他的幼子。绝不会忘记他的生日。

不过，比起最小幼子来，切·格瓦拉对他的长女小伊尔达，也许会有更多一层怜护之心。因为她在身边没有生身的爸爸之外，也已经没有了最亲爱的生身的母亲了。虽然继母阿莱达妈妈疼爱她如己出，这是令切·格瓦拉可以放心的，然而，毕竟，人的心灵的失衡，是总难抚平的。

何况，小伊尔达出生的年月，出生的日子，那曾经是一个更为多么艰难

的岁月和日子啊：1956年的2月15日，在墨西哥城。小伊尔达也许是切·格瓦拉生活最为艰难和紧张的岁月里出生的孩子。她后来跟着她的生身妈妈，简直是渡过了每天都是在苦水中浸泡的生活。她小小的年纪，已经经历过了非常人可以想象的充满苦难的生活，直到古巴革命胜利后，她才回到生身的爸爸身边，过上了像样点儿的日子。但却仍然要经常忍受与爸爸的遥远的，有时经常会是时间很久的离别。

因此，对于这个孩儿，切·格瓦拉对她的深切的关怀，她的痛苦，往往会令父亲更易心碎。反映也更为灵敏。所以，每年凡是小伊尔达的生日，爸爸总要为她隆重庆祝一番，总要送她最喜欢的礼品的。去年，1966年的2月15日，爸爸在远离哈瓦那的地方，爸爸不能来和小伊尔达共享她的生日蛋糕，但是却写来了一封祝贺生日的长信。

而一年后的同是这一天，又逢小伊尔达生日的这一天，爸爸身在遥远的玻利维亚游击队的艰难的行军途中，爸爸不仅不能来与小伊尔达共享生日蛋糕，甚至连写一封热情的贺卡也寄不出来了。因此，也只能在日记本上，简单的写下这样一行字：

2月15日，小伊尔达的生日（十一岁）。

切·格瓦拉写下这一行字时，他的心海间，会翻滚着怎样的深情的波涛呢？在远方的小伊尔达，她能不思念身在远方的爸爸吗？

爸爸没有生日的礼物送来。

爸爸不能来与她共享她生日的快乐，甚至再不能寄来一纸生日的贺卡。

那么，在这样的时刻里，远方的小伊尔达，会不会垂泪重读去年在她生日的时候，给她寄发自远方的生日贺信呢？

1966年2月15日，切·格瓦拉给女儿小伊尔达寄来过这样一封信，祝贺她的生日：

亲爱的小伊尔达

我今天给你写的这封信，你却要在很久之后才能收到。但我希望你我知道我在惦念着你，并希望你过一个非常快乐的生日。你差不多是个大人了，所以给你写信，就不能象给小孩子写信那样瞎扯几句，讲些无聊的话。

你应当晓得，我正在遥远的地方，我将和你分别很久，为了同我们的敌人斗争，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正在做的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毕竟是在做一件事情吧，我想，你是可以永远为你的父亲感到骄傲的，就如我为你而感到骄傲一样。

你要记住，今后斗争的岁月还长着呢，甚至在你成人之后，你也要为这一斗争作出贡献。同时，你应当作好准备，做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就是说，在你现在的年纪，要尽可能多学习些东西，并随时准备支持正义事业，除此之外，要听妈妈的话，不要过于自负，而这种情况将来是可能产生的。

你要争取成为学校里最好的学生之一。在各方面都要比较好，你知道我所指的是学习和革命态度，说得清楚些，就是要品行端正，严肃认真，热爱革命，与同志友好相处等等。我在你那么大时，没有做到这些，但我是在另外一个社会里长大的，那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而你呢，现在的条件很优越，生活在不同的时代里，因此作应当无愧于这个时代。

别忘记回家去看看弟妹们，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叫他们规规矩矩。特别要照顾好阿莱达，她是非常尊重你这个大姐姐的。

好吧，小老太，再一次祝你幸福地度过你的生日。代我拥抱妈妈和希娜；

接受我热烈的、紧紧的拥抱吧，以此来弥补我们今后不能相见的全部时光。
你的爸爸

在敌人的突袭中

由于地图标识的不尽准确和不无错误，也因为行军计划本身是非常的，再加上实际上会有的料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还要加上气候、风雨的原因，以及因为迷路和迂回损失的时间，种种原因，原计划二十五天完成的拉练行军任务，实际上历尽千辛万苦，走了整整四十八天，在玻利维亚这方土地上，这支小小的游击队，可以说也完全是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长征。

长时间的考验和磨练，队伍没有被累坏、拖垮，而是更加坚强起来，整个队伍激发了昂扬的斗志，他们走过了许多村庄和居民点，处处都能看到帝国主义和它们的走狗的剥削和压迫的痕记，处处都能看到苦难和贫穷，这里的人民的革命觉悟虽然不高，但他们是革命矿藏中的煤层，终会在革命中燃烧起来，这是无疑的。

通过拉练和行军，切·格瓦拉和他的大多数战友，完全熟识了相当广阔的一个地区范围的各种情况，从山川河流到农业区和荒原，到各地各地的各种各样的生存条件，比如那里是有饮水的地方，哪里的棕榈叶可食，可以无饥渴所虞，而那里不仅是荒原，而且是无水的荒原，没有走兽的荒原，因此人也不该进入，等等这样的情况，绝大多数人都掌握了。

因为是准备进行游击战争，游击队得有化整为零的单兵作战的能力和准备，所以，让每一个战斗员都熟悉情况，具备能力，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在开始拉练之始，切·格瓦拉组织了尽可能多的游击队员参加了拉练演习，在“卡拉米那”基地上留下来的只是少数几个守卫者，守卫者们也被命令绝对地提高警惕和在常备不懈的警戒中，非常机警地生活。

总体来说，这次的演习拉练，是非常成功的，队伍越走越好，越练越坚强了，特别是本来饱经战斗经验的所有古巴战友，在拉练演习中，完全洗净了在胜利的优裕日子落在他们身上的全部尘埃，比如肚皮里面的过剩的多余的脂肪，现在都被清除掉了，格瓦拉的体重减轻了15磅。他们大家似乎又完全恢复到了战斗青春时光的状态。

大多数玻利维亚人，也经历住了考验和训练，只可惜在行军中，落水牺牲了两名非常坚定的玻利维亚革命者，都是非常优秀的大学生，他们的无谓牺牲，令格瓦拉十分的痛惜。

当然，在行军和拉练中，也发现几名玻利维亚人，是必须从游击队中淘汰的对象，他们怕苦怕累胆小怕死，不是革命的坚定分子，这样的人留在游击队里，只能是投敌叛逃的角色，是靠不住的，所以，必须予以淘汰。

游击队里，只能留下在锻炼考验中挺得下来的部分。这部分，当然占着全体的多数。

3月19日，经过48天的艰苦行军，切·格瓦拉带领着最后一批游击队员回到了游击队的“卡拉米那”营地。

在切·格瓦拉回到这里以前，奉命先行的先锋部队，已经先行到营地一带，有的部分，在营地之外的丛林里，山地间开始迂回活动，有的部分，已经进入来到了营地上的那排房子。

在营地上等待着切·格瓦拉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本来，应该是安然的情况。

但是，本来安然的情况，却被意外地弄糟了。

现在，等在营地上的，已经是十分令人不安的，相当严重的情况。

首先一个严重的情况是，出现了两个可耻的逃兵。都是两个未经训练的

玻利维亚人，他们没有参加拉练行军，他们是被留下来守卫营地的，但他们忍受不了营地上单调却又紧张的生活，所以，他们开了小差。

这两个开小差的家伙，会不会被政府军抓住，在严审和拷打中，成为叛徒和告密者呢？

这是难得有把握的。

第二个严重的情况是，在原先留在营地上负责指挥和守备老营的主要指挥员马科斯，看着切·格瓦拉带领着的拉练队伍超过了行动计划的时间，而且超过了不止三天五天，仍然没有返回到营地上来，他担心会出意外，便带上了几个游击队员，离开营地，出来探寻和试图接应格瓦拉带领的拉练队伍，结果在路经一个石油公司的吸油站时，他向一个好心奇心很重又饶舌的农民问路，并向他购买粮食，结果他被这个讨厌的家伙缠上了，这家伙一个劲儿打听马科斯的来历，马科斯编了个谎，但他不善撒谎，有些吞吐、有些说不清，有些不自然，然而，越是这样，那好奇心十足的讨厌鬼，越是没完没了地请问盘查不休。事后查明，这个好奇心十足而又饶舌的家伙，还把遇到几个有些来历不明的人，当作新鲜事儿回家告诉了他的老婆。他的老婆呢，也同样是个长舌妇，而且，正好这个长舌妇，又是在卡拉米那内给一位陆军四师的上尉家里当保姆，她没得别的谈资，回到城里后，就把她知道的新奇事儿告诉了上尉。于是，上尉就把这情况报告了四师的司令部情报处，结果，四师的情报处便派出一个分队来，查寻马科斯这几个可疑的人。

3月19日，正好是切·格瓦拉带领人马回到“卡拉米那”营地时，政府军搜寻马科斯的战斗分队，也来到了位置在营地不算很远处的那个吸油站，在那里拉开了警戒的岗哨，显然是想构成陷阱，缉拿马科斯等几个可疑的人。

这样，政府军的战斗分队，事实上已经出现在了“卡拉米那”营地的大门口。

这情况，似乎就成了更为严重的一个情况。它显然已经严重地影响着“卡拉米那”营地的安全。

然而，所有这些情况，还没有接下来让切·格瓦拉知道的事情，给格瓦拉带来更多的不愉快和烦恼。这就是，从3月5日以来的这半个月来，“卡拉米那”营地上，突然好像赶庙会似的，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客人，显然，有一些是不请而至或并不该来的不速之客。

这些来客中，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名人是法国记者兼作家德布雷，他非常年轻，只有二十五、六岁，尚是个未婚青年，是法国巴黎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高材生，他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古巴革命的形势，认为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一个奇观，他就来到古巴，有志要研究古巴革命的经验，后来在古巴写成好几部研究古巴革命的著作，在古巴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拉丁美洲的各国，也有大量的流布，一般的人认为他是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忠实信徒和崇拜者，事实上也许也确实如此。

早从1963年开始，为了研究古巴革命的根源和背景，德布雷就遍行拉丁美洲，不仅囿于研究古巴的资料，墨西哥，阿根廷，危地马拉，委内瑞拉，以及玻利维亚，他都有过长时间的驻足和采访，所以，他熟悉了这些南美国家，这些南美国家也熟悉了他。他的影响在这些已经提到的国家中，可谓是知名的。

由于他对古巴的事情了解甚多，在古巴还可以说有比较多的深交，加上他记者兼文化人的嗅觉灵敏，在从1965年3月以后许多人一直在追踪着切·格

瓦拉的行踪时，他也始终不断对这种追踪深感兴趣，后来他隐约听到切·格瓦拉已经进入玻利维亚，他就迅速也启程赶到了玻利维亚来。他来这里很想寻觅到格瓦拉的行踪。他偶然地见到了塔尼亚。他认识塔尼亚还是在古巴的时候，他知道塔尼亚和格瓦拉还是熟人和乡亲，同是出生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他估计切·格瓦拉如果来到玻利维亚，塔尼亚很可能会知道一些信息。于是他就寻问到塔尼亚这里来，一表示要找到切·格瓦拉的行踪，二表示要投身到切·格瓦拉领导的战斗中去。

塔尼亚也了解和熟识德布雷，知道这是一个单纯而不无幼稚，热情却也不失赤诚的真正坚定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的年轻人。这样的年轻人，虽然他是法国人，可是，法国人怎么就不可以投身到切·格瓦拉领导的斗争中去呢？塔尼亚自己心里明白，她自己不其实也是个德国姑娘，而同时也是一个切·格瓦拉领导着的战斗成员吗？考虑到德布雷的真诚和挚着，塔尼亚通知秘密联络人员，把德布雷设法接应，让他只身来到了“卡拉米那”营地。德布雷是3月5日来的。此后又过了两天，塔尼亚自己也不宣而至，也来到了“卡拉米那”营地，而她这样做，是严重地违犯了秘密工作的纪律的。此后，接着又自动来到营地的，还有秘鲁的革命家，绰号叫“中国人”的胡安，以及阿根廷人绰号叫“秃子”的西罗，此外还有一些别的客人。这么多热心的“客人”，纷纷到切·格瓦拉正在开创中的游击中心营地上来“作客”实在令切·格瓦拉有些烦恼。对德布雷的到来，切·格瓦拉认为热情可嘉，可以理解，但却并不可取。他实际上想来到游击队，充当一名忠实的、权威的编年史作家，他并不想充分的作好在这里参加战斗，不惜流血牺牲的准备。他和切·格瓦拉刚刚拉开谈话的架势，就说出他的意向：准备在这里采访一段新闻，然后就离开，而后去委内瑞拉和在那里的女朋友结婚，并且还特别声明，等着他的新婚妻子给他生下一个儿子来以后，他再返回到这里来，以便进行更进一步的采访活动。他倒是挺有长远打算的。不过，这却是实在太让人哭笑不得了。

这里来去哪能那么容易。这里是生死场。这里可是准备展开革命的游击战场啊！哪能什么不误，既不误来英勇投入战斗，又不误结婚生孩子，世界上哪会有这么方便的革命事呢。

但是，切·格瓦拉不会给虽然天真烂漫，却不失革命热情和赤诚的年轻革命者泼冷水。

切·格瓦拉马上招待所有来到营地上的贵宾们吃了一顿饱饭，有菜豆和里卡多刚猎获的一尖小鹿肉。

四天前，3月15日，在拉练的最后行军途中，拉练行军的队伍已经基本上用尽了各自所带的粮食给养，不得不靠猎获野物来充饥，那一天，作为一天伙食的，是猎来一群四只鹞，从3月16日开始，也就是距此三天前，又不得不杀掉一匹驮用物品的老马来为大家充饥。游击队的生活实在是艰辛的。

所以，今天回到老营来，在这里有贮备的粮食，能有一顿菜豆米饭，外加小鹿肉，能有如此美味的饱饭，实在也就是盛宴了。

招待客人们吃饱肚子以后，切·格瓦拉迅速指挥所有的人马上从老营这里撤出，因为政府军已经出现在大门口，这里已经完全不是游击队可以安营的营地了。游击队必须迅速撤出到早在行军拉练开始以前已经开劈好的野外营地去了。

当然，现在所有的客人，也都得加入游击队从这里撤出的行列。

情况十分严重而且紧急，很难令人从容，撤出在猝然中进行，不免有些匆忙，因此，自然产生了一些凌乱，因为事实上这里已处在危机之中。

唯一能令人感到略有安全感的是，切·格瓦拉在这里，他还在沉着地指挥着这里的撤出工作。

事实上，在为客人们备炊，招待客人们吃一顿饱饭之时，切·格瓦拉已经不仅派出了严密的警戒岗哨，同时也派出了准备作战的伏兵。罗兰多已经带着一部分游击队员，埋伏在了可能会有敌人过来的区域。随时作好了迎战、作战的准备。

切·格瓦拉是31月19日下午6点钟，已经是在黄昏中，回到营地上来的。

他招待客人们吃饭，同时也给一路行军饥肠漉漉的游击队员们开饭时，已经是在夜间9点以后的事了。客饭和游击队员们的伙食，当然是完全一样的。吃毕饭，虽然已经连续48天行军的游击队们都已经疲劳不堪，回到营地，本应该是好好休息一下，休整几天的，但是现在这些都谈不上了。吃饱饭后的第一件事，是迅速撤离营地，除了带走行军背包，子弹武器外，现在还得把营地上的所有一切物品和贮备物品都从这里搬走。

营地，已经不能再是游击队员们可以遮风避雨的一个窝了。营地，已经不是在雾海的航船安然泊锚的港湾，这里，简直已经变成了陷阱，所以，迅速撤离离开这里，是绝对必须的明智措施。

德布雷、塔尼亚和其他客人，吃过饱饭以后，跟着第一批撤出的游击队员前往新的野营之地，他们这些人是文小姐和弱书生，第一次的夜行军，就使他们难以忍受，慌乱不堪，特别是德布雷，只经过这第一次的夜行军，虽然他并不佩带武器，也不背沉重的背包，但尽管如此，只踏石插荒走路，他就很难适应，坚定了他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他不是一块可以和游击队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共同奋斗的料，虽然他不乏这方面的热情和向往，但是他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和勇气。

在所有客人和第一批撤出营地的游击队员们在半夜里撤出营地以后，切·格瓦拉仍然留在营地上，他指挥着游击队员们分批撤走，主要是把营地上的物质都要运输出去，物质贮备是不容轻易损失的。同时，显然一场故事已经在临近，切·格瓦拉必须处在战事的指挥中心。

本来有条不紊的一切计划和安排，现在被来自诸多方面的原因完全打乱了，因此，有些气象似乎给人一种仓促应战的感觉，事实上当然也是这样的。

一夜的紧张和繁忙，切·格瓦拉几乎没有得到片刻的休息，当然其他所有的人，也不能容得休息。一直紧张收拾忙累到第二天上午，10点钟，当绝大部分辎重基本撤出完以后，游击队员的主要部分也已经分散开来——以战斗的小组和分队的形式分散开来。这时候，切·格瓦拉才带领几名骨干游击队员，离开了“卡拉米那”的那幢房子。

在过去的几天里，政府军的小型飞机已经不止一天，在此方上空盘旋，所以，现在防空的问题也就提出来了。格瓦拉带领着的几名骨干游击队员，只能进入丛林，沿着一条小河，向着以前已经开发出来的另一处被称为“熊营地”的野外营地出发。

切·格瓦拉撤出营地一两个小时以后，最后一批辎重队和游击队员离开

了“卡拉米那”的那幢房子。从此那幢房子也就再也不是游击队的营地了。

切·格瓦拉在通向“熊营地”的途中，他和他带领的一个游击小组的战友，在一个看来比较安全隐蔽的地方，认真地休息了较长时间的一阵儿，他们必须善于抓住休息的机会适当休息，以恢复体力和保持体力。

不过，休息以后，他们还是抓紧又行军，在20日傍晚夜幕将临的时候，切·格瓦拉带领着他的他的一小队战斗骨干，终于也来到了“熊营地”。

在这里，切·格瓦拉和已经先行一步，先遣来到这里的这批客人会合了在一起，包括德布雷、塔尼娅，以及各位阿根廷人和秘鲁人。

来到了这个“熊营地”，切·格瓦拉和他的游击队的主体部分，无疑已经再一次跳出了政府军的视野，游击队是又一次隐匿在了一个新的地场上，已经脱离了被围剿的境地。

在这里，可以稍事休息，同时可以进行一些必要进行的工作了。

切·格瓦拉分别和阿根廷和秘鲁来的同志作了谈话。秘鲁来的革命家，和阿根廷来的革命家，都是和切·格瓦拉的商谈合作事宜的，主要是想派人参加切·格瓦拉游击队，使一些人得到游击战的训练，以备在他们的国家也组织武装斗争。

切·格瓦拉对这样的意向是支持的，但不主张是大规模的。

切·格瓦拉和这些秘鲁人、阿根廷人谈话时，没有出现太麻烦的纠缠，没有出现太复杂的问题。

和德布雷谈话时，有一些麻烦问题就出现了。

德布雷首先是坚持要成为游击队的正式成员，但是又不想和游击队永远在一起，一直战斗到底，中间他得走，他得去结婚，以及让老婆生孩子，然后再回来。

切·格瓦拉坚决劝导他放弃这样的天真幼稚的想法，考虑到他既然没有决心和准备完全留在这里，就应该赶快离开这里，他可以不必成为正式的游击队员，可以跳到这支游击队的范围之外去，可以回法国等地，组织对游击队的声援和可能的物质援助。

德布雷最后同意了切·格瓦拉的意向，他准备同意按照切·格瓦拉的意向去做。

只是，此时，德布雷已经有些能来得，却走不得了。

眼下游击队处在险境中。

游击队因此自然也没有把握把他安全送出险境。

而他自己，又怎样离开这个地方呢？

冒然离开，显然是危险的。

他必须等待适当的机会了。

在此后的日子里，切·格瓦拉和游击队的同志们，曾经几次策划和安排办法，以使德布雷安全离开，顺利走出此方险境，但是，几次的努力，都没有获得成功。这就迫使德布雷，不得不在切·格瓦拉身边，在他的游击队里，又多滞留了许多天，而这样一来，也就使他有可能会亲身经历了切·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的战斗生活，使他十分真切地亲历和受到了切·格瓦拉伟大的人格力量对他的震动和熏陶，虽然时间并不太久，但所获的精神升华，却是无比的巨大的，甚至使他的整个生命和人格品性，都发生了光辉的飞跃和质的变化。

在嗣后的又几日以后，切·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终于和围剿而来的政

府军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激战，德布雷也有机会亲临了战场，看到在每一次的战斗中，切·格瓦拉都成功地指挥战斗，消灭敌人，赢得了胜利，使德布雷拥有了非常不同凡响的经历。

只是，到了四月中旬，在德布雷脱离游击队，试图从一个镇子上离开险境时，他终于还是成了玻利维亚政府军的俘虏。

玻利维亚政府军立刻如获至宝，把他马上解押到了玻利维亚政府军第四师司令部驻地的米里卡，马上诬指他是玻利维亚游击队的领导人物和组织者，决定成立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德布雷案件，立刻成了惊动玻利维亚全国的大案，成了惊动世界的大案。玻利维亚法律没有死刑。但是，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玻利维亚的独裁统治者巴里恩托斯，马上向全世界宣布，他要恢复玻利维亚的死刑法律，他要处死德布雷。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迅速介入对德布雷案件的审讯，他们亲自审问和拷打德布雷，残酷无情地折磨这个文弱书生，企图从德布雷口中，完全翘开切·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的全部秘密。

但是，德布雷正是从这样的血与火的考验中，他开始真正成为坚定勇敢的革命者，他开始成为坚贞的革命战士，他被切·格瓦拉伟大人格和精神所感召起来的伟大的革命良心，使他守口如瓶，绝不出卖和泄露游击队的任何秘密，而且，经历过无数次的沉痛折磨，他始终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决不肯叛对格瓦拉的忠诚和友谊。

德布雷的英勇行为，得到厂玻利维亚进步力量和全世界人民的声援，拉丁美洲各国的新闻媒体和作家们，也强有力地声援他们的同行。

德布雷的案件延审了很久。

最后，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发出了强有力的声援，德布雷才免于死。他在切·格瓦拉牺牲以后回到法国，写下了大量的介绍切·格瓦拉伟大形象的震撼人心的文章，使他真正成为了一个杰出的作家和优秀的记者，最主要的，使他真正成为了一个思想家，信心坚定的革命者。而且，后来，多少年以后，他对切·格瓦拉的崇敬和热爱，仍然是始终不渝的，一直在著书立说，对切·格瓦拉的伟大形象，进行着热情的宣传。

德布雷特别写了一部书，书名叫《切的游击战》，印刷的册数很多，在法国和世界各地流传很广。在这部书里，德布雷十分详尽地记述了他在切·格瓦拉身边，他在玻利维亚游击队里一段生活经历的强烈印象。

他在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生动地叙述着切·格瓦拉：

首先他严格要求自己，他对自己比对士兵还严厉，对士兵比对敌人更不能宽容……他亲手展开或卷起吊床，不要任何人帮助；每顿饭，他严格遵守规定，只吃半盒沙丁鱼或同样分给每人一分的三片干肉；他的背包里有和别人同样多的子弹。有一次在穿过一条河流的时候，他的口粮掉进了河里，没有向别人要，一天没有吃东西。他把这种平等或吃苦的尺度作为一种信条，一种思想考验的试金石。

他纯洁而坚强。

德布雷记述和介绍切·格瓦拉形象的书，时至今日，仍然是特别为法国知识界和年轻人喜欢和重视阅读的读物。

在法国，切·格瓦拉的伟大形象和他不朽的人格和思想的旗帜，一直备受着人们的仰望，在人们的心间回荡着腊腊飘动不息的回响。

在不尚英雄崇拜的法国，几乎是大多数人，始终热烈而由衷地热爱和崇拜着切·格瓦拉，认为他是二十世纪人类史上少有的最可崇敬的英雄之一。

这样的影响，与德布雷的热情介绍和宣传，不能说没有一定的联系。因此，也可以说，德布雷的经历和工作，也创造了很可令人崇敬的价值。

在法国引起的巨大反响

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英勇战斗和牺牲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光辉事迹，在法国引起的回声和反响，不亚于二十世纪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一桩伟大事件在这里发出的回声和反响。

法国的新闻媒体和法国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们，写出了大量的著述，描述和介绍切·格瓦拉。热情宣传和介绍切·格瓦拉的，绝不仅限于德布雷这一个杰出的宣传家。

法国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最辉煌的历史时期，是在夏尔·戴高乐将军领导法国的时期。

在戴高乐总统领导法国政府的很长的时期内，一位和萨特几乎不相上下知名的伟大作家马尔罗，在戴高乐总统的政府内，当了十一年的文化部长。

其间，大体上正在古巴革命的发主和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活动和牺牲的前后。由于他是法国的文化部长，不像法国伟大的作家萨特一样，能够有机会亲赴古巴，亲自和切·格瓦拉接触和长谈，掌握有关切·格瓦拉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在回到法国后，写出大量的热情介绍和评价切·格瓦拉的内容信实、评价准确的文章和书籍。但是，作为文化部长，马尔罗同样可以从另外一些渠道，搜集到关于古巴革命和切·格瓦拉活动的大量信息。马尔罗搜集到的大量信息中，有的是信实有据的材料，有的是新闻记者的无聊之辈为了制造新闻捕风捉影或妄加猜测写出来的含有大量虚假水分的报导材料，也有一些作家们凭空想像和虚构的作品；除了这些以外，马尔罗作为法国的政府部长，他还能看到一些非常特殊的材料，这就是一些情报部门，特务机关为着各种目的制造的大量文字垃圾，比如有一些专门为着展开心理战而制造的无中生有，指鹿为马，凭空捏造，造谣和攻讦，诋毁性的文字，这些文字，有的时候往往充满了传奇和玄虚，往往又能使人被蒙蔽和迷惑，甚至被传为“信史”以假乱真。这些特务部门的材料，有些是公开的，有些是备而不用，但是往往这样的材料，会被传送到政府的高级部长们的手中。

关于古巴，关于古巴领导人，关于切·格瓦拉，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特务，尤其多而挖空心思，制造了许多造谣诋毁的材料，这些材料有时候实在难辨真假虚实，法国的情报部门，也便经常把他们弄到的这样一些“情报材料”编撰起来，呈文传送给他们的高层领导人参阅。

法国的文化部长马尔罗，是受人尊敬的一位老作家。因为他是老作家，他有一种写作的习惯势力，促使他不管行政事务多忙，总还是要勤于写作，有的时候，也会情不自禁地写一些热点问题的东西，也来赶一赶文坛上的热潮。

切·格瓦拉在1967年，在玻利维亚牺牲以后，1968年，在法国出现了一个空前热烈的宣传和颂扬切·格瓦拉的热潮，这热潮在法国当时，简直形成了铺天盖地的巨浪，所有的报刊，所有的出版商，都在介绍着格瓦拉和发行着相关格瓦拉的图书。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尔罗似乎也受到了热潮所染，也动笔写起了描述和介绍评价切·格瓦拉的文字来。

当然，马尔罗的文章和作品，自然也不会是攻讦和贬损切·格瓦拉的。他是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和表述切·格瓦拉的人品和他的行为现象的。但是，这位可尊敬的老人，由于他地处政府高官的要职，他可以看到法国情报部门收集来的一些所谓的情报资料，其中当然包括大量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编撰的材料，他受到了这些材料的影响，他甚至把美国中央情

报局的特务们为扭曲、丑化切·格瓦拉捕风捉影编撰出来的不无传奇色彩的艳遇故事，也引列到了他的文章中来，不无哗众取宠之嫌地加以传播。或者也只是想借助这样的描写，增加他文章作品的吸引力和魅力。

但是，这个本来还算严肃的老作家，为此犯下了一个极不严肃的错误。他成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恣意制造和渲染的桃色新闻的传播工具。

马尔罗在讲述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故事时，超出了艺术渲染和浪漫主义允许的界限，在描写切·格瓦拉和塔尼娅之间的关系时，虽然没有像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一样，把他们编造成一个色情故事中的两个角色，但是，笔调也接近了非常荒唐的暧昧，完全可能在损着他自己的良心和责任心。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们，当然也还包括一些仅以卖文为生的下九流的文化人，所谓的作家或记者，在他们编撰的切·格瓦拉和塔尼娅的桃色新闻和色情故事中，主要的一个故事情节，是说塔尼娅原来就是一个苏联克格勃的女特务，她是专门领受着败坏切·格瓦拉的身名事业的使命，利用色相的迷惑和勾引来到格瓦拉的身边，并且得手于起专门败坏切·格瓦拉的事情来的。

无可否认，苏联克格勃有着派遣色情间谍的经历，据说克格勃训练出来的色情间谍无孔不入很有本事。不过，要说色情间谍的历史和传统在全世界各国都源远流长。中国的古代兵书中，所列三十六计战法，就包括着一条“美人计”。不过，在进入近代史以后，中国的“美人计”早已经把格外的传奇色彩让给了近代世界的西方国家，色情间谍在诸多的西方国家，由来已久已经有了被捧为英雄的历史，用美人陷英雄，已经成为一种惯用的成功系数很高的手段，成为一种极被推崇和经常使用的手段，然而，苏联在这方面却只能是学主，完全还够不上教师爷的资格，在这方面的本事，苏联肯定并不领先于西方。

苏联的克格勃，能不能有能力、有水平、有手段，可以训练出能够完全腐蚀和操纵控制象切·格瓦拉这样纯洁的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的出类拔萃的女特务来呢？

人们事实上实在可以怀疑苏联人在这方面的水平。

在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牺牲以后的第九天，噩耗传到哈瓦那，古巴党和政府决定举国哀悼三十天。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数十万参加的切·格瓦拉的追悼大会上，有过一篇十分沉痛，相当长的悼词，在这篇悼词中，卡斯特罗论述到伟大的切·格瓦拉的行为品质时，说过一段十分断然截铁的话：

切不仅具有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家和活动家的双重性格，而且切是一个兼备最充分表明一个革命者和种种美德的革命者：一个完全正直的人，一个有最高节操的人，一个绝对真诚——一个生活习惯淡泊、刻苦的人，一个在行为上没有丝毫污点的人。由于这些美德，他就成了所谓真正的革命模范。

在死了人的时候，通常总要发表演说，来强调一下死者的美德。但是，难得有机会像我们这次悼念切这样可以更加恰当、更加精确地说一句死者是具有种种革命美德的一个十全十美的榜样。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们想到他一生的时候，我们说他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卓越人物，不仅能兼备活动家的特点，而且也兼备思想家的特点，革命美德纯洁无暇和思想感情非常敏感的人的特点，再加上铁的个性，象钢那样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

作为一个革命家，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家，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

人，他无限相信道德观念。他无限相信人类的良心。我们应该说他完全清晰地理解到道德就是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建设的主要精神力量。

他思考、研究并撰写了许多东西。今天，在这里把切的著作、切的政治和革命思想在古巴和拉丁美洲的革命进程中享有永恒价值的这一问题阐述明白，是适宜的。我们毫不怀疑，作为一个有行动的人，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作为一个道德上无瑕的人，作为一个敏感绝顶的人，作为一个行为纯洁的人，他的思想在现在和将来都会继续具有普遍意义。

我们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这一段悼词中，完全可以信实地看到切·格瓦拉的人品面貌和精神面貌。

这里一眼可以看出，卡斯特罗绝非是在恭维死者，他说的每一个字都不属于溢美之词。

与卡斯特罗类似的话，法国伟大作家萨特，在议论到切·格瓦拉时，也曾指出过切·格瓦拉是“最纯洁的人”，是“不可腐蚀的人”。

如此纯洁，如此高尚，如此似钢如铁意志坚韧不拔道德上了无瑕疵的人，却可以被苏联训练的女特务轻而易举地就陷杀，如果确是这样，苏联克格勃的本事实在太高明了，美国出了多少花花公子总统，部长和将军，苏联的克格勃有如此灵效的肉弹，美国不早就在苏联的臣治之下了吗？

在西方世界制造的关于切·格瓦拉和塔尼娅的色情新闻中，实际上也还包含着一个深刻的阴谋，这个阴谋就是制造这样的鬼话：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帝国主义凶恶的走狗协同杀害了切·格瓦拉，而是因为切·格瓦拉自己的不检点，因为贪恋女人和好色，才死因于自己本身的弱点。

总之，切·格瓦拉死于苏联女特务之手也好，或者死于自己的好色和荒唐也好，用这样的鬼话，可以来遮掩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帝国主义走狗杀害切·格瓦拉的凶暴罪行。

这样的伎俩，本来是明显暴露着马脚的，明眼的人应该是一眼就能看穿这伎俩的荒诞和可笑的。

但是，马尔罗这样的法国文化部长，严肃的法国大作家，却自觉不自觉地使自己成为了下流物器无耻滥调的传声筒。对一个尚可受人尊重的老作家来说，实在也成了一桩荒唐的事情。

有些不明真象的人，很有可能被马尔罗所渲染传播的滥调所扰乱视听，很难对其诘驳。

但是，明了真相的人呢？情况当然就会不同。

特别是像正真的法国革命作家德布雷，他在格瓦拉身边呆过，认识塔尼娅，也有过在玻利维亚游击队的经历，他是最了然一切真相的人。

对一些胡编滥造，由特务和下流文人们编造出来的关于切·格瓦拉和塔尼娅的色情故事、桃色新闻，德布雷完全不屑一顾，也不愿理置他们。臭狗屎还一定要人指说它是臭的吗？似乎完全可以不用。但是，在严肃的作家和文化部长马尔罗的笔下，如果喷洒出了粪渣，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是必须进行清扫和消毒的。

于是，德布雷写了几篇论战式的批评和批判文章，坚决揭露马尔罗的谎言，猛烈抨击他的恶劣行径和不负责任的荒唐立场。

德布雷的批评和揭露，当然具有权威性，因为他说出来的是真实面目，因此也更令人可信，更具说服力，这样，他的批判和揭露性文章，就使得马尔罗处在了一个不光彩的，难堪的地位。

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尔罗倒不失一个正直作家的品质起来。他不为德布雷的文章造成他的巨大难堪，和横扫了他庄严威风因而激怒起来，相反，在合乎逻辑的本来的事实面前，他倒也还能清醒起来，猛省过来。

这样，马尔罗自然就不能再和德布雷迎战和论战，而是决定邀请德布雷来与自己见面，并请他共进午餐，他很想听听德布雷进一步讲讲切·格瓦拉的真实故事。

这是发生在切·格瓦拉已经在玻利维亚牺牲以后又过了四年多一点时间以后的事。这是在1971年11月1日的巴黎。安德烈·马尔罗盛情邀请雷诺·德布雷和他的妻子克莱姆，也就是德布雷曾经向格瓦拉讲起过的他已经非常地爱上了的那位委内瑞拉姑娘。雷布诺当年急于从玻利维亚游击队离开，他和切·格瓦拉明确说出的一个理由，就是急于要出去来与克莱姆结婚，德布雷后来被从玻利维亚死刑监狱释放以后，他还是如愿以偿地来到委内瑞拉，与克莱姆结了婚，并且也还确实生下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

克莱姆也不是一个没有思想的美女，她也是一个很有理想和信仰的人，是切·格瓦拉忠实的崇拜者，在马尔罗宴请德布雷夫妇的午宴上，当时马尔罗还特别邀请了一位美国的专栏作家，著名的新闻记者苏兹贝格来陪席。在这次午宴以后，苏兹贝格写文章，称德布雷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富有哲学思考的能力，而且头脑冷静，镇定而坚定，但态度从容而平和。他在文章中，还称长着一双明亮黑眼睛的德的委内瑞拉妻子克莱姆，是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

苏兹贝格是有身份的作家和记者，他不失倾向性，但还是比较真实地记录了马尔罗接见和宴请德布雷夫妇时谈论到的关于切·格瓦拉的全部话题。

苏兹贝格在笔下生动地记述了当德布雷向马尔罗，一个三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向一位七十多岁的有地位的老作家，指出他荒唐地描述两个真实生活过的崇高的革命者时，是昧良心和不道德的。

德布雷开始时候的谈话词锋，和他批判揭露性的文章中的锋芒，几乎同样的尖锐。

马尔罗汗颜充满了尴尬和窘迫。

当德布雷向马尔罗指出：

“在您先生的笔下，把英勇的女游击队员描写成一个轻薄的喜欢勾引男人的电影明星的样子，实在不知道您是怎样突发奇想想出来的。塔尼娅与切·格瓦拉相比拟，本身是不合适的。塔尼娅和切·格瓦拉不可比拟。切·格瓦拉是无与伦比的最纯洁杰出的伟大人物。塔尼娅不是。塔尼娅是一个存在着致命弱点的女性，她热情，她多情，富于幻想，太多浪漫色彩，这都是可能有的。但她也绝不是一个没有崇高人格和灵魂的女人。塔尼娅完全不像您先生笔下描述的是那样的风情万种的女人，也许只有一种风情，她是真正狂热的，这就是革命的风情。她的父亲、母亲，都是心地善良，正直而文化层次很高的大学教师，都是德国的老共产党员，二战前，受希特勒的迫害和通缉，才被迫移居阿根廷。他们在那里，生养出了塔尼娅，同时在那里，他们教养塔尼娅长大成人起来。你不必怀疑那是真诚正直的革命者，他们对他们的后代，所给予的教育和熏陶，绝不可能塑造出卑鄙的灵魂，如果不带偏见的话，谁都只能这样认为，不会有别样的结论。事实上，塔尼娅后来回到民主德国，她所受到的教育，仍然绝不能说是虚伪的教育。后来，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古巴革命特别对她产生感召，这是自然可以理解的，

因为她虽然有德国血统，但她出生在阿根廷，那里是生她养她的土地，她对那里富有感情，这应该是不难理解的。所以，她后来返回拉丁美洲，投身到那里的斗争中去，也不是没有根基的。她后来违反秘密工作的纪律，出现在切·格瓦拉的身边，进入到玻利维亚游击队的战斗行列，无疑这是她犯下了严重错误，但这也只能是她没有经验和幼稚冲动的结果，她不仅使她的革命工作冒了风险，她更使她的美丽的富有活力的生命冒了风险，而且最后的结局是悲惨的。但是综评她的全部人格行为和她的全部活动，人们仍然不能不认为她是一个美丽而杰出的女性，是一个虽有瑕疵，但仍然光辉夺目的人物，对为人类解放事业，为正义事业献出生命和鲜血与美丽青春的人们，进行泼污和毁谤，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道德的行为和高尚的行为。是善良的人，正直的人们不足取的。”

德布雷的这样犀利言词，马尔罗听来虽然汗颜窘迫，但他毕竟还是富有良心和充满智慧而且正直的智者，所以，他听过德布雷的指陈以后，他非常由衷地向德布雷承认说：

“您是完全对的，德布雷先生。我当了十一年的法国政府部长，不会不知道一个人经常可能从‘特务部门’得到子虚乌有或风马牛完全并不相及的错误报告，我本来是警惕的，但是，也免不了会有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时候。我上了‘特务部门’的当，成了他们的传声筒，这真是很可笑的，是一种可耻可鄙的行为，我是会感到深深的歉意的。”

马尔罗，这位法国的文化部长，有良心正直而崇高的作家，从此从编造切·格瓦拉与塔尼亚的荒唐行为的桃色故事，歪曲和丑化切·格瓦拉的下流不们的营队里脱身了出来。他再写文章，就不再胡羸，干那种无耻的蠢事了。

不过，又过了许多年以后，当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和人性化了以后，人们又从另一个侧面议论起了切·格瓦拉与塔尼亚当年的关系，其实如果真的存在一种浪漫故事的话，不是也是一种人性的辉煌，是一种完全合情合理正常的事情吗？有什么可资恣肆来诽谤和加以诋毁的呢！

不过，尽管人们有新的这样的认识和境界，作为阶段性的历史，人们在反映那个历史时期的历史情景时，最主要的一种要素，还是必须无条件的尊重事实，如实地反映其确实真实存在过的面貌。历史是不允虚拟的。

不该出现的幼稚的浪漫

1967年3月21日。

在玻利维亚。

切·格瓦拉指挥他的游击队，从敌人重点包围迫逼而来的“卡拉米那”营地匆忙仓促撤出，撤到新的野外营地“熊营地”以后的第二天。切·格瓦拉开始能够抽出时间来同来到营地的各位客人进行交谈了。

他与秘鲁同志、阿根廷同志以及德布雷的谈话，都还是顺畅的，是顺利的。

但是，轮到他与塔尼娅谈话时，问题就严重了，气氛就立刻相当的紧张了起来。

对塔尼娅此次突然出现在“卡拉米那”营地，切·格瓦拉完全不知道有什么必要性和如此决定的所以。他完全不明白，不理解塔尼娅为什么擅自采取了如此轻率的行为。

在最初听说塔尼娅已经来到营地的信息时，切·格瓦拉简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要的情况，后来在3月19日晚间见面以后，塔尼娅没有说有什么紧急紧迫的情况，切·格瓦拉才开始放心下来。

后来，环境进入险恶状态，忙于撤出营地，切·格瓦拉就来不及与塔尼娅马上进行交谈。到了3月21日，来到“熊营地”以后，脱离了危险境地，他们在切·格瓦拉与别的“客人”都谈话交流过以后，才抽出空闲来，有时间进行单独的交谈。

切·格瓦拉有些费解，急躁和恼火，几天来突发的烦乱事情太多，很容易令他产生急躁和恼火的情绪。不过，切·格瓦拉毕竟不是凡人，他有很高的政治文化境界和素养，他懂得作为男性同志对女性同志应该持有充分的尊重。

所以，切·格瓦拉在与塔尼娅进行交谈时，一开始，他强压着恼怒和火气。他客气地，平静地说话，却不想罗嗦。

切·格瓦拉一开始，平静地问塔尼娅：

“你来这里，是干什么来了呢？”

塔尼娅大睁着一双美丽的蓝眼睛说：

“这是无疑问的问题。我来参加这里的斗争。”

格瓦拉问：

“谁命令你来的呢？”

塔尼娅回答：

“我自己。我自己的革命觉悟。我自己的革命良心。”

格瓦拉说：

“可是，你擅自离开了你自己的秘密工作岗位。你违犯规定擅自来到游击队的营地，这不仅是幼稚的行为，也是破坏纪律的行为。”

塔尼娅说：

“我在拉巴斯的任务已经完成。我建立起了在此工作的网络。我已经完成了计划迎送所有到此来参加斗争的同志的任务。在拉巴斯，我还有什么事情好干呢？你们来到此间，投入艰苦的生活，投入不畏流血牺牲的战斗，却让我仍然居住在拉巴斯漂亮舒适的住宅里，整天去为政府部长的孩子们当家庭教师，到政府的电台去主持妇女节目，胡扯瞎扯，胡说八道，过资产阶级小姐太太般的生活，在那里养尊处优，不断的受到邀请，出入那里的舞厅和

酒吧，夜总会，甚至受到猩猩总统的宴会请柬，去与那些乏走狗和屠夫胡孱，那种味道，谁能受得了？那样的角色，我实在有点儿演不下去了。”

塔尼娅说着，似乎也还振振有词。

切·格瓦拉耐心地听着，但是，他明显有些不耐烦。他对塔尼娅说：

“你在拉巴斯能站住脚，打开工作局面，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很大的胜利。你在那里能打进政府机关部门，和一些政府成员能有所交往，这是极有价值的工作机会，我们可以很透彻地掌握敌人的心理和动态，这也是你的一种成功和已经掌握了的工作优势，而且，你完全是在为着革命的目的扮演一种完成革命任务所需要的角色，这样的生活性质，怎么能和同资产阶级贵族小姐太太比拟呢？明明不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吗？你怎么连这一层也认识不到呢？”

切·格瓦拉的谈话，有了明显的批评的意味。塔尼娅就有几分感到满腹委屈，有些泪汪汪的了。

她渴望火热的斗争生活。

她渴望火热的战斗生活。

平静的生活，平庸的生活，她简直有些难以忍受和不耐忍受。她热情奔放的天性，是很难承受束缚的。优裕的生活不能使她迷恋，婚姻的幸福生活也不能使她沉迷。她在进入玻利维亚的第二年，与一位聪明健壮的玻利维亚青年知识分子举行了婚礼，有过婚姻的生活，但是这样的婚姻生活，并不能满足她的更为广阔高远的热望和追求，个人恋情的小天地，放置不下她博大的情怀，她的情怀装载着冲击的壮举和诗意的豪情。她在这样的诗意的豪情之中，有一颗鲜亮的红心，她是那么热烈地向往着崇高的革命英雄，在古巴，她崇拜向往的男性英雄是很多的，同时，她所衷心敬爱和向往的女性英雄，并且以她们来引为榜样的对象，也是大有人在的，比如被称为古巴革命之花的塞莉亚·桑切斯，以及埃斯平·比马耳同志，等。这些古巴革命女英雄的旗帜，在塔尼娅的心中和耳畔，似乎总是在发生着钟鸣和涛声一般的回响，总是在令她激动不已，向往不已，感奋不已。

塔尼娅在玻利维亚的那场婚姻，很快的发生，也很快的结束了。也许她只是为了谋求加入玻利维亚的国籍，她才选择了那样一场婚姻，而因此，一旦取得玻利维亚国籍以后，自然也就放弃了那样的选择。事实上，她所一直钟情和向往的，是投入轰轰烈烈、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战斗浪涛，在革命的暴风雨中，使自己也能成为像古巴革命女英雄们一样的，盛开而璀璨的革命之花。

这是她的情怀。

这是她的热望。

她的这样的情怀和热望，似乎也应该被人所宽容地理解吧，虽然有些幼稚，实在不无狂热，她实际上，本来也还不是一个热情充沛，精力充沛，充满了无穷的浪漫色彩，向往和期待往往会与幻像并存的年轻女子吗？

她热望使自己也成为像塞莉亚·桑切斯一样的女英雄和革命之花，应该说，也是无可指责的。

何况，塞莉亚·桑切斯似乎真的也曾如此这般地扮演过自己的角色。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最初开始的阶段，她也曾被留在哈瓦那，被严格规定进行地下联络工作，进行秘密工作，但是，后来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展开游击战的旗帜的时候，她毅然离开哈瓦那，投奔到马埃斯特腊

山区去，参加了那里的天天也是真枪实弹浴火浴血的战斗生活，成为了游击队里的不可缺少的战斗骨干和重要成员，成为了卡斯特罗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这样的塞莉亚·桑切斯，当然会成为着塔尼亚摹拟的楷模和榜样。

对此，格瓦拉却认为，这实在是幼稚得难以令人理喻的一种摹仿。

不过，出于对塔尼亚的理解，切·格瓦拉对塔尼亚没有继续进行过分严厉的批评，他没有太多的申斥和指责塔尼亚。但是，却仍然引导和规劝她，在适当的时候再从游击队走开，重返回到她在拉巴斯的秘密工作岗位上去。

经过切·格瓦拉的说服和教育，塔尼亚也大体上接受下了切·格瓦拉的如此意问和安排。

只是，后来的情势发展，使这种意向和安排，很快失去了可以兑现的可能。

首先是，在切·格瓦拉和塔尼亚进行完此番谈话以后的又隔一天，游击队就沉入在了充满战事的日子，故斗频繁地进行起来，从总体上看，游击队已经处在敌人的大的战略包围圈之内，塔尼亚已经不能轻易离开了。

紧接着，从敌人的新闻广播中，已经听到了这样的信息：塔尼亚的秘密身份已经暴露。

首先是塔尼亚此次来到“卡拉米那”营地的头几天，在等待切·格瓦拉和主力队伍归来时，在两个当时逃走的玻利维亚游击队员中，其中一个在营地上看到了塔尼亚的到来，这家伙在开小差后又叛变告密，或者是被敌人严刑拷问了出来，总之他完全细致的描绘供出了塔尼亚的形象。

另一方面，塔尼亚自己从拉巴斯开来的吉普车，在她藏匿的地方，也已经被巡逻的政府军发现。政府军还从这辆吉普车上搜查出塔尼亚在匆忙离开时遗留在车上的一个背包，内里装着一些文件、资料之类的东西，甚至包括在拉巴斯的通讯录和联系电话卡，这样，敌人一经分析，就完全可以知道这些文件材料的主人是谁，这辆吉普车是从哪里来的，它载来了要到哪里去的主人。

敌人的广播电台，当是重要新闻广播了这样的信息。

切·格瓦拉和他的游击队员们，配备着一些微型收音机，自然很容易收听到了这样的信息，充分说明塔尼亚的身份已经完全暴露，她已经是完全不可以从这里再出去，重新再行走到敌手们的眼皮底下去，再执她的秘密使命去了。

充满战事的日子

从1967年3月23日开始，切·格瓦拉领导和指挥的玻利维亚游击队，开始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连接不断的狱战和大战。

当然，这里所说的激战和大战，是相对而言的。

切·格瓦拉指挥的这支刚刚组建起来的游击队，正式的战斗成员不满四十人。但是，从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正面对着了一支人数在一百以上的敌军。

这是一支正在搜寻游击队，清剿游击队的敌军，装备精良，是一支劲旅。

3月23日，第一场杀伤战，在切·格瓦拉精心指挥部署的游击队的伏击圈内展开，首先歼灭的是一支由一名少校和一名上尉指挥的前出的巡逻分队，大约有三十几人，他们配置着自动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还有无线电报话机。他们的人数和游击队大体相等，装备比游击队更为精良。但是，在游击队的伏击圈内，除了少数几个敌军逃跑掉以外，七人被击毙，四人被击伤，十四人被生俘，包括这支队伍的少校指挥官和上尉。

在歼敌俘敌的这场战斗中，游击队缴获敌人的迫击炮三门，大口径机关枪一挺，冲锋枪和自动步枪、步枪共二十二支，还有两架步话机，以及大量的子弹和炮弹，仅六 迫击炮弹就有六十四发，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

在这场战斗中，游击队方面无一伤亡。可谓是干净、漂亮的胜利。

但是，战斗结束后，首先是切·格瓦拉并不欣喜若狂，他也不让游击队的战友们飘飘然起来，尽管这第一场激战的战果，比起当年在古巴马埃斯特腊山区开展游击战时，在最初阶级赢得的战果和战绩，都是大得很多的。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第一年的游击战中，一战下来能歼灭五六个敌人，就可以算是重大胜利了，能缴获两三支步枪，也就是很大的缴获了。像是现在这样一战能歼灭如此众多的敌人，缴获如此大量的武器，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尽管如此，切·格瓦拉要求战友们一定不要飘飘然起来。

战斗结束后，他一方面指挥继续警戒敌人的动作，同时仔细地打扫战场，不仅要珍视武器，同时要珍视给养和药品之类的东西。

在这同时，在自己的队伍无一伤亡的情况下，游击队的医生迅速开始给受伤的敌人伤员包扎医治，让所有的战俘集中起来休息，由玻利维亚人中的游击队领导成员，主要是因蒂这位曾经是玻利维亚共产党的中央委员、现在的游击队领导委员，来给俘虏们讲解宣传游击队的俘虏政策和游击队的其他政策和奋斗目标。

同时，在格瓦拉的授意下，因蒂还与两位被俘的政府军军官谈话。首先和那位少校谈话，接着和上尉谈话。那位少校十分沮丧，在谈话中表示如果游击队释放他的话，他将坚决退出政府军，决不再与游击队作战。那位上尉听了因蒂的巨传后，“像只鹦鹉一样唠叨个不停。”（格瓦拉日记用语）相当认真地表示，今后要“身在曹营心在汉”，要与游击队进行合作。

经过一番宣传教育，切·格瓦拉马上下达命令释放全体被俘人员，包括抬走伤员。在释放俘虏的同时，切·格瓦拉还让因蒂劳请两个被俘军官，让他们带通知给政府军方面，游击队实行人道主义政策，在他们离开48小时以内，游击队将不袭击打着白旗和红十字旗的非武装人员、车辆，进入战区收拾敌方士兵遗留在战场上的尸体。

这样的游击队，是何等的文明之师，仁义之师啊！

但是，愚顽的敌人并不来收拾他们士兵的尸体，以至这些尸体后来全成

了老鹰的食物，仅半个月后被老鹰的铁嘴叼啄洗涮成干干净净的一具又一具白骨。

半个月后，到了4月10日，在又一场较大激战中，不到四十名战斗成员的切·格瓦拉游击队，再次一举歼灭一支四十多人的敌军巡逻清剿队。在这支队伍里，包括着一名少校，数名尉官，更多的军士和突击队员，以及伞兵，也堪谓是一支劲旅。

在这一次的战役以后，打扫战场，处理战后事宜很忙。但是，这一次俘虏的敌军人数较多，共有三十人，这是一个相当多的数字，所以，切·格瓦拉在因蒂的配合下，亲自出面来给俘虏讲话，对战俘给予政治教育。

此时，从新闻广播里已经听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最后认定和确定认为，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在领导和指挥着这支玻利维亚游击队。

从上一次战役以后，游击队通过被俘军官带出战场散发给新闻界的新闻公报中，这支游击队已经被称为是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

既然敌人已经大体上肯定认定了切·格瓦拉在这里，甚至还举出了几乎多项近乎是准确的根据，甚至还拿到了一张切·格瓦拉在老营里留下的照片。这样，切·格瓦拉觉得自己的身份已经没有必要再来遮遮掩掩的了，所以，他不仅亲自出面给被俘的敌军士兵讲话，他还单独对那位在四月十日的战斗中俘虏的名字叫鲁文·桑切斯的少校，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谈话，他从这个少校这里，了解到了许多情况，他同时和这位少校，几乎是平等地探讨了許多问题，当然他也教育开导了这位少校，使这位少校在很短的时间里，思想立场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以至他后来，尽管在军队中仍然干着差事，而且军衔也还晋升到了上校，但他从与切·格瓦拉的那次谈话以后，就完全成为了一个游击队的同情者，后来他坚决多次拒绝执行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的命令，坚决不再指挥部队与切·格瓦拉作战。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牺牲以后，这位鲁文·桑切斯先生坚决退出了玻利维亚军队，成了一名进步人士，成了一名革命的坚定的同情者，后来还访问过古巴，对古巴领导人和古巴人民，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敬意。

4月10日，第二次较大规模激战，以游击队的绝对胜利而告结局。经过宣传和教育，包括鲁文·桑切斯少校的三十名战俘又被即行释放，接下来，玻利维亚政府军加强了攻势，切·格瓦拉指挥游击队进入了更为活跃的转战时期。

这支游击队，几乎已经成了一支完全的常胜军。

4月19日，又一支玻利维亚政府军巡逻队，碰到了游击队的前锋部队，未经战斗，巡逻队即交出长短四件武器，宣告了无条件投降。

政府军的士兵已经完全变成了“惊弓之鸟。”（格瓦拉4月20日日记语）。

只是，从进入4月以来，政府军的空军越来越频繁地参战，扔炸弹轰炸游击队居住的房舍，或者寻找行进中的游击队，用机关炮来进行疯狂的扫射。

4月25日，游击队又伏击击溃了一支由三十人组成的政府军巡逻队。给政府军造成了两人伤亡，并击毙一条警犬。

从这一天开始，敌人派出了直升飞机参战。从直升飞机参战的情况看，切·格瓦拉判断，美国中央情报局指挥的美国特种部队，已经在这里参战。

切·格瓦拉在日记中同时指出：所有的战士精神状态都好，他们都在游击队员的预备考试中及格了。

5月8日，游击队在再一次与一支政府军的清剿队发生战斗后，击毙三

名敌人，生俘包括两名受伤士兵的十名敌人，再一次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和给养。

缴获来的给养，比子弹和枪支更重要地给予游击队以补充。

这时候游击队的最大问题是给养告罄，唯一的食品只是一些猪油了。“人们很弱了，我们已经有几个人浮肿。”（格瓦拉日记语）。

不过，5月11日，游击队员贝尼尼奥打死一头野猪，使大家又狠吃饱了一次肚子。

5月30日，在又一场伏击战中，游击队前锋的六名战士，击毙三名敌人，击伤一名。

6月3日，切·格瓦拉亲自指挥游击队的一个战斗组，在一条公路边上打伏击。几辆民用车放过以后，下午五点钟开过来一辆军用卡车，“车上有两个小兵裹着毯子。我没有勇气向他们射击，脑子里要截住它的想法也来得不够快，把它放走了。”（格瓦拉日记语）

这辆军车他们前一天就见到过，当时车上坐的也是这两名小兵，一看只是十多岁的娃娃兵，所以，头一天格瓦拉就没有下达向他们开枪的命令，头一天就把他们放过一次了。6月3日，他们是从头一天过去的相反的方向转了回来。

6月26日，游击队在又一次的伏击中，击毙三名敌人，击伤两人。

在整个6月里，还击毙击伤其他一些敌人，多次多批俘虏了化妆侦察的政府军军官和地方警察官员。凡是俘虏兵，都一律坚持着立即释放的政策，从来没有发生过虐待和侮辱枪毙任何俘虏的事情。

由于长时间的连续作战和奔波，只是得不到恢复和休息，特别是给养问题，越来越成为严重问题，不仅缺粮，而且缺水，这里小河里的水都是苦的，几乎完全不能饮用，大约是含着的某种矿物质太多了，这一带本来是石油产区，地下有特别复杂的矿层。

因为缺粮、缺水，不能适当休整，游击队出现了一些伤病员，有的人发高烧到38度、39度，还在行军、作战，这是难以坚持的。

为了便于战斗活动的展开，便于解决给养问题，从5月的下半月开始，切·格瓦拉已经作出游击队分兵的决定，主要作战部分由他亲自指挥和带领，这是人数较多的部分，主要活动范围用在寻机作战方面。

另一部分，只包括少量的战斗骨干，使这一部分仍具战斗能力，但主要包括着一些准备被淘汰的胆小鬼、懦夫和一些病号，其中包括已经患病发烧到39度的塔尼亚，由切·格瓦拉指定的副手，来自古巴的指挥员华金指挥和带领，进入另一条路线，即被主要作战部分把敌人牵制开去的空档下来的路线，努力保持避战的机会，以期使这一部分人的大多数能得到休整，特别是能使高烧不退的病患者得到治疗和康复。在高烧的病患者中，不仅有塔尼亚，还有一些别的人，还有一些伤员。

这一部分尽量隐蔽和避战，主要的活动范围规定在休整的方面。

在这样分兵的同时，规定了两支部队大体上再度会合的时间和路线。

这样，华金带领着那一部分走了，隐蔽离开了主动寻机与敌人作战的主力部分，华金带走的是十多个人。而这样一来，留在切·格瓦拉统带着的一队以寻机作战为积极活动目标的作战部分里，事实上也就只是有二十几名战斗人员了。这样一来，进行略大规模的作战，有时候已经力不从心，比如正面进攻三十到五十人的敌军集团，有的时候已经是在避免中的事情了。

尽管如此，切·格瓦拉的这支小小的战斗部队，仍然似乎所向无敌，在这支游击队活动的区域里，到处传说着游击队是无敌的超人的传奇故事。

在切·格瓦拉6月份的日记小结里，仍然这样写着：

游击队的士气仍然很坚定，斗争的决心正在增长。所有的古巴人在战斗中都是模范，只有两三个玻利维亚人不过硬。

政府军的军事行动仍然等于零。

6月14日。切·格瓦拉想起了这一天是他三十九岁的生日。他同时也想起了，这一天是他的最小的女儿赛利塔的四岁的生日。他在他的战地日记上，写下了一笔字里行间，略略显出几丝忧郁。感到自己已经在向老来逼近。但仍然非常乐观地自信自己“还是‘完整的’。”

对切·格瓦拉个人来说，6月份最大的麻烦事，是从6月23日开始，他身上的沉疴痼疾开始又犯了，又开始发病。他在这天的日记上写着：

哮喘严重地威胁着我，贮存的药品剩下很少了。

6月24日，他的日记上还记着：

我的哮喘更厉害了。

6月25日，他的日记继续记录着他的病情：

我的哮喘病是在发展，现在已不能够好好地睡觉。

在进入7月以后，切·格瓦拉带领和指挥着的仅有二十多人的游击队，差不多不两日三日，就逢临一场激烈的战事。

7月6日，他们奇袭苏迈帕塔镇的一个警察哨所，俘虏了哨所所长巴卡弗洛尔中尉和两名警官，以及一名军官。在击毙一名反抗的士兵以后，又在哨所内部俘虏了十名政府军士兵，同时缴获了不少枪枝弹药，和其他战利品，主要是给养。

最难得的机会是，在占领这个小镇后，游击队可以花钱从小镇上的一家药店里，“买到了一些游击队所不可缺少的药品。”（格瓦拉日记语）遗憾的是，所有这些药品里，找不到一种可供格瓦拉使用的止喘药。

生俘的俘虏仍然照例被释放，只是这时，由于游击队不断的作战、行军，衣服鞋袜已经破烂不堪，在释放战俘时，不得不抱歉地请求战俘们谅解游击队征用他们身上穿着的除内衣以外的全部鞋袜和服装。

7月27日，游击队又对一个有八名官兵组成的政府军侦察巡逻队进行了成功的伏击，歼灭了四名敌军士兵。

但是，7月30日，由于切·格瓦拉“哮喘病发得厉害，彻夜未眠。”（格瓦拉日记语）使他很难临阵指挥，致使一场与政府军的遭遇战没有打好，给游击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除了牺牲了杰出而优秀的战士里卡多以外，游击队还损失了不少武器和给养物资。

不过，从这时起，在游击队的面前，也出现了人数更多，装备更为精良，训练更为有素的敌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在整个7月里，游击队歼灭的敌军官兵虽然为数是七死十伤，以及被俘和被释放了将近二十名政府军官长和警察官员，这样的歼敌数字，超过了游击队力量的人数，但是，对游击队来说是如此不易地取得的歼敌数字，在人数更多来势更凶的越来越强大的敌人那边，却也可以被视为是有限的损失，和为数不大的损失了。

从5月初，在切·格瓦拉指挥开展的游击战进行到两个月的时候，驻扎卡里米负责清剿游击队，负责和游击队作战的玻利维亚陆军第四师，被在一场一场的激战中，直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呈现看全师人马士气低落，

被瓦解溃败的迹象。

在这样危急状态下，美国走狗玻利维亚总统巴里恩托斯，下命令撤掉了第四师师长罗恰的指挥职务，把第四师的指挥权，完全交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火速派来的由十六名特工专家组成的军事顾问团，这个军事顾问团，立刻从陆军第四师的所有战斗营中，简拔最为能战的兵员，还从玻利维亚空军、机械化部队、装甲兵部队，调集一些兵员，集合起了两千多人参加的特种兵战斗营，并把这个特种兵战斗营的人马，都集中到圣克鲁斯市，进行反游击战的突击强化训练，重新装备更精良的武器和装备。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突击强化训练，这个特种兵战斗营的兵马，已经被陆续投放到了切·格瓦拉游击队活动的游击区来，开始布置着全面清剿的态势。

因此，进入7月以后，切·格瓦拉指挥领导的小小的二十多人的游击队，事实上已经面临着近乎百倍强大的敌人。形势显然是更加的严重了。

然而，格瓦拉最大的麻烦事，还是他自身的疾病，进入7月里，他的哮喘病进一步恶化，加上这支小小的游击队，现在还出现了两名伤员的拖累，加上格瓦拉自己是重病号，严重地影响了游击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

7月3日，切·格瓦拉在日记中写到：

我的哮喘病仍然闹得很凶。

7月8日，他在日记中又写到：

为了能够继续前进，我给自己打了几针。最后打的是作眼药用的百分之一的肾上腺素溶液，如果保林诺完不成任务的话，我们将不得不回到尼阿卡瓦苏去找治我的哮喘病的药。

7月12日，他在日记中说：

我们留在原地。气喘病把我弄得够呛。

7月14日，一天一夜降着蒙蒙细雨，切·格瓦拉在日记中写到，这一天他的哮喘好了一些。在如此好了一些的时候，他在日记中便接着又写出这样的话：

（巴里恩托斯）政府正在迅速瓦解中。可惜的是我们在这样一个时刻不能再多一百人。

切·格瓦拉满怀信心和把握的估计，如果他能再多有一百名武装战斗人员，他就完全能够推翻得了巴里恩托斯这个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政权了。

然而，他的哮喘病，却仍然还是好好犯犯，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地发作着。

7月27日，他再一次在日记上写着：

哮喘使我很难受，不顶用的止喘药已快用完了。

7月31日：

我的哮喘病正在剧烈发作。

8月2日：

我喘的很厉害，治哮喘的最后一针也打完了，只剩下了够用十天左右的药片。

8月3日：

我的情况不佳，白天晚上我都很难过，短期内不见得会好转。我曾试着打静脉奴佛卡因，但是没有效。

8月5日：

我的哮喘病毫不留情。

8月7日：

我的哮喘仍然无变化，但是药快用完了。

从8月中开始，切·格瓦拉的过敏性哮喘病的过敏源，似乎不知所以然的越来越扩大了。

游击队从桔子园买来了桔子，既作饮料，又当饭食，可是，切·格瓦拉只吃了两只桔子，立刻就大喘起来。战友们猎来了野火鸡，格瓦拉吃到嘴里时，也会引发他的喘病骤发。后来，连鹿肉也吃不得了，一吃鹿肉，也会使格瓦拉气喘得很厉害。而鹿肉和猴子肉，是在此地唯只较多可以猎获而来补充给养的肉。不能吃鹿肉，不能吃野火鸡，格瓦拉就得要有更多的时候需要忍饥挨饿了。

由于切·格瓦拉的病情越来越重，同时伤员又必须随队活动，无法安置到什么地方养伤，所以，游击队的作战能力、活动能力，都大不如初了，同时，大多数人也疲劳过度。

所以，进入9月以后。切·格瓦拉决定这支游击队不再积极主动寻机作战，也进入了休整的时期，切·格瓦拉计划要作一个月休整的时间，以使伤员有可能康复，他的哮喘病能得到抑制。格瓦拉还渴望着能够得到兵员的补充。武器装备，包括机关枪和迫击炮，以及冲锋枪、自动步枪、子弹、炮弹都不亏乏。现在最缺少的还是给养和药品，有的时候还有水，也得不到保障甚至难以解决。药品解决不了，对格瓦拉来说，也很致命。

格瓦拉试图在9月里的休整过程中，使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或改善。

不过，一进入9月以后，立刻有一团铅云笼罩在游击队的头上，压在了切·格瓦拉的心里。

9月2日，从收音机里收到了一条非常不好的消息，是美国之音播发的，“说是在卡米里地区消灭了由一位名为华金的古巴人率领的十人小组。”（格瓦拉日记语）这消息给游击队和切·格瓦拉本人带来的震动和影响，无疑是很大的。

从7月初开始，切·格瓦拉已经在进行着努力，争取和华金小组的重新会合了。但是，多次的寻找和联系，都没有能够寻找到和联系上，虽然后来的情况表明，他们一个游击队的两个部分，在分离后不止一次几乎可以重新联络会合到一起的机会，然而，都阴错阳差，在近在咫尺之中，却又咫尺天涯了开去。

如果华金部分覆灭，对格瓦拉和他指挥领导的游击队的打击，无疑也是巨大的。

华金小组覆灭的消息，在9月初的许多天来，成为敌方电台播发的要闻消息，仿佛像一场难醒的恶梦，很难令人挥之而去。

在后来的电台报道中，还开始有了女游击队员塔尼亚被击毙的描述，以及唯一被俘的一名游击队本来准备淘汰的胆小鬼的供述，看来，华金部分的同志已经全然覆没，是可以证实的了。

接着，在卡米里和圣克鲁斯电台，开始宣传切·格瓦拉已经死去的消息，并且发布电台通知：凡能提供切·格瓦拉死亡或被俘信息的人，将获得五万元玻币（相当四千二百美元）的赏金。

此时，形势显然是更险恶了。

但是，在切·格瓦拉和他的战友们这里，大家的斗志，仍然是坚定的。

9月11日，切·格瓦拉与年纪最小的游击队员玻利维亚人小巴勃罗谈话。谈话时间很长。格瓦拉在日记上说：“他表现坚强，有决心，他表示要‘誓

死保卫祖国’，要干到底。”

9月6日，是来自古巴的游击队员贝尼尼奥的生日。切·格瓦拉在日记上写着说：

贝尼尼奥的生日看来是可以大庆一番的：清早用带来的粮食磨一点面粉，并喝了加糖的马黛茶。……

我们把田牛杀了，吃了一顿很丰盛的饭。

9月17日，是小巴巴勃罗的生日。切·格瓦拉也发布命令，给他过生日。在这一天的日记，切·格瓦拉在日记上写着：

小巴巴勃罗是我们游击队里最年轻的，他今天二十二岁生日，为了给他过生日，煮了一点大米饭。

作为外科医师的切·格瓦拉。也是口腔科牙病专家，他很善于给人以拔牙来治疗牙疾。在玻利维亚游击队里，他像在马埃期特腊山区一样，负责给所有的同志治疗牙疾。9月17日，他还为两位牙痛的战友拔了牙，治了牙疾。

在玻利维亚游击战的整个过程中，在有的时候占领一些村镇后，切·格瓦拉也开展治疗牙疾的业务，给难以得到牙疾治疗的居民，包括农民，甚至包括被俘的政府军士兵，进行拔牙治疗。有些被他治疗的牙病患者，不知他是大名鼎鼎的切·格瓦拉，只知道他的化名费尔南多，因此，有些村民就管他叫作是：拔牙费尔南多。

切·格瓦拉通过拔牙行医，给牙痛病患者解除苦痛，同时，他也通过这种方式接触玻利维亚人民，向他们了解生活状况思想动态和各种情况。同时，也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

9月22日，游击队占领了一座在海拔一千九百米以上高原处的村落，这是一个有五十多户人家的村落，尽管日夜行军爬涉十分辛劳，在这里，在夜间，切·格瓦拉还是在玻利维亚同志因蒂的陪同和帮助下，召开了村民大会。

这是一个完全由印第安人组成的村庄。农民差不多都是文盲，很不开化，对游击队和切·格瓦拉的态度十分木然，但是，通过因蒂的翻译，切·格瓦拉还是给这些只能听懂克丘亚语的村民，热情地宣讲了社会主义，号召这里的人民行动起来，奋起反抗任何形式的压迫和剥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种族灭绝的政策。

村民来听格瓦拉宣讲的人数不多，大约只有十五人，大多数没有任何反响，他们太麻木了。但是，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似乎受到了感召，第二天自告奋勇要给游击队带路，显示出了对游击队的亲近和信任。

格瓦拉的游击队，很可惜没有能够争取到必要的时间和机会，把群众工作的基础扎实的进行起来。本来，最初在“卡拉米那”构筑营地时，切·格瓦拉是计划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和工夫，首先要开展群众工作、作基础工作的，遗憾的是秘密工作系统由于不慎被破坏，非常仓促地在异国异族的不熟悉的地域，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游击战争，以至没有打好基础就盖楼，以至盖起来的楼层不能不摇摇晃晃，并不稳固，虽然在游击战中几乎差不多总是在节节胜利中，但却并没有可以自由裕如的回旋余地。

这可以引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教训。

进入9月以后，切·格瓦拉的严重发作的哮喘病，已经完全断了治疗的药物。但是，说来奇怪的是，在没有了止喘药的情况下，格瓦拉的哮喘，却似乎开始见好，喘得不那么严重了。然而，切·格瓦拉实在太不顺利，从9月24日开始，他的肝病又发作，严重呕吐，进食困难，以至身体更加虚弱下

来。

最不幸的是，在9月26日，在一个海拔两千二百八十米的高原处的村落，游击队遭到了政府军的伏击，在战斗中，牺牲了三名战斗骨干，两个本来已决定让他们退出游击队的玻利维亚人，也在战斗中趁乱逃走了。

这样，切·格瓦拉指挥和带领着的游击队，最终就只剩下十七个人了。

但是，就是已经在这样的严重时候，明知已陷入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的这支游击队，战斗力仍然是顽强的。

在9月最后一天的日记小结里，切·格瓦拉提出了突围的决心。在他的这一天的日记里，仍然写着这样的话：

剩下来的人们的士气仍然相当不错。

而切·格瓦拉记下来这一笔的时候，距他最后壮烈牺牲，已经只隔距着仅仅还有八天的时间了。

切·格瓦拉的战斗日记，一直记到他最后牺牲的前一天：

1967年10月7日。

美国鬼子来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国干尽了坏事。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世界上最为为匪作歹的一个机构和组织。他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曾经干成功过许多罪恶勾当，比如 1954 年随心所欲消灭危地马拉人民政权；1960 年凶惨地插手镇压刚果革命，杀害刚果总理卢蒙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他许多地方干罪恶勾当，得手的时候，是不少的。

但是，偏偏就是在中央情报局和革命的古巴所展开的，由来已久的，一直在进行中的战争中，中央情报局一直都是在惨遭挫折和失败，最大的失败，是古巴非常漂亮、非常干净地歼灭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雇佣军 1961 年 4 月的猪湾入侵，还有一项并不十分显眼的重大失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精心策划和组织的对古巴领导人的暗杀行动，包括暗杀卡斯特罗兄弟以及切·格瓦拉的行动，几经周折，虽然两届总统都参与了其中的行动，甚至还联系动员了黑社会、黑手党势力来参与其间行动，美国为此每年花销的经费都在一亿美元以上，他们设立了“w 特遣队”，配置了四百人参加的常设工作机构，建立了五十个联络处和办事处，雇佣了将近两千名主要由古巴流亡人员组成的秘密工作人员，研究制定并付诸实施了三十三套暗示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的行动方案，真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使用了投毒计、美人计、狙击射杀计、化学毒杀计等等手段，甚至还配置了海军力量和空军力量，来协同完成这些行动，但是，却总是难以得逞，硬是达不到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

然而，尽管如此，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来并不停顿，把古巴革命领导人作为他们特别盯注和侦察的对象，作为他们随时准备打击和作战的目标。

1965 年 3 月以后，古巴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切·格瓦拉，投入到革命所需要的隐蔽战线的斗争和活动以后，不再抛头露面，为了便于进行革命斗争，他后来也只是公开了与古巴脱离法律联系的声明，但是他的具体行动，则完全成了美帝国主义情报机关几乎永远也没能猜得很透的谜，在当时更是完全猜不透的一个谜。

他们一会儿说切·格瓦拉在这里，一会儿说切·格瓦拉在那里，尽管美帝国主义有很多钱，雇佣着很多神通广大的特务遍布在世界各地，但是，他们却始终追踪查寻不到切·格瓦拉的踪影。于是，他们便不断地制造着一厢情愿的消息，一会儿在这家电台广播说切·格瓦拉已经在古巴死了。一会儿在另一家报纸上又发布独家新闻，说切·格瓦拉已经战死在刚果，甚至还说被苏联克格勃捕杀在莫斯科的卢比扬卡监狱。

一连好几年，关于切·格瓦拉的消息几乎总是在世界新闻媒体中沸沸扬扬地传播着，十有八九，几乎无不是来头就在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中间，但是，切·格瓦拉到底身在何处呢？月管在这几年间，切·格瓦拉一直都在积极的，勇敢而机智地进行着一连串大的行动，然而，他的行动则总为美国佬的特务机关所侦察不到，捉摸不透，经常只能靠制造谣言来进行刺探和寻求反映，以期猜测一个大概。

1967 年 3 月间，当切·格瓦拉又是在美帝国主义完全的势力范围，玻利维亚开展活动的情报信息传送到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总部时，美国这个特务机构最高层，立刻又如雷轰顶，惊诧不已起来。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切·格瓦拉竟然又会在哪里出现。

美国中央情报局立刻又似如临大敌，马上把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活动

的情报直接向美国总统报告。

此时的美国总统是林登·约翰逊。他曾是肯尼迪总统的副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接任总统，后来在竞选中连任，成为新的一届美国总统。

此人在肯尼迪手下时，受够了垂眉折腰，低声下气的侮辱，一旦继任当了总统后，官升脾气长，恣意妄为的很，恣意妄为到有的时候甚至蹲在马桶上接待客人，独断专制，甚是不可一世，也许正是由于他的如此脾气，吻合了美国五角大楼鹰派将军们的脾气，因而也受到了美国五角大楼的鹰派将军们的吸引和控制，使得美国在他任上，投入美国五十万大军，扩大了美国的侵越战争，从而也使美国陷入了深难拔足的越战的泥坑。

切·格瓦拉，出现在玻利维亚，他有明确的战斗口号，这就是：“创造两个、三个……乃至许多的越南——这就是口号。”这样的口号，是在1967年4月17日古巴的《革命报》和哈瓦那广播电台传播出来的。是切·格瓦拉在致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的一封信中明确的宣布出来的。

这样的战斗口号，事实上也明确地表明了切·格瓦拉进入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争的明确的意图，就是要造成两个三个乃至许多个深陷美帝国主义的泥坑，使美帝国主义在所有的泥坑中都不可拔足，使它不能再来恣意破坏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由此，美帝国主义的战略家们，自然也就知道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出现，意味着什么。他们当然知道切·格瓦拉在那里采取的行动，首先是针对着美帝国主义的行动，因而，这是绝对不能等闲视之的。

美国总统约翰逊阅读了中央情报局和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道格拉斯·亨德森通过总统的特别助理、特别顾问转呈上来的情报呈文以后，马上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来研究对付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活动的方针和决策。

美国五角大楼的将军们，以美军总参谋长约翰逊将军和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玻特将军为代表，坚决主张立刻派遣美国武装部队进入玻利维亚，组成特种部队突击司令部，以期迅速彻底地扫除和消灭切·格瓦拉游击队。

愚蠢的将军们总是很迷信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他们像猪一样记吃不记打，忘记了美军在亚洲的越南已经因为人侵和干涉陷入了深深的泥坑，难以自拔。他们完全不能理解，切·格瓦拉的游击队，事实上更渴望与美军的直接作战，那样一来，事实上的又一场越战，便在拉丁美洲真正拉开了序幕。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凶顽们，并不比美国愚蠢的将军们聪明明智多少，他们只是考虑到美国的重要事务，不应该都交给五角大楼去干，花销美国的战争预算，也应该有中央情报局的份儿，所以，到1967年的春天，新上任还不满一年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逊总统的密友和亲信理查德·赫尔姆斯，在约翰逊的最高决策会上，指出了五角大楼的将军们的决策建议，可能会带来的麻烦后果。同时，提出了他自己的方案，即由中央情报局操纵一场特种战争，主要用特务操纵的手段，来对付和消灭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游击活动和他的游击队。

约翰逊总统事实上，此时已经被一个越南搞的焦头烂额，他实在又怕再弄出第二个越南来，因此，他很赞成赫尔姆斯的建议和方案，同意把对付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游击队的事情，完全交给给美国中央情报局来统筹和指挥。为了保证拥有必要的充分的打击力量，约翰逊总统还作出决定，属于驻扎在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军南方司令部的军事情报机构和它拥有的特种机动部队，归属美国中央情报局辖制。

这样，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赫尔姆斯的直接指挥下，美国组成了一个经最高决策机构授权的专门对付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游击队的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头目，由美军南方司令部情报机关头子，空军准将威廉·斯克尔担任。

斯克尔是中央情报局的老搭档。他一直充当着中央情报局的鹰犬，由于美军的所谓南方司令部，战斗目标主要是针对南美洲各国的，所以，这个斯克尔也是一个所谓的拉丁美洲问题专家，他精通西班牙语，参与过协同美国中央情报局镇压秘鲁、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游击战的行动，因此，也可谓是一个对付革命游击战争的老手了。

斯克尔成为这个特别行动小组的头目以后，他还确定了他的副手。这个副手，就是拥有一个特种部队，亦即被称为绿色贝雷帽，特种战斗团指挥权的雷蒙德·韦伯中校。

在这样的组织架构下，具体战斗行动，完全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专家们来操纵指挥。

首先，中央情报局派出了十六名特工专家，然后，从雷蒙德·韦伯中校领导着的绿色贝雷帽战斗团，选拔了五十名特种兵战斗骨干，然后，他们便也由美国的空军飞机运输，向着玻利维亚开来。

直接统领和指挥这支别动队的，是一位中央情报局的老资格的反游击战专家，绰号被称为是“老头子”的拉尔夫·谢尔顿少校。

这一帮人马，来到玻利维亚后，马上和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拉巴斯站熔为一炉。

美国驻玻利维亚当时的大使道格拉斯·亨德森，是美国马萨诸塞州人，是一个富翁，也是一个政客。他在玻利维亚当大使，实际上只是履行一个牌位的角色，无足轻重。

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的真正有权力的人物，实际上主要是大使馆武官爱德华·福克斯上校。他不仅是大使馆武官，他同时是中央情报局拉巴斯站的站长。他还有一个副手，名字叫威廉·库尔亨，也是中央情报局的老牌间谍。他们主要的任务不是什么大使馆的外交事务。他们的主要的工作，是控制玻利维亚的政府和军队。直接控制的，其一是玻利维亚总统，美国扶植上台的美国走狗巴里恩托斯，其二是玻利维亚的陆军司令，也是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奥万多将军。

巴里恩托斯总统，原是玻利维亚的空军司令，是在1964年的一场军事政变中，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全力扶上台的，具体的说，他是被美国大使馆武官福克斯上校兼中央情报局驻拉巴斯站长，一手确定和扶上台的，所以，他完全被福克斯上校操纵指挥和控制着。他实际上是美国人在玻利维亚的代理人 and 塑造起来的傀儡。

奥万多将军是一个野心勃勃，专横拔扈的家伙，但他多年来被美国特务豢养，福克斯上校还答应他在巴里恩托斯当过四年总统后，也让他登上玻利维亚总统的宝座过过总统瘾，所以，这一个“大猩猩”陆军司令，事实上也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豢养和操纵着的一匹恶狼。

这样一来，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事实上完全控制着玻利维亚政府和军队的首脑，控制着玻利维亚的政府和军队，实际上他们已经完全控制着了玻利维亚，这样，经过美国总统和最高决策机构批准，在玻利维亚实施特别行动时，美国佬完全可以在这里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当“老头子”拉尔夫·谢尔顿，带领着由十六名特工专家和五十名特种部队战斗骨干，来到玻利维亚后，他们首先进行的一项工作是组建训练玻利维亚突击营。他们主要从驻卡米里的第四师抽调出大批能战的兵员，后来又从驻圣克鲁斯的玻利维亚第八师，抽调出一部分能战的人马，当然还抽调了空军和伞兵，共有两千来人，进行强化训练。十六名特工专家和五十名美国特种部队的战斗骨干，穿插在这两千人的突击营中间，充当顾问和训练教官，后来并且直接负责作战指挥。

接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又特别派遣经过特别训练的，从古巴叛逃出来的三名反革命分子，都授予美军上尉军衔，来到特别行动突击队，参加进攻和围剿切·格瓦拉游击队的战斗。这些家伙比较熟悉切的战斗方式。

在经过强化训练以后，玻利维亚清剿突击营，又进行了各方面的细致准备，他们甚至把切·格瓦拉的照片，以及能搜集到的游击队成员的照片和画像，发给每一个突击队员，让他们熟识每一个游击队员的面孔。

至于在武器装备方面，不待说，他们也加倍地精良起来，不仅配备着小型飞机，野马式战斗机，而且配备上了武装直升飞机，他们的作战手段，强化到了游击队完全不可比拟的程度，因此，美国走狗玻利维亚总统巴里恩托斯，从7月份开始，隔三差五就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向记者们宣布或发誓，只在几天之内。就能完全消灭切·格瓦拉的游击队，逮到格瓦拉。这是因为，美国主子已经给他打足了气，几乎真的已经使他变成了一个力大无比的泥足巨人，使得他一时可以如此猖狂，似乎真的已经变成了一只老虎，其实，充其量，他还也不过是一条夹着尾巴的走狗。

华金支队的覆灭

5月中旬，当切·格瓦拉的游击队，由于种种困难的原因，不得不分兵两路行军以前，切·格瓦拉带走了主要的战斗成员寻机作战；华金带走了部分战斗成员和所有的“包袱”，即所有的重病号和已经被解除游击队员资格的四个玻利维亚人胆小鬼。他们是帕科、佩佩、钦戈洛、欧塞维奥。这四名已经决定淘汰的游击队员，只能等待一个机会才能放他们出走，否则，他们的出走，必然会给游击队带来泄密的危险，因此，在这样的机会还没有来到时，必须再挟制他们一起行动一段时间。华金带着这一部分队伍，主要目标在于避战休整，其中包括待机甩掉这已经准备淘汰的四个包袱。

但是，这四个已拟淘汰的家伙，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都确成了败坏游击队的主要祸害。

两队分兵行动以后，5月23日，佩佩第一个开了小差，自行逃离了华金带领着的这一部分游击队。他逃出去以后，第一件干的事情是向政府军投降，他马上向政府军说出他所知道的游击队的全部情况，政府军从他这里得知了许多他们急想知道的情况，但是，他们并不甘心，还想通过吊打和拷问，从佩佩嘴里掏出更多的情况，以致把这个佩佩后来在拷问中活活打死。使他并没有得到一个好的下场。

玻利维亚政府军从佩佩嘴里得到了华金这部分游击队的行踪之后，他们马上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专家们的操纵和指挥下，制定了一个“辛迪娅行动计划”。

辛迪娅是总统巴里恩托斯将军女儿的名字。巴里恩托斯亲自定名这项行动计划为“辛迪娅行动计划”，是象征和意味着他的女儿也参加了这桩行动计划，以提高和鼓舞参加这项行动计划的所有政府军官兵的士气，同时，他也是向美国佬显示这项行动，打着他本人的标记。

巴里恩托斯决心兴师动众，发誓要把这个辛迪娅行动计划搞好，他指令两名上校，在美国顾问和特工专家的配合下，可以任意调动第四师、第八师的军队，可以随便调动空军，来全力执行这项行动。

他们很快开始找到了华金这一部分游击队的行踪，咬住了这支游击队的尾巴。

6月4日，政府军第一次和华金支队发生交火。在掩护战友们突围的时候，来自古巴的医务工作者，原古巴军队卫生部门的负责人迪亚斯少校，现在作为普通的游击队战士马科斯，壮烈地牺牲在战斗中，他就是那位在格拉拉批评后，宁肯被枪毙也不愿意离开游击队的英雄。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在这次突围战斗中，华金支队还失去了另一位宝贵的玻利维亚战士维克多。

但是，这一次，华金游击队胜利地完成了突围任务。不过，紧接其后，另两个原拟淘汰的游击队员战士欧塞维奥和钦戈洛，也在不适宜的时候逃跑了。这两个家伙投降政府军后，说出了游击队给养仓库和基地的全部秘密，并且向政府军提供了华金支队更为具体的情况；这样，就进一步调动了政府军对华金支队的追击。因为他们从欧塞维奥和钦戈洛嘴里知道，华金支队已经是一支疲于奔命，完全没有战斗能力的队伍了。

然而，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其后7月中和8月初的又两次战斗接触中，华金支队又连续多次挫败了追尾而来的大股敌人的势焰，给敌人造成了进一步的伤亡。

当然华金支队也付出了代价，在7月和8月初的几次与政府军的接触战斗中，又牺牲了两名勇敢而坚定的玻利维亚游击队员，其中一位是塞拉皮奥，是一个坚决革命的玻利维亚大学生；另一位就是年仅二十六岁的玻利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玻利维亚共青团的领导人佩德罗。他在1966年年底，随同玻利维亚共产党总书记马里奥·拉蒙一起来到切·格瓦拉游击队后，没有再随同拉蒙离开，却坚决留下了下来，成为毅然参加革命游击队的战士。在游击队里，他受到了切·格瓦拉的特别喜欢和器重，他还被切·格瓦拉特别聘请为克丘亚语的学习辅导教师。在8月的战斗中，他战斗得十分英勇，牺牲得也十分壮烈。

在马科斯、佩德罗等战斗骨干相继牺牲以后，华金支队的战斗成员已经越来越少，最后剩下来的十个人中，除了另一名准备淘汰的游击队员帕科以外，包括塔尼娅在内，实际上的游击战士，只剩下九名成员了。

然而，这支华金游击支队，仍然在敌军的大部队的包围之中，辗转进行着顽强的坚持和战斗。他们还在努力地寻机争取和切·格瓦拉带领的另一支战斗部队会合。他们是不屈不挠的。

然而，临近8月末的时候，他们也开始临近了全军覆灭的悲剧性的，然而同时是无比壮烈的一个时刻。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老牌特务，名字叫欧文·鲁斯，他用三千美金的价格和答应其去美国当移民的许诺，买通了一个原先和格瓦拉游击队发生过接触和联系的农民哈罗斯充当他们的奸细，在布下来的陷阱中，他们指定这个奸细把游击队引来上钩。

这样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当疲于奔命的华金支队来到哈罗斯家中解决吃饭问题时，哈罗斯盛情招待游击队吃饱肚子，还卖给游击队一些粮食，然后，他又给游击队殷勤指路，让游击队走向卡米里城附近的格兰德河的耶稣渡口。哈罗斯说那里是一个浅滩，渡过那里的浅滩，可以走向万无一失的可以隐蔽的复杂地形和丛林。

游击队根据他以前没有出卖过游击队行动的经验，很是相信了他。但他们不知道，在哈罗斯殷勤招待他们吃饭的时候，这个农民妄想能得到三千美元的赏金和移民到美国去，他已经派他的八岁的儿子到政府军去通风报信。

政府军自然地，迅速进入形成陷阱的阵地，准备让游击队来上钩。

而游击队疲惫的队伍，在凶险卑鄙的这个奸细的指引下，几乎是非常欣然地踏上了这条走向覆灭的绝路。

8月31日的夜里，华金支队的全体十名成员（包括准备淘汰的帕科），来到了四面丛林茂密的耶稣渡口。在夜色中，这里除了蛙声，显得一片寂静，好像是绝对安然的状态。

此时，华金支队已经没有特别顶硬的战斗骨干了。

华金命令尚可称得上是战斗骨干的布劳略率队过河，华金自己留在最后防卫。

这里河道因为缓浅可涉，所以河面较宽，水不太深，但主河道上也还有浸腰齐胸的水流，所以，大家过河的时候，必须把自己的背包和武器高高地举在头上。

布劳略走在前面，华金走在最后，游击队员塔尼娅，走在华金的前面，是倒数第二个下水的人。他们一队人马，很快都下到了河里，开始依次过河。

然而，就在他们全部下到河里，全都进到河流的中间主河道的时候，埋

伏在两岸的政府军伏兵，立即猛烈开火，把急风暴雨的子弹，一起射向河心里的游击队战士。

打前锋的布劳略，头一个负伤，但他立刻操起武器，丢弃背包，展开与敌人的枪战，他一阵排枪，不只击毙一个敌人。但是，政府军隐在阵地里，隐在河岸上，而游击队却完全暴露在河心里，完全成了明晃晃的可任敌人射杀的目标。

华金殿后指挥，但是，现在整个支队处在来自两岸的夹击中，完全陷入了包围，游击队已经完全陷在了进退两难，进不得也退不得的境地中了。华金知道一切部完了，他放弃了指挥权，而仅仅作为一个拚死搏斗的战士，奋力扳动他的枪机，坚决地打击和射杀敌人，宁死绝不甘当敌人的俘虏。他打尽了他冲锋枪里的子弹。他倒在了格兰德河滔滔的浊浪里。

英勇的女游击战士，她重病以来，身体一直不爽，但她始终顽强地坚持着在游击队里的生活，在此一刻，她也完全变成了视死如归的无畏的战士，她也丢弃了她的背包和一切器物，只操起她的冲锋枪来，拚命地、勇敢地向敌人开火，射杀敌人，最后，她也周身饮弹多处，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倒在了滔滔的格兰德河的流水中。

这支华金游击支队，全部九名游击战士，最后都壮烈牺牲了。嗣后活下来的，唯只就是那一位原拟淘汰的玻利维亚胆小鬼帕科。他由于不加抵抗地从河道里爬到了岸上，蹿入了丛林，虽然也负了轻伤，但保全了性命，最后成了政府军的俘虏。

此人无所谓是游击队的叛徒，因为他事实上早已经不是游击队员了。切·格瓦拉在组建游击队之初，曾经宣布过所有游击队员都拥有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的军职，后来由于帕科、佩佩、钦戈洛、欧塞维奥四名玻利维亚人的怯懦，切·格瓦拉已经亲自宣布解除了他们的军职，所以，事实上，最后活下来的帕科，并不算是游击队员，因此，他自然也再戴不上叛徒的帽子，因为他后来被政府军捉拿以后，也没有能再提供什么有用的情报。但是，此人活了下来，倒给后来的采访者们，提供了这一场战斗的一个活生生的证人，他有一张尚能说出当时全部情景的嘴，把那一场激烈而悲壮的战斗，能说得分清楚和明白。

那真是一场悲壮而惨烈的战斗。

没有一个真正的游击战士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中宣布投降。他们只有愤怒的子弹，表达着他们顽强战斗，战斗到底的决心。他们慨然血洒格兰德河，他们慨然壮烈牺牲他们的生命，悲壮激烈，无怨无悔。

几天后，牺牲在河道里的全体游击战士的遗骸，都被搭捞上来，政府军把他们全埋在了一个深深的坟坑，只把在战场三公里以外河滩上找到的女游击队员塔尼娅的遗体，埋入了一个单独的墓穴。

玻利维亚政府当局，巴里恩托斯这条美国走狗，得意非常，大肆张扬和宣传他们赢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宣扬他们已经消灭了切·格瓦拉游击队的主体和大部分成员，实际上当然是自欺欺人，他们通过使华金支队覆灭的战斗，更是吓破了胆，对切·格瓦拉游击队更是充满了巨大的恐惧。

有一个奇异的插曲是，指挥伏击华金支队的那一位政府军的指挥员马里奥·巴尔加斯，在赢得伏击战胜利后，在庆功时受到了加官晋级的奖励，但是旋即却就变成了一个吓破了狗胆的疯子，风声鹤唳，听见风，听见雨，听见树叶哗哗响，听见叮咚流水声，就会狂奔、狂嚣，发狂地死命躲藏，最后

钻在一条阴沟里被污水淹死了。

还有另一个插曲是，那个被美国特务用三千美元和移民美国的好处买下来的奸细，那个农民哈罗斯，最后并没有被弄到美国去，他也没有得到三千美元的奖赏，巴里恩托斯政府只奖给了他在圣克鲁斯城郊的一所房子和一块土地。他对此也很满足，举家搬到了这里定居下来。但是他欠下的血债，几年以后，还是被人前来进行了讨还，那是在华金支队全军覆没已经三年以后，突然有一个人来到哈罗斯家中造访他，向他宣布了一纸对杀人凶犯和奸细的判决书，然后把他领到了室外的一块荒地上，以一颗子弹，对他实行了处决。

前赴后继的革命者，是绝不会忘记向一切凶恶的敌人、奸细和叛徒们，讨还他们所欠下的血债的。

这可能也是一个必然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原则。这将是一个必然的、无休无止的、生生不息的原则。除了世界上不再存在两条腿走路的吃人的恶兽和凶惨的豺狼，否则，这规则就必将是永恒不变的。

在大敌重兵包围之中

1967年10月6日。

从外国的电台广播中，切·格瓦拉听到信息说，他现在带领着的仅有十七人游击队，已经陷在了数千敌军的层层包围之中。

切·格瓦拉判断这信息并非是虚张声势。他知道情况已经十分严重。

但是，切·格瓦拉仍然镇定如昔，了无惊慌。

他临牺牲前的最后一页日记，在10月7日的篇章上，他的字里行间里，依然从容地流露着诗与散文的文学的情韵和笔调。他这样写着：

今天是我们游击队开场满十一个月的日子，过得很安稳，有田园风味。

（晚间）我们十七人出发时，月亮很小，行军很累，在我们所在的河谷里留下了很多痕迹，附近没有房屋，但是有种上了土豆的地，由一些水渠引用小溪的水来灌溉。二时停下来休息，因为不再需要继续前进了。

切·格瓦拉的这最后一页日记，实际上写于10月8日的凌晨。是经过连续七、八个小时的夜行军后，在驻足下来的露营地宿营的时候，摸着他的小小的笔记本，操着他的笔，完全是在夜色中写下来的。

此时，这一支小小的部队，已经进入到了尤罗山峡地区。

他们在此间的土豆园田地边上，大约露营休息了两个小时，他们恢复了一下体力，有的人或许还打了个盹儿，但是他们不能展开背包露营展卧，因为在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切·格瓦拉已经下达了只休息两个小时，两小时后继续行军的命令。

他们必须向尤罗山峡的深处进发，以期从山峡的峡道中突围。必须从那边的完全的无人区突围。

在过去的两三天中，所有接触过的老百姓，包括男人和女人、老太婆或小孩子都能从他们的面孔上发现可疑的神色，完全不仅仅是惊骇，而往往是一种莫名奇妙的敌意和慌乱，比如在10月7日在一处高山野地里驻扎宿营时，遇到了一个放羊的老太婆，一见游击队，她就想赶快跑开，当把她抓回来询问她时，凡是问到政府军的情况，她都闭口不言，显然不是不知道任何情报，显然她是在掩饰和隐瞒什么。

后来知道的情况表明，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专家们，在这一带的山地居民中间，已经施展了相当毒棘的策略，他们利用这里的山地居民的贫穷和愚昧，施展恫吓和收买的两手策略，他们向附近左右的广大村民宣传和宣布，凡藏匿游击队或知情不报的人，都要被政府抓去坐牢和受审，而同时，凡是提供游击队行动信息和情况的人，都将能得到大宗财产的奖赏，赏额是非常可观和巨额的。

这两手，一软一硬，在贫穷愚昧的山民中间，很见成效，他们既怕被抓去受审和坐牢，又很想捞一笔额外的财产和奖赏，因此，他们的存在，不仅不能是游击队可以借以依恃的屏障，他们的存在，事实上也成了羁绊游击队的网络。

切·格瓦拉测透了这样的情势，所以，他决定必须进入不再和任何山民接触的无人山峡。

10月8日凌晨4点钟，也就在切·格瓦拉在那一块土豆地田边写完7日的日记又一个多小时之后，他也稍事休息一下，然后，就又照原定的计划，拔营行动起来，开始投入新的行军。

此时，天色还是一片蒙蒙的黑漆，山区黎明前的夜色，也还是很黑的。

切·格瓦拉带领指挥着小小游击队，现在比法捷耶夫小说《毁灭》中走向覆亡的十九人的莱复生游击队，还少两人，已经是一支完全势孤力单的队伍了。

忽然，在队伍前进的前方，出现了一星闪亮。但只闪现了一下，就不再闪现了。

行进的队伍，开始发出了一阵议论声，有的人认为，什么闪光也没有出现过，肯定又是幻觉在作怪。后来，他们又观察了一阵，果然不见闪光再闪，确实可能是人们产生了幻觉，所以，队伍就又开始向前进。

后来知道的情况表明，那忽然出现的闪光，其实真的并不是幻觉，而是真实的手电筒的闪光，切·格瓦拉的游击队，是碰上了敌人政府军的密探，他们正在侦察和搜寻游击队的踪影，他们闪亮了一下手电准备涉过一条小溪时，听到了前方的说话声，他们立刻熄灭了手电，退回去报告他们发现游击队的信息。

而这边，游击队开始踏进了敌人早已布局好了的埋伏圈。

十七人的游击队，开始继续向前行军，在黎明的晨曦中，他们已经疾进进入到尤罗山峡。

但是，在黎明的晨光中，切·格瓦拉发现，他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地形并不很好的地场，山峡的土地贫瘠，灌木丛很低，完全说不上茂密，周围的山丘上的树木，也相当稀疏，不能形成隐蔽的屏障，这情况是相当不好的。

在这样的地形间行军，是很容易被敌人的飞机、直升飞机发现的，甚至地面上的望远镜，也能不难发现和收入镜底，怎么办呢？

几乎没有更多的选择，只能化整为零，把小部队再疏散开来，然后在矮矮的灌木丛中隐蔽，以期黑夜来到之后，再展开疾进的行军。

这样，进入尤罗山峡的这片地场以后，切·格瓦拉就派出因蒂、达里奥和身带轻伤的贝尼尼奥，前出到右前方，去扼守右翼，派庞博和乌尔瓦诺，前出至左翼去，形成依恃的犄角。

切·格瓦拉本人，和其他十一名战士，留在峡谷中，在矮矮的灌木丛中，隐蔽了起来。

这时候，切·格瓦拉已经充分地估计到了局势的严重性。他作了队伍完全被打散的布署，要求战友们，如果被打散的话，坚持各自为战，从一切可以选择的方向突围，然后到皮德尔帕戈河边再寻机集结。

在切·格瓦拉留在身边的十一名战士中间，有一些人是病号，有一些人是完全没有多大能力可以投入战斗的。比如绰号叫做“中国人”的秘鲁革命家胡安·纳瓦罗，他是高度近视眼，离开眼镜便会寸步难行，完全成为一个瞎子。他在三月间初到游击队时，原准备是迅速离开游击队，然后返回秘鲁去组织后援部队的，后来由于“卡拉米那”营地的陷落，断了去路，他就也毅然成为了切·格瓦拉游击队里的战斗成员，由于他的眼睛太近视，他始终成为不了战术上过硬的战士，但他的革命意志和战斗决心，在切·格瓦拉的感召下，却是越战越勇，越来越顽强坚定，所以，后来在格瓦拉的日记上，一方面称他是一个包袱；另一方面却也说他堪称是一个模范的游击队员。

当时，留在切·格瓦拉身边的，还有一名这样的游击队员是玻利维亚人威利。这人很有革命觉悟和革命决心，但是天性胆小，每每在战斗中，表现出懦弱和胆怯，是一个坚定的战士，却不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他十分敬仰和崇拜切·格瓦拉，所以，在战斗中，如果他依傍在切·格瓦拉的身边的话，

他的胆子就会很有效地壮起来一些。正因为如此，切·格瓦拉也才特别把他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当然，切·格瓦拉留在身边的战斗骨干，也还有几个，遗憾的是，特别过硬的骨干，已经不多了。当年第八纵队的参谋长安东尼奥老战友一直还留在他身边，这位杰出的革命战友，由于他脑部的伤残，在玻利维亚游击队里，他一直充当着普通的游击队员，追随着切·格瓦拉，可是，最近以来，由于一直活动在海拔两千米左右的高原地带，他的脑伤残疾反映很厉害，时有幻觉出现，神经有些病态反映，有时候会像孩子一样默默垂下泪来，令切·格瓦拉十分心痛，所以，切·格瓦拉总是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总是让他随在自己的身边活动。

切·格瓦拉身经百战，受伤多次，经历过奇奇怪怪的各种风险，他都成功地挺了过来，活了过来，所以，他也总觉得自己像猫一样，有着九条性命——拉丁美洲人认为猫的生命力顽强，总能九死而一生，所以，切·格瓦拉总有一种无畏的自我感觉，认为他自己是不会被致命和伤害的。而正因为他有如此的一种意念，他把一些胆怯懦弱伤病的战友留在自己的身边，他总觉得他似乎可以给这些同志一些庇佑。

而可惜的是，现在能够非常强有力地庇佑他的非凡的战友已经不多了，他原在第四纵队和第八纵队时的两个警卫员，罗兰多和图马，来到玻利维亚后，都已经先他而战死了。

现在，切·格瓦拉显然陷在了最困难的时刻。

然而，他仍然怀抱着坚决突围出去的决心和期望。

把一切都部署好以后，他指挥留在他身边的十一名战友安然潜伏。

糟糕的是，这里根本就不是好的潜伏地形。

不过，他们还是潜伏了很长的时间，使战友们也能够得到了一个休息的时间。

他们一直在一片灌木丛里，潜伏到10月8日下午1点30分，这时候，切·格瓦拉派遣玻利维亚战士胡利奥和阿尼塞托前出去联络已经在前方左翼的庞博和乌尔瓦诺。

但是，这时候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的敌军，突然用机枪、步枪和掷弹筒，猛烈地向着他们开起火来。

敌军迅速地穿插、分割了切·格瓦拉和他前出形成犄角之势的战组的联系，敌人开始主攻进逼切·格瓦拉所在的隐蔽处。

这里的隐蔽处，事实上形不成阵地，没有什么的遮挡的掩体。

切·格瓦拉在此时此刻，仍然从容指挥，无所畏惧，他立刻把他身边的最后九名战士分成两个战斗组，他命令来自古巴的医生莫罗、玻利维亚籍的战士小巴勃罗、查帕科和秘鲁籍的战士欧斯塔基奥，组成突围组，强行突围，切·格瓦拉自己指挥还剩下来的五个人，掩护第一组人突围。

游击队里年龄最小的玻利维亚战士小巴勃罗已经完全成长起来，成为了一名所向无敌的战将，他作为第一组的突击手，他横扫着手提机关枪，为第一组突围的战友开路，他们很快突到了敌人的包围圈外去了。

切·格瓦拉奋勇地指挥着留下来的五个战友，用密集火力吸引着敌人的火力，掩护着第一组的战友们撤退。但是，敌人的机关枪弹、步枪子弹、掷弹筒发过来的飞雷，也像狂风暴雨般的密集。

在脑伤残疾折磨阵痛中的英雄，切·格瓦拉最亲密的战友之一的安东尼

奥，原第八纵队的参谋长，站直身体牵制敌人的人力，机枪横扫敌人，催促切·格瓦拉赶快撤离，但他英勇牺牲了。

接着，另一位玻利维亚籍的比较过硬的战士阿图罗也牺牲了。在激战中，最后一名从古巴来的战友，也就是十一个月前，从巴西圣保罗市迎接和陪同切·格瓦拉来到玻利维亚的帕春戈，也就是帕乔，也就是阿尔维托·奥卡上尉，在切·格瓦拉的面前，身中敌人的枪弹，倒了下去。他临倒下时，向着切·格瓦拉喊出来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为能是你的战士而骄傲！”

战斗一直在激烈的进行中。

切·格瓦拉坚持射击着敌人，一直到他手中的 M2 式步枪枪筒被敌人的一颗子弹打坏完全不能使用时为止。他的手枪子弹后来也完全打完了。

本来，切·格瓦拉如果自己先一步突围，他也还是有可能突围出来的。只是由于在最关键的时候，那一位高度近视的秘鲁革命家胡安，他在最后要突围时，他的眼镜滑落到了草丛里，而没有眼镜他又寸步难行，在他寻找眼镜的过程里，耽误了格瓦拉突围的时间。

而在那一刻，敌人的罪恶子弹，射伤了切·格瓦拉的一条腿。

在此严峻的时刻，往昔在战斗中表现怯懦的玻利维亚籍游击队员威利，也就是西蒙·库瓦，忽然升华为最伟大、最勇敢无畏的战士，他奋勇地背起受伤的切·格瓦拉来，离开了最后的阵地，撤上了一座小山，进入了一片丛林。

然而，经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专家和美国特种兵严格训练出来的玻利维亚政府军的突击队员，铺天盖地合围上来的包围圈，里三层，外三层，已经是突不破的了。

腿部业已负伤，步枪打坏，手枪子弹打完失去反抗自卫能力的切·格瓦拉，和背负着他撤退的英勇顽强的战友威利，在敌人的弹雨和枪口下，终于落到了凶恶敌人的手中。

在弹尽负伤之后

切·格瓦拉以及他的战友，玻利维亚籍的游击队员威利，在突击队上尉加里·普拉多指挥一队人马的押解下，被押解到了尤罗山峡中的伊格拉斯村。

加里·普拉多上尉在第一眼看见脸色凌厉而严峻，负伤被俘的切·格瓦拉时，他马上认出了这正是切·格瓦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专家们，早把切·格瓦拉的照片和画像发给了每一个突击队的官兵，使他们对切·格瓦拉的形象全部了然在心了，这一位上尉，现在在认出切·格瓦拉时，几乎禁不住就大叫出一声来，他叫的是“教皇”两个字，然后，禁不住跪倒在地上，差一点儿晕了过去。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专家，给他们训练出来的玻利维亚突击队，有严格的指令和规定，即是，在逮到切·格瓦拉游击队的任何俘虏时，要一律进行捆绑，以防继续反抗和逃逸。

但是，加里·普拉多上尉不敢下令捆绑威严不可侵犯的切·格瓦拉，反而，他命令由两名突击队的中士搀扶着切·格瓦拉走路。只是对最后护卫切·格瓦拉的游击队员威利，实行了捆绑。

切·格瓦拉和威利，被分别关在了伊格拉斯村小学校的两间教室里。

来到这里后，加里·普拉多上尉还立即命令卫生兵桑科，给切·格瓦拉的腿上的伤口，进行了清洗、清毒和包扎。

这时候，通过无线电话，普拉多上尉已经把切·格瓦拉落网的情报，报告给了他的上峰，在很短暂的一刻时间里，所有的电讯通讯网络都畅通起来，切·格瓦拉被逮的消息，几乎首先通报到美国大使馆，接着通报到玻利维亚总统府，以及武装部队总司令的作战室。

首先，第一个赶到关押切·格瓦拉的伊格拉斯村小学的，正是围歼切·格瓦拉游击队的前线突击营的指挥官安德烈斯·塞尔尼奇上校。这个同样花销了大量美金，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豢养出来的歹徒，他知道已使格瓦拉落网，被他的部下已经逮住的时候，他知道他也会因此获得一笔新的巨额的赏金了，所以，他已为他巨大的胜利开始了热烈的庆祝，在坐着吉普车，从他的指挥所奔向伊格拉斯村的路上，他已经在车座上狂饮着白兰地酒，庆贺他成为了赢家。因此，当这个家伙飞车来到关押切·格瓦拉的小学校时，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喝得醉酒熏天的醉汉。他马上进入关押切·格瓦拉的教室，他要开始审讯切·格瓦拉。他首先要侮辱一番格瓦拉，但格瓦拉坚决拒绝他的侮辱，他像一只受伤的老虎一样，猛扑上来，给了这个醉汉猛得一个响亮的耳光，一个伤员，竟把这位政府军的上校打倒在地。

当然，切·格瓦拉也受到了反击。他也受到了安德烈斯·塞尔尼奇上校的狂殴。不过，为此，他也要受到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也是不会逃出总有一天到来的报复性的惩罚的。所有惨害过切·格瓦拉的人，到头来都是必然要遭受到惩罚的，而所有的这些惩罚，将都是来自人民的良心。人民的良心，是不会宽恕残暴的罪恶和残暴的歹徒的。

安德烈斯·塞尔尼奇上校，后来也没有好下场。他的下场也是可悲的。

接下来，来到这里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事实上在玻利维亚招聘的特务，玻利维亚情报机关的米格尔·阿约罗亚上校，随后是负责围歼切·格瓦拉游击队的陆军第四师的森特诺上校，随即，玻利维亚武装部队总司令奥万多将军，具体负责指挥军队与切·格瓦拉游击队作战的玻利维亚武装部队参谋长胡安·何塞将军，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些特工专家，坐直升飞机，从拉

巴斯飞到了这里来。他们要对切·格瓦拉实行一番“会审”。

有意思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此间的大特务们，包括操纵这场围歼切·格瓦拉游击队战役的美国大使亨德森，以及大使馆武官兼中央情报局拉巴斯站站长福克斯上校和他的副手库尔亨，还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专门派到玻利维亚来的特工专家，特别行动队队长“老头子”拉尔夫·谢尔顿，却都并不来直接参加对切·格瓦拉的会审，不过，他们派来了足有一个班的中央情报局雇佣的为人所不知名的喽罗，前来“观察”对切·格瓦拉的“会审”。

美国的大特务和间谍头目们为什么不亲自出面呢？他们不是不方便，他们只是因为他们的心理上，拂不去对切·格瓦拉的恐惧，另外，这些美国的坏蛋们，他们既是一些无恶不作的歹徒，却又是一些卑鄙的家伙和伪君子。他们既要杀人害命，却往往又极力使自己离血腥的杀人场尽量远一些，他们有的时候，也惧怕在这样的罪恶现场，被无情的历史书页上，记下他们参与其间的罪恶姓名。

然而，当然，如此一来，即就可以掩饰得了他们的罪恶和罪行吗？事实上当然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当从尤罗山峡传来的电讯，把切·格瓦拉被俘的情报，首先报告美国大使馆，同时报知玻利维亚总统府后，美国大使馆和玻利维亚美国走狗所居的总统府，立刻就欢腾鼓舞起来，出现了差不多是节日的景象。

美国大使亨德森，武官兼中央情报局拉巴斯站长福克斯上校，以及此间的走狗总统巴里恩托斯，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奥万多将军，参谋长胡安·何塞将军，立刻麇集到一处，他们马上开始研究和磋商如何处置切·格瓦拉。

怎么办呢？

把切·格瓦拉押解到拉巴斯来，进行军事审判吗？

这是无论如何都行不得的。

因为，那样一来，被审判的，将决不是切·格瓦拉，被审判，被控诉的只能是美帝国主义的罪恶和他们的走狗的罪恶了，切·格瓦拉能不能也像当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一样，也发表一篇长篇的辩护演说，宣布“历史将审判我无罪”呢！

这样的审判，实在危险，也太不可行了。因为，全世界的人民，全世界的，包括玻利维亚全国人民，玻利维亚全国的舆论，都几乎会无可置疑地统统站到切·格瓦拉的方面去，最少，人们的良心和同情，都会是向着他的。

因为，这样的事实已经证明，在切·格瓦拉领导玻利维亚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差不多快满一年的时间里，尽管他在玻利维亚南部山区，很难得到那里深陷在贫穷和愚昧中的农民的支持，但是，在比较开化的玻利维亚地区，在城市里，在工人和学生中间，甚至在军队的军官和士兵中间，在许许多多的政府职员们中间特别是在新闻媒体方面，人们的向心和同情，几乎是一边倒的朝着切·格瓦拉，朝着切·格瓦拉的游击队的。

玻利维亚人民的向心，是绝不朝着美帝国主义和他们在这一带的走狗的。

所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美国在玻利维亚的走狗们，这里的美国大使和玻利维亚总统，这里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这里所有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和特工专家们，都一致认识到，切·格瓦拉是不能被审判的，对切·格瓦拉的唯一办法，在他们看来，只能有一种选择，这就是坚决从肉体上消灭，绝不能让他的生命再得以留存。

但是，玻利维亚至今仍然没有恢复死刑的法律。

不过，这有什么难办的呢？美国人最善于玩弄的两种把戏，其中一项是玩弄女人，一项就是玩弄法律，美国的法律从来都既可以充作是贞洁牌坊，又可以充作是妓院的幌子。美国的法律，从来是在只对统治阶级压迫阶级有利的时候，才是有效的原则，否则从来都是无效的。美国玩人权牌，但是连他们的总统都参与策划暗杀别国领导人的血腥勾当，罪恶勾当，下流勾当，美国当然还有违犯日内瓦公约大量残杀战俘的传统。美帝国主义是一个行为最为卑鄙无耻的帝国主义势力。

因此，美帝国主义势力，有的是现成的罪恶榜样和现成的罪恶手段。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首先作出了消灭切·格瓦拉肉体的决定。接下来，美国在玻利维亚的走狗们，包括这里的总统巴里恩托斯，包括这里的总司令奥万多，这里的参谋长胡安·何塞，他们所能干的差事，只是执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决定罢了。

事实上，布下擒获切·格瓦拉的罗网的，完全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最后决定格杀切·格瓦拉的，也还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正是在1967年10月7日，当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尤罗山中，在沉沉的夜幕里摸黑写下最后一页的日记的时候，远在美国的纽约，正在开机印刷的《纽约时报》，已经印刷着这一天《纽约时报》上的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切·格瓦拉的最后一战》。美国《纽约时报》几乎是提前一天，已经宣布了切·格瓦拉游击队被消灭的消息。也就是说，美国的《纽约时报》发表的格瓦拉游击队已被消灭的消息，发表在格瓦拉游击队被消灭的事实发生之前的一天，这是一种文字游戏的巧合吗？完全不是。

事实上，美国的最高当局，一直并没有完全放手只让他们在玻利维亚前线执行任务的间谍特务小头目们处置在玻利维亚切·格瓦拉游击队的问题，美国的最高当局，一直仍然亲手把持着这件事情处置的最高环节。

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擒获的情报，在最初的当时，并不仅仅是报到美国在此间的大使馆，和在此间的走狗总统府，就算已经报告到了最高当局，实际上，远非如此。其间，通过美国大使馆和中央情报局驻拉巴斯站，早把电讯迅速呈报给了远在美国的最高当局，于是，美国的最高当局，在欣喜若狂的同时，对切·格瓦拉真的被擒获，还持着将信将疑的态度。

于是，最高当局马上指示最高当局早已决定组成的专门负责和领导对付玻利维亚切·格瓦拉游击队特别行动小组，即机构设置在巴拿马运河区特种部队所在地的由美国将军威廉·斯克爾领导的这个部门，让这个部门对来自玻利维亚的关于擒获切·格瓦拉的情报报告，作出反馈指示，要求务必验明证身，就地处决切·格瓦拉，同时，要拿切·格瓦拉的一部分肉身实体，要拿到巴拿马运河区美军南方司令部由威廉·斯克爾将军领导的机构再进行核查和验证。

起先，从这里发出指示，要求玻利维亚当局在伊格拉斯村就地处决切·格瓦拉以后，要锯下切·格瓦拉的一双手来，把这双手马上用福尔马林溶液泡着，原封不动地运送到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军南方司令部的特别行动机构来，以便从手指纹上，查验核证是否确系切·格瓦拉的真身和双手。

这个指示发出后，威廉·斯克爾将军又觉得，只有两只手，仅靠指纹，似乎仍然难于令人确实可信地验明是切·格瓦拉的手和指纹，再说，负伤以后肿胀的手指可能会使手指的指纹发生变化。所以，威廉·斯克爾将军又要

他的部属，对玻利维亚前线的特务们和玻利维亚当局发出指示，光要两只格瓦拉的手还不行，还要把切·格瓦拉的头颅割下来，要把完整的头颅运送到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军南方司令部的特别行动机构来。

主子作出了这样的命令和指示，主子手下的奴才和走狗们，就只有无条件执行的份儿了。他们不会有哪一个家伙，会有足够的聪明的头脑和富有人性的心灵来违抗主子的如此惨无人道血腥的吃人意图的。

凛然不屈壮烈牺牲的时刻

切·格瓦拉在他所极为鄙夷和蔑视的敌人的手里的最后几个小时的生命，必然是十分痛苦的。

但他仍然没有绝望和恐惧，他仍然保持着从容和凛然正气，他是不屈服的，他没有疼痛不堪、沮丧地低下了充满尊严和骄傲的思想的头颅来。

在一个平静的时刻里，他仍然保持着像山海一般的庄严和平静。

他被单独关押在一间小学校的教室里。有那么一个时刻，教室里，除了两个荷枪实弹的政府军军士，在看押着切·格瓦拉以外，还曾出现过一年仅二十二岁的女教师，她的名字叫胡莉亚·科尔特斯。

这是一个很聪明、很朴素的年轻女孩，她被允许进入到关押切·格瓦拉的教室来取教案，所以，她有机会看到了最后时分的切·格瓦拉。

她很惊异地看着切·格瓦拉的一张异常平静的脸。切·格瓦拉一定马上判断出了她的身份与政府军绝对无关，所以，切·格瓦拉报与她的目光，是一种特别温和善的目光，甚至是一种满含微笑的目光。

这目光，使年轻的女教师，忍不住向切·格瓦拉表示致敬，她冲着切·格瓦拉说了一声：

“您好！”

切·格瓦拉友善地向她点点头。格瓦拉问她：

“你是这里的教师吗？”

胡莉亚答道：

“是。”

切·格瓦拉笑了一下，扬起他长满蓬松卷曲胡须的下巴来，朝胡莉亚背后的黑板上指了指。

“这一行西班牙文，是你写下的吗？”

胡莉亚回头看了一眼黑板上的一行西班牙文，写的是：“我已经会读书了。”

胡莉亚转过脸来，对切·格瓦拉不无羞怯地点了点头说：

“是我写下的。是教我的学生们的。”

切·格瓦拉笑了一下，他知道这位讲克丘亚母语的，有印第安血统的女教员，所受教育水平也不会超过初等师范，所以，她的西班牙文的水平，显然也不是很高的，因此，她写在黑板上的西班牙文，出现了错误。

切·格瓦拉平静地，善意地，像是父辈在告诉女儿似的，他对胡莉亚说：

“你的那行字里，有一个重音符号标错了，‘会’字是不该标成重音的。”

“哦！”胡莉亚忽然惊悟地拍起了手来，提高声音说：“您说的对。我想起来了，是我错了。”

切·格瓦拉说：

“不要紧，你还年小，好好学习进取，将来你就不会错了。”

这是切·格瓦拉最后对一个善良纯朴的年轻女孩，说出来的热情鼓励和祝福的话。

切·格瓦拉直到此时此刻，他仍然不忘把善良美好的祝福和人类的友爱，更多地留在人间，更多地留给纯洁善良的人们。

但是，至此，全人类最凶残的敌人，帝国主义的的特务和走狗们，就不容他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在拉巴斯那边，美国大使亨德森和武官并兼中央情报局拉巴斯站长的福

克斯上校，以及巴里恩托斯总统、奥万多和胡安·何塞将军，已经根据美国最高当局作出的指示，作出了最终处置和处决切·格瓦拉的决定。

奥万多将军等人，和一大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不知名的特工专家，坐直升飞机来到了伊格拉斯村，来到了这所关押着切·格瓦拉的小学校。

他们来此，一方面是对切·格瓦拉实行“会审”，主要的目的，是来监督执行对切·格瓦拉的处决的。

奥万多将军等众多的几位将军，来到此间后，由森特诺上校、米格尔·阿约罗亚上校和安德烈斯·塞尔尼奇上校陪同，进入了关押切·格瓦拉的教室。

奥万多将军没有勇气审向切·格瓦拉，他受不了切·格瓦拉鄙夷他的、蔑视他的目光。

奥万多将军只好鼓动一位陪同他来的经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特殊训练的，由古巴反革命分子而成为美国特工专家的家伙，名字叫冈萨雷斯，让他来向切·格瓦拉发问：

“此时此刻，你在想什么？”

切·格瓦拉凛然回答道：

“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奥万多敦促冈萨雷斯：

“再问他，还想什么？”

切·格瓦拉更加凛然地注视着他面前的所有死敌，他厉声地又说一句：

“我在想：你们将在什么时候，什么的情况下，被我们的人枪毙！对你们，一定是要统统枪毙的！”

奥万多将军立刻浑身颤抖起来，他浑身颤抖的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了。

其他所有的将军和上校，所有的特工专家和特务，都满面蒙上了灰土的颜色。

奥万多将军第一个从审讯切·格瓦拉的教室里退了出来。

其他“猩猩”和校官们、特务和特工专家们也都退了出来，他们每个人的脑瓜瓢上，都挂着一串串冰冷的汗珠。

他们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副官们在这里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雪茄烟和咖啡、果点。但是，奥万多拒绝在这里多呆一刻，他迫不及待地要求马上准备飞机，马上离开这里，但是，他立刻下达了处决切·格瓦拉的命令，同时，他表示，这个处决需要在他远远离开此地以后再执行，他要飞到格兰德城里去，在那里等待处决切·格瓦拉的最后报告。

奥万多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决定？原因当然很多。他的原因多的永远也不能完全说清楚，也许包含着对罪恶的恐惧，也许包含着对被惩罚和报复的恐惧，而他能说出来对他的下属有所解释的是，他所以要到格兰德城里去等待切·格瓦拉的死讯，是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赴玻利维亚执行对付切·格瓦拉游击队的别动队总头目、中央情报局特别行动的前线执行官拉尔夫·谢尔顿这一位“老头子”，正也坐镇在格兰德城里，等待着刽子手们报来杀死切·格瓦拉的消息。

这样，奥万多将军和其他诸多的“猩猩”们、上校们，就都躲到远在数百里之外的格兰德城里去，等待着切·格瓦拉被处决的最后报告去了。

在伊格拉斯村，最后留下来来监督执行行刑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事实上招聘的特务，玻利维亚军事情报头目米格尔·阿约罗亚上校，以及突击营的指挥官安德烈斯·塞尔尼多上校，还有陆军四师的师长森特诺上校。

他们决定首先执行对与切·格瓦拉同时被俘的游击队员的枪决。

在切·格瓦拉被俘过程中，玻利维亚的游击队员，在以往的战斗中，表现不无软弱怯懦的威利，也就是西蒙·库瓦，在最后的战斗中，他却表现的如此无比的顽强和英勇，在最后一刻，他誓死和他的领袖和指挥员战斗在一起，在被俘以后，关押在学校里的另一间教室里，他也坚定无比，对凶恶的敌人决不示弱和屈服，敌人从他嘴里掏不出半句埋怨和怨恨切·格瓦拉的话来，敌人更休想借他的嘴来侮辱革命和侮辱切·格瓦拉，虽然他遭受到了凶顽的安德烈斯·塞尔尼多上校更为冷酷无情的殴打。

威利视死如归，在最后的时刻，他成为最坚贞的游击队员，成为最纯洁纯粹的革命英雄，当敌人的刽子手，手操着叫起枪机的冲锋枪，冲到他身边，准备最后杀害他的时候，他突然的高喊的呼声，竟吓得刽子手倒退三步，一时忘记了开枪、以至，他们没能阻止威利最后喊出这样的壮烈声音：“我能同切一起就义，我感到光荣和自豪！”“嘟嘟嘟”，一串冲锋枪子弹，穿透了威利的胸膛，作为一个战士，他倒下了。但是，作为一个英雄，他站起来了。在打死威利以后，敌人又处决他们的另一个俘虏，这就是处决绰号叫做“中国人”的秘鲁革命家胡安·纳瓦罗。尽管切·格瓦拉的游击队，从来不曾处决过任何一个政府军的战俘，包括不处决他们的军官和被俘的情报军官，但是，美帝国主义及他们在这里的走狗，他们是决不放弃处决他们所俘获的一切俘虏的。

“中国人”胡安·纳瓦罗，在最后的时刻，由于他的眼镜滑落，掉在地上，使他变成了瞎子，寸步难行，他不仅影响了切·格瓦拉及时撤退，他更影响了他自己的撤退，以至他最终也没有撤退成功，他逃进了一片树林，他以为那里树木茂密，实际上四周已经站满了敌人，敌人的突击队员扑上来一阵狠命的殴打，把他痛打一个半死，最后也捆到小学校来，和威利关一起。

他失去了眼镜，他完全变成了瞎子，但他仍然心地光明，他仍然不觉得眼前是一片黑暗，而恰恰相反，他感觉到的只是无比的辉煌和灿烂，只是后来，敌人的枪口对准着他的胸膛的时候，他还是不知道，他只是无怨无悔，无声地倒了下去。

威利和“中国人”被敌人杀害了。

切·格瓦拉听到了处决他们的枪声。他甚至还听到了威利高声的、响亮的呼喊。当然，这呼喊带给切·格瓦拉的绝不可能是慰藉，而只能是深深的沉痛和遗憾，他沉痛和遗憾没有把这样杰出的人物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带到辉煌胜利的日子，为此，他不能不无沉痛和遗憾，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内心深处，仍然并不感到愧疚和不安，一个个杰出的革命英雄，成为如此光辉无比的永垂不朽的榜样，这是完全可以引为自豪和带来永恒的慰安的。革命就要战斗，战斗就会有牺牲，只要烈士的鲜血染红革命的旗帜在天空中飘扬不息，尽管无数烈士失去生动鲜活的肉体躯壳，但他们璀璨的精神和灵魂，就必将是长存不息的。

最后，刽子手们来了。

阿约罗亚上校、森特诺上校、塞尔尼奇上校、三名上校一起，掏出了中央情报局特别拨来的赏金，是很厚很厚的一迭美元。他们把这些美元交到一名名叫马里奥·特兰少尉的手上。这个手指颤抖接过赏金来的少尉，在他把厚厚一迭美金装在口袋里以后，却仍然拉不开半自动步枪的枪栓，于是，三名监刑的上校和仍然有一大帮同时在监刑的美国特工专家，又赏给马里奥·特

兰少尉几大杯上等的白兰地酒，直把他灌到酩酊大醉的程度以后，在人们的导引下，把他送到切·格瓦拉的身边，让他的枪口对准着切·格瓦拉的肚子，然后向他下达命令开枪。

他被严格命令不准向切·格瓦拉的脑袋开枪，不准向格瓦拉的双手开枪，因为格瓦拉的双手和脑袋，还必须被完整地保存下来，都要送到美军驻巴拿马运河区的南方司令部特别行动机关去验证去呢。

于是，马里奥·特兰少尉的半自动枪枪口，就对准着切·格瓦拉的肚子跳跃，多半都打到了肚子上下，一共击发了九发子弹。切·格瓦拉的下半身差不多完全被打碎了，但仍然因为没有伤致脑袋和心脏，使他呻吟喘息了很长时间，最后，另一名烂醉如泥的军官被命令再给切·格瓦拉补上一枪，这个军官用手枪在切·格瓦拉的左肋又补了一枪，这才使切·格瓦拉终于最后死去。

一切都沉静下来，所有的刽子手们都被吓得喘不上气来。他们屏息了很久，才开始收拾切·格瓦拉残破的躯体。他们遵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别行动机构的命令，开始肢解切·格瓦拉的躯体。

直升飞机又从格兰德城里转来，带来了装有医药溶液的容器，来收放切·格瓦拉的头颅和双手。于是，刽子手们又动起手脚来，开始锯下切·格瓦拉的两只手来，同时，又锯下了切·格瓦拉的脑袋来，把手和脑袋一起装在装有溶液的容器中。只有一件事情，是任何一个凶恶刽子手都不敢施为、也办不了的。这就是，他们谁也不敢动手抹合起来切·格瓦拉怒睁不闭的一双眼睛。

切·格瓦拉死了，他也决不让他的敌人们不感到恐惧和获得安宁。

从此，切·格瓦拉的名字，都会像他怒睁不闭的眼睛一样，使整个世界的帝国主义势力以及他们的走狗，永世不得安宁。

切·格瓦拉活着。

切·格瓦拉是永远不死的。

他的部队还在战斗中

切·格瓦拉牺牲了。

切·格瓦拉被凶恶的敌人杀害了。

但是，切·格瓦拉游击队并没有覆灭。切·格瓦拉的游击队，在切·格瓦拉被俘以后，还在坚持着殊死的、不屈的战斗。

10月8日，在尤罗山峡中的最后一战打响以后，从下午一点半钟开始的战斗，一直打到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枪炮声停息了下来。

从早上潜伏开始，前出到左右两翼的两个游击小组，包括因蒂、庞博、贝尼尼奥、乌尔瓦诺、达里奥和胡利奥等六名战士，在激战的时候，他们被敌人的炮火把他们和切·格瓦拉所在的阵地分割了开来，他们与敌人展开了战斗的周旋，但是始终没有离开过战场。

在黄昏以后，这六个战友会聚在了一起，他们在夜色中又返回了切·格瓦拉曾经潜伏的阵地，但是，此处除了一片战后的凌乱以外，他们已经找不到他们的领袖和指挥员切·格瓦拉了。

于是，他们便又开始向着别处寻找，他们以为，切·格瓦拉已经成功地突围。不过，他们仍然并不放心，他们仍然围绕着曾经激战的战场寻找切·格瓦拉的踪影，一度，他们甚至近至了依格拉斯村，只是由于敌人的警戒严密，他们没有试图进入村内。

因蒂和庞博两个战斗小组六名战友，在尤罗山峡里徘徊三日，坚持寻找着切·格瓦拉，一直到第三天，在10月10日，他们从贝尼尼奥还带在身旁的小收音机里，听到了切·格瓦拉牺牲的消息，他们才六个同志抱在一起大哭一场，迅速离开依格拉斯村附近的战场。

因为，他们从电台中收听到的消息说，除切·格瓦拉业已被俘和牺牲之外，牺牲在此处的还有其他六位同志，而有十名游击队员，业已突围。

从这样的消息中，因蒂和庞博等人判断，除了他们现在在一起的六人之外，还有四位同志也已经突围出来。这样，他们立刻想到了切·格瓦拉的原部署，即如果游击队被打散的话，大家要各自为战突围，然后到皮德尔帕戈河边再集结。

于是，他们决定离开依格拉斯左近，开始奔向皮德尔帕戈河边，准备在那里，再会合他们的战友，继续坚持和展开战斗。

因蒂、庞博的六人小分队，坚持进行了两天的行军。但是，到了10月12日晚间的时候，他们从电台的广播中，再次收听到了不幸的消息，消息中说，已经又有四名突围的游击队员，在又一场围歼战中被歼灭。

因蒂、庞博知道，现在，整个切·格瓦拉游击队，现在就仅仅存着他们这一队的六个人，六个火种了。

后来的情况很快就清楚了。在依格拉斯这边的尤罗山峡的激战开始以后，切·格瓦拉首先命令小巴勃罗迅速带领正在病中的来自古巴的医生莫罗，和无线电技术员，秘鲁籍战士欧斯塔基奥，以及也是个病号的玻利维亚籍战士查帕科突围。小巴勃罗在战斗中，已经锻炼的十分顽强过硬，他横扫着手提机关枪，掩护其他三位同志突围，当时突出了包围圈，但是，在向着皮德尔帕戈河边运动，准备和战友们如约再度会合时，再一次遭到敌人的围截和伏击，小巴勃罗和其他三名同志都奋力战斗，全部阵亡。

他们在切·格瓦拉被俘后，又坚持血战了四天。他们并没有投降。

在余下来的最后六个同志，怎么办呢？

他们不得不作出一个痛苦的决定。为了保存火种，在目前的条件下，只能撤出战斗了。

这时候，他们从电台广播的政府公报中，听到了一项悬赏捉拿他们余下的六名游击队员的通缉令，他们被悬赏一千万玻利维亚比索（约合四十三万美元）。而同时，也还悬赏以同样的价格收买他们，只要他们六人一起到政府军中来自首和投诚，他们也可以得到这个数目的美元。

然而，切·格瓦拉训练和带领出来的战士，是没有一个人会成为这样的无耻叛徒的。

金钱，怎么能买得动他们的革命意志呢？在他们的革命意志和革命良心面前，金钱不过是粪土一般的东西。

他们完全不为所动。

他们一致推举庞博现在成为六人小分队的战斗指挥员，他们仍然携带着准备激战的武器。

他们研究了撤退的路线，他们轻装快速行军，向着科哈班巴——圣克鲁斯公路沿线靠近，在最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时，他们又遇到了一支敌人的巡逻队追击。在这又一关键的时刻，年仅三十岁，勇敢而忠诚的游击战士，被战友们戏称为是“塌鼻子”的胡利奥·门德斯，掩护战友，牵制敌人，打了一场漂亮的狙击战，最后自己也献出了他的生命，作为玻利维亚籍的战士，他把他的热血尝还给了渴望独立、解放和自由的祖国母亲的土地。

对于切·格瓦拉牺牲，对于切·格瓦拉游击队的覆灭，在玻利维亚引起的震撼是深刻的。人民，几乎没有一个工人，觉悟的农民和学生以及其他各界人士，走上街头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胜利欢呼和祝贺，他们高额酬金悬赏捉拿仍在生存战斗中的游击队员的通缉令，并没有任何人出来响应，相反，有一些进步人士和同情革命同情游击队的人士，纷纷伸出于来，准备着救援游击队的幸存者。

庞博、因蒂他们来到科恰班巴——圣克鲁斯的公路沿线上，潜伏了一个白天，晚上他们踏上公路，他们想拦截一辆汽车使他们搭乘能奔向远方，结果，他们正好拦截到了一辆正在寻找他们，准备支援他们的车辆，于是这一辆车把他们载到了科恰班巴。在这里，因蒂已经如鱼得水，他有许多关系和朋友，他把余下来的其他同志和他本人一起，分别安排隐匿了起来。一直隐匿了三四个月，待风浪平静下来以后，因蒂和达里奥两个玻利维亚籍战友仍然留在玻利维亚开展地下活动，而他们又设法让庞博、贝尼尼奥、乌尔瓦诺三名古巴战友，越过玻利维亚西部边境，护送他们进入智利，在智利，他们受到智利进步人士的支助，然后，他们转道巴黎，回到了亲爱的祖国古巴。他们当然受到了母亲欢迎英雄儿子归来一般的热情欢迎。

但是，他们在走下飞机的舷梯，踏上祖国的土地的一刻，当他们跪下来亲吻着祖国的热土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泪如泉涌，泣不成声。他们不是悲伤和悔恨，他们只是在沉痛地想着，从这里离开的十七名勇士，回来时，只留下了他们三人，特别是，伟大的指挥员切·格瓦拉，他再也不能回到这一方红色的火热的土地上了。然而，正是为着这方红色的火热的土地，他们才从这里毅然离去的呀，为着这片热土，为着世界上每一片黑暗的土地都鲜红起来，明亮起来，英雄们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付出了多少鲜血、生命和热烈的爱恋啊！

庞博、贝尼尼奥和乌尔瓦诺，他们三个人，在走下飞机前已经约定，他

们每人都要带给古巴母亲土地十五份热吻，一份是他们自己的，另外的十四份，是代表着伟大亲爱的切，代表着其他另外十三位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战友的。

古巴举国致哀三十天

古巴一直关注着切·格瓦拉的活动，关注着他领导的玻利维亚游击队的斗争。

菲德尔·卡斯特罗，一直关注着与切·格瓦拉有联系的所有的一切。

从1967年10月10日开始，整个哈瓦那，整个古巴都严重的不安起来，新闻媒体，广播电台甚至《革命报》，都开始不加评论地转述着外国新闻媒体播发的有关切·格瓦拉已经在玻利维亚被杀害的消息。

10月15日，菲德尔·卡斯特罗令人如此罕见地低着他总是高昂的头颅，垂着眼眉，满脸饱含沉痛的神色，出现在哈瓦那的电视荧屏上。他镇定地发表演说，宣布了切·格瓦拉已经献身的消息。他尽可能详细地谈到了切·格瓦拉最后的斗争和他英勇牺牲的经过，他开始愤怒地揭露着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杀害切·格瓦拉和游击队员其他烈士的残忍和罪行。同时，菲德尔·卡斯特罗郑重地宣布古巴革命政府作出的决议。决议表彰了切·格瓦拉在他辉煌而短暂的一生中，为古巴人民、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所作出的杰出的、伟大的奉献，表彰他为此建树的不朽的丰功伟绩。同时宣布，成立由切·格瓦拉的最亲密战友之一，胡安·阿尔梅达领导的全国治丧委员会和纪念委员会，宣布10月8日，将定为是“英雄游击队员纪念日”，宣布全国致哀三十天，10月18日晚8时，举行全国追悼大会，来追悼伟大的、英雄的切·格瓦拉和他的已经牺牲了的战友们。

10月18日晚8时。古巴全国的汽笛，包括海域里行驶的轮船，发出长时间的哀鸣，哈瓦那革命广场上的礼炮，沉痛地响过了三十九响。

这象征着切·格瓦拉的年龄。他仅仅短暂的生活了三十九个年头，他只战斗生活到了三十九岁。

哈瓦那数十万人民群众，集合到了庄严肃穆的革命广场上来，他们的手中都点燃着轻轻摇曳的蜡烛。在哈瓦那的所有切·格瓦拉的亲密战友，包括他的亲人，他的父亲、妻子和孩子们，都来到了追悼会的会场。

治丧委员会主席，切·格瓦拉在生命的最后一些年月，一直和他并肩战斗在一起的古巴革命起义军中第一个黑人少校，第一个进入古巴最高领导核心的黑色人种战友，他与切·格瓦拉在一起有过许许多多生死与共的日子，他们之间的感情笃诚笃深。今天，他受命来主持切·格瓦拉的追悼会。

宣布追悼大会开始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表《悼念切》的长篇演说，痛致悼词，沉痛地哀悼切。

革命的同志们：

我第一次会见切是在1955年7月或8月的某一天。一天夜里——正象写在他的著作中回忆的那样——他成了“格拉玛号”的一个未来的远征队员，虽然那时候这支远征队还没有船，也没有武器，也没有军队。

切就是这样，与劳尔一起，成了“格拉玛号”名册中的两个最早的成员。自那时以来已经十二年了——这是充满了斗争和历史意义的十二年。在这段期间，许多勇敢的和宝贵的人牺牲了生命，但是同时，在我们整个革命岁月里，也出现了从革命人民之中锻炼出来的一些杰出人物，在这些人和人民之间，出现了无法形容的感情和友谊。

我们今天晚上举行的大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要表达我们对他——一个最新亲密、最可爱、毫无疑问，也是我们最杰出的的革命同志——的感情，表达我们对他以及同他一起战斗和牺牲的英雄们，以及对他的那支为革命谱

写了光辉的和绝不能抹煞的历史诗篇的国际主义队伍的情感。

切——他的朴直、他的性格、他的纯真、他的同志般的态度、他的个性、他的独创精神——使人们甚至在还不了解他的一些特有的和无与伦比的优点时，就感到他是那种能够立即受人喜爱的的人。

切是为保卫这个世界上的穷苦人和被剥夺权利者的事业而牺牲的。他为保卫这个事业实现的那种模范态度和大公无私精神，甚至他那些不共戴天的敌人也不能加以否认。

屹立在历史面前的，是那些按照他的行为而行动的人们，那些为了被压迫者的事业而献出一切的人们——他们的形象随着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而日益变大起来。帝国主义敌人正开始看到过一点，而且不要多久就能证明，他的死将象一颗种子那样终于要开花结果，产生出许多决心追随他的人，许多决心以他为榜样的人。……

从我们人民的革命观点来看，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切的榜样？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失去了他吗？确实，我们看不到他的新著作了，确实，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但是，切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一笔遗产，一大笔遗产，而我们这些非常了解他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成为他的遗产的受益人。

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的革命思想、他的革命美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的性格、他的意志、他的坚强、他的工作精神。一句话，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的榜样！切的榜样是我们人民的典范——切的榜样是我们人民的理想的典范！

如果我们想说出我们希望我们的革命战士、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人民成为怎样的人，我们一定毫不迟疑地说：“要让他们象切！”如果我们想说出我们要我们的后代成为怎样的人，我们一定说：“要让他们象切！”如果我们想说出我们要我们的子女怎样受教育，我们一定毫不迟疑地说：“我们要他们在切的精神下受教育！”如果我们要找一个典范的人，一个不是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典范的人，一个属于将来的典范的人，我衷心地，这样一个在行为上没有一丝污点，在举动中毫无瑕疵的典范就是切！如果我们想表达我们要我们的子女成为怎样的人，那么作为热情的革命者，我们一定会从心底里说：“我们要他们象切！”

菲德尔·卡斯特罗这篇悼词，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篇，每一个字都饱含着对切·格瓦拉真挚无比的热爱和炽情。每一个字都仿佛饱含着动人心魄的热血和泪水。

古巴革命军民，长久的深陷在对切·格瓦拉的追思和哀痛之中。古巴人民将是永远不会忘记切的。

在10月的追悼会9个月后，到了1968年的7月间，又一条关于切·格瓦拉的重大新闻，突然从一个早晨开始，使整个古巴的全体人民再一次激起强烈的震荡和颤动。7月3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亚那电视台的早新闻中，突然宣布：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回到了古巴。而且，经过检验和核实，确实是切的日记，因此，古巴党和政府已经作出决定，作为革命教材，将大量印刷切·格瓦拉日记，将免费分发给每一个渴望阅读这本日记的人。

切·格瓦拉的玻利维亚日记，从1966年11月7日记起，一直记到1967年10月7日，一直记到他最后一战牺牲的前一天。他被俘以后，他的背包和随身携带的一切文件、书籍和日记本，都落到了玻利维亚政府军手中。这本切·格瓦拉的日记本，是怎样从敌人的手中，又辗转回到古巴来的呢？这在

切·格瓦拉日记最初归来的日子，它所通过的渠道还是个最严格的秘密。

又过了两年，到了1970年，还是在7月间，菲德尔·卡斯特罗再一次宣告了一件与切·格瓦拉有关的震撼人心的消息，在纪念“七·二六运动”的群众集会上，卡斯特罗心情沉重，但同时不无激动地告诉古巴人民：切·格瓦拉牺牲后所拓下来的面膜，以及他的一双手，也回到古巴来了。

这真是出现了奇迹！

当切·格瓦拉的一双手，重新回到古巴时，在哈瓦那，首先检验了这双手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劳尔·卡斯特罗，是胡安·阿尔梅达，是塞莉亚·桑切斯，是埃斯平·比马耳。他们都熟识这双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能认出这双手来。

随后，菲德尔·卡斯特罗请来了与这双手关系更深一层的切·格瓦拉的妻子阿莱达·马尔奇，让她来辨认。阿莱达一见这双手，马上就泣不成声，痛哭了起来，这是一双曾经给过她多少温暖和爱抚的手啊，她一眼就认出来了。

战友们给了阿莱达最大的抚慰。

菲德尔·卡斯特罗要求阿莱达，要求她暂时不要把有一双父亲的手回来的消息告诉给切的孩子们，他们还都太小，幼小的心灵怎么能装得下这么巨大的痛苦，最大的小伊尔达，也才仅仅只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而最小的小儿子小埃内斯抵，刚刚还只有五岁。

切·格瓦拉的日记，他牺牲后拓下来的面膜，以及他的一双手，是怎样从玻利维亚回到了古巴来的呢？现在，在1970年的时候，这一绝对的秘密渠道可以打开了。原来，这一渠道是来自玻利维亚当局的前内政部长阿格达斯博士。这个人，原本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多年来在玻利维亚雇佣的间谍。在美国走狗巴里恩托斯当总统的期间，他是玻利维亚政府的内政部长。在镇压切·格瓦拉领导的玻利维亚游击队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特种部队以及执行特种行动的玻利维亚突击营的联合司令部，理所当然设置在这个国家的内政部，所以，切·格瓦拉牺牲后，从他那里缴获的文件、物品，和所有材料，都收归到内政部来存档，切·格瓦拉被切割下来的脑袋和双手，自然也装入容器，从格兰德城又运到了在拉巴斯的内政部。切·格瓦拉的头颅美国中央情报局坚持要运送到巴拿运河区美国南方司令部特别行动小组去检验，因此，在临走时，玻利维亚内政部只拓下了石膏面膜，然后，把切·格瓦拉的脑袋运走了。然而，因为有了脑袋可以检验，用不着一双手了，所以，切·格瓦拉的这双手，就在玻利维亚内政部保存了下来。而切·格瓦拉的日记，用照相技术复制了几套，每套包括着两百五十张照片。阿格达斯作为内政部部长，他有条件控制了一套这样的照片。

在美国帝国主义，中央情报局，和他们的忠实的走狗，在镇压切·格瓦拉游击队的残酷血腥行动中，阿格达斯虽然官居高位，他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固定支取着巨额的酬金，但是，他的人类良心，还是被凶残的罪恶所惊醒，他认清了的中央情报局和他们的走狗，是一伙阴谋反对全人类的罪恶匪帮，所以，他毅然决然准备弃暗投明，他勇敢地冒着巨大的风险，作出了非常难于作出的努力，先把切·格瓦拉的手和面摸妥善地隐匿了起来，接着把切·格瓦拉的日记送到了古巴，最后又千方百计，把切·格瓦拉的双手和面摸带到了古巴，他也举家迁到了在古巴来要求在美国定居下来，要求成为一个古巴公民。

菲德尔·卡斯特罗非常感激阿格达斯博士在弃暗投明中为革命的古巴作出的重要事情。他同时指示非常妥善地安排了阿格达斯全家在古巴的定居。

切·格瓦拉的日记、面膜和双手，就是如此辗转回到古巴来的。

切·格瓦拉的手和面膜，该作怎样的处置呢？古巴党和政府决定，用切·格瓦拉牺牲之后拓下来的不屈的面模形象，拓出成千上方面型面模发送给每一个工厂、农村、学校和兵营供人们瞻仰。

切·格瓦拉留下来的的一双手，该怎样保存呢？

卡斯特罗在1970年7月26日纪念“七·二六”运动的万人大会上，发布切·格瓦拉的一双手回到了古巴的消息时，他冲着话筒前所有人请问：“留下来的一双手，应该怎么办？”

悲伤而激动的数万人们齐声回答是：“保存下来！”“菲德尔，把切保存下来！——”

卡斯特罗想到了古巴人民必然会有这样的意愿。事实上，这正是他的意愿。也是切的所有战友的意愿。在此之前，卡斯特罗已经争求过切·格瓦拉的父亲林奇先生，以及他的妻子阿莱达的意见，他们都不反对把切·格瓦拉的双手保留下来。尽管他们知道，他们每当再看到切·格瓦拉的手时，他们肯定会勾起心头无限深刻的痛苦和悲伤。但是，他们同时知道，无疑的，这样无限深刻的痛苦和悲伤，也还会转化成无限深刻，铭心刻骨的仇恨和誓与敌人不共戴天的冲天力量，人民会受到巨大的震颤、鼓舞、激励，他们的耳边会立刻响起切·格瓦拉旗帜猎猎飘响的声音，那会是一种唤醒整个世界惊醒和起来的呼喊，是一种钟声和号于是，把切·格瓦拉的一双手保存下来的决定，就付诸执行了。

古巴的医务专家们，为了保存好切的一双手，他们悉心地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把切·格瓦拉的这双栩栩如生的手，安放到一个玻璃容器中。他们把它永远贮藏安放在一个圣洁神圣的地方，决定在每年的10月8日切的忌日，把盛着这双手的容器，移放到神圣的马蒂纪念碑下，让人民自由地瞻仰这两只曾经为解放全人类，创造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主义的压榨，没有贫穷和苦难，没有愚昧和蛮荒，而英勇奋斗不息的神圣的巨手。

古巴人民将永远深深地怀念和纪念切·格瓦拉。时间、岁月、流逝的光阴和风雨，都不会冲淡和消融古巴人民对切·格瓦拉永志不忘的深情和怀念。

年复一年过去。世事沧桑。整个世界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古巴，切·格瓦拉已经悄然离去三十多个年头了。但是，革命的古巴人民，仍然无时无刻会觉得，切·格瓦拉仍然还与他们同在，在与他们绵延无限地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他们的中间。

当年三十多岁、四十岁刚刚挂零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业已年近七十岁。如果切·格瓦拉健在的话，他也快接近这个年龄了。然而，他永远只活在了他三十九岁的年限上。所以，卡斯特罗每当想起他来，时光的车轮仿佛仍然都很年轻。虽然卡斯特罗的胡子变苍了，他的胡子变白了，但是，他对切·格瓦拉的友情、怀念和追忆，仍然萦回不绝，浓郁的颜色，仿佛越老越浓，越浓越厚，越厚越重，永葆着青春的色彩。

进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菲德尔不止一次地在电视台上，和他的古巴人民不断地仍然谈论着切：谈论着格瓦拉，每谈起来，仍然充满了催人肺腑的深情。他总是在这样说：“有多少次，我梦见过切·格瓦拉，我梦

见他回来了，他活着。他在我们的国家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我们正在努力消除与他的思想、作风和他的榜样相对立的平庸。切的某些思想今天具有绝对的价值。没有他的这些思想就没有古巴，没有共产主义。”

古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旗帜。

苏联解体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凛然表示：“即使古巴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共产党国家，亦不改变。”他强调指出说：“我们的革命，所具最杰出的特质，即在于它并非抄袭，乃是出于创造。”

切·格瓦拉在他活着的时候，所做的一切，可以说是心力交瘁地为这种创造作出了他永难磨灭的巨大奉献。在古巴革命胜利的日子里，对外，古巴始终显示着与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决心，坚决反对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同时坚决抵制了其他任何国家对它实行的控制的企图，他们始终坚持着独立和自主，始终不渝地坚持着对真理和正义事业的执着追求。对内，首先是对革命本身，对革命的领导阶层，始终坚持着彻底革命化的方针坚决杜绝和彻底清除作为统治阶级历史固有的官僚主义、贪污腐化、骄奢淫逸的现象。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中的老战士，在革命战斗中从普通士兵成为古巴武装部队西部集团军司令的奥乔亚中将，在古巴革命过去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也曾建树下了无数的丰功伟绩，是卡斯特罗最为珍视器重的爱将之一，但是，由于他利用手中职权，参与贩毒赢利的非法活动，一经发现，绝不饶恕，毅然枪毙他。古巴政府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兼交通部长托拉尔瓦，内政部长阿夫兰特，也都曾是革命的功臣，但也都因为贪污腐化而被执行了枪决。古巴对贪污腐败行为，是绝不宽恕的，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所有权力部门，是绝不赋予任何腐败的特殊权力的，对所有的领导者，官僚主义，贪污腐败，都意味着他首先在政治上的死亡。

古巴革命从胜利伊始首先厉行的革命政策；第一是土地改革，第二是进行扫盲教育。土改是非常彻底的，卡斯特罗家族是奥连省的大庄园主，拥有一万三千公顷土地，毫不例外，全都无条件地分给了没有土地的农民。为此，卡斯特罗的妹妹胡安娜，甚至愤然离开古巴，宣布和她的在古巴革命政权的最高领导层的两个哥哥完全断绝关系。可见古巴土改的深刻和彻底。而古巴革命从胜利之初即在全国开展的扫盲教育运动。其结果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在古巴革命前，古巴的文盲率占全国人口的将近百分之八十。而到了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期统计，古巴的文盲率，已经下降到可受教育人口的0.3%。现在古巴是全世界各国文盲最少的国家之一。

1996年5月上旬，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夫人，法国人权组织、法国自由基金会的领导人达尼埃尔·密特朗，对南美的诸多国家进行了一次有关医疗卫生状况的考察。5月15日，她回到法国巴黎后，马上向新闻界津津乐道，赞扬古巴的医疗卫生事业，她赞扬古巴“建立了不比任何国家差的制度。”有两个数字可以说明情况，第一，古巴的婴儿死亡率，不仅低于拉丁美洲各国，同时也低于美国，古巴是全世界婴儿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可见其医疗保险制度的深刻和优质。第二，古巴的人均寿命，已经从古巴革命前的五十岁，上升到了七十三点九岁，也高于拉丁美洲各国和美国，成为了全世界人民最为长寿的国家之一。

由于全民族的文化水平的提高，古巴现在也还是全世界全民族整体人文文化觉悟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在古巴，差不多是全世界少有的基本消除了种族歧视的国家之一。在人权口号叫得最响的美国，全世界人民都从电视上

看到了美国白人警察在洛杉矶的效区公路上，如何用狼牙狗棒把黑人活活打死，人们同样还看到了这样的景观，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白人警察是怎样非人性地殴打地安移民，把他们打得在地上打滚，死去活来，尽情地发泄他们的种族偏见和野蛮。这在古巴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情。在古巴人口中占12%左右的黑人，他们在古巴社会中完全真正地拥有着平等的社会地位，国家的最高领导群体中，军队司令和政府部长中，都有黑人兄弟参加，全世界人民亮着眼睛，曾经看到了古巴的一个丰饶的果实，这就是作为世界冠军的古巴女排。在这支世界冠军女排队伍里，有古巴的白色人种，也有古巴的黑色人种，人们从这个战斗的群体中，完全可以看到她们的完全默契和亲密无间。人们可以从这个战斗的群体中，特别看到那些杰出无比的黑人小妹妹，一个个都亮晶晶地璀璨闪光，胜似黑珍珠，她们不仅仅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也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漂亮的妇女，她们的精神状态，那种压倒一切的气势和魅力，远非是美国的黑人“拳王”们所可比拟的。在美国的黑人“拳王”们的脸上，人们永远不难找到愤怒，忧郁甚至是悲伤的色彩，包括阿里，包括泰森，人们什么时候看到过他们出自内心的由衷的快乐和爽朗？几乎是没有什么的。但是，在来自古巴的黑珍珠们的脸上，能寻找得一丝被压抑的自卑的阴暗的神色吗？

是绝对找不到的。

古巴革命胜利，三十多年的岁月已经过去了。

古巴革命从胜利伊始到其后的三十多年的生存和发展历史中，始终伴随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侵略，不停顿的恫吓，威胁和一分钟也不曾消解过的封锁。古巴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始终在饱受美帝国主义无情的扼杀和窒息。美帝国主义总想置古巴死地而后快，妄想把古巴革命的红色政权，从他们的眼皮低下抹煞开去，完全地抹掉。

古巴人民始终承受着美帝国主义强力的窒息和压迫。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一刻也不放松的包围和封锁，甚至往往还有极为愚蠢刻毒的捣乱和破坏，这给古巴人民带来了许多灾难和损失，使古巴人民蒙受了十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古巴人民为打破美国的包围和封锁，不知付出了多少牺牲，流血和生命的代价。

但是，古巴人民始终绝不示弱和屈服，古巴人民在最为艰难条件下，在最为险恶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始终一手拿枪，一手拿生产工具，描绘建设社会主义古巴的蓝图，建设社会主义的古巴。

菲德尔·卡斯特罗，始终坚持不懈地掌握着古巴革命前进的航向和舵盘。而切·格瓦拉和其他一些杰出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始终忠诚不渝充当着这条行进的大船上的最好的水手长和大副。

切·格瓦拉在担任着这样的水手长和大副的年月里，他为古巴革命的伟大成果，社会主义基础的奠定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开辟，可以说探索铺平了十分广阔的道路。

1960年，切·格瓦拉在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吸取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在古巴的经济建设中，确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1961年，在美帝国主义雇佣军入侵古巴失败以后，在当年8月间召开的乌拉圭埃斯特角会议上，作为古巴代表团的团长，切·格瓦拉向美国代表团成员，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特别顾问古温德，提出了请美帝国主义改弦易辙，以贸易来代替侵略行为的建议。实际上，切·格瓦拉向古温德宣布的是，古

巴准备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反对引进美国资本，来参加古巴的经济建设。

古温德当时对格瓦拉的建议，有十分积极的反响。这个建议事实上在后来，肯尼迪总统也有过认真的深思和考虑，只是后来他死的太早，中断了这种深思和考虑。美国反动愚昧的保守势力，坚决拒绝放弃对古巴包围和封锁的政策。

尽管如此，在建设环境得不到改善和保障的环境下，在古巴全民加强防范的同时，作为古巴经济建设的主要领导者和决策人，切·格瓦拉仍然坚定地强调在古巴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以经济建设为先导，全力以赴地突击进行古巴经济建设，努力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

在切·格瓦拉牺牲后，他的经济建设思想，进一步受到研究和重视，他生前写下的大量的关于经济建设的思考笔记和纲要文章被整理发表了出来，其中有一份文件是他在1961年时候起草的，这份文件的题目是：《工业化的各项任务》。

在这个文件中，切·格瓦拉明确指出，古巴摆脱美帝国主义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是最大限度的迅速发展生产力，迅速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切·格瓦拉指出：

社会主义建设是以劳动成果，日益发展的生产和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如果我们不能提高我们的生产量，如果我们没有各式各样的消费品，那么提高我们的觉悟也徒劳无益。

切·格瓦拉的武装斗争的革命思想，给古巴革命和古巴人民留下了财富。

切·格瓦拉的经济建设思想，也给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改善和提高，留下了功不可没的巨大财富。

古巴是个小国。

在革命胜利以前的古巴，也是一个经济完全不能独立的国家，是一个经济非常单一的贫弱的国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除了一部分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富豪以外，绝大多数的古巴人，过的是形同奴隶般的生活，没有土地的农民，一年有三个季度失业，生活完全没有保障，城市里的大多数居民，也全生活在外国资本家，主要是美国资本的的奴役压迫和剥削中，很少有古巴人，是拥有着人的尊严和平等的社会地位的。

但是，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的古巴人民，完全彻底地颠倒和扭转了这样的生活状态和面貌。古巴人成为了古巴的真正的主人。由于是事实上的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古巴独立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再加上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的全部年代里，美帝国主义一刻不停顿的捣乱、破坏、包围和封锁，古巴今天似乎仍然还没有建设成为是一个十分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生产力水平，尽管已经有了空前的极大发展，但相对地说，仍然比较低下，它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虽然也有了不可比拟，甚至不可想象的极大提高和改善，但是也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十分的富足的程度，人民生活的水平，相对说自然不算很高，但也不能说仍然没有脱离贫穷。不能这样说，古巴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不能算甚高，但是却拥有着社会主义社会绝对的优越性，它们没有绝对的富有，却也没有绝对的贫穷。没有任何一个古巴人，仍然存在着不得温饱，没有衣穿，没有房住的问题，在古巴彻底消灭了失业现象，没有一个人会是不自觉的无业游民；国家把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关照起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为接受教育，医疗保险发愁，没有任何一个人，享受不到应该享

受的休息和娱乐。

在革命发生后的古巴，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年代和岁月，经济建设和发展水平，其增长率都在增长和发展，始终位居在拉丁美洲各国第一位的位置上。

古巴今天在上世界上，仍然不是一个大国，不能算是一个富国。

但是，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古巴在今天的世界上，无论如何而论，都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顶天立地，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以恣意欺凌和辱谩的强国。

古巴是今天世界上一个强国。

1996年5月1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七届代表大会上，发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长篇讲话。他的讲话不断地被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所打断。卡斯特罗说：

古巴已成为一个象征。我们仍将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为此，我们捍卫古巴革命至今，我们没有改变红旗的颜色。

古巴之所以能够坚持至今，因为它没有改变红旗的颜色，没有改变思想意识，也没有改变革命原则。

我们所作的努力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所希望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我们所捍卫的也正是社会主义。

现在，古巴革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对此，谁也不容怀疑。

菲德尔·卡斯特罗说出来的，是世界的强音。

在岁月进入到1996年的时期以来，尽管美帝国主义仍然不断地对古巴实行挑衅和加压，3月24日，美国克林顿政府纵容古巴的反革命流亡者，从美国的佛罗里达州驾机入侵古巴领海、领空，在古巴空军的警告不予理睬后，古巴空军坚决击落了入侵者的飞机。美国佬为此又恼羞成怒，暴跳如雷，通过了两个美国国会的极右派议员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案，进一步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丑恶嘴脸，企图进一步扼杀和封锁社会主义的古巴。但是，美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狰狞面目，越暴露越狰狞，越狰狞越丑恶，越丑恶越不得人心，美国的许多盟国，包括英国、法国、加拿大、墨西哥、两班牙以及欧盟各国，都纷纷谴责美国的帝国主义强盗伎俩一般的封锁。

古巴，革命的古巴，社会主义的古巴，已经越来越成为了帝国主义梗骨在喉的吞不下，咽不下的硬骨头，已经越来越成为帝国主义黔驴技穷，无可奈何的古巴。

在这样的年代里，自然的，切·格瓦拉会在每朝每夕，迈着他仍然脚穿伞兵靴的脚步，仍然是一身橄榄绿的戎装，高仰着他戴着无沿软帽的骄傲而崇高地思想着的头颅重新回到古巴来，重新回到哈瓦那，重新回到马埃斯特腊山，重新回到圣克拉腊，重新回到比那尔——德里奥省，回到他的古巴银行，回到他的古巴工业部，回到他一切战斗、工作、劳动和生活过的地方，他还会一次又一次地来到菲德尔·卡斯特的梦中，回到所有的战友们和亲人们的梦中，回到世世代代，绵延不熄的革命的古巴人民的心中。

他是人民心中永远不息的灯火。

他是古巴的天空里永不褪色，永远鲜红透亮的旗帜和红星。

古巴没有改变红旗的颜色，因为它饱含着无数烈士鲜红的不朽的热血，特别它也饱含像切·格瓦拉这样的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英雄之列的永垂不朽的真正英雄的鲜血。切·格瓦拉必将是永垂不朽的。

尾声：切·格瓦拉永垂不朽

切·格瓦拉是无比向往和热爱中国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中国人民怀有着极为深厚的赤诚的挚情。他的心，始终热恋着中国。

切·格瓦拉在中国人民心中，也是备受热爱和尊敬的革命英雄，是一种坚强和非凡毅力的象征。切·格瓦拉的许多光辉著作，包括《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一直是中国人民广为流传和阅读的宝贵读物。多种版本的《格瓦拉传》，以及无数的宣传切·格瓦拉的诗文，在中国也传布甚广。

不过，由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切·格瓦拉的英雄品质和不朽的革命事迹，在中国并没有十分广泛的正面宣传过，尽管如此，他在中国仍然差不多是家喻户晓，备受人们崇拜和敬仰的伟大英雄。

今天，在切·格瓦拉辞世已近三十年的时候，古巴人民深刻怀念切·格瓦拉，铭记如初。在切·格瓦拉最后战斗牺牲的玻利维亚，他也被那里的人民推崇为最伟大的英雄。杀害切·格瓦拉的所有凶恶的敌人，包括美帝国主义当时在玻利维亚走狗巴里恩托斯在内，最后都没有落得好下场，后来的玻利维亚历届政府，也开始逐渐表示尊敬切·格瓦拉，开始逐渐承认切·格瓦拉为整个拉丁美洲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伟大贡献。

切·格瓦拉的人格和品质，他的圣洁和崇高，他的璀璨和磊落，在拉丁美洲，在世界各地，越来越成为最为辉煌夺目的魅力所在，首先在法国，切·格瓦拉成为青年革命运动的最热烈崇拜的旗帜；在西班牙的马德里街头，人们为切·格瓦拉树立起来的巨幅画像，比两层楼房还要高一些。在英国和爱尔兰，切·格瓦拉父亲的祖籍，在那里商标上印有切·格瓦拉像片的“切·格瓦拉”牌啤酒，成为最畅销的啤酒，而且，这种啤酒畅销到美国和墨西哥，畅销到香港和巴西、阿根廷，更为大受欢迎。

在一定意义上说，切·格瓦拉的游击队，已经完全突破了美国的封锁，开始大批进入到美国，在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的超级市场里，在各式各样的展销柜里，都能看刻着切·格瓦拉肖象的商品和制品，有的是高档金表，有的是有着切·格瓦拉签名字样的各种纪念物和贵重礼品，甚至狡猾的日本商人，也似乎领悟到了切·格瓦拉备受人们崇敬和向往的价值，在日本东京街头立起来的切·格瓦拉塑像比比皆是，有的是借格瓦拉抽着雪茄烟的因缘作着香烟广告，有的是借着切·格瓦拉脚蹬着的伞兵靴，作着鞋和靴袜的广告。而法国和意大利的时装名模们，也都纷纷竞相佩戴起切·格瓦拉的圆型无沿软帽来，凭添三分英雄气，激扬她们诱人的美丽。

在今天，坚持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也在实行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古巴，在美丽的哈瓦那，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如织，在美丽如画的古巴海滨。开展着吸引全世界游人瞩目的健身游泳运动，旅游业正给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着极为丰厚的外汇收入。

有趣的是，这些收入，有很大一部分的比重，是从出售切·格瓦拉的像章、纪念饰物，和有他形象和签名的足球衫，圆型无沿软帽等等一些物品中收取来的。仿佛也是一个象征，即切·格瓦拉仍然在为革命的古巴的经济工作，在劳作和操心。

切·格瓦拉，无可置疑成了全世界伟大英雄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不仅成为了崇高的象征，也成为了美和光荣的象征。

他不仅是已经远去的昔日英雄。

他更是正在走来的新世纪的璀灿如血的曙光。

切·格瓦拉是一定会重新回到一个崭新的世界上来的。全世界正在响彻着他的脚步声的巨大回响。

